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15期 2022年6月



專題論文

- 數位時代下的新公共廣播服務：以台灣《公視+》串流平台為例
- 在傳統和數位之間擺盪：台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
- 性別文化空間、影像與公共性：以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衍生文化產製品
- 臺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現

研究誌要

- 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對話：以學術傳播的媒介化為考察場域

歷史與現場

- 烏克蘭的軍事情境
- 不實資訊、廣場事件與戰爭究責：理解烏克蘭

書評書介

- 評析《運動—批判社會學的視野》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創刊

半年刊，6、12月出刊

出版：2022年6月 第十五期

主辦機構

媒體改造學社

編輯顧問

卜衛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井迎瑞	台南藝術大學
王春泉	西北大學
王嵩音	中正大學
王毓莉	文化大學
史安斌	清華大學(北京)
吳予敏	深圳大學
呂新雨	華東師範大學
李金銓	政治大學
林元輝	政治大學
林東泰	臺灣師範大學
林靜伶	輔仁大學
邱林川	新加坡國立大學
胡光夏	世新大學
胡泳	北京大學
倪炎元	銘傳大學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
翁秀琪	世新大學
張志安	中山大學(廣州)
張裕亮	南華大學
張錦華	台灣大學
張國良	交通大學(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學(上海)
陳衛星	中國傳媒大學
單波	武漢大學
曹晉	復旦大學
劉海龍	人民大學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
趙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蕭蘋	中山大學(高雄)

編輯委員會

主編	羅世宏	中正大學
編輯委員	林富美	世新大學(執行編輯)
	馮建三	政治大學
	陳光興	交通大學
	洪貞玲	台灣大學
助理編輯	劉忠博	華南理工大學

出版

發行人 媒體改造學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5221499

傳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網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黃勻祺

封面設計 馮議徽

訂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本刊採用創意公有授權條款，如下



目 次

编辑室报告：i

专题论文

数字时代下的新公共广电服务：

以台湾《公视+》串流平台为例.....林玉鹏、蔡蕙如/1

在传统和数字之间摆荡：台湾公视的全媒体转型.....罗慧雯/29

性别文化空间、影像与公共性：

以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与文化产制品为例.....孙嘉穗/67

台湾的东南亚族裔地景与媒体再现.....张春炎/87

研究志要

媒介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对话：

以学术传播的媒介化为考察场域.....刘忠博、冼楚桥/113

历史与现场

乌克兰的军事情境.....冯建三译注/139

不实信息、广场事件与战争责任：理解乌克兰.....冯建三/161

书评书介

评析《运动—批判社会学的视野》.....陈子轩/203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稿約

稿約詳情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编辑室报告：

当数字依赖已成为当代人生活的日常，透过媒介中介所架构的符号意义与逻辑，或恐已如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所述「拟像真实」已取代真实，成为比真实还真实的「超真实」。

对阅听人来说，这种看似为「自由意识选择」下的「拟像」接收，或恐能让其情不自觉，或无法自拔的深陷于一种「拟真」的叙事套路，让真实或虚假，逃离理性的规范，取而代之的是媒体建构下的符号意义的情感认同。

是以，无论野心勃勃的政客或奉资本累积为圭臬的资本家，理当不会坐视这种披着「自由意识选择」的外衣，实则足以召唤普罗大众沉浸于符号拜物主义的非理性行为。因为这种非理性的认同，一旦成为信仰，其汇聚的集体行动，往往成为其可以收编与收割的权力或商机。对心有所怀的他们来说，若能顺势扰动，让其自然而然，顺势成「潮」，沛然成为「主流」，进而让个人或群体，找到「我群」与「他群」的划界认同，更是额首称庆。

若主流成为政经脉络下被操纵的假象，则坚持与被视为「少数」、「不同意」、「非主流」的媒体结构与内容文本，或恐才是改变与捍卫多元公共价值的关键。当拟真逻辑与符号消费已渗透推展至政治、商业、艺术、性别、族群乃至于恐怖的战争报导时，捍卫多元公共价值的公共电视的发展，就变得格外重要。

承上，本期的专题旨在探讨数字变迁下，有关多元公共价值的努力与体现。共有四篇：第一篇是由林玉鹏、蔡蕙如老师所撰写的〈数字时代下的新公共广电服务：以台湾《公视+》串流平台为例〉。该文分析公视+面对 OTT 的挑战，除了扮演产制优质「电视」节目外，如何维持其公广服务与普及性原则公共价值；第二篇则由罗慧雯老师所写的〈在传统和数字之间摆荡：台湾公视的全媒体转型〉，该文以策略管理学的意义建构理论，探讨公视管理阶层如何认知全媒体转型的意义，如何透过转型来实践公共电视理念，并检讨其转型困境；第三篇则由孙嘉穗老师所撰写的〈性别文化空间、影像与公共性：以阿嬷家博物馆与衍生文化产制品为例〉，该文以台湾的慰安妇博物

馆「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与其衍生之纪录片为例，讨论性别文化空间与影像，如何展现公共性、承载记忆文化，建构性别网络，展现其公共价值与理念；第四篇则由张春炎老师所撰写的〈台湾的东南亚族裔地景与媒体再现〉，该文运用数据说明，在台湾，东南亚移民／工，如何透过人数的增加，建构成为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藉由东南亚族裔地景的多元意义，反思其作为新文化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本期研究志要是由刘忠博、冼楚桥老师所撰写的〈媒介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对话：以学术传播的媒介化为考察场域〉乙文。该文主张，近年有关媒介化理论的研究，研究者常有意或无意地将政治经济的因素，排除于理论的建构过程，造成媒介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被忽略。其间有关应纳入以学术传播的媒介化为考察场域，就学者、图书馆、大学机构与政府单位等行动者，探讨其形构知识生产的认证历程的研究建议，十分中肯。

本期的历史现场的内容，更是十分难得与精采。面对本世纪很难想象的俄乌战争，相关媒体报导，充斥着大美国主义的「拟真」叙事时，冯建三老师顶着酷暑，为期刊翻译了由包亚克（Jacques Baud）所述之〈乌克兰的军事情境〉相关事件与论述。

包亚克是瑞士参谋本部的退役上校，曾经担任瑞士战略情报分析工作，苏联解体后，参与了欧洲与俄罗斯军方及情报官员的最高层之讨论工作，堪称东欧专家。其书写，我们有幸能透过冯老师的翻译，让我们重新检视非美国主流传媒下，有趣、重要且有争议的视野。诚如冯老师所言，该呈现，虽不一定能「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但文章内容所披露的事情与观点，与欧美主流明显不同，或许能化解单极世界的可怕与误解，让世界平衡一些。

对此一正在进行的事件与现场，冯建三老师更鼎力相助，撰写了一篇〈不实信息、广场事件与战争责任：理解乌克兰〉。该文通过「布查镇」屠杀疑云，对「广场事件」进行真相的探讨。也同意乌裔加拿大学者的「广场」分析，是有特定力量刻意转和平示威为血腥事件，对这场战的原因与问责，提出了看法，不同于那些经济学人的论述，令人敬佩。

本期的书评，是由陈子轩评介由 Richard Giulianotti 着（刘昌德译）的《运动—批判社会学的视野》。该书的书写与论述，架构于理论与议题间，立论

扎实，论述精辟，案例贴切合宜，可以被视为是台湾运动社会学中重要的入门书。

有趣的是不同于许多教科书采取较为中立、「平衡报导」的摘要式写法，Giulianotti 在书中，对近年在北美运动研究社群兴起的身体文化研究(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 简称 PCS)，不吝宣称其立场，大力抨击。突显运动社会学与 PCS 两派的争辩，十多年来，一直没变，读来令人莞尔。

或许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不同的世界观，但造成社会的两极化的极端思维与认同，却可能是人为的。自由、民主，重要的就是沟通、聆听；而媒体的公共价值就在呈现社会多元的视角与关怀。期待本期的专题、研究志要、历史现场与书评，能抛砖引玉，激起更多的真知卓见与讨论。

《传播文化与政治》编辑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五期
2021 年 6 月

数字时代下的新公共广电服务： 以台湾《公视+》串流平台为例

林玉鹏、蔡蕙如*

本文引用格式

林玉鹏、蔡蕙如（2022）。〈数字时代下的新公共广电服务：以台湾《公视+》串流平台为例〉，《传播、文化与政治》，15:1-28。

投稿日期：2021 年 4 月 26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2 月 9 日。

* 作者林玉鹏为国立联合大学台湾语文与传播学系助理授，e-mail:yupenglin@nuu.edu.tw
蔡蕙如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助理教授，e-mail:hjtsai@ntnu.edu.tw。

《摘要》

平台化时代的新挑战，当大多数的观众都在少数几个平台（例如 Google，脸书与 Youtube）进行各种日常活动、接收信息与娱乐。平台化世代的新收视习惯对公共媒体产生影响，导致公共媒体面临创新平台公共服务的新挑战。本研究将以数字时代下的公共媒体的影音串流媒体平台为出发点，并进一步分析解释，公共广电服务除了扮演产制优质「电视」节目之外，如何在影音串流平台发展数字时代下的公广服务。本文回顾相关文献厘清各国公共广电服务在数字时代下的转型策略，再以下列二个面向探究公视+在 OTT 时代下的挑战与如何维持公共价值（特别是普及性原则）（一）《公视+》串流平台的发展方向，试着从《公视+》和公众连结的机制和内容编排方式讨论；（二）台湾公视于国内外串流平台合作发行播映节目策略。思考在与跨国串流媒体平台合作影视内容创作与播映之外，公视+的定位和发展的模式会有何种可能？

关键词:公共广电平台策略、公视+、串流平台、台湾公视、数字策展

壹、前言

全球公共媒体服务都面临平台化时代的新挑战，当大多数的观众都在少数几个平台（例如 Google，脸书与 Youtube）进行各种日常活动、接收信息与娱乐。而巨型娱乐串流平台的兴起带来新的收视情境，阅听人的收视习惯已大幅改变。「看电视」这件事，不只是坐在电视机前面随机或等待节目播出，越来越多人选择随时随地透过各种载具与平台 app，以更多元方式收看各种影视内容。然而，平台化世代的新收视习惯，更对公共媒体产生新影响，公共媒体将思考如何透过创新平台公共服务，重回大众阅听人的视野。

2021 年四月立法院第 10 届第 3 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 11 次全体委员会议针对「公共媒体法推动进度与我国公广集团面对全球数字化之发展规划」进行报告与质询（2021 年 4 月 14 日）。其中《公视+》成为质询重点之一。会议上针对平台使用率、内容多元性与操作使用度进行讨论。文化部是否提出积极政策，媒合更多优质内容上架《公视+》也成为议题核心。公视串流影音平台《公视+》的推出因应数字潮流，面对的公众不再仅限于电视机前的观众，而是扩大至这些使用「非传统媒体」的新观众。进一步来说，公共广电服务正转型为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这里指的「媒体」意味着不只是原本单向的传输内容至观众，还有在串流平台时代的双向互动。公共媒体可以透过阅听众的数字行为（点击次数、停留时间）理解公众的需求，并做为往后收视评量的指标，也可以藉此思考多元的内容，以策展式内容连结，达到更多元性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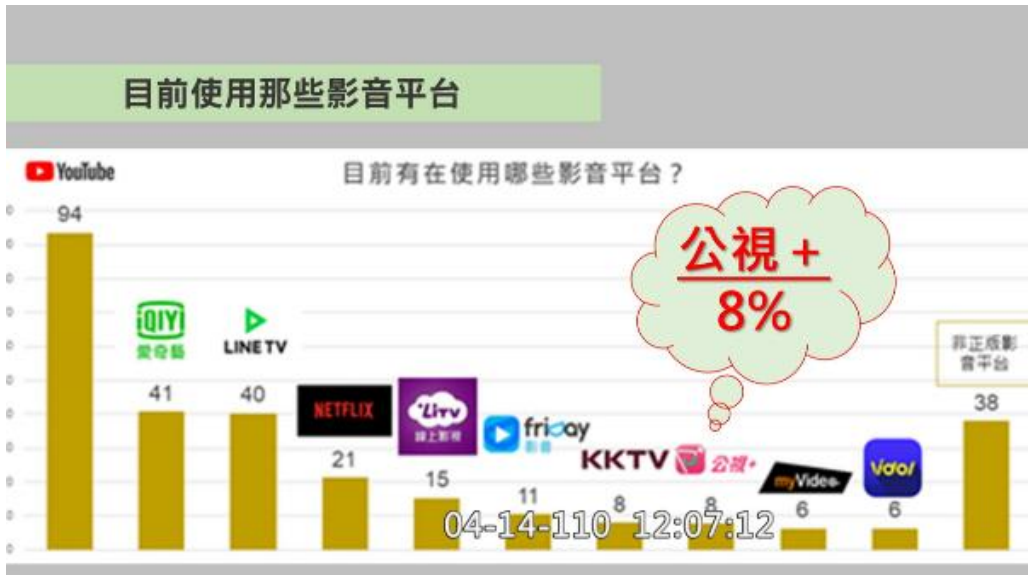
这样的转变呼应了公共媒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公共价值——普及性（universality），相较于传统定义的地理覆盖普及，和节目设计上的普及，串流平台的推出，更能服膺于此公共价值。透过各种不同管道触及最大的公众，以及不限于线性安排、展现弹性的多元节目，重新创造新的普及公共价值，这些都是公共电视在推出串流平台后的关注焦点。

再者，公视长期持续产制优质影视内容节目，但面对平台时代下的国际影音市场竞争，国际串流平台 Netflix、爱奇艺与 LINE TV 在台湾高市占率现况（如图一），如何在数字时代下发展公共媒体新的公共服务策略，实

为一大挑战。事实上，台湾公共电视与国际串流影音平台已有些合作经验，例如 Netflix、CATCHPLAY 与 HBO Asia 等串流影音平台合资合制优质电影电视剧集。无论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通灵少女】或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早已是讨论度极高并且收视率不错的电视剧，都是近年来与知名国际串流媒体平台（HBO Asia 和 Netflix 等）合作的成功国际案例，并适度地增加台湾影视产品的国际能见度。也就是说，公视除了在发展《公视+》成为一个新的串流服务新品牌外，也积极地与国际串流平台合作，尤其是在播送流通的合作，更已成常态。然而，在这类合作上，但在公共服务、普及性、内容多样性、本国自制比例、平等的国际影视内容交流等议题上，已逐渐浮出各种讨论的声音，如何兼顾以上公共价值与原则，并且创造平台化时代下的新公共服务，实为公共电视所面临的新课题，同时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因此，本研究将以数字时代下的公共媒体的影音串流媒体平台为出发点，并进一步分析解释，公共广电服务除了扮演产制优质「电视」节目之外，如何在影音串流平台发展数字时代下的公广服务。本文先回顾相关文献厘清各国公共广电服务在数字时代下的转型策略，再以下列二个面向探究公视+在 OTT 时代下的挑战与如何维持公共价值（特别是普及性原则）（一）《公视+》串流平台的发展方向，试着从《公视+》和公众连结的机制和内容编排方式讨论；（二）台湾公视于国内外串流平台合作发行播映节目策略。思考在与跨国串流媒体平台合作影视内容创作与播映之外，公视+的定位和发展的模式会有何种可能？

图一：公视+的市占率



数据源: 立法院议事转播 IVOD 第 10 届 第 3 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赖品妤委员质询影片截图, 取自 <https://ivod.ly.gov.tw/Play/VOD/129555/1M/N>

貳、文献回顾

串流影音媒体平台化这几年迅速发展, 加上这两年疫情影响, 使得串流媒体的市场几乎取代电视和电影的地位。特别是 Netflix 的成功, 带动了其他串流媒体平台产业, 在学术上的相关研究不少是以 Netflix 为主轴 (Hallian & Striphos, 2016; Jenner, 2018; Lobato, 2019; Wayne, 2018), 主要聚焦于 Netflix 本身的运作, 或是对各国影视产业发展的影响 (Lobato, 2017; Lotz, 2021; Rios & Scarlata, 2018) 等, 或是针对阅听人行为和理论的反思 (蔡蕙如, 2020; Jenner, 2017)。进一步而言, 这波学术研究风潮, 也有串流媒体抽象层次的探讨, 例如整理串流媒体研究的「类型」(Spilker & Colbjørnsen, 2020), 或是「概念化」流通经济等较为理论层次的研究 (Colbjørnsen, 2021)。

公共广电的数字转型一直是重要的议题。即便大型的公共广电媒体如英国广播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很早就发展类似的数字平台 BBC iplayer, 已成公共广电媒体数字转型的典范, 但在面对这波串流

平台大战时，仍无法轻忽，并积极调整策略¹，近来甚至和 ITV、Channel 4 联手组成「OTT 国家队」（Over-the-top media services，意指直接透过因特网给观众的串流媒体服务）和 Netflix 对抗（Waterson, 2019 November 6）。近期的英国通讯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Ofcom, 2019, 2020）报告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和提醒。目前有关串流平台相关研究的面向，反映学术社群较关注在串流媒体时代下所带来的创新趋势，包括其新的产制流程、新的阅听人体验与新的消费模式等议题。然而公共广电媒体受到串流平台趋势影响甚巨，针对如何在串流平台时代维护其公共服务、普及性、多元性、民主等功能并且创新加值，需要更多关注与研究（d'Arma, Raats & Steemers, 2021）。以下针对公共服务媒体在平台时代下的创新策略进行两个面向的文献回顾与反思：（一）数字时代下的公共媒体策略：普及性 VS 个人化；（二）公共媒体的平台化的新策略。

一、普及性原则 vs 个人化策略

普及性原则一直是公共广电服务中重要的价值之一，这是公共广电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提供内容与信息的职责，不论时地，让公众能近用公共信息进而参与民主社会。普及性可分为内容和近用两个层面：（一）内容：公共广电必须提供和服膺各式品味和多元利益的群体；（二）近用：公众是否皆能近用公广媒体内容，不会因为年纪、性别或非主流而受到歧视无法近用（Van den Bulck & Moe, 2018, p.877）。然而，随着数字科技和串流影音平台的影响，公共广电的普及性原则受到挑战，在平台化媒体的时代，最常运用的算法以达到「个人化」的内容，公共媒体能否运用，又是否因此违反普及性原则？这是近年研究公共媒体的重要课题，也以普及性做为主要框架，试讨论在平台化时代，公共媒体如何调整或因应这个变局。

Hilde Van den Bulck 和 Hallvard Moe（2018）的研究，讨论以算法为基础的媒体个人化，如何影响公共媒体的普及性原则。并以挪威公共广播媒体

¹ 今年（2022），BBC 更宣示要將 BBC 4、CBBC 和 Radio 4 Extra 轉至線上，並且要縮編 500 人，全力發展成為數位優先的公共廣電媒體（Waterson, 2022, May 26）。

Norsk rikskringkasting (以下简称 NRK) 和比利时佛拉蒙区公共广播媒体 Vlaamse Radio- en Televisieomroeporganisatie (以下简称 VRT) 做为个案分析, 从三方面——推荐系统、登录系统、隐私和安全性, 讨论个人化策略和普及性原则的关系。研究指出, NRK 认为算法和编辑团队的结合, 是可以为观众带来好的推荐方式。甚至希望公共媒体平台的登录系统也能全部整合(使用同一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以方便节目的推荐系统更有效地推行, 然而, 对于隐私权的问题, NRK 会坚守不将用户数据商业处理的原则。至于 VRT, 虽然不至于完全反对个人化策略, 但仍有所保留, 指出算法的运用是否会导致多元性的伤害(只给观众看想看的节目)? 再者, 无论观众是否注册登录系统, 都会提供同样好的服务, 不因此有所差别。至于隐私权的问题, 因为这涉及公众的信任和安全性, VRT 认为这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处理, 同时也是对普及性最大的障碍。因此, 总结来说, NRK 于数字时代的个人化策略, 带点科技决定论、乐观的态度, 肯定有助于普及性原则; 而 VRT 则是有科技焦虑感, 虽然这些个人化策略能帮助和改善公共广电服务的目标和观众需求, 但潜在的资安、同温层问题仍待解决。最后指出, 其实大部份的公共服务媒体, 在面对新兴的个人化策略, 都以新的方式诠释普及性原则, 也渐渐将个人化服务整合进组织的新政策。作者认为公共广电媒体需要的是「公共服务」算法, 应该更能兼容普及性和公共服务责任。

Erik Nikolaus Martin 的研究(2021)则是针对公共媒体如何与「硅谷」科技公司(新媒体平台)竞争。研究中提到普及性和算法之间的问题是重要讨论面向。英国和美国的公共媒体提出了对算法的以下几个论点, BBC 平台所采取的算法仍是以公共服务为主, 而且即便使用算法, 也不代表要舍弃人工编辑过程, 应采取「混合式」的策略, 追求算法策展和人工策展的平衡。而美国的公共媒体(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和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则认为必须思考个人化之于公共媒体的意义, 公共媒体要创造公众的热情和兴趣, 并成为一個受信赖的来源, 成为强而有力、有别于商业平台的公共媒体平台, 然而这些目标, 观众的洞察力和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再者也主张, 若能将现行的公共电视和公共广播, 能整合为同一登录系统, 如此就可以这些资料, 转化成理解公众对公共媒体的兴

趣和改进公共媒体、个人化体验等的依据。

整体而言，多数研究对于算法的态度，仍期待公共媒体能以公共价值发展、并有别于商业媒体的「公共服务算法」。公共媒体运用算法，推荐观众节目（或相关节目），目的并非方便广告的使用，而是为了促成主题和观点的多元性，也能以其平台扩大服务更多的公众，以促成健康的民主社会。相较于前面两个研究提出「公共服务算法」的概念，台湾公共电视全媒体中心负责人李彰（Lee, 2018）则以实务经验的角度，讨论台湾公共电视的普及性和串流媒体平台间的关系。将《公视+》的经营模式纳入「商业模式」，从公视本身较为少见的「付费制」，讨论【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发行策略。就普及性原则的观点来说，付费制反倒成为新兴的商业模式，除了在公视本频道播出外，在 LINE TV 和 Netflix、《公视+》三个平台播出。在前两者平台上的表现亮眼，也成为该剧主要的收入来源。研究指出，公共电视的普及性可从多平台管道发行达成。这个研究将普及性原则更往前推进，除了公共广电媒体本身对于个人化（算法）和普及性的矛盾外，对外则可思考和商业串流媒体平台的关系和可能性会是什么？《公视+》做为公共广电服务的串流媒体，普及性原则的实务经验，也会关系着本研究的另一重要提问：公视的发行播映策略。

二、平台化的流通策略

本节聚焦公共广电服务的节目发行（流通）策略如何改变的相关研究与理论回顾。主要为比较型研究，大部份较集中在北欧、比利时这类较小市场的公共广电的发展，这对于台湾而言也较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可以此对应目前《公视+》的发行播映策略。除了在策略上可供参考，同时再思考串流媒体时代下公共广电服务的普及性原则。

学者 Karen Donders (2019) 的研究以公共广电服务在转型至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 以下简称 PSM）时，参照公共服务媒体的特性，面对串流媒体平台时代竞争下的流通策略。公共服务媒体中的「媒体」（media）代表了「不限于」广播和电视、而又具公共价值的媒体形式，并

且更加强调公民的角色。Doners 指出 PSM 的特性有：（一）超越传统线性广播电视的多平台策略；（二）在国际集团或是传统电视发行公司所掌控的媒体环境下，仍可以将提供所有公民公共服务；（三）在内容和流通策略上仍坚守公共价值；（四）内部组织的重整以适应新的环境（Donders, 2019, pp.1104-1105）。Donders 以此四个面向比较公广媒体：英国的 BBC，荷兰国家电视台（Nederland 1, NPO），和爱尔兰的国家广播公司（Irish broadcaster Raidió Teilifís Éireann, RTE）和前述的比利时佛拉蒙区的 VRT，研究它们如何在日趋国际化的市场所采取的流通策略。研究指出，这些公广媒体的节目发行和流通策略已经明显地产生变化，也势必会向多平台的方向发展。竞争环境的复杂、预算压力和组织结构等都会影响政策的发展。和商业平台合作（例如 Netflix）可能会影响普及性原则，但并不代表公共媒体受到经济趋力的影响。在作者所搜集的数据显示，这样的合作关系反而更显示强烈的公共意识，也意味着公共精神和整体预算间的摩擦。虽然目前这些公共媒体面对平台化竞争环境的定位仍不甚明确，部门协调度也不足，不过这些情况在现今复杂多变的媒体环境，都尚属正常，所有媒体公司都要不断地调整战略以适应多变的环境（Donders, 2019）。

Alessandro d'Arma, Tim Raats & Jeantte Steemers (2021) 则从 Philip Napoli 的框架讨论讨论公共广电服务在串流媒体时代的响应。同样也是比较研究，以 BBC, VRT 和意大利的公共广播机构（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 RAI）三个公广媒体为主要案例分析，从 Philip Napoli 所提出的媒体组织在面对新科技时的媒体演化反应的四个模式，（一）自信（complacency）：不在乎新科技所带来的竞争威胁；（二）抵抗（Resistance）：会以各种方式（游说、拒绝版权销售）维持自身的地位；（三）差异化（Differentiation）：转型为与竞争者有明显差异的定位；（四）多元化 / 模仿（Diversification / Mimicry）：活动扩展至多平台，并开始会采用新（威胁）科技的核心特色（d'Arma, Raats, & Steemers, 2021, pp.685-686）。除了这四种模式外，亦提出了「合作」（collaboration）的可能，有二种可能的合作式，第一个是将节目的版权直接卖给串流媒体平台（例如 Netflix 和 Amazon Prime 等），第二种则是采用合制播出的模式（d'Arma, Raats, & Steemers, 2021, p.686）。

研究分析指出，虽然案例显示或多或少都有经历过上述四个阶段，但并非一定呈现线性历程，基本上还是取决于各国公共广电媒体的政府政策（支持程度和规范）、文化因素、定位和市场规模。例如英国节目的内容有语言优势（英语）而有国际合制的优势，比利时荷语区的 VRT 虽然 Netflix 会购买其高质量的戏剧，但则可能因语言、市场规模等，很难受到 Netflix 合制的青睐。多元性的内容和服务则仰赖政府或政策的特别支持，例如英国因为有提供串流媒体制作的赋税减免。研究也指出，公共广电服务对于随选视讯串流平台发展的响应，渐渐从短期的排斥到较务实的态度，不过合作的形式亦有可能使公共广电边缘化。然而公共广电服务的转型虽然持续地致力于和商业媒体区隔，但许多问题仍待解决，例如政策、资金和观众问题 (d'Arma, Raats, & Steemers, 2021)。

欧洲广播联盟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以下简称 EBU) 于 2021 年所出的产业报告中，也提到欧洲公共广电在串流媒体时代所面临的难题，将焦点放在戏剧。EBU 报告指出，戏剧同时具备公共价值市场价值，前者代表了多元文化、生活经验，后者意味着观众也期待能在其他国际 OTT 平台上看到公共电视的戏剧。进一步来说，公共广电媒体除了建置自身的串流平台外，更必须思考如何让自己的戏剧作品出现在国际串流平台 (李彰, 2021)。然而，「小市场」的公共服务广电的电视戏剧产制，串流媒体、平台化的转变带来不小的压力，这类小市场的国家的特质是：竞争者少、市场高度集中化、以及公共广电很大程度仰赖公共资金，但该机制长年也维持高质量的戏剧产能。

Raats 和 Jensen (2020) 指出数字化和汇流时代已改变了媒体产业的经营模式，传统媒体一方面要面对来自原本传统媒体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新兴国际 OTT 平台的压力，因此对于小市场的戏剧产制，有四项主要的变化：（一）观众的收视习惯从线性变为非线性，例如订阅制；（二）这些新兴的 OTT 不仅改变旧有的观看模式，也会投资原创内容，不过目前 Netflix 对于大市场国家的投资兴趣，远比小市场高；（三）广告往这些新兴媒体平台移动，例如脸书、谷歌等，根据欧洲视听观察报告指出，2018 年的在线广告就有 56% 流向脸书和 Youtube；（四）欧洲公共广电的财政支持逐

年下降，例如 2018 年就下滑 2.8% (Raats & Jensen, 2020, pp.837-838)。以比利时荷语区的 VRT 和丹麦公共电视台 (Danmarks Radio, DR) 为例，在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竞争和既有市场的挑战，这类小市场所仰赖公共资金的公共媒体究竟如何维持电视戏剧的产能。Raats 和 Jensen (2020) 研究指出，VRT 和 DR 虽仍是该区主要电视产制的中心，但面对国际化的市场仍采取不同的策略。VRT 仰赖国内的公共财政支持，重心也放在国内市场。事实上，比利时佛拉蒙区的整体电视市场，有意识到 Netflix 或「外国」（主要是美国）内容为共同的竞争对手，也萌生合作的想法，但目前为止尚未形成确实的合作。虽曾一度提出公私媒体共组 Flemish Netflix 的构想，不过由于利益交织和成本问题难以落实 (Raats & Donders, 2020)。DR 相对而言较重视国际市场，积极出售国际播映权。不过 VRT 和 DR 的策略并非截然二分，两者模式近年也互有重迭。Raats 和 Jensen 在文末指出，国际 OTT 的兴起，对于公共广电的戏剧产制带来了三方面挑战，第一个是公共服务广电应和这些 OTT 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又必须冒着品牌认同被伤害，以及侵蚀自身的节目和串流平台服务的风险；再者则是关乎公广服务投入付费平台机制的程度，虽然可能获得更多的高质量戏剧制作预算财源，这又会牵涉公广角色（近用性）的问题，第三则是和 DR 较有关系，究竟公共广电服如何能在革新之余，仍能保持其独特性，又能立足国际，实为重要课题 (Raats & Jensen, 2020, pp.851-852)。公视资深研究员何国华在 2019 年〈合作与协作 让线性广电得以永续〉一文中亦提出北欧公共广电的思考，他指出，对于北欧这些小市场的广电媒体，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提出合作、协作，并扩大内容聚合伙伴关系。因此，在戏剧的产制和流通上，小市场的公共广电媒体势必会碰到国际影音串流平台的竞合问题。

参、案例分析：《公视 + 》串流平台公共服务

以广义的串流媒体形式来看，台湾公共电视的串流媒体服务可以追溯至公视于 2007 年所成立的 Peopo 平台，是鼓励公民制作「公民新闻」并上传至此平台，为一种使用者生产内容 (User generates content) 的平台，另外

会精选一些内容在主频道播出，搭配客座编辑，算是串流媒体形式在公视播出的「基础原型」。

图二：《开镜》广告页面主打全新公视+影视平台服务上线的信息。



数据源：《开镜》第二期（2017 年 10 月，第二期）

公共电视在 2016 年推出公视+7 的影音串流平台，配合当日传播传统电视排播，隔日播出，可以回看 7 天的服务。事实上，台湾的 OTT 市场在 2016 年已渐热络，2016 年甚至称之为 OTT 元年（颜理谦，2016）；2017 年时，

已有 15 家 OTT 平台業者，主要的訂閱者以年輕人為主 (CASBAA, 2017) 相较于这个趋势，2017 年的尼尔森收视调显示，公视的观众群年纪始终偏高，大概在 55 岁左右 (Lee, 2018)。因此，一方面公视希望能因应年轻观众新的（网络）收视习惯，另一方面也因为市场的原故，公视+ 于 2017 年转型升级为公视+ OTT 的服务，不限 7 天的收看期限，也加入过往节目，强调「地表最强串流影音服务和超过 800 小时影音」（图二）另外除了能收看市场原有的标准 (SD) 与高画质 (HD) 节目外，更支援超高画质 (4K) 播映。就整体接口和播放质量来看，是合乎新媒体潮流的设计 (如图三和图四)。接下来即针对《公视+》进行两个主要面向分析：（一）串流平台的发展方向；（二）发行播映节目策展策略。

图三：公视+ 的计算机接口



数据源：公视+网站

图四：公视+ 的手机界面



数据源：公视+ app

一、注册会员制度和策展式内容的流通策略

《公视+》的观看方式主要为注册会员制，无论是从《公视+》平台，或是透过 app，都需要先注册为会员才能观看《公视+》所提供的节目，在部份节目采收费制外，其他节目都是免费收看，由于节目版权的关系，国外的观众无法注册。2019 年 1 月《公视+》网站改版并同时推出 Android 版 APP，以更贴近数字时代下的观众观影需求，同年 3 月由于新影集《我们与

恶的距离》开播，甚至一度吸引超过 11 万人登记注册使用，6 月的会员人数已达到 46 万人。《公视+》后台所检视的收视指标有三：「节目点击次数」、「桌机 / PC 累积观看分钟数」与「Android APP 累积观看分钟数」，2019 年前半年的统计显示这三项指针都稳定成长（李彰，2019）。未来这些数据数据都将纳入公视节目收视评量指标，藉以衡量并发挥公视串流影音服务的多元价值。

如前所述，在 Van de Bluck 和 Moe (2018) 谈及公共广电、算法和普及性的关系时，登录服务 (Log-in Service) 是其个人化服务核心之一，用于「节目推荐」和「理解公众样貌」两个目的。公视+的机制，必须先注册成会员才能在平台观看节目，藉以能将观众的样貌和观看行为，更能清楚地记录下来，例如常看的节目是哪一类型？是否会看到一半就不看？又常会在哪里停住不看等。再者，透过观众登录装置的分析，也能了解观众多屏幕（手机、平板计算机和计算机）的收看方式比例，这个部份可以对公视的串流平台发展政策和节目内容营销有很大的帮助，前面可以往加强基础建设的方向，后者则是节目文本增加多媒体叙事的可能性。因此，登录系统的机制看似限制公众的文化近用，但实则不然，因为得到的信息会以公共服务的原则和价值，更能精确地理解公众对于公共电视的需求和兴趣，公共电视也能以此调整至数字串流平台时代的多元内容。然而，在目前《公视+》的发展，还未充份运用算法的阶段，而是以「人工策展」为主的节目编排，以主题策展方式，扩大公众对于节目「参与」的形式。

策展一词本源自博物馆研究用语，近年因为数字内容信息庞大，将这类能将数字内容分类、选择再组织进而呈现的过程称之为「数字内容策展」，而判断最终呈现的结果是依据人工方式判断，而非依照所谓的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等工具（Rosenbaum,2011；黄贝玲译，2012）。《公视+》平台即有针对性对节目内容主题式选取的编排，也如同「策展」一样，希望将在主题下的相关内容赋予意义，以符合主题的价值。公视+的内容策展主要分为二种形式，第一种为一般「策展主题」的推广，另一种则是较以时效性为主的内容策展。前者如图五所示，在公视+网站页面的选项为从频道选单下拉至「人为什么要爬山？」，《公视+》即将目前正在播映的群山之岛纪录片为

主轴，搭配其他相关且曾经播出的纪录片或节目，如 2019 年柯金源导演的《神殿》纪录片，或是同样于 2019 年播出的台湾国家公园纪录片，这些「旧节目」不见得在主频道（电视频道）有随时播放的机会，但在这类策展式的安排下，会让观众和收视群更能清楚公视+策展的逻辑。至于后者，会因应「时事」（例如议题、得奖回顾或是和外部影展合作）而做出立即性策展，例如每年总是在金钟奖能获得众多奖项的戏剧节目，在金钟奖隔天后即会安排所有得奖相关节目上线。

图五：「人为什么要爬山？」



数据源：公视+网站

在前面的文献提到「公共服务」算法的概念，会强调公共广电媒体的一大特色就是会维持人工编辑，而不会将全部的编排交给算法，即便是全由算法排序，仍必须以公共价值为主。《公视+》一方面发展出线上主题的策展编排（人工节目编辑），从节目主题发散其他相关的节目连结，如此亦可强化过往节目的公共性，同时发挥串流平台媒体的特性，与电视频道节目的线性逻辑不同。线上策展可将旧节目的公共效益最大化，也能透过节目的彼此连结，让公众对于文化内容的想象和诠释扩大。

因此，相较于一般 OTT 较常采用的「图书馆」、「数据库」策略和接

口（片量愈多愈好），在国际串流平台更为明显，《公视+》采取了另一条的新路线——内容策展路线，提供观众对于 OTT 平台的另类想象，透过这类内容策展安排，不是由算法决定观众看什么，而是透过文化连结和想象重新编排，提供公众更多的文化节目，可以是新时代下的普及性原则重新界定《公视+》的内容策展属性。虽然《公视+》平台接口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也因为平台系统问题，暂时并未很能精确地使用大数据和算法等数据，若未来能搭配适合的算法，节目的流量和数据，也许更能强化公共服务和普及性的精神。

二、《公视+》的发行策略

公视在面对平台化媒体时代，戏剧的发行流通，基本上和其他小市场公共广电媒体的处境类似，也采取了和商业媒体竞合的方式。表一整理了自《公视+》开播以来所运用此合作策略的公视戏剧，可以看出公视自 2018 年开始逐渐展开与其他献上平台合作播映的模式。由于国际知名串流平台的效应（例如 HBO 和 Netflix），让更多观众透过新闻报导与相关平台效应，除了原先在国际平台收视的观众之外，也因为戏剧质量优良口碑极佳，让更多观众回到《公视+》收看，并且因此进一步使用其他的平台服务。而这种公共电视与商业串流平台合制 / 合播的方式，有机会促进民众对于公共电视的认识与戏剧品牌的忠诚度。公视与其他串流平台有不同的合作模式，例如：（一）与公视主频道同时播出；（二）同一天稍后播出；（三）隔日之后播出等模式。2021 年 8 月底推出的影集《斯卡罗》则是近期表现极佳的主频道与商业串流平台合播的成功案例，相关报导（钟智凯，2021 年 8 月 16 日）指出《斯卡罗》为公视开台 21 年来首播收视纪录，首播收视率也是当日全部频道戏剧类节目第一名，合作播映的平台，例如 LIVE TV 首播 2 小时内排名第一名；myVideo 上也是戏剧类第一名；在 Netflix（台湾）也是前五名。

这个策略一方面扩大内容能见度，同时也拓展平台公共服务被近用的可能性。公视在面对影音串流平台化环境新挑战，除了主频道收视频道和《公视+》，也思考平台化媒体的整体策略。这里的「平台」，并不仅限于自身

的公共平台服务，也扩及于公共内容于商业平台露出，因此甚至能增加国内外的知名度。

公视选择和任何具有声誉且创新商业影音串流平台合作，都可使公共电视产制的高质量戏剧，在数字时代下扩大观众的收视，突破传统受地理限制的普及性原则。另一方面也透过版权贩卖增加收入，这是公共广电媒体和商业串流媒体平台合作的收益之一。公视总经理徐秋华也指出「公视的迷你剧因制作成本高，过去往往无法完全回收成本，但如今透过 OTT 平台积极购买版权合作，已经有三部作品达标 100% 回收率：《我们与恶的距离》、《麻醉风暴 2》，以及年底（2021）才上映的电视剧【返校】。」（文化内容策进院，202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过往的经验研究较少提到「播映时间」的合作。

此外，《公视+》在戏剧的收视上，2018 年 6 月大胆启用付费制的方式，首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以 99 元随选观看两个月的付费方式，这类新的商业模式对于公共广电媒体是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初期使用者的公视影音平台经验并非完善，且缺乏「独家」才有的节目，因此内部评估有很大的失败风险，再者面临法源的挑战，公视征询文化部的意见，指出公视法第 28 条同意公视可以从公共电视文化基金会相关的商业活动或其他来源取得收入，因此文化部同意这个新商业模式（Lee, 2018）。以结果来说，这个试水温的新制度表现不俗，在自家的《公视+》和商业平台都有不错的表现。例如在 Line TV，【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自开播后截至 2018 年 9 月，平台流量排名前三的剧集节目，单一集的浏览量已破 130 万（唐子晴, 2018）。这个成功模式继续延续到【我们与恶的距离】，这次合作的对象是台湾本土 OTT 影音平台 Catchplay，亦有投资该剧。同样在公视+采取付费的方式，采用 3 个月付费 130 元的方式，可以观看系列全集，由于该剧造成极大回响，公视的收入破 400 万，Catchplay 的会员更在一个月增加 22 万新会员，付费会员也增长了一倍（唐子晴, 2019）。在原本公视的市占率就比较小的情况下，选用戏剧做为付费模式的试金石，也同时尝试和商业影音平台合作，藉此增加公共影视内容的曝光度与额外影是产制的收益。《公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新商业合作模式，是让在台湾公共电视资源不足与平台化阅听人

的時代下，一種可持續觀察的創新合作方式。

不過在過往的討論中，很容易沉浸在「成功經驗」里，往往會忽略成功模式下的缺失，在此也一併提出幾個思考方向。在這波戲劇合作發行的策略里，較為嚴重的問題首推公視+本身的基本建設是否能跟上「最大化觀眾」的策略。以最受歡迎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公視+》的播出就因承受不了過多的觀眾同時上線因而當機，或許之後推出的戲劇未再出現類似的情況，這仍涉及普及服務原則（蔡蕙如、林玉鵬，2019年4月22日）。也可以進一步去觀察《公視+》在整體公共廣電的定位，包括預算和資源等，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政策工具，都會影響《公視+》的發展。

第二個問題，則是即便合作策略成功、也在多串流影音平台播出，誠如 d'Arma、Raats 和 Steemers (2021) 指出，公共廣電媒體在評估整體利大於弊的情況下，若販賣播放權給平台業者，或是和這些平台業者合作，可以提升製作成本和能見度，但相對而言，也可能會有失去品牌和主導權的可能性。這個問題在 Netflix 原創 (Netflix original) 這個「品牌」日趨強大，因而忽略真正的製作單位（公視）必須注意。如同在前述文獻的討論，較為小市場的公廣媒體，在面對國際影音平台的合作時，就會有邊緣化的問題 (Raats & Jensen, 2020)。

《公視+》因為新的商業模式，更能掌握付費會員的信息。如前所述，更有助於節目的規劃；付費會員制也強調收視數據精準的預測。然而以上兩種數據應用的方式，是否能符合數字時代下公共服務精神，則值得進一步觀察。例如，如何服務數字時代下的未付費的在線觀眾需求？以及「精準收視數據」是否真能未提供又優質且符合多元公共價值的節目設計，也必須進一步討論。此外，選擇使用付費機制的戲劇標準為何？是否有可能會因宣傳資源、演員陣容等而造成不同的效益？在串流媒體時代下，公共服務媒體的新挑戰不單服膺數字時代下的收視趨勢，也審視創新服務與公平性和普及性的原則，特別是以台灣為小公視小市場的特殊脈絡，如何掌握與國際影視平台之間的競合關係，並且擴大公視的數字公共服務優勢，以達公共廣電服務真正的意義。

表一：公視+上線以來所推出的付費戲劇

公视主频播出 时间	剧集	其他播出的商业平台
2018/7/7 每周六 21:00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Netflix Line TV MyVideo
2019/10/6 每周六 21:00	通灵少女 2	HBO HBO GO 和 HBO 随选视讯服 (HBO on Demand) 全亚洲同步首播
2019/2/16 每周六 21:00	魂囚西门	Netflix Hami Video
2019/3/24 每周日 21:00	我们与恶的距离	CATCHPLAY HBO Asia
2019/6/8 每周六 21:00	噬罪者	Netflix 爱奇艺台湾站 FriDay 影音 LINE TV KKTV MyVideo
2019/11/16 每周六 21:00	糖糖 Online	Netflix
2020/5/16 每周六 21:00	路~台湾 Express~	CATCHPLAY LINE TV friDay 影音 中华电信 MOD HamiVideo MyVideo
2020/ 12/5	返校	Netflix

每周六 21:00		
2021 /1/2 每周六 21:00	大债时代	Netflix
2021/2/20 每周六 21:00	天桥上的魔术师	Netflix MyVideo
2021/5/1 每周六 21:00	火神的眼泪	MyVideo Netflix
2021/8/14 每周六 21:00	斯卡罗	LINE TV Netflix MyVideo Hami Video

数据源：本研究整理

除了受重视的戏剧类型外，最后提出在《公视+》，仍有一些新的「自制」节目尝试，自《公视+》2017年成立以來，共计有三部：【博恩在脱口秀的前一天爆炸】、【百年未来】、【懂了也没用的台湾史】，共有特点都是以短影音节目，同时适应串流平台和网络型态。【百年未来】另有搭配360度全景技术的【未来百年】网站，让公众参与总统府的历史。这类新媒体科技的运用，也出现于【返校】、【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营销策略（公视全媒体项目中心，2021）。换言之，《公视+》也可视为是台湾公共媒体平台公共服务的创新实践。

这个公共实践扩大「观众」的传统想象，也改变「线性」观看的模式。《公视+》透过新媒体科技，将所谓前述的PSM中的媒体特性发挥，前面提到的迷你影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另外开发在线游戏《KIDZ孩子》，更因此得到2018年新加坡亚洲电视学院奖之最佳电玩奖。台湾公视除了思考戏剧内容贴合社会亲子议题与时事脉动，更透过多元内容与接口，亲近不同世代的阅听人，特别是该影集触及亲少年生活与升学相关议题，而透过在线游戏设计的形式，某个程度上也拉近了「网络原生代」的青少年们。

另一个创新的案例是公视【返校】影集，原本【返校】已是解谜式恐怖冒险类在线游戏（2017），并于2019年被改编为电影。2020年公视不仅改编成电视剧，更同时利用跨媒体叙事策略进行宣传。原本电影和电玩的名气就已具知名度，公视推出【返校】影集时，利用新媒体和影音平台的特性，采用另类实境游戏（alternative reality game）的营销和推广方式，采用了商业媒体较少使用的所应用的跨媒体的叙事和营销方式，运用平台包括脸书、Line、BBS和【返校】等，利用【返校】故事，串起各社群媒体平台间的互动、新观众的加入（公视全媒体项目中心，2021）。公视新媒体部对于未来的公视影音内容的公共服务策略时，更投入开发观众、贴近更多不同类型的数字时代下的网络用户，尝试以创新的社群媒体节目宣传、交互式体验游戏与跨平台合作放映形式，服务更多观众。

因此，就公共广电媒体在串流媒体时代的发展，如何能在竞争激烈的OTT市场中明确定位，为未来的重要课题，策展型内容导向和新媒体试验是目前较清楚和可行的方向；再者，串流时代下的普及性原则也需要再思考，如何妥善运用串流平台时代的数据化和个人化功能，发展出不同于商业串流影音平台的可能；然而，公共广电服务与商业串流的竞合关系会更加复杂，公共和商业也很难再泾渭分明，诚如公视前执行副理谢翠玉在公视《开镜》周刊表示，公视+在未来不只服务公视，只要政策许可，亦可服务其他业者甚至进行版权处理或者商业营运（公共电视，2019）。然而，合作关系是否让公共广电的品牌受到影响，也是未来值得观察的方向。

肆、结论

本研究观察当代的公共串流媒体平台的公共服务的发展趋势，以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探究公共广电服务，从扮演优质内容提供商的角度，如何在串流时代下，掌握平台信道，强化数字时代的公共媒体服务效能。

公共电视季刊《开镜》于2017年7月创刊后，可见公视对于国际串流趋势的关注与反思，了解公视对于串流平台公共服务的想象、设置与发展。例如多篇文章探讨公共广电与国际串流平台之间的竞合关系。有关国际平台

对公共广电的威胁，不同的公共媒体采取不同的策略，但无论处于大或小市场的公共媒体，都仍备感威胁，而成为数字变革策略的契机之一，无论是针对公共媒体本身的策略，或是对于该国影视政策的改革。公视研究员王菲菲（2017，页 113）曾指出澳洲保护本土影视产制政策，面临国际串流平台来袭，应重新调整政策内容的问题。公视副研究员王如兰对于台湾公视的串流发展也提出看法：

虽然如 Netflix 与 HBO 多已经开始制作所谓的台湾本土内容，但是终究是纯粹的利益考虑，委制内容数量与时数均不多，台湾业者是否只是一个代工的角色？能有多少自身的创作理念与台湾价值在其中？建议政府应积极鼓励业界整合一有带宽、技术与内容力的国家队，提供以台湾原创内容为主的 OTT 服务。并依罗世宏教授建议，政府可以借镜德国、法国以及加拿大等国的立法行动，对境外 OTT TV 平台课征特别税，用以挹注并扶植本国优质自制影视内容。避免台湾在全球眼球竞争大战中逐步消失产业竞争力与文化主体性（开镜 2019, no.8, 页 127）。

公共广电在激烈竞争的串流媒体市场中的新策略，透过国际的公共广电的在不同市场类型中的竞争策略，并且响应当目前串流平台研究社群缺乏有关公共广电的响应策略与创新，并从普及性、多元性、近用性思考数位时代的公媒责任，与创新策略如何因应商业平台的竞争与合作，同时不失去公共价值。《公视+》目前的发展仍属初步阶段，资源仍不足。另一方面，《公视+》维持原本的节目规划，创新利用平台化媒体的特性，公共服务媒体对于数字时代下的文化的参与形式，不仅只限于「线性观看具有公共意涵的文本」，而可是透过更多元平台服务与连结、创新内容策展体验，增强数字时代下文化公共增值服务。台湾公视推出《公视+》之后，在数字时代下开创新的平台服务，更贴近了阅听人的新收视与体验信息的习惯，也达成公共

服务媒体的普及性原则。公共模式的改变，响应前述的《公视+》相关系统设计，例如：登录系统、付费模式等，则回到以公共服务为前的数据收集与公开说明的方式，以更能清楚、多元、公共的方式展现「公共服务算法」，或许能突破既有的「公共」想象，而有更多创新的数字平台公共服务。再者，在内容的编排上，透过编辑主题策展，结合公共议题与时事，让平台阅听人可以以更迅速的方式接收信息，这种内容策展方式改善原先在网络平台上各种以商业或私利为目的杂乱的信息洪流，透过结构化与系统化的主题策展，让网络用户可以更有效的方式近用信息。《公视+》在创新和数字公共服务的平台策展与设计，重新定位公共服务媒体创新服务，也带给平台阅听人新的新内容与新的参与。

参考书目

- 文化内容策进院 (2021)。〈当串流文化转型已成趋势，面对韩流侵袭、Netflix 等国际巨头…本土业者该如何因应？- OTT 产业咨询交流会〉。
取自 <https://taicca.tw/article/851f68e5>
- 王如兰 (2019)。〈Disney+ 将展开全球眼球攻霸战〉，《开镜》，8:127。
- 公共电视 (2019)。〈公视准备好了!〉，《开镜》，9: 102。
- 公视全媒体项目中心 (2021)。〈返校影集-- 营销与 ARG 结合时〉。取自 <https://reurl.cc/RrIL2n>
- 王菲菲 (2017)。〈澳大利亚主张「说自己的故事」〉，《开镜》，1:113。
- 何国华 (2019)。〈合作与协作 让线性广电得以永续〉，《开镜》，8: 128。
- 李彰 (2019)。〈打造公共串流媒体 公视+收获满满〉。《开镜》，8。
- 李彰 (2021)。〈因应串流时代，欧洲公共媒体建立戏剧合制新局〉。岩花馆。取自 <https://rnd.pts.org.tw/Home/Article/FL20210330135718>
- 唐子晴 (2018)。〈《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爆红后，LINE TV 加倍购买版权，揭露流量胜出两关键〉，《数字时代》。取自 <https://www.bnnext.com.tw/article/50742/line-tv-ott>
- 唐子晴 (2019)。〈打败 Netflix 夺下《我们与恶的距离》版权，CatchPlay 让「台剧之光」跃上国际〉，《数位时代》。取自 <https://www.bnnext.com.tw/article/53576/the-world-between-us-and-catchplay>
- 蔡蕙如 (2020)。〈串流媒体时代下的阅听人商品观点再检视：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点分析 Netflix 追剧劳动〉，《中华传播学刊》，37: 83-112。
- 蔡蕙如、林玉鹏 (2019)。〈萃论：《与恶》风光结局「公视+」须创新局〉，《苹果日报》。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190422/7R2T4C4S56S4R7M3GOQA6O OKL4/>
- 颜理谦 (2016) 〈内容决胜负！台湾 OTT 百家争鸣〉，《数字时代》。取自 <https://www.bnnext.com.tw/article/41346/taiwan-ott>
- 钟智凯 (2021 年 8 月 16 日)。〈《斯卡罗》首播夺冠！收视破公视开台 21 年纪录〉，《自由时报》。取自 <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640078>
- Colbjørnsen T. (2021). The streaming network: Conceptualizing distribution economy, technology, and power in streaming media services. *Convergence*. 27(5):1264-1287.. doi:10.1177/1354856520966911
- d'Arma A, Raats T, Steemers J. (2021).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the age of SVoD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SM strategic responses in Flanders, Italy and

- the UK. *Media, Culture & Society*. doi:10.1177/0163443720972909
- Donders K. (2019). Public service media beyond the digital hype: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in a platform er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1(7):1011-1028. doi:10.1177/0163443719857616
- Hallinan B, Striplhas T.(2016). Recommended for you: The Netflix Prize and the production of algorithmic culture. *New Media & Society*. 18(1):117-137. doi:10.1177/1461444814538646
- Jenner, M. (2018). *Netflix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elevision*.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Jenner, M. (2017). Binge-watching: Video-on-demand, quality TV and mainstreaming fan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3), 304-320.
- Lee, Y. (2018). Public service online video achieve universalism? An overview and discussion on Taiwan PTS+ and its business model. Presented at Revi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 in Media (RIPE,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info.pts.org.tw/open/paper/2018/doc2018/2018_021.pdf
- Li, N. (2021). Netflix Has Invested \$700 Million USD in Upcoming Korean Content. *Hyperbeat*. Retrieved from <https://hypebeast.com/2021/1/netflix-700-million-usd-korean-content-investment-info>
- Lobato, R. (2017).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V flows research in the age of Netflix*. *Television & New Media*, 19(3), 241-256.
- Lobato, R. (2019). *Netflix nations: The geography of digital distribution*.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 Lotz AD. (2021). In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Mapping the geographies of Netflix as a multinational serv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4 (2) :195-215. doi:10.1177/1367877920953166
- Ofcom. (2019). *Media Nations*. UK: Ofco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fcom.org.uk/research-and-data/tv-radio-and-on-dem-and/media-nations-reports/media-nations-2019>
- Ofcom. (2020). *Small Screen: Big Debate Consultation- The Future of Public Service Media*. UK: Ofco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mallscreenbigdebate.co.uk/consultation>
- Martin, E. M.(2021). Ca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survive Silicon Valley? Synthesizing leadership perspectives at the BBC, PBS, NPR, CPB and local U.S. stations. *Technology in Society*, 64. doi.org/10.1016/j.techsoc.2020.101451
- Raats, T. & Donders, K. (2020). Television Distribution in Flanders: Who Takes the Lead and Is Content Always King? In Petr Szczepanik, Pavel Zahrádka, Jakub Macek, Paul Stepan (eds). *Digital Peripheries- The Online Circulation of Audiovisual Content from the Small Market Perspective* (pp.125-144).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 Raats T & Jensen PM. (2020). The Role of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Sustaining TV Drama in Small Markets. *Television & New Media*. 22(7) :835-855. doi:10.1177/1527476420913398
- Rios S, Scarlata A.(2018). Locating SVOD in Australia and Mexico: Stan and Blim contend with Netflix. *Critical Studies in Television*. 13(4):475-490. doi:10.1177/1749602018798158
- Spilker HS, Colbjørnsen T. (2020). The dimensions of streaming: toward a typology of an evolving concep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2 (7-8) :1210-1225. doi:10.1177/0163443720904587
- Van den Bulck H, Moe H. (2018). Public service media, universality and personalisation through algorithms: mapping strategies and exploring dilemma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0(6):875-892. doi:10.1177/0163443717734407
- Wayne, M. (2018). Netflix, Amazon, and branded television content in subscription video on-demand portals. *Media, Culture & Society*,40(5), 725-741.
- Waterson, J. (2019, Nov 6). Channel 4 to join new UK streaming platform BritBox.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v-and-radio/2019/nov/06/channel-4-to-join-new-uk-streaming-platform-britbox>
- Waterson, J. (2022, May 26). BBC announces raft of closures with CBBC and BBC Four to be online only.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2/may/26/bbc-announces-raft-of-closures-cbbc-four-online-only>

New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ase of PTS+ in Taiwan

Yu-Peng LIN & Hui-Ju TSAI

ABSTRACT

In this era of platformization, when the majority of viewers rely on a few platforms (such as Google, Facebook, and YouTube) to perform various daily activities and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global public media services face new challenges. The new viewing habits of the platform generation have an impact on public media, leading to fresh demands for platform public services to be more innovative. This research will start from the video streaming platforms of public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and further analyze and explain how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beyond producing high-quality television programs, can develop and produce public service programming in the digital age of streaming platforms. The first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the Taiwan PTS+ streaming platform, discussing the mechanisms of this service and how the offered content is curated. The second perspective examines how Taiwan PTS cooperates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treaming platforms to distribute their television dramas. The study also attempt to asks this question: what are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igital curatio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streaming platform, Taiwan PTS+

*Yu-Peng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Hui-Ju Ts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eap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在传统和数字之间摆荡： 台湾公视的全媒体转型

罗慧雯*

本文引用格式

罗慧雯 (2022)。〈在传统和数字之间摆荡：台湾公视的全媒体转型〉，《传播、文化与政治》，15:29-65。

投稿日期：2022 年 3 月 2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5 月 4 日。

*本文完成于 2021 年 10 月，文中数据即依当时，未再更新。作者罗慧雯为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助理教授，曾任公共电视第六届董事。

e-mail: hwlo@mail.shu.edu.tw。

《摘要》

在用户纷纷转向网络和行动载具的趋势中，公共广电如何转型以因应使用者行为变化，是许多国家公共广电的重要课题。

台湾公视于 2017 年宣布全媒体转型，成立全媒体项目中心和「公视+」在线影音平台，2018 年公视新闻部也成立 P#新闻实验室，不定期推出数字专题策展。公视为何一改过去对新媒体的保守态度开始进行转型？公视如何转型？本研究以策略管理学的意义建构理论、主导逻辑概念，和深度访谈法、次级数据分析法，探讨公视管理阶层如何认知全媒体转型的意义，如何透过转型来实践公共电视理念；也分析公视目前的全媒体转型策略和主导逻辑，最后检讨转型困境，期使研究成果对台湾公共媒体未来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公共服务媒体、公共电视、主导逻辑、全媒体转型、意义建构理论

壹、前言

公共广电制度出现已近百年，近四十年来，随着媒体环境变化，公共广电存在的必要性屡屡受到挑战。公共广电在过去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石，提供公众信息、促进公共事务讨论、实践公共领域、满足教育文化等多元需求。如今网络提供更多信息和更多讨论空间，是否还需要公共广电来达成公共领域？在用户纷纷转向网络和行动载具的趋势中，公共广电该如何转型以因应使用者行为的变化？成为许多国家公共广电的重要课题。

台湾公视从 1980 年时任行政院院长孙运璿倡议公共电视算起，历经十八年艰辛的建台历程。1992 年 9 月行政院始将公共电视法草案送至立法院审查，耗时四年多后，终于在 1997 年三读通过。立法阶段的主要争议在于如何透过制度设计来维持公视独立性，例如董监事选任须达审查委员四分之三同意的高门槛、经费来源的公共性¹等等。为防止政府干预新闻，立法院还通过附带决议，明定 2002 年 7 月之前公视不可制作每日新闻。然而媒体作为公共领域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信息，这样的决议导致公视在关键的品牌形象建立时刻与每日新闻脱钩，使得公视不提供每日新闻的印象深植人心，后来即使公视推出每日新闻，表现也较不受外界注意。加上公视新闻部采制作人制²，也导致新闻部较难产生整合性策略来响应变化中的社会需求。此外，戏剧或艺文等其他类型的节目也无法跟上使用者阅听行为的剧烈变化，因为法定预算仅有九亿元，资源多集中在电视制作，导致公视拓展新媒体或多媒

¹當時立法院曾討論過經費應來自三家無線電視台營業額或稅後盈餘的一定比例，因無線電視台反對，公視經費才改為由政府捐贈。公視建台歷程之崎嶇，參見魏鈞、林麗雲（2012）。

²公視自開台起，每屆總經理都和公視新聞部簽訂新聞製播公約，公約中明訂「公視新聞部採製作人制，製作人在新聞部編輯方針指導下，為其製作節目的決策者，對節目內容負全責」。製播公約中也規定「董事會、總經理、經理等主管，不得以任何有違新聞專業精神的理由，干預新聞專業和自律空間」（公視製播公約：https://info.pts.org.tw/open/data/prg/2004news_produce_rule.pdf）。製作人制旨在維護公視新聞和新聞性節目的專業自主，但在實際運作中卻被過分強調，導致新聞部經理從指揮官的角色淪為行政。最典型的例子是早中晚三節新聞各有一個製作人，新聞部經理卻不介入統合三節新聞的調性。

体平台的能量不足。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组织文化下，台湾公视仍在2017年宣布全媒体转型，不仅成立「全媒体项目中心」和「公视+」在线影音平台，2018年新闻部还成立「P#新闻实验室」，不定期推出数字专题策展。这样大幅度的转变显然不同于公视过去较保守的新媒体策略，为何公视会出现全媒体转型？公视管理阶层如何认知转型的意义？如何转型？转型是否成功？是本研究最初的问题意识。

策略管理学者认为管理阶层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能力、管理阶层的思维是组织变革或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本研究以意义建构理论、主导逻辑概念，和深度访谈法、次级数据分析法，探讨公视管理阶层如何认知全媒体转型的意义，及如何透过转型来实践公共电视的理念；也分析公视目前的全媒体转型策略和主导逻辑，最后检讨转型的困境，期使研究成果对台湾公共媒体未来发展有所帮助。

贰、文献检阅

一、从公共广电（PSB）到公共媒体（PSM）

世界最早的公共广电机构是英国的 BBC，其第一任总经理 John Reith 擘划「告知、教育、娱乐」三大任务，为 BBC 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其理念也影响世界各国公共广电。公共领域也是公共广电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哈伯玛斯是最早清楚论述媒体和公共领域关系的学者，虽然哈伯玛斯并未直接论述过公共广电和公共领域的关系，但有许多学者引用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来探讨公共广电，Garnham 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1986, 1992, 2003）。他主张自由民主社会必须有公共领域，由于公共广电实践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和哈伯玛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的理想非常接近，因此他支持公共广电。后续也有许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例如 Curran, 2002; Murdock & Golding, 1989），也都指出公共广电（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简称 PSB）是最能体现公共领域的媒体制度，公共广电让所有人平等地获得广泛且多样的信息、娱乐、文化服务，这是民

主社会中重要的公民权利。

80年代后，公共广电的正当性逐渐受到挑战。首先是卫星和有线电视的兴起，瓦解了频道稀有性的神话，因为商业性质的新兴频道也提供丰富的新闻信息和多元节目，财源来自国家或公众的公共广电，其存在之正当性遂受到质疑。进入数字时代后，网络提供更多信息和更多讨论空间，是否还需要公共广电来达成公共领域、促进民主？也成为重要议题。如今是观众碎片化的时代，观众可在各种数字平台上消费随选视讯，内容丰富多元，公共广电的必要性更成为各国传播政策论辩之主题（Larsen, 2014）。

进入2000年后，国外陆续有许多专家学者呼吁将公共广电 PSB 转型为公共服务媒体 PSM，提供多平台服务，并与阅听人有更多的互动与沟通。这样的呼吁与媒体环境丕变有关，Coleman（2004）以三个特征来描述当时公共广电所面对的环境变化，从传输到互动（from transmission to interaction）、从地方到空间（from place to space）、从距离到审议（from distance to deliberation），强调数字时代的公共媒体除了服务范围扩大之外，还有更深的民主意涵。Bardoel & Lowe（2007）则主张公共媒体必须从「供给导向的公共广电文化」转型为「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媒体文化」。另外也有许多学者聚焦在「公共」，主张公共服务媒体的责任就是将阅听人视为公民，鼓励阅听人互动参与，以阅听人为中心（Walvaart, 2019）。

倡导公共媒体的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于2007年的建议案中正式采用「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简称PSM）此一用语，强调公共服务媒体依循科技中立原则，应在不同平台提供不同的服务（Aslama, 2008）。此外，每两年举办一次研讨会的RIPE网络，旨在推动学界与实务界讨论公共媒体的重要议题，亦自2008年开始皆以公共服务媒体为主题，取代以往所使用的公共服务广电（胡元辉，2020）。

但从公共广电到公共服务媒体，价值理念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根据世界广播与电视理事会（World Radio and Television Council）2001年所出版的《公共广电：为何？如何？》（*Public broadcasting: Why? How?*），公共广电应具备四项原则：首先是「普及」（universality），让公众得以

接近使用，不受阶级或收入影响。再者是「多元」(diversity)，公共广电应达成节目类型、阅听众类型，讨论议题等三面向的多样呈现。第三是「独立」(independence)，公共广电是意见自由表达的场所，促成各种信息、想法与批评的自由流通，不受特定群体或力量的干涉。第四是「独特性」(distinctness)，公共广电的独特性能使大众区分其服务和其他业者的不同，公共广电必须产制其他业者不感兴趣的节目，也必须服务被其他业者忽略的阅听人。公共广电应勇于创新、创造新节目、新类型，以带动整个产业。

至于公共服务媒体的核心价值，根据欧洲广电联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2012)³公布的文件(*Empowering Society: A Declaration on the Core Values of Public Service Media*)，PSM的核心价值简述如下：

(一) 普及(universality)：提供内容至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排除任何人、任何地方。强调观点和意见多元的重要性，我们创造一个公共领域，公民可在这公共领域中形成他们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我们的目标是凝聚社会。我们是多媒体平台，以各种形式分享我们的内容，也让每个人都能接近使用，我们启发阅听众参与民主社会。

(二) 独立(independence)；我们不偏不倚，不受政治、商业和其他因素或意识形态影响。在节目制播、编辑决策、人事等方面都保持独立自主。

(三) 卓越(excellence)：节目专业且成为业界标杆。我们赋权和启发观众、丰富他们的生活。观众参与我们的活动，观众也是新闻和节目的协力者。

(四) 多元(diversity)：致力提供多样和多元的节目给不同的世代、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主流或弱势。促成一个包容的、较少分裂的社会。

³「歐洲廣播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簡稱 EBU) 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公共廣播聯盟。

(五) 问责 (accountability)：开放并倾听阅听人，持续进行有意义的辩论。公开编辑准则，解释并修正错误。报告我们的方针、预算、编辑选择。信息透明并诚心面对公众的检验，期待阅听众了解公共服务媒体的运作。也依据良善治理的原则有效经营。

(六) 创新 (innovation)：丰富媒体环境，成为创新与创意的驱动力，发展新的节目形式、新技术、连结阅听众的新方式。训练员工一起型塑数字的未来，服务公众。

比较上述两份数据得知，无论环境和科技如何变化，普及、多元、独立、独特和创新，都是公共广电和公共服务媒体的核心价值，但公共服务媒体更强调问责，也更强调利用多媒体平台和公众互动、和公众之间的连结、鼓励公众的协力或参与。就如 Bardoel 与 Lowe (2007) 所指出的，多媒体时代中，PSM 必须超越既有的服务和营运模式，提供更多服务给公众，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公众不应是目标 (target) 而是伙伴 (partner)。Clark 与 Aufderheide (2009) 也主张参与式公众 (engaged publics) 是新型公共媒体的核心。学者 Jakubowicz (2010) 将 PSM 的概念定义为「PSB + 所有相关的平台 + Web 2.0」，意指公共广电必须朝向多媒体 (multimediality) 发展，并于多媒体平台提供服务。

PSM 利用多平台提供服务、让公众有更多的参与，除了发展自身的多媒体平台 (例如网站、App、OTT) 之外，利用第三方平台也是方法之一。根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 Sehl 等人的研究，许多欧洲国家的公共媒体都利用社群媒体平台 (例如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触及年轻阅听众及潜在阅听众。这样的策略虽然可扩大公共媒体的影响力，但也有很多风险。一来是社群媒体的运作并不透明，也无法预测，将 PSM 的数字策略依附在其他平台上，会有受制于人的风险。再者，社群媒体使内容和阅听人都碎片化，容易形成过滤泡泡 (filter bubble) 或同温层现象 (echo chamber)，难以达成公共媒体藉由多元内容促进沟通的使命。更重要的是，阅听人若藉由社群媒体接触公共媒体的内容，可能无法辨识出内容是由公共媒体所提供，影响到阅听人对公共媒体的品牌认知。因此实务上，各国公共媒体大多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既

发展自己的网站和 App，也利用第三方平台触及年轻听众 (Sehl et al. 2016, pp.32-37)。

二、全媒体转型

「全媒体」一词在台湾学术研究中并不常见，陈顺孝 (2018) 提出「全媒体」的定义，他认为「公共服务媒体」(PSM) 是「全媒体」在公共广电领域的说法，而「全媒体」是新媒体的最高境界，代表在内容开发 (主要指的是内容不受固定篇幅或时段限制)、叙事形式 (利用多样媒材叙事，超链接、相互混搭、开放互动)、传送模式、用户关系、营运创收等五个面向都有创新。陈顺孝也强调新旧媒体并不是截然二分，而是光谱的概念，越能开发新内容、发展新叙事形式、跨平台传送讯息、与用户共舞、拓展新营收模式的媒体越新，反之则越旧。

游梓翔 (2017) 也说明「全媒体」的意义，他说「今日的新媒体，未来必将变旧」，因此「新媒体」一词并不适当，「全媒体」最适合来描述目前的现象。他指出，「全媒体」包含有两个意义，第一是科技带来媒体的融合或汇流，导致单一媒体包罗万象的现象。例如报纸有影音链接，电视也有文字平台，所有媒体都有互动成分。第二个意义是阅听众也能参与内容产制，使用者成了「产用者」(produser)，这些产用者又藉由「群媒」相连，这种共写共创共享的现象，无论称为用户生成内容 (UGC) 或是同侪共创 (peer production)，都是「全媒体」。由此可见，游梓翔所说的「全媒体」是一种包括媒体、阅听人、内容变化的社会现象，而陈顺孝所说的「全媒体」主要是着重在媒体端五个面向的变化。

观察近年来台湾公共电视公开数据 (例如年度报告、公视《开镜》季刊)，「全媒体」一词约出现于 2017 年之后，2017 年 3 月 16 日第 6 届第 8 次董事会通过的三年计划中包括有「完成公视全媒体产制流程修订」(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2018，页 5)。从脉络来看，相当于国外所称之「公共服务媒体」，如陈顺孝所指出的，「公共服务媒体」是「全

媒体」在公共广电领域的说法。由于公视对外与对内文件，都使用「全媒体」而非「公共服务媒体」，因此本研究题目也使用「全媒体」，但并不探讨游梓翔所说的全媒体现象，而是聚焦于媒体端的变化。

国外学者探讨公共广电的转型，主要聚焦于多平台发展策略的探讨。例如 Klein-Shagrir 与 Keinonen (2014) 比较芬兰和以色列两国的公共电视如何发展多平台 (multi-platform)。研究发现，两国的公共电视都试图在科技变迁的环境中，维持公共媒体的正当性、公共媒体与人的链接。两个公视也都将多平台视为可使 PSB 的内容触及更广的机会和必要手段，也都认定多媒体会成为人们媒体消费的新习惯。另一方面也都担忧利用数字平台和商业服务（例如 Facebook 和 YouTube）虽可触及更多年轻阅听人，却可能因此无法贯彻普及服务的使命，甚至可能因此受制于其他平台而影响公共媒体的独立自主。研究也发现芬兰的公共电视 Yle 较以色列的公共电视 IBA 积极，Yle 强调改革、活化组织，也积极和阅听人互动。而互动的意涵广泛，Yle 鼓励观众利用手机参与现场节目的投票活动，观众建议节目主题或来宾名单、甚至提供节目点子，都算是互动。

Sehl 等人 (2016) 研究六个欧洲国家（芬兰、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的 PSM 如何在数字环境中提供新闻服务，研究发现英国的 BBC 和芬兰的 Yle 这两家公共媒体的数字转型最为成功。该研究指出 BBC 与 Yle 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持续的组织变革、对行动装置的服务进行投资、重视社群媒体策略。该研究也指出 BBC 和 Yle 的成功有外部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有四个，首先是它们都处于网络和智能型手机普及的环境中；其次是财源也较为充裕；第三、组织管理的特色是跨媒体平台的整合且集中式的管理；第四、较不被政治力干涉，免于频繁应付政府和国会，得以进行较长期的公共服务规划。内部因素主要指的是「接纳数字化」的组织文化，管理阶层清楚的公开强调，必须进行改革来因应数字环境，即使必须裁员或砍掉旧服务的经费 (Sehl et al. 2016, p.39)。

有关台湾公共电视转型的研究并不多，陈雅萱 (2012) 以英国 BBC 的转型经验来反思台湾的公共电视，指出台湾的公共媒体政策消极，政

府补助预算不足，最重要的是董监事选任的高门坎，导致董监事难以选出，延任的董事会也就难有突破性的发展，影响到公视的转型。

徐福德（2017）的研究主要是透过对台湾公视（PTS）核心管理阶层与部门员工的深度访谈、以及公共电视年度报告等次级资料的分析，探讨台湾公视在迈向公共服务媒体（PSM）过程中主导逻辑之演进。该研究指出2017年的主导逻辑是「凝聚内部整合，推动新媒体研发与实验基础」，由于成文时间的关系，尚未探讨2017年至今的转型过程。

综上所述，公共广电的全媒体转型，并不只是将内容从广电媒体延伸至其他媒体、让阅听人在新兴数字平台上也看得到公共广电的内容而已，而是连组织、管理思维、内容叙事、阅听人关系都有所转变。本研究参考上述英国BBC和芬兰Yle的成功经验，以及陈顺孝（2018）提出的全媒体定义，归纳公共广电的全媒体转型至少要包含以下三个重要面向：组织改造、发展多媒体平台、社群媒体策略，本研究主要从这三个面向来探讨台湾公视的全媒体转型。

三、意义建构与主导逻辑

组织变革或组织转型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牵涉到很多不同层级的行动者，策略学者最关注的是管理者的角色（Walsh, 1995; Augier & Teece, 2009; Kaplan, 2011）。因为管理者是策略的主要发动者（initiator）与执行者（carrier），也是外部环境和外来信息的最终诠释者，其感知与诠释的能力至关重要，关系着整个组织变革顺利与否，也关系着竞争力的维持（Gioia & Chittipeddi, 1991; Kaplan, 2011; Maijanen, 2015a）。

意义建构（sense-making theory）和主导逻辑（dominant logic）是许多策略管理学者探讨组织转型时经常使用的概念，其聚焦于管理者的感知诠释能力和管理者思维，以下简述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与应用。

（一）意义建构（sense-making theory）

当组织成员遭遇动荡不安或不确定性状况时，会藉由萃取或诠释环境中的线索，以厘清究竟发生什么事，并使用理由来建立秩序，对发生的事情「建构出意义」，如此才能安身立命，组织管理学者称上述的过程为「意义建构」(Weick, 1995)。

「意义建构理论」强调人们所建构的意义是一种行动、选择和解释的持续过程，包含认知、情绪、行动等面向。意义建构也有强加秩序、抵抗偏差、简化、和链接等四种功能 (Weick, 1995, p. 82)。

以 Weick 为首的组织管理学者提出意义建构过程具有七种特性，分述如下：

1.以认同建构为基础：Weick 引用 Mead 的理论，指出人们透过与他人的互动，建构出不同的自我或认同；在与他人互动中，持续重新定义和调整自我，而组织也有相同的特性 (Weick, 1995, p. 22)。组织认同被视为组织的基础，它描述出组织的特色，「我们是谁」的想法决定了人们如何行动和诠释，也影响别人如何看我们（形象）、如何回应我们，这些都会威胁或确认我们的认同 (Weick, 1995)。

2.具有回顾的特性：Weick 引用 Schulz 「有意义的生活经验」的概念，主张意义建构具有回顾性。我们能观察到的所有事情都已成历史，即使它短暂出现，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它已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过去的事件提供人们发掘现今发生事件的意义，过去的事件在现今回顾时被重新解释，虽然过去的事件和现今事件不一定相同，但人们可能有相同的感受 (Weick, 1995, pp. 23-25)。

3.行动者开创所察觉的环境：意义建构是一种行动与认知的结合，当人们创造环境，也是在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就是在做意义建构。透过和其他意义建构者共同建构的过程，个人也成为环境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意义建构不仅是诠释、或理解文本，也包含创造文本 (Weick, 1995, p.31)。

4.意义建构并不只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也是社会性的活动：我们的想法、感情和行为往往会视别人而决定，虽然不必然要他们实际出现才能建构意义，仅是对他人的想象就会对我们的行动和诠释造成影响。Blumer指出符号互动是一种发生于内在的社会性互动，他人实际上并不存在。意义建构从

来不会发生在与他人隔离的状态，听众总是存在的，即使唱独角戏（Weick 1995, p.76）。

5.具有持续进行的特性：意义建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没有清楚的起点或终点。但当我们注意或只标出期间的某些片段，就像是有一个清楚的起点与终点。我们能从中萃取特定的线索，并且创造出意义（Weick, 1995, pp. 42-43）。

6.具有聚焦和萃取线索的特性：虽然意义建构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过程，但它经常快速到我们无法目击到意义建构的过程，而仅能看到结果。要了解更多的意义建构，Weick 建议观察那些意义建构过程延伸的状况，例如两难困境或矛盾。包括人们如何注意、萃取线索、美化他们所萃取的，都特别重要。人们认为他们所萃取的线索相当于获得这些线索的情境。再者，这些线索也凸显出原始材料中的特定意涵（Weick 1995, pp. 49-50）。

7.意义建构偏重合理性而非正确性：人们从事意义建构时只要言之成理，即使不正确也无所谓，因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事实（Weick, 1995, p.56）。

Lowe 与 Maijanen (2019) 指出，如今是媒体环境动荡的时代，以意义建构理论来了解策略管理者的工作，此其时矣。特别是传统媒体要面对全球竞争和阅听人偏好的反复无常、使用者行为的碎片化，管理者的工作更具挑战性。意义建构理论最适用于探讨组织策略的变革，Gioia 与 Chittipeddi (1991) 就曾以意义建构理论研究公立大学的策略变化；Maitlis (2005) 探讨英国交响乐团的建构模式；Lüscher 与 Lewis (2008) 做丹麦乐高的研究（转引自 Lowe & Maijanen, 2019）。Lowe 与 Maijanen (2019) 也强调认同建构的必要性，媒体策略管理者必须持续更新「我们是谁」的说法，以响应变迁中的市场需求和客户。特别是以公共服务为使命的公共媒体，更需要认同建构。

（二）主导逻辑 (dominant logic)

Prahalad 与 Bettis (1986) 最早提出主导逻辑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管理者概念化经营的方式，以此决定技术、产品开发、流通、广告或人力资源管

理上关键资源分配之决策」。也可说是「管理者的思维与世界观」，透过其经营与管理工具所概念化而成，以实现其经营目标与经营决策」。在管理认知研究领域，「主导逻辑」被视为是群体层次的心智模型知识结构，或高层管理团队的认知地图，其作用在于将复杂的实存简化为普遍化的模式 (Pralhad & Bettis, 1986; Bettis & Prahalad, 1995; Walsh, 1995)。

Daft 与 Weick (1984, pp.285-86) 将组织定义为一种诠释系统，「高层」的管理者为这个系统搜集和诠释信息。虽然组织的其他部分或层级也处理信息，但管理者终究是组织中最终诠释信息的人。Daft 与 Weick 定义此处的「诠释」为，「说明事件并在高层管理者中发展出共识和概念结构的过程」。这是源于行为理论的说法，因组织或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因此他们需要简化才能更好的因应复杂的世界和信息。

Kor 与 Mesko (2013, p.235) 指出主导逻辑的重要性，「主导逻辑代表管理者对经营环境的世界观，也代表应该做什么事情」。主导逻辑中最重要的是对核心价值和信仰的共识，因为它们建立组织的正当性 (Bettis & Wong 2003; Eggers & Kaplan, 2013)。主导逻辑是组织本来就具有的成分，根深蒂固在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和常规中，就像是其他常规行为一样，是一种很深的路径依赖 (path-dependent)，很难改变 (Nelson & Winter, 1982)。但主导逻辑并不是不会改变，特别是组织在经历巨大改变时，既有的主导逻辑就容易被挑战被质疑，从而组织认同和组织目的也变得不稳定。这是一个充满辩证的过程，源于变革和延续现状这两种压力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Balogun, 2007; Bartunek, 1984)。现行的主导逻辑会妨碍新逻辑的学习，因此管理者和组织会倾向以旧的策略框架机制继续去形塑和解决问题 (Bettis & Wong, 2003)。

出身于芬兰公共媒体 Yle 的学者 Päivi Maijanen 多年来以组织、策略管理等理论研究欧洲公共媒体和组织变革。她曾使用主导逻辑的概念和内容分析研究法，分析芬兰公共电视 Yle 历年的年报，探讨 1976 年至 2012 年这四十多年来 Yle 的管理思维和主导逻辑之变化 (Maijanen, 2015b)。Maijanen 将主导逻辑分为五类，分别为 Yle 的使命、科技、竞争者、阅听人关系、内容。并依主导逻辑的变化将上述的研究期间区分为五个阶段：道德监控期 (1976-1980)、防御期 (1981-1984)、反击期 (1986-1993)、科技承诺期

(1994-2004)、开放期 (2005-2012)。主导逻辑在「防御期到反击期」以及「科技承诺期到开放期」这两个期间出现转折点。以后者为例，此时管理者认为与其他组织或企业的合作，可提供 Yle 更多发展机会与策略选项，并且在内容与服务方面，管理者强调 Yle 必须以阅听人为导向，增进与阅听众之间的关系。Maijanen 认为无论在哪个时期，管理者的共同认知都是公共服务的使命，这也是 Yle 主导逻辑中最重要且稳定的成分，但不同时期「公共服务」被以不同的方式强调和诠释，例如早期 Yle 的使命是维护芬兰文化，现在则是创造芬兰文化。

Maijanen 也曾和 Lowe 合作，以主导逻辑与意义建构两个理论探讨欧洲四个公共广电媒体如何转型为公共服务媒体 (Lowe & Maijanen 2019)。研究对象是芬兰的 Yle、德国的 NDR 和 RB、瑞典的 SVT 这四个公共媒体。作者对这四个媒体里的高阶管理者做深度访谈，探讨媒体组织如何面对市场竞争和年轻阅听众流失的两大挑战，并厘清传统公共广电媒体的公共服务使命 (public service mission) 如何在转型过程中被重新定义。研究结论为传统公共媒体的公共服务理念虽然被认为是有用的，但要落实普及服务使命却是个难题。再者，在转型过程中，传统广电的主导逻辑与数字传播逻辑在管理阶层的工作中被并认为同等重要，管理者必须在改变和延续的两种压力下取得平衡。

胡元辉 (2020) 也应用主导逻辑的概念比较日本公共广电 NHK 与美国芝加哥公视的 WTTW、圣保罗-明尼亚波利斯双子城的 TPT，研究发现日本 NHK 现阶段的主导逻辑仍相当程度停留在传统的广电逻辑。相对的，美国 TPT 与 WTTW 的组织变革则显得积极，主管们对于迈向公共服务媒体的转型都有高度认知，并愿意透过组织变革来引导转型。

综合上述文献检阅结果，本研究以意义建构和主导逻辑两个概念探讨台湾公视的全媒体转型，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并在结论中总结转型的困境。

- (1) 公视的管理阶层如何认知全媒体转型？
- (2) 采取什么样的转型策略？
- (3) 转型过程中的主导逻辑为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深度访谈法，輔以次级资料分析法，分析的次级资料有，公视董事会会议纪录⁴、出版品（公视之友、开镜）、网站、YouTube 频道、粉丝专页。

深度访谈对象主要是和内容产制决策相关的管理阶层，包括前任总经理曹文杰⁵、节目部经理于蓓华、新闻部经理苏启祯、全媒体项目中心召集人李彰、P#新闻实验室负责人卓冠齐。全媒体项目中心、P#新闻实验室是公视因应转型所设立的两个组织，两位小主管如何建构转型的意义、做出转型的策略，也关系着转型成功与否，因此列为受访者。访谈采用半结构式访纲，由于研究旨在探讨公视管理阶层如何建构「全媒体转型」的意义，并分析组织的主导逻辑是否转变，因此访谈过程中提示受访者意义建构理论，引导受访者申论公视全媒体转型的意义，并分析转型策略，最后请受访者归纳公视的主导逻辑。

访谈日期和进行方式如下表：

表一：深度访谈名单

⁴ 也参考〈公视基金会新媒體諮詢委員會工作備忘錄〉。公視新媒體諮詢委員會由陳順孝董事於 2017 年 3 月召集成立，旨在推動公視的全媒體轉型，該委員會在 2019 年原定董事會換屆日期前即完成備忘錄，於 2019 年 10 月 17 日第六屆第 39 次董事會提出。備忘錄紀錄公視所有參與全媒體轉型的節目或專案，目的在將經驗傳承給下一屆董事。本研究參考這份備忘錄做轉型策略之分析，備忘錄是董事會會議附件資料，公眾都可調閱。

⁵ 總經理曹文傑於 2020 年 7 月 29 日因文化部委託公視國際影音平台前導計畫執行事件程序爭議問題而辭職，總經理一職由企劃部經理徐秋華代理，公視至今尚未遴選新任總經理。職是之故，本研究訪談對象為前任總經理。

受访者代号	职称	访谈日期	访谈方式
A	总经理（前任）	2021 年 6 月 1 日	因疫情因素改以电话访问。
B	节目部经理	2021 年 6 月 28 日	因疫情因素改以电话访问。
C	新闻部经理	2021 年 2 月 23 日	因疫情因素改以电话访问。
D	全媒体项目中心召集人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021 年 7 月 4 日	第一次于公共电视会议室中面访, 第二次电访。
E	P#新闻实验室负责人	2021 年 1 月 21 日, 2021 年 7 月 3 日	第一次于公共电视会议室中面访, 第二次电访。

肆、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为因应使用者行为变化和实践公共服务理念而转型

公视为何进行全媒体转型？公视管理阶层如何认知全媒体转型？对公视管理阶层而言，全媒体转型的意义为何？受访者大多从环境中萃取线索来响应这些问题，主张是因为「使用者行为发生变化」，所以必须转型，也强调基于对公视的组织认同，促使他们采取转型策略来做好公共服务。受访者对于意义建构理论的其他特性，例如回顾性、持续性等等，较少提及，因此以下主要运用意义建构理论中的「萃取线索」和「组织认同」这两个特性，分析公视管理阶层对全媒体转型的意义建构。

受訪者主要从个人经验或调查资料来申论用户行为的变化，受访者 A、D 偏向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受访者 B 除了个人经验外，也因为出国交流，看到国外公共媒体的转型经验和作品，更感受到转型的急迫性。受访者 C、E 则是以调查资料来左证。

受访者 B 提到几次出国参与 INPUT（世界公视大展，International Public Television Screening Conference）⁶带给她的震撼。她说许多国家的公共媒体都在 INPUT 会议中提出观众已离开电视的警告，并说明他们的电视是拿来宣传其他平台用的，在电视上告知观众到 YouTube、Facebook、或 Twitter 上收看节目首播。B 说，这样的改变等于是宣告「主战场都在新媒体上」。B 强调，看到国外经验，再加上周遭许多人（包括公视员工）都已经是新媒体的重度用户，感觉新媒体的转型非常急迫。《青春发言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于 2016 年诞生，这是公视第一个在 FB 上首播的节目，也是受访者 B 认定的第一个做数位转型的节目。该节目受到 INPUT 会议中德国公视二台的「社群优先、电视第二」策略启发，一推出就是「网络先播电视再播」的策略。所有影音先于《青春发言人》Facebook 粉丝专页和 YouTube 专频播放，再集结精华于电视播出⁷。

受访者 A、D 则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使用者行为的改变。

我们必须转型，是因为观众收视行为已经改变，连我自己都不看电视，我来公视工作后才刻意看公共电视的电视频道。现在人都很少看电视，生活文化的变化很大，看电视也不按照节目表看。我们（公共电视）若能提供给人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的内容，不是很好吗？（受访者 A）

⁶ INPUT 成立於 1977 年，1978 年開始在不同國家舉辦年度世界公視大展，大展中放映世界各國的優秀節目，鼓勵公共電視的發展。

⁷ 《青春發言人》是一個以 13 至 18 歲青少年為目標觀眾的節目，為了配合行動裝置的播出型態，每則影音不超過 10 分鐘，電視則每集播出 15 分鐘。製作單位也利用 Facebook、YouTube，以圖文互動工具和觀眾溝通，讓公眾透過社群媒體加入討論。

「我看到大家都到网络上，不看电视，所以我认知我的工作就是去服务那群在网络上的人。」(受访者 D) 受访者 C 则根据收视率调查的数据指出，「公共电视的主频 (CH13) 是 44 岁或 60 岁以上的观众在收看，现在年轻人都使用网络而不看电视，公视一定要藉由网络转型来扩大公共服务，要服务到年轻族群」。C 也提到各国公共媒体的做法，「不仅发展出更多网络服务，也将内容『一源多用』(同一套内容放在不同平台上)，让既有的资源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受访者 E 则提到因为公视的一份内部报告，让她意识到阅听人的媒体使用行为已经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份报告是公视于 2018 年所出版的《新媒体收视使用行为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多数人使用手机浏览公视新闻网，公视新闻网是公视子域中最多人跨网域造访的地方。E 说，这份报告让她进一步思考使用手机造访公视网站方便吗？公视新闻网对网络用户友善吗？新闻网的内容足以应付使用者需求吗？

由上述的访谈得知，公视管理阶层从环境变化中萃取出公视应该转型的线索主要是「使用者行为的变化」，意义建构的内容则是主张公视要配合使用者的习惯，提供适合放在网络或社群媒体、其他平台的内容或服务。也如同意义建构理论指出的，意义建构包括有「行动者开创所察觉的环境」、「社会性」等特性，受访者也藉由对其他人的观察与互动，共同建构意义，使其产生公视应该要转型的想法，创造出「意义的文本」。

下面以受访者 D、E 的说法为例，看其如何说明全媒体转型的合理性。「所谓全媒体转型，我认为不只是电视规格变成网络规格而已，而是一种内容上的转型，包括文章、迷因、梗图、影音……。我们现在也做《观点同不同》的网站，这是个和『公视+』连动的网站，我们在那里设定议题、po 文章、放公视的节目。我们希望能引领公众讨论，发挥公视的影响力」。

受访者 E 也强调，现在的使用者都习惯看整理过的「懒人包」、看网络直播，但公共电视提供的仍是传统电视规格的内容，公视再不转型，使用者会严重流失。

由此可知，受访者对转型意义建构的合理性，还包括制作「符合使用者习惯阅听的内容」，因此除了将内容放到其他平台之外，公视也必须做内容的转型。

各个受访者不仅描述感知到使用者行为变化之外，也都强调公视必须进行全媒体转型，才能服务更多阅听人。由此可见，服务公众是公视管理阶层的共同理念。然而，「服务公众」的意涵是什么？谁是「公众」？受访者普遍提到公视的价值是《公视法》中所明定的「弥补商业之不足」。也就是说，商业媒体基于利润考虑，不做没有收视率或点击率的内容；但公视经费主要来自国家，不依赖广告收入，可服务更多对象，包括弱势、少数族群。

受访者 B 说：

我最认同《公视法》的部分就是《公视法》第一条的「弥补商业台之不足」，这是公视很重要的功能。举例而言，《谁来晚餐》每一季都有同志的故事，每次播这样的故事收视率就会掉，我们很清楚这是商业台不会做的题目，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商业台也不做身心障碍者的节目，我们也做。

受访者 A 主要从多元性来论述公视的价值。

我认为公视的主要价值就是做全民的媒体，为公共服务。例如同志议题，公视只要播出这议题都会被骂，但我认为就是该做，坚持要做。又例如《艺术很有事》，这是个艺文节目，虽然只有少数人在看，但我很鼓励。我们做商业台不重视的艺文类型，就是在彰显公共价值。我很同意公共电视法中说的「补商业之不足」，但觉得可以讲得更好，是「照顾别人照顾不到的」、「服务别人服务不到的」。

受访者 B 藉由疫情严峻时期公视在节目方面的应变，说明在人心不安时给予公众情感上的支持、正确的知识、实时的新闻，也是公共媒体的价值。

公视的价值在这一波疫情中更显现出来。公视受公众所托付，服务公众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尤其当社会有急难、人心不安时，更需要媒体提供新闻、信息、知识，或心理卫教、娱乐、故事或不同角度的观点。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年（2021 年）五月多一发布第三级警戒，我就给公视的制作人、编导写信，要大家想想公共媒体可以为台湾社会多做点什么？身为公媒的内容产制者，可以为台湾社会、为公共、为他者，多做点什么？

我建议大家的摄影机要打开来，去纪录现在。我们的器材都是纳税人给的，要有责任感。只要有适当的点子，我们（管理阶层）就可以想办法提供防疫设备和资源去完成（受访者 B）。

在这样的理念下，《谁来晚餐》关心三级警戒下的偏乡孩子能否顺利远距学习，做出了《撑五百万大雨伞远程上课！台湾三仙台的好学男孩》影片，这是节目企划打了四百多通电话才找到的故事。讲述一位台东三仙小学的学生，每天必须由妈妈骑机车载到三仙台隧道附近的高台，才能收到网络讯号，连上学校的远距课程。该影片上传到 YouTube 后，反应非常好，观看次数很快就到数万次。

三级警戒中公视发挥安定人心功能的节目还有《我又在市场待了一整天》（《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的第二季），该粉专也在疫情中发挥安定人心的作用，邀请上过节目的市场工作人员，以疫情对市场工作的影响、他们在疫情中的心情为题，自拍影片上传。

从这些节目单位对疫情的实时反应，可以看到各制作人对公视的组织认同，以及公视如何在疫情时期利用社群媒体实践公视理念。

综上所述，公视管理阶层认知使用者行为发生大幅变化，因而主张公视必须以转型来因应，而转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持续贯彻公视服务公众的价值理念。本文文献检阅中提及芬兰 Yle、德国 NDR 和 RB、瑞典 SVT 等四个公共媒体，其管理阶层认知的环境变化主要是市场竞争和年轻阅听众流失，与之相较，台湾公视管理阶层对环境变化的认知主要是使用者行为的变化，

虽然也包括年轻阅听众不看电视，但公视管理阶层并不特别重视市场竞争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台湾公视的定位主要在补商业之不足而非与商业媒体竞争，这样的定位也导致公视对市场较不敏感，影响转型策略。

二、转型策略

本研究将全媒体转型分为三个面向来观察，分别是组织改造、发展多媒体平台、社群媒体经营。在组织改造方面，公视目前仅新设全媒体项目中心、P#新闻实验室两个组织来因应全媒体转型。多媒体平台方面主要是发展公视自己的 OTT 影音平台「公视+」，由全媒体项目中心负责营运。社群媒体经营策略则由各节目制作单位各自经营，并没有专责组织负责，没有一致的策略。

（一）组织改造：成立创新团队

公视具体规划全媒体转型是在第六届董事会上任后（根据受访者 A、受访者 B），2017 年 3 月 14 日公视董监事暨主管策略会议决议，公广集团愿景为「建立公共服务媒体平台，看见台湾更美好的未来」，使命包括「1.以创用者为导向，进行多平台传播」、「2.以实验创新精神，带动影视音产业」，三年目标包括「4.完成公视全媒体产制流程修订」，具体策略也包括「5.成立新媒体咨询委员会，广纳各方人才凝聚智慧及人脉」⁸。此决议经 2017 年 3 月 16 日第六届第八次董事会确认通过，该会议中也通过新媒体咨询委员会名单⁹，此后新媒体咨询委员会针对公视新媒体业务之规划与营运现况提供专业意见（新媒体咨询委员会，2019）。

⁸ 該會議決議全文公布在公視網站的「公開資訊」。

⁹ 公視諮詢委員會制度源於公共電視法第 15 條第 10 項，「董事會可設置各類諮詢委員會，以制度化方式進行社會溝通，作為營運參考」。第六屆新媒體諮詢委員會名單如下：公視董事有陳順孝（召集人）、馮小非、張天立（2019 年初請辭董事）、張玉佩、舒米恩魯畢；外部委員有，資料視覺化領域與網頁技術專家吳泰輝、社群經營專家李全興、時任 Yahoo!奇摩媒體資訊事業部資深製作經理李怡志、作家黃哲斌、關鍵評論網內容總監楊士範、鏡周刊 READr 團隊總編輯簡信昌、PanSci 泛科學總

在董事会和新媒体咨询委员会的积极运作下，公视有了初步的组织改造，但幅度并不大，仅在新媒体部¹⁰之下成立全媒体项目中心，新闻部之下成立 P#新闻实验室。以性质来说，这两个组织属于创新团队，类似英国 BBC 的 News Lab、芬兰 Yle 的 Kioski，但规模却远远不及。以下分析这两个组织的定位与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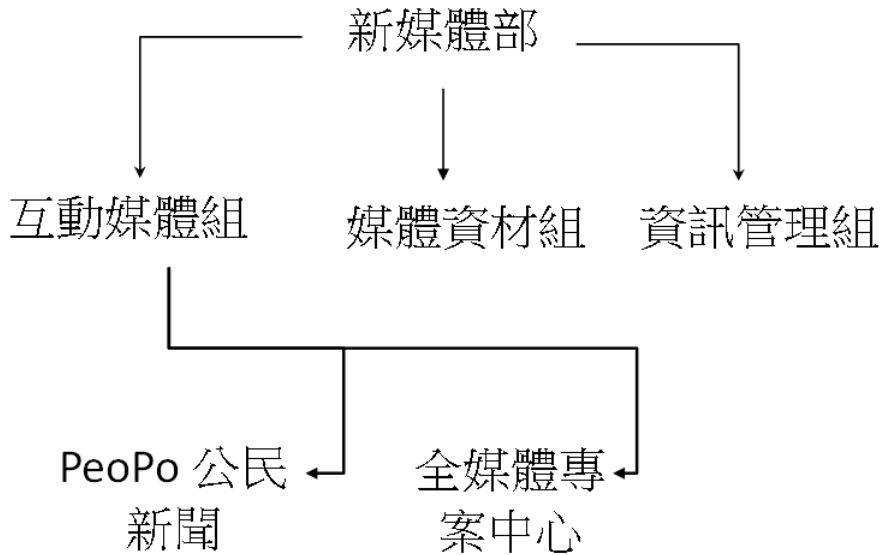
1. 媒体项目中心的定位与功能：2017 年 6 月 15 日，公视董事会决议成立全媒体项目中心，规划由全媒体项目中心发挥编辑平台兼示范中心的功能，以用户体验为导向，发想并实验各类项目。全媒体项目中心总监由执行副总经理谢翠玉担任，新媒体部李彰担任召集人，共有六个工作人员，其编制在新媒体部之下的互动媒体组¹¹，组织结构详见图一（新媒体咨询委员会，2019）。

編輯鄭國威、曾任公視紀錄片導演王瓊文(歿)。

¹⁰ 新媒體部的前身為資訊部，其定位為後勤單位，目前共有 58 人，除了「互動媒體組」之外，都是負責資訊管理與網頁設計、網頁維護業務的人員，並不能獨立產製數位內容，也不具備數據分析能力。

¹¹ 互動媒體組之下除了全媒體專案中心，還設有公民新聞平台，負責 PeoPo 公民新聞的營運。互動媒體組編制人數共有 33 人。

图一：新媒体部组织架构图



数据源：全媒体项目中心提供

全媒体项目中心第一年的运作方式是和各部门或制作单位互相接洽并讨论可行的合作项目，各部门亦自行规划执行项目。但项目中心成立第二年起，就无法发挥原定的「编辑平台兼示范中心」的功能，主因是全媒体项目中心在公视的组织架构中的位阶太低，以及节目部和新闻部都各有内容专业，不容易沟通，尤其是新闻部，因恪守新闻专业与独立自主，并未与全媒体项目中心合作，仅有经验的分享与交流（受访者 D）。因此公视的全媒体转型，就从原定的「全媒体项目中心主导」，转为各部门各自经营的方式（新媒体咨询委员会，2019）。

全媒体项目中心完成的著名项目有《博恩在脱口秀的前一天爆炸》，《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电玩游戏，《返校 ARG 在线解谜》。这些创新都使

公视原本的内容或新制内容得到更多的关注。此外，全媒体项目中心也经营「公视+」，《观点同不同》网站、《剧够》网站。

2.P#新闻实验室的定位与功能：依2018年9月20日第六届第二十六次公视董事会之决议，新闻部规划「台湾公广新闻网建置三年计划」，并于当年12月成立「公广新闻网全媒体实验平台」（简称「全媒体实验平台」），2019年5月，全媒体实验平台正式定名为「P#新闻实验室」，专网也同时上线¹²，以专题策展式新闻网站，提供每日新闻策展及数字叙事专辑，也经营社群媒体。「P#新闻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在官网上说明「#」的意义（如下图），「#」代表多元，也代表关键、数字，这些就是实验室的工作内容。「以聚合公广集团新闻资源为目标，采全媒体形式于多平台实验，提供新一代的新闻信息服务，启动视网整合新闻数字转型。」（受访者E）。

图二：P#新闻实验室的工作内容



数据源：<https://newslab.pts.org.tw/about>

¹² 專網網址為：<https://newslab.pts.org.tw>

实验室的具体发展方向是在新闻咨询委员会¹³中由外部专家和新闻部人员一起脑力激荡后才确定的。实验室初期设定的目标有三个，第一是将既有的影音加值，第二是数字专题策展，第三是做最小可行性产品（受访者 C）。

在实验室成立之前，新闻部针对网络用户所提供的服务，仅有公视新闻网和「PNN 公视新闻议题中心」¹⁴。《我们的岛》、《独立特派员》、《有话好说》等个别节目虽有各自成立的 YouTube 专频和 Facebook 粉丝专页，但整体而言，公视新闻并没有整合性思考，直到 2017 年新闻咨询委员会成立后，才有公视新闻部全媒体转型的具体方向（受访者 C）。

实验室成立之初为 7 人编制，包括制作人、数字编辑、社群企划、视觉编导、美术编辑、前端工程师、以及 3 位实习生。2020 年 3 月和「公视新闻网」整并后人力编列为 14 人，同步进行「公视新闻网」改版，但技术创新团队资源仍有限，例如编制内的前端工程师仅一人。从团队编制来看，明显与传统电视制播的职务分类不同，「数字编辑、美术编辑、视觉编导、前端工程师」等职务显现数字叙事、项目策展已打破传统的新闻编采观念（受访者 E）。

打响 P#新闻实验室知名度的是 2019 年 5 月起在 YouTube 专频上架的《记者真心话》系列影片，该系列主要探讨台湾媒体问题，第一集主题是「台湾媒体是怎么烂掉的？」，甫推出就创下近百万观看次数的纪录；第二集也是一推出观看次数就破百万，并且因为主题是「红色渗透」，还遭片中指涉的纸媒以头版来大张旗鼓的批评。《记者真心话》系列由台大新闻所研究生方君竹和实验室合作完成，叙事风格与影片长度都类似时下的 YouTuber，节奏、

¹³ 根據 2017 年 4 月 20 日第六屆第 9 次董事會的會議紀錄，新聞諮詢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引進外部專家智慧，協調資源分配，在既有基礎上強化公視新聞的質量，並積極拓展多元新聞內容與平台、服務國內各族群閱聽眾、擴大社會影響力，以落實公視作為一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的重要使命」。諮詢委員會由兩位董事擔任召集人，邱家宜與羅慧雯，外部委員有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羅世宏、政大新聞系教授劉昌德、台大新聞所教授林麗雲、風傳媒副總編輯閻紀宇、天下雜誌資深研發長兼編輯部總主筆蕭富元。新聞諮詢委員會也曾就教中央廣播電台的經驗，促成公視東南亞語新聞的製播。

¹⁴ 「PNN 新聞議題中心」網站主要關注司法與人權新聞，在網路上提供有別於電視新聞的網路原生報導。

语言、幽默感也都贴近现在的年轻人，有别于严肃的电视新闻专题。但新闻部内部也有批判声，「有记者认为这样的呈现违反公视原本客观中立的原则，公视怎么能走网红路线？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样的方式引发更多人来关心以媒体识读为主题的公共议题」（受访者 C）。

（二）发展多媒体平台：公视+的成立

公视于 1998 年开播，开播后就有网站服务，2007 年为落实公民近用媒体权，推出「PeoPo 公民新闻平台」，提供公民记者新闻报导的平台。2007 年起公视也在 YouTube 影音平台上建立公视的专频。2010 年，公视新闻部建置「PNN 公视新闻议题中心」的部落格网站，提供民众实时新闻信息，有影音与文字，并与 Facebook 等社群网站连结，增加与阅听人的互动。2015 年推出公视新闻网，也因应智能型手机的普及，推出公视 APP（受访者 C，受访者 D）。

近年来公视在多媒体平台方面最大的进展是成立「公视+」。「公视+」的前身是「公视+7」，成立于 2016 年，主要服务对象是错过公视节目的网络用户，其作法是配合公视电视节目表安排隔日跟播，并提供网络限时回看七天的串流服务。2017 年 10 月，公视正式推出 OTT 影音平台「公视+」，提供更多电视节目表之外的内容。除了原有跟播公视电视频道上的新制节目外，也将过去公视经典节目转档上传供使用者随选，包括戏剧、纪录片、儿少、生活、艺文等类型。2019 年 1 月，「公视+」也推出 Android 行动 App，2019 年 10 月推出 iOS 的 App，服务更多不同族群。APP 的操作接口中有「观看纪录」、「节目收藏」与「屏幕投放」等功能。根据「公视+」提供的数据，公共电视的服务已稳定触达网络世代，「公视+」的使用者也年轻化，主要集中在 25-34 岁，其次为 35-44 岁与 18-24 岁之观众。「公视+」的内容以免费为主，只有少数高人气戏剧采用「单部付费」，例如《我们与恶的距离》。「公视+」2020 年总会员数突破 61 万，2021 年 8 月会员数已超过 70 万（受访者 D）。

（三）社群媒体策略

许多国家的公共媒体都利用社群媒体（例如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与阅听人互动，鼓励阅听人参与（Sehl et al., 2016），台湾公视主要也是利用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第三方平台经营社群，但并没有整体的社群经营策略，由节目单位各自经营，负责经营社群媒体的「小编」之间也少有交流。

公视主要发展社群媒体的节目有节目部的《青春发言人》、《谁来晚餐》、《艺术很有事》，新闻部的《我们的岛》、《独立特派员》、《有话好说》。新闻部还有 P#新闻实验室开发具互动性的数字内容项目，实验室本身也有 FB 粉丝专页（受访者 B、受访者 C）。全媒体项目中心除了有《观点同不同》、《剧够》网站之外，也经营 FB 粉丝专页「公视影音网」（受访者 D）。

社群的经营策略也包括和外部的积极合作，一方面是借重外部人员的经验和专业，一方面也可藉此扩大触及率，发挥品牌加乘效果。

「在既有资源的限制之下，我们鼓励各节目和外部合作，电视人需要数字原住民来帮忙。例如《青春发言人》就和《台湾吧》合作，讲置入性营销（业配文）的那一集就是用台湾吧的方式来讲，这样也可利用台湾吧的名气和人气，把观众吸引过来。另外也和「视网膜」、《法律白话文运动》合作过。」

「作为电视台，必须要和 KOL（关键意见领袖）做跨平台的合作，《谁来晚餐》和很多 YouTuber 合作，它的内容二创也会和 YouTuber 讨论。此外，因为人力不足，也用外面的社群小编（以承揽契约），《公视表演厅》、《谁来晚餐》都是用外面的社群小编。」（受访者 B）

新闻部中最积极进行转型的是《我们的岛》，该节目探讨环境议题，以数字叙事和经营社群媒体两种方式来进行转型。该节目最著名的例子是 2017 年 12 月 26 日于粉丝专页发表实时现场「澳洲圣诞岛海龟困在垃圾堆」¹⁵的短片，震撼画面在脸书发表后立即在网络发酵，高达三万多次分享，这则影片后来被 BBC 重新制作，扩散至全球。

在内部缺乏社群媒体相关规范与训练之状况下，公视的社群媒体经营偶发争议。2019 年公视台语台粉丝专页的台语教学，将「番薯粉」发音标明「韩

¹⁵影片紀錄的是澳洲聖誕島小海龜在塑膠垃圾海灘中誕生的過程，由台灣生態學者劉烘昌在澳洲聖誕島進行陸蟹研究時意外拍下。

极混」，遭网友指责此举在嘲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有违公视客观中立的立场。

2020 年 9 月公视新闻网的粉丝专页中，小编贴了一则公视新闻报导，讲述中共制作以新疆为题的大外宣纪录片，贴文中引用中共大外宣纪录片的说法，维吾尔人乌兰「在南京电子厂一个月赚取 5000 多元人民币，她说寄钱回老家，旁人会羡慕」。贴文搭配的图片则是该部央视纪录片《我们来自新疆》里四个维吾尔人笑容满面的截图。小编这样的处理被众人批评仅引用中共大外宣说法，却没说明维吾尔人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2021 年 3 月《主题之夜 SHOW》粉丝专页贴了梗图，引用纪录片《药命俱乐部》中主角说的「一颗要价一千元的药丸实际成本不到五十分钱...，每年仍有近四十万人持续死于 C 型肝炎」，这张梗图导致台湾医药界一片哗然，认为公视立场偏颇，无视开发新药的成本，也把病人不治的责任归咎于药价太高。

上述社群经营的案例都显示公视对于社群媒体生态的掌握不足，社群媒体中的人们耐心很有限，快速滑手机的习惯往往导致阅听人只看图片、或小编评注与标题，不点击贴文所附的新闻连结，因此对小编的图片与文字就产生难以抹灭的第一印象，导致更加断章取义。公视在这些事件后也重修节目制播准则，并在准则中加上社群媒体专章，其中也包含社群小编的相关规范。

三、变化中的主导逻辑

芬兰学者 Maijanen 将主导逻辑分为科技、竞争者、阅听人关系、内容、公共媒体的使命等五类，本研究则从访谈资料中归纳出台湾公视目前的主导逻辑主要是科技、阅听人关系、公共媒体的使命。目前台湾公视还在数字科技、阅听人关系，和传统电视逻辑中摆荡，但如前所述，公视管理阶层具有很强的组织认同，「公共媒体使命」的主导逻辑维持不变，仍占优势。

受访者 A 以对外征案方式的改变来说明公视与阅听人关系正在改变中。

过去征案是用类型来订主题，我来之后就不订题目，因为我认为创作者有他们本身关心的东西，公视如果订题目，不见得是创作者正在做的。……只有百花齐放的情况下才会有漂亮的景色。这也是公视与阅听人关系的改变，让我们的剧和内容都更贴近阅听人。

受访者 B 以疫情时期的公视应变来说明如何加强观众的参与感，强化与阅听人的关系。

《公视表演厅》将表演者、表演团体的自拍画面后制包装后放在脸上，他们因疫情无法演出，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连结观众和表演者。《艺术很有事》则是呼吁因疫情不得不待在家的小朋友多创作投稿给节目单位。这些节目都发挥节目品牌原本的优势，让观众来参与，给大家互相加油打气，这是我们公共电视发挥公共责任的时刻。

在科技方面，公视的主导逻辑已有从传统电视思维转向数字逻辑的倾向。例如受访者 B 要求制作人提新节目企画案时，都必须附上新媒体的设计，其中也要包含如何和观众对话与互动。但受访者 B 也强调并不认同公视现在的转型策略，她主张公视的首要之务是做全媒体内容，而非「公视+」在线影音平台。

当然做了「公视+」还是不错，因为公视本身有丰富的影音数据库，但我预期的是内容的转型，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儿少、戏剧都有全媒体内容了，公视目前都只有单点经营，转型尚未全面开始。

其实在制作人都知道，你必须在新媒体上才会被看见。但公视的问题和其他组织一样，都有本位主义，我们不是有新媒体部吗？转型是他们要做的吧？或说，脸书是用来宣传的，宣传不就是公行部（公服暨营销部）应该做的事情吗？这就是本位主义。多数人的想法是，我的专长是影像和电视，新媒体并不是我的专长。

我认为转型是非常困难的，大家对频道的认知还很传统，有些员工是要资源才肯做，有些是需要教育训练。转型也需要人才，我们部门的人都四十多岁了，要引进新血才行。（受访者 B）

受访者 A 同样提到本位主义的问题，「我们要在『公视+』放节目，传统电视人是很排斥的，怕影响到电视的收视率，后来看到对收视率有帮助，才愿意接受」。

受访者 A 却认为公视的全媒体转型算是成功的，「要全面大翻转是好几个世代以后的事，目前这样算成功的」。她提到公视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组织的老化」。

全媒体的转型也有技术上的升级要克服。公视组织的老化是主因，我们有很多摄影师、剪接师都已经五十多岁了，他们连 HD 要转 4K，都很困难，年龄会造成学习新技术的能力问题。但这样的员工我们也要让他们在组织内能发挥所长。

受访者 D 说，其实公视并非所有部门主管都是数字逻辑，以电视为中心的思维还是存在。

我认为公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电视思维，因为公视主要在卖的还是节目，所以很多决策是绕着能不能让节目卖出去，其他的价值都是次要。这也是我做新媒体的挑战，要能和电视人沟通。电视思维是看剧本、制作、电视的美感，网络的价值观是不同的，网络是要能激起讨论。比如我想在《观点同不同》讨论《斯卡罗》里的李先得有没有卖台，但电视人说不喜欢，他们认为要正面营销这个剧，不要太碰触冲突的议题。

如同芬兰的 Yle、德国的 NDR 和 RB、瑞典的 SVT 等四个公共媒体的个案，其公共服务使命（public service mission）在转型过程中被重新定义，台

湾公视的公共服务使命也被重新解释为，扩大原本的电视服务至其他平台的使用者。管理者所认知的不变的使命则是补商业之不足，以及提供多元的内容。考虑到既有人力和资源的限制，台湾公视管理阶层将传统广电主导逻辑与数字传播逻辑并列为同样的重要，此外，管理者在变化的环境中，提出加强阅听人关系的策略。

伍、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从意义建构和主导逻辑两个概念来探讨台湾公视的全媒体转型。研究发现，公视受访的管理阶层都认知到转型的必要性与急迫性，也都有强烈的组织认同，都认同必须转型才能持续落实公共服务的理念。但从转型成果来看，无论是组织改造、多媒体平台、社群媒体等面向，公视都尚未走向全面的全媒体转型。特别是参与转型的节目也只是少数，整体的资源分配仍是电视架构下的决策，因此台湾公视的主导逻辑仍是以电视为中心但带有数字逻辑的管理思维。

组织管理学认为管理者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能力以及对转型意义的认知，是组织转型能否成功的重要关键。本研究经过深度访谈得知公视管理阶层的转型认知虽然强烈，但主导逻辑却尚未完全转为数字逻辑，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矛盾？本研究分析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造成公视全媒体转型的困境：

一、法定预算过低，经费不足

根据公共电视法，政府每年捐赠给公视的经费仅有 9 亿元，又根据公视管理阶层表示，公视人事支出就高达 7 亿多元，因此每年都需要另外靠政府项目补助¹⁶，才能达到 25 亿元左右的营运规模，制作出优质丰富的节目并提供公共服务。以 2020 年为例，公视年度支出总计约为 25 亿 5 千 9 百多万元，年度收入总计为 23 亿 5 千 6 百万，其中来自政府每年固定的补助除了依《公

¹⁶例如 2019 年广受好评的公视戏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由「前瞻基础建设计画」补助 4 千 300 万元。

视法》编列捐赠之9亿元之外，还有来自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捐赠的9千9百多万¹⁷。这两笔金额合计9亿9千9百多万，占公视2020年收入的42.4%。而2020年政府的项目补助金额就有11亿2千7百多万，占比47.87%（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2021，页41-42）。由此可见，来自政府项目的补助比政府每年固定的捐赠还多，但项目补助的金额却不稳定，因此公视的财务体质可说是极为脆弱。在这种情况下，要投入更多经费与人力在全媒体转型上，有相当大的难度。如前所述，英国BBC和芬兰的Yle能成功转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经费充足且稳定，台湾公视要解决转型困境的首要之务就是修法增加政府每年捐赠给公视的经费。

二、核心能力转换不易

公共电视本业是电视台，其资源和人力都以电视节目制作为主，全媒体转型需要的是大量的资讯工程人力资源，公视原本这方面的人力就很少。第六届董事会决议朝向全媒体转型后，陆续招募人力，但因公视的薪资不如业界，人才招聘不易，又有组织老化的问题，最终核心能力仍不足以应付转型。资源都集中在电视制作，就意味着数据分析能力尚未进化到全媒体时代。公视多数网站虽有Google Analytics追踪码设定，搜集用户的基本浏览数据（如性别、年龄、登入时间），但因人力与能力限制，并无法深入探讨更深层的使用者转换行为，也就难以制定更好的策略来服务使用者。

回到本研究在理论方面的意涵，意义建构与主导逻辑理论都主张管理者思维是转型成功的关键，但台湾公视个案反映的是转型成败维系在更大的结构，以及组织内部的本位主义或资源问题，这是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此外，要让管理者思维能在组织内部落实，加强员工对转型的认同、优化管理工具

¹⁷ 依有线广播电视法第45条规定，系统经营者应每年按当年营业额百分之一之金额，提缴至中央主管机关成立之特种基金，基金中的百分之三十捐赠给公共电视。2020年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捐赠9908万5944元。

和合理的奖惩制度，诚属必要。若有更全面的研究，厘清以上问题，方能解决台湾公视全媒体转型的困境。

参考书目

- 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2018)。《2017 公视基金会年度报告》。台北：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 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2021)。《2020 公视基金会年度报告》。台北：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 李彰 (2018)。〈公视+迎接时代挑战：公视新媒体部沿革与现况〉，《公视开镜季刊》，3:12-17。
- 徐福德 (2017)。《台湾公共电视迈向公共服务媒体的组织认知研究》。中正大学电讯传播所硕士论文。
- 卓冠齐 (2019)。〈为何此刻做新闻还需要实验？公视公广新闻网全媒体实验平台〉，《公视开镜季刊》，7:68-69。
- 胡元辉 (2020)。〈公共服务媒体的建构与挑战－以日本、美国公视的组织变革为例〉，《中华传播学刊》，37:227-258。
- 游梓翔 (2017年3月28日)。〈「爱慕你，梅地亚」，全媒体是什么东东〉。取自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892780> (上网日期：2021年6月28日)。
- 陈雅萱 (2012)。《向数位转！从公共服务广电 (PSB) 到公共服务媒体 (PSM)：英国广播协会 (BBC) 与台湾公共电视 (PTS) 之比较研究》。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
- 陈顺孝 (2018)。〈公视前进「全媒体」。从「新媒体」的五个创新谈起〉，《公视开镜季刊》，3: 8-11。
- 张锦华 (1997)。《公共领域、多文化主义与传播研究》。台北：正中。
- 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 (2002)。《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台北：联经。(原书 Habermas, J. [1990].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Berlin, Germany: Suhrkamp Verlag.)
- 新媒体咨询委员会 (2019)。《公视基金会新媒体咨询委员会工作备忘录》。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 魏玟、林丽云 (2012)。〈三十年崎岖路：我国公视的演进、困境与前进〉，媒体改造社、刘昌德 (编)。《丰盛中的匮乏：传播政策的反思与重构》，页 1-30。台北：巨流。
- Aslama, M. (2008). Policies of inertia or innovation? European public service in

- transition from PSB to PSM. (McGannon Center Working Paper Series. Paper 23). Retrieved from http://fordham.bepress.com/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22&context=mcgannon_working_papers
- Augier, M., and Teece, D.J. (2009).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he role of managers in business strateg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 Science*, 20(2), 410–421.
- Balogun, J. (2007). The practice of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From design to reality.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5(2), 81–91.
- Bardoel, J. and Lowe, G. F. (2007). From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o public service media: The core challenge. In G. F. Lowe & J. Bardoel (Eds.), *From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o public service media*, 9-26. Göteborg, Sweden: Nordicom.
- Bartunek, J. M. (1984). Changing interpretive schemes and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The example of a religious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9(3), 355–372.
- Bettis, R. A., & Prahalad, C. K. (1995). The dominant logic: Retrospective and extens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6(1), 5-14.
- Bettis, R. A., & Wong, S. (2003). Dominant logic, knowledge creation, and managerial choice. In M. Easterby-Smith & M. A. Lyles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pp. 343–355).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Bulck, H. V. d., Donders, K., & Lowe, G. F. (2018).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the networked society: What society? what network? what role? In G. F. Lowe, H. V. d. Bulck, & K. Donders (Eds.),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the networked society* (pp. 11-26). Göteborg, SE: Nordicom.
- Clark, J., & Aufderheide, P. (2009). *Public Media 2.0: Dynamic, engaged publics*. Retrieved from http://archive.cmsimpact.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ages/publicmedia_2.0.pdf
- Coleman, S. (2004). From service to commons: Re-inventing a space for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D. Tambini & J. Cowling (Eds.), *From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o public service communications* (pp. 88-98). London, UK: 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Collins, R. (2007). Public value and the BBC: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work foundation's public value consortium.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workfoundation.com/assets/docs/publications/174_publicvalue_bbc.pdf
- Curran, J. (2002). *Media and Power*. London, UK: Routledge.
- Daft, R. L., & Weick, K. E. (1984). Toward a model of organizations as interpretation syste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9(2), 284–295.
- Eggers, J. P., & Kaplan, S. (2013). Cognition and capabilities: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7(1), 295–340.
- Ericson, T. (2001).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under standing strategic chang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 Management*, 17(1), 109-131.
-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2012). Empowering society: A declaration on the core values of public service medi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bu.ch/files/live/sites/ebu/files/Publications/EBU-Empowering-Society_EN.pdf
- Garnham, N. (1986).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olding, P. Murdock, G. and Schlesinger, P. (Eds.), *Communicating politics—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arnham, N. (1992).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alhoun, C.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Garnham, N. (2003). A Response to Elizabeth Jacka's 'Democracy as Defeat'.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4(2), 193-200.
- Gioia, D.A. and Chittipeddi, K. (1991). 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 in strategic change initi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2(6), 433–448.
-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 Burger,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Jakubowicz, K. (2010). PSB 3.0: Reinventing European PSB. In P. Iosifidis (Ed.), *Reinventing public service communication: European broadcasters and beyond* (pp. 9-22).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Kaplan, S. (2011). Research in cognition and strategy: Reflections on two decades of progress and a look to the fut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8(3): 665–695.
- Klein-Shagrir, O., & Keinonen, H. (2014). Public Service Television in a Multi - Platform Environment. *VIEW: Journal of European Television History & Culture*, 3(6), 14–23.
- Kor, Y. Y., & Mesko, A. (2013). Dynamic managerial capabilities: Configuration and orchestration of top executives' capabilities and the firm's dominant logic.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4(2), 233–244.
- Larsen, H. (2014). The Legitimacy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ase of Scandinavia. *Nordicom Review*, 35(2), 65–76.
- Lowe, G. F., & Maijanen, P. (2019). Making sense of the public service mission in media: youth audiences, competition,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 16(1), 1–18.
- Lüscher, L. S., & Lewis, M. W. (2008).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managerial sensemaking: Working through paradox.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2), 221–240.
- Maijanen, P. (2015a). Cognition as a driver and barrier of strategic renewal: Case of the Finn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Int. J.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9(3), 351-374.
- Maijanen, P. (2015b). The evolution of dominant logic: 40 years of strategic framing in the Finn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 12(3), 168-184,

- Maijanen, P., & Lowe, G. F. (2016). Manager perceptions of the public service mission in the emerging networked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IPE@2016 conference, Antwerpen, BE.
- Maitlis, S. (2005). The social processes of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1), 21–49.
- Murdock, G. & Golding, P. (1989).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Political Inequality: Citizen in the Age of Privatize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9(3): 180-195.
- Nelson, R. R., & Winter, S. 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rahalad, C. K., & Bettis, R. A. (1986). The dominant logic: A new linkage between diversity and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7(6), 485–501.
- Sehl, A., Cornia, A. & Nielsen, R.K. (2016). *Public Service News and Digital Media*.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 Sehl, A., Cornia, A. & Nielsen, R.K. (2017). *Developing Digital News in Public Service News*.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 Valerie Belair-Gagnon, Jacob L. Nelson & Seth C. Lewis. (2019). Audience Engagement, Reciprocity, and the Pursuit of Community Connectedness in Public Media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13(5), 558-575.
- Vanhaeght, A-S. (2019). Audience participation in PSM: From a media-centric to a society-centric approach: The Monitor as a best practice of the Dutch public broadcaster NPO. *VIEW Journal of European Television History & Culture*, 8(16), 45-58.
- Walsh, J. P. (1995). 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cognition: Notes from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Organization Science*, 6(3), 280–321.
- Walvaart, M.te (2019). Translating PSM Policy into Production Practices: Studying New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wards Audience Engagement. *VIEW Journal of European Television History and Culture*, 8(16), 88–97.
- Weick, K. E. (1995).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Wilson, S.-A. (2020). Public service media, an overview: Reflecting on news and trends.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 11(2), 253–259.
- World Radio and Television Council. (2001). Public broadcasting: why? how? Retrieved from <http://web.pts.org.tw/~web01/input2006/Documents/WRTVPSBWhyhow.pdf>

A Swing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Paradigm: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Huei-Wen Lo

ABSTRACT

While users are turning to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device, how the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starts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ponding to these user behavior chang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many countries.

In 2017,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announced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stablishing the Public Service Media Project Center and the "PTS Plus" online audio-visual platform. In 2018, the news department also established the P# News Laboratory and launched digital thematic curations from time to time. Why did PTS start these transformations? How does it transform? This research uses the theory of sense-making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 dominant logic concept, the in-depth interview and the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to explore how the PTS managers recognize the mean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research also analyzes how PTS managers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hrough transformation, presenting the current omni-media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dominant logic of PT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dilemma, hoping the resul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public service media.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ominant logic,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ublic service media, sense-making theory

* Lo Huei-We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of Shih Hsin University, and she was the sixth board member of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email: hwlo@mail.shu.edu.tw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性別文化空間、影像與公共性： 以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文化產製品為例

孫嘉穗*

本文引用格式

孫嘉穗 (2022)。〈性別文化空間、影像與公共性：以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文化產製品為例〉，《傳播、文化與政治》，15:67-86。

投稿日期：2022 年 2 月 9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5 月 4 日。

* 作者孫嘉穗為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教授，e-mail：
suncs@gms.ndhu.edu.tw

《摘要》

本文以台灣的慰安婦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其衍生之紀錄片【**芦苇之歌**】為例，探論性別文化空間與影像如何展現公共性、乘載記憶文化，以及建構性別網絡。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不僅展現不義歷史的記憶文化，讓慰安婦得以發聲，更讓受害者的個人故事轉化為性別教育的公共資產。透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及其相關影像，慰安婦的個人生命故事從私領域到公領域，透過博物館和影像在公共領域與公眾進行溝通，讓身處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參與者能深刻體認壓迫的形成，並召喚參與者及閱聽眾的情感共鳴，使更多受不同形式壓迫的阿嬤與女人得以反抗受迫的處境。經由博物館和影像，慰安婦的生命故事與相關經驗得以與社會交織，並串聯多元的性別網絡，以及展現公共價值與理念。

关键词：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慰安婦、公共價值、性別、公共性

本文以台灣的慰安婦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其衍生文化產品為例，探論性別文化空間與影像如何展現公共性、乘載記憶文化，以及建構性別網絡與轉型。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不僅展現性別地景，更構連不同世代關切的性別議題及性別文化團體與組織，公共空間更透過舉辦不同活動與網絡串聯成為不同論述與行動的辯論場域，並提供性別文化之公共議題激蕩與落實為行動倡議。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不僅展現不義歷史的記憶文化，更成為轉變受害者以己身經驗成為性別教育賦權者的療愈空間。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透過影展與不同形式的策展召引多元的參觀者，讓影像成為溝通媒介與大眾在此公共場域交流，相關的策展與博物館展覽之呈顯，在國族脈絡下同時展現人权的伸張，也讓事件中涉及的性別與族群等議題能在此公共空間中，經由持續的討論延展出性別教育的多重面向與多元可能。

婦女救援基金會附設之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於 2016 年 12 月 10 日正式成立，收錄台灣 59 位慰安婦阿嬤的生命故事，是台灣展示女性人權議題的重要地標，透過博物館的策展以及不同形式的網絡串聯，成為性別教育的重要基地。儘管因為虧損加上疫情的衝擊，使得位於大稻埕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於 2020 年 11 月閉館，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接續透過募資平台發起群眾募資活動，並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另覓新址重新開幕，而此公共參與的方式也展現了公眾對慰安婦博物館之關注。

本文所論及之性別文化空間乃指涉可展現性別文化，與召引性別討論和促發性別意識之文化空間，在此文化空間中可透過公共敘事展現性別文化公共性之意涵。本文不僅是以博物館與衍生之媒介視為文化空間為討論基礎，更以文化空間本身具有的政治性與能动性，來討論博物館如何重新問題化性別與權力關係。文章的論述主軸強調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如何藉由「博物館」機制，透過展覽、媒體影像、阿嬤生命故事展現等過程，讓慰安婦議題被公共化，也牽動相關性別議題重新被問題化。

而選擇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紀錄片【**蘆葦之歌**】，乃基於在當前台灣的社会，阿嬤家博物館是少數以性別為主軸的文化空間，透過慰安婦的故事呈顯性別文化地景，而慰安婦的个人生命故事如何經由博物館的展示，

影像的诠释与再现，呈显私人到公共的历程，以及显现多元向度与视角，乃是本文所欲探究之处，同时也探讨性别与国族、历史及文化的意义与特殊性。本文透过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的文化空间与【芦苇之歌】的媒介展现，探究与深化性别文化公共性之相关议题。

慰安妇的历史经历报导、跨国求偿与政治折冲与不同权力的挪借及收编等各式历程，与各种论述及各式权力互相冲撞，然而在慰安妇议题挪借为各方势力的公共讨论与介入中，慰安妇的个人生命样貌与故事又如何在公共化的过程中找到主体意义，而非只是被诠释与挪借议题的客体，由私到公的过程有那些问题？又彰显了什么样的性别文化？本文藉由下列之梳理呈显性别文化公共性之样态。

本研究聚焦于下列研究问题：

- (一) 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展现了甚么样的性别文化公共性？
- (二) 性别文化公共议题的再现方式与公/私领域议题的跨越
- (三) 【芦苇之歌】如何展现不义历史与记忆文化？
- (四) 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促进公共参与的价值与目的为何？
- (五) 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媒体与公共网络的串联为何？
- (六) 公共倡议如何透过性别符码再现与创新？

本文涵纳博物馆与其具代表性的性别影像之文化空间分析，并就其公共性之展现、网络构连、文化记忆与符码的转型与文化消费等梳理性别文化之公共面向。

壹、何谓公共性与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的公共价值与理念

哈伯玛斯 (J. Habermas) 提出公共领域、沟通理性以及审议民主等概念，关切如何建构具解放意义的沟通模式 (Habermas, 1984; 张锦华, 2014, 页

50)，哈伯玛斯批判当代的公共领域常被商业和政治利益控制，因而提出沟通理性之概念，关切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免于系统性压迫，并能经由有效沟通过程，追求理性与互为主体的共识（Habermas, 1984, p.5；张锦华，2014，页50）。那么，将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与纪录片【芦苇之歌】视为性别文化空间与可资沟通交流的公共领域，博物馆与纪录片展现了哪些努力与试图增进参与者与阅听众对慰安妇议题的了解与沟通，又如何促发反思与行动，以展现公共性之意涵，遂成为本文所欲探究之处。

何谓公共性？顾忠华在论及知识的「开放性」与「公共性」时，主张其意味「共通的普遍质素，让知识可以更为灵活地与社会交织，并产生改善人类生活的效益」，顾忠华也主张社会科学知识的公共性可以转换到学术外受众或公民观点，须受到受众或公众的肯认（顾忠华，2005，页2-15）。而陈逸淳（2012，页33）则指出公共性指称意义具备了多重的歧异性，含括集体、国家、政府、社会，甚至是公众、大众等范畴。

而吴介民、李丁赞（2005）批判性地指出哈伯玛斯的公共沟通概念乃基于理性的沟通模式，但缺乏对情感层面和身分认同差异的关照，而公共修辞需透过个体或团体间的生活经验召唤和串连以形成共同经验和达致公共感受，且沟通方式同时需要构连阅听众的主动参与和情感共鸣（张锦华，2014，页52）。

那么透过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及其相关影像，慰安妇的个人生命故事如何从私领域到公领域，如何透过博物馆和影像的文化空间与公共领域进行沟通，并召唤参与者及阅听众的情感共鸣，以及博物馆和影像所承载的相关经验如何展现公共性，与更为灵活的与社会交织，受到公众的肯认，并展现公共价值与理念，遂成为本文聚焦之处。

在战争下被剥夺的生命尊严与社会压力下的失语及压迫，失声的慰安妇如何透过慰安妇博物馆和影片发声，将私领域的个人生命经验转化为公领域的展示，这些进程为何？如何进行沟通又化为行动？本文关切慰安妇的噤声失语及反抗如何转化，如何夺回主权与公共发声，以及慰安妇被剥夺的青春与由自卑到寻回自信的过程，是如何与博物馆及影像呈显交织，由私到公领域的过程也彰显公共化历程中藉由沟通到寻找共识的历程，而如何沟通？如

何串联？以召引观众参与而进行，皆呈显性别文化空间与慰安妇的生命历程交织而由私领域到公领域的多元面向。

那么，透过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与衍生之影片【芦苇之歌】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所形构的共识为何？又串联与召唤了观众哪些面向的思考与成果？首先，博物馆展现了战争下的性别处遇，以及慰安妇所遭受的性别暴力，公众进入博物馆的性别文化空间，透过慰安妇的生命经验展现，未曾经验战争洗礼的公众进入慰安妇遭难的时空，体察每一位受暴女性的生命经历，以及各种遭受歧视的样态，从而激发反性别歧视的情感共鸣，与进而召唤公众主动参与反制性别暴力的共同行动。其次，慰安妇由噤声到勇于发声的过程，召唤了身分各异，却在不同情境下同样遭逢性别暴力却怯于发声的人，在参展与观影过程中得以疗愈与获得发声的勇气。参与的公众也能重新审视性别暴力运行的外在结构，并进而检视身处的环境，思索改善尚待努力的性别处遇，慰安妇的故事从而与社会不同处遇的性别压迫经验交织，并进而成为促发公众共同改善性别环境之动力。

贰、性别文化公共议题的再现方式与公/私领域议题的跨越

由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到阿嬷的故事【芦苇之歌】纪录片，不仅展现性别文化公共议题的再现方式，也呈显公 / 私领域议题的跨越与转化过程。从个人的生命故事到公共叙事，公共化的慰安妇影像故事成为性别教育资产的过程需经过对结构与压迫形制的反省，并进而反抗与拆解压迫形构，方能彰显性别文化公共领域之价值与意涵，而厌女情节的诸多社会成因使得慰安妇在艰困处境中噤声不语，在其个人生命经验故事由私领域转为公共化的过程中展现对压迫形制的反抗，本段因而由爱女/厌女之情感与性别再现梳理此公共化过程中公 / 私领域之跨越，与对不义历史与记忆进行转化。

与台湾慰安妇相关的历史与故事，发展出哪些新的文本、形式与再现？从阿嬷的故事【芦苇之歌】纪录片到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不仅展现爱女 / 厌女之情感与性别再现，更显现了从个人的故事跨越到公共领域而展现公共性的多重面貌。

阿嬤的故事【**芦苇之歌**】纪录片呈显的慰安妇故事，不仅承载着故事背后的国族印记，更深刻的刻画着受压迫女性的噤声与发声历程，不同阿嬤的故事呈现不同种族、阶级的女人，经历时代的悲情，却又被污名化而的人生，与当中面对不同形式亲密关系的断裂与重构。本文首先析论影片中显现的爱女/厌女情结，以及不同慰安妇在不同形式亲密关系中遭逢的压迫，与被亲人排拒的处遇。而后梳理厌女情感的生成，与拆解压迫的成因，进而探究慰安妇个人处遇的生命故事，透过影像与博物馆成为不同形式的文化空间与公众互动与沟通时，什么样的公共性呈显于其中。

本文将媒介和博物馆皆视为为性别文化空间，检视阿嬤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如何再现慰安妇的噤声与发声历程，又如何诠释其中的爱女 / 厌女情结，与谁来诠释？同时，承载着故事背后国族印记的阿嬤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与进入参观者进行了甚么样的互动，而进入其中的参与者在博物馆中生产与消费了什么样的情感，又如何反思厌女情结在不同时期社会的展现，皆是本文所欲探究之处。阿嬤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再现慰安妇生命故事的同时，博物馆的文化空间扣连不同的社会网络，让身处阿嬤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的参与者能深刻体认压迫的形成，阿嬤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成为平台，重构亲密关系的连结，以使更多受不同形式压迫的阿嬤与女人都得以回家。

参、慰安妇博物馆与【**芦苇之歌**】展现的不义历史与记忆文化

慰安妇的生命经历呈显多重的压迫与歧视，而厌女症的生成源于社会系统性的压迫，因而如何对不义历史进行反抗与翻转记忆文化，是慰安妇故事公共化过程中彰显性别意识的重要途径。而梳理博物馆与纪录片参与慰安妇生命故事公共化的过程，可呈显性别文化空间在公共化历程中如何重新问题化性别与权力关系。

尽管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对「负面遗产」（Negative Heritage）仍未有明确定义，然「负面遗产」可意指「可彰显负面教训与纪念集体记忆的地方」（黄龙兴，2011），保留「负面遗产」并非

要彰显仇恨，而是要和解与避免世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而因歧视或偏见所造成的创伤记忆，得以有所警醒（黄龙兴，2011，页 75）。而单德兴以越战将士纪念碑召唤越战逝者与观看者的互动与沟通，使参访者成为参与者，认为遗产「提供一个记忆与反省的场域，让人如实面对自己和历史的创伤，透过真诚的感受与割切的反思，逐步疗伤止痛，以史为鉴」（单德兴，2008，页 161）。而「阿嬷家博物馆」也让驻足其中的人反思性别处遇，让慰安妇与曾受性别歧视与暴力之人得以疗伤，也召引参与者共同努力改善性别环境。

纪录片【芦苇之歌】中每一个慰安妇的故事皆承载着生命沉重的压抑，也深刻的刻画着受压迫女性的噤声与发声历程，而纪录片中展现的爱女/厌女之情感，也揭示着不同阿嬷的故事，呈现不同种族、阶级的女人，经历时代的悲情，却又被污名化的人生，与当中面对不同形式亲密关系的断裂与重构。

慰安妇的故事不仅承载着故事背后的国族印记，更有着每一个阿嬷和个人及家族面对遭难的情感挣扎。当陈桃阿嬷费尽千辛万苦回到自己的家，以为回到所爱之人之处时，却是遭到自己的叔叔将行李箱扔出门外，并对着她说：「姓陈的没有你这样的贱女人」，影片中对着摄影机的阿嬷数度说不出话，停顿数次后只能再一次的说着被叔叔说是贱女人的痛楚，以及抗辩着自己并非自愿而是被抓去的处境。在阿桃阿嬷的境遇中，呈现慰安妇的印记对其家人而言是个耻辱，因而宁可将亲情断裂也不要让慰安妇的印记影响到家里的其他人。女性的身体与性不仅在战争中被剥削，女性的心灵更在更大社会的厌女情结下遭逢更大的羞辱与啃蚀着受压迫女性的尊严，因而在重新寻回自我尊严的过程中，慰安妇的生命不仅需要和自我的过去和解，更需要解构社会的厌女情节与直视参与其中的男性暴力，并从而翻转社会价值与正视对受害者的处遇并给予尊重，因而理解厌女情节的生成，与从战争与灾难中省视受难女性的处境。

阿桃阿嬷在纪录片中说着曾经希望自己成为老师的梦想，而在受难成为慰安妇返回之后，不仅二十五岁的年纪在当时已经无法再念书，曾经的梦想也成了无法完成的想望，在纪录片【芦苇之歌】中当她悠悠说着一辈子就此毁了的悲凉，让观者看到人的生命个体在战争、国族、性别暴力下交织的沧

桑与多重的无奈，曾经可能美好的生命，在时代的悲凉处境中夺去的不仅是女性的身体与尊严，更是无法回复的生命想望。因此，从厌女到爱女的修复过程，也须检视不同层次厌女情结与不同层次的修复过程。

慰安妇阿嬷的处遇也显现了疗愈与修复的过程涵盖了与自己的、家庭以及与社会不同层次的情感接合，厌女情结的解构与修复也包含了不同社会脉络之影响与生命主体的重构。【芦苇之歌】中的一幕，呈显了在疗愈工作坊带领中，慰安妇阿嬷画出的自己都是年轻的少女，彷彿时光停在未曾受伤之前的年代，不忍再检视受难为慰安妇之后的人生。

【芦苇之歌】揭示不同慰安妇的故事，也刻画着一个一个的生命伤痕，包含不敢和家族后辈揭示的过去，因成为慰安妇而不能生育只能领养后代的身体，历经三次婚姻的经历，被卖掉而成为慰安妇的过去，老年孤单无伴的人生，在豆蔻年华无法实践生命愿望而背负着遗憾和受着屈辱生活的人生，厌弃作为女人的身体和生命，而疗愈与修复以及和自己、家庭与社会的情感重新接合并非只是慰安妇阿嬷自己的事，更是其所身处的家庭与更大的社会架构需进行去污名化的过程，以及尊重受害女性的身体和心灵，唯有如此，慰安妇阿嬷才能和自己和解，以及和家庭与社会进行情感的重新接合。

亲密关系的重构须由自己开始，慰安妇阿嬷和自己的和解以及重新和自己产生情感构连，须由自己谅解过去的自己，不再受到既有社会框架看待有着慰安妇标签的生命，也不再厌弃自己。然则情感的重新接合涵盖复合的层次，厌女情节的生成在慰安妇阿嬷自身，部分因根源于厌弃无法反抗日军的命令，而只能屈从以性的服务生存的女性身体；家族的厌女情结则不愿连构污名化的慰安妇标签，以让家族其他人与之隔离，而无视于受难者的情感，以厌弃的方式拒绝慰安妇阿嬷和家族的连结；而更大的社会则无视战争暴力下的女性屈辱，在各种对慰安妇的刻板化印象和污名化情境中，让受压迫的女人受到更大的伤害，无法坦然面对受迫的过去，也无法昂然向前瞻望未来，并因此产生与各种不同层次情感关系的断裂。

因而理解慰安妇阿嬷的处遇，可协助每个人反身检视自身对于性别与社会关系，以及对于受压迫者是否同理与尊重的社会转机。当慰安妇阿嬷可以面对影像，让自己的故事为人知晓，面对过去挺身而出时，阿嬷们的故事就

成为性别与人权教育的重要指标，展现公共性中与大众的沟通并将个人的生命故事串联到更大的公共网络，协助公众理解受害者的处境，阿嬷们也不应背负社会的污名与成为可怜与同情的对象，阿嬷们敢于挺身而出，要求历史正视与平反，并让后代知晓当时环境下的生命境遇，也彰显了要求尊重的自信，与对生命的重新掌握。

正视爱女 / 厌女的多重样貌与讨论，让博物馆与影像成为透过公共辩论拆解厌女现象与反性别歧视展现公共性之文化空间与影像中介。透过不同的媒介，故事重新被述说，也重新面对不同的权力角力，譬如日本、韩国、台湾与中国都以不同国家的不同立场与观点，重新述说着慰安妇的故事，也各自以不同的媒介影响述说涵盖国族、阶级与族群的故事。

Hepp 与 Hasebrink (2014; 方念萱, 2016) 强调的社会互动概念，认为媒介化研究关注当媒体科技成为社会不可少的一部份，并关注社会互动会如何发生与如何转变。而在慰安妇博物馆的各国运作中，可见到慰安妇故事媒介化的现象，慰安妇故事被以不同媒介不断的再制与转述，也进行社会互动连构到不同的网络。

女性作家琼·史密斯 (Joan Smith) 在《厌女症》 (*Misogynies*) (2013) 一书中指称厌女症 (misogyny) 常表现于文学、艺术和各种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之中，展现对女性相关事务的厌恶，并把妇女的性视为为死亡和痛苦而非生命和快乐的象征。

Gilmore (2005) 推论，厌女现象其实源于男性高度依赖与需要女性的心理，当依赖与需要的程度过高引发了焦虑与恐惧，反而演变极度贬抑与憎恨女性的心态。

上野千鹤子 (杨士堤译, 2015) 在论及慰安妇时则指出下列现象：

这里的性满足指的是男人的性满足，因此男人不需要去在意女人的性满足。这时就让人不禁想到，「慰安妇」的确是一种十分恰当的称呼。「慰安」指的只是男人方面的「慰安」，但对「慰安妇」而言，这却是一种有如地狱般的奴隶劳动。因此，有许多的幸存者都陆续地出面表示「我们不是慰安妇」，并且断然地拒绝这种称呼方式。

陈莲花阿嬷被送到菲律宾，太鲁阁族阿嬷林沈中被骗到部落山洞，吴秀妹阿嬷由童养媳又被舅舅卖去当慰安妇，不同女人的生命境遇面对战争、贫穷与性别各种面向的压迫，交织为慰安妇不得已面对的生命情境。如同林沈中阿嬷在片中所陈述的现象，不时有人当面问她，担任慰安妇时共服务了多少人？几次？她响应说自己不是不知检点的女人，而是在当时的情境下，无法反抗日本人的命令，部落的人才不再说话。而林沈中阿嬷在片中能指出并说明当时原住民妇女受害的地点，说明自己的经历，也展现了勇敢面对过去，并体现了能捍卫自己的尊严的努力。

战争的军国主义下，女人没有主体，女人的身体只是被用来当作为军国服务的工具，当女人的身体为男性所操控，女人不仅没有了身体的主控权，在精神与心灵上也丧失了自我，而产生厌恶自己身体和心灵的状态，而这样的解离，需要情感上和自己的和解，方能重新扣连自我的主体性，而面对媒体与大众揭露自己的经验，更是夺回自主权的具体展现，宣告受害者不应躲藏，加害者才应道歉寻求谅解，受害者更不应被排除在文化系统之外。而把女人当性客体与他者化的加害者与历史，也应重新检视，并让往后的人因理解真相而能正视慰安妇所处的历史与当时情境，如此，也当能破除厌女情节的生成，与归还给慰安妇阿嬷应有的尊重与展现正义。

肆、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公共参与的价值与目的

当慰安妇个人的生命经验挪借为公共议题时，甚么样的权力竞逐存于其中呢？慰安妇个人故事公共化的过程中也须面对不同权力的竞逐，慰安妇议题的发声主体未必是女人，相关议题常被挪借为不同政党或国族彼此竞逐的工具，在以慰安妇之名发声获利或者立像的同时，却可能只是挪借慰安妇议题作为政治竞逐，甚或国族竞争的筹码。虽以慰安妇之名发声，实际上却恰可能使慰安妇噤声并且失去主体性，男性政治人物以慰安妇之名疾呼，却可能只是想要以此行动来对正在进行中的转型正义提出反制，慰安妇雕像在台湾立碑，却吊诡地反而是消费了慰安妇议题，以正义之名发出为慰安妇争取

权益，背后却有政治盘算与收编了慰安妇议题为男性竞逐的政治目的服务，慰安妇议题在不同时空的框架下，有时非但未能展现性别主体，反而成了另一个被剥削的议题，或被其他政治目的收编为筹码与借口。失却主体性的过程，非但未能展现正义，反而更显不公，也未能显示尊重。

媒体中展现的慰安妇女性经验经常在传媒的论述空间被扁平化与单向化描述，而未呈显其多元复杂的样态，慰安妇在新闻再现中经常是可怜与悲情，或因要求日本补偿的议题而上新闻。慰安妇议题也经常不同政治议题所收编，或挪借成为国族或政党的操作议题。

那么，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致力于公共参与的价值与目的为何？除了如其名的希望给慰安妇阿嬷们一个安身立命与被关爱的家，在记录与展示其受压迫的历史与面对生命遭难的故事勇敢新生的故事外，这些逐步转化的历程，更是实践正义与性别教育的重要资产，让慰安妇阿嬷们的生命故事不只是战争下的女性遭难故事，而能成为建设性的性别教育珍贵素材。进入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的参与者，在此性别文化空间中不仅阅览着战争下无辜女性生命被卷入的战争印记与事件，更能深刻反省自身如何看待慰安妇，以及省视更广泛的受压迫女性的社会处境，进而期盼参与者无论男女皆能成为现有社会结构下以爱与尊重反转厌女情境结构的一方，或至少不再以歧视态度看待慰安妇及其相关议题。而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的性别空间，也就能成为持续性的公共性别教育平台，让受压迫以及受暴妇女的经验能经由此得到安全与生命反转的可能，也让进入空间的参与者不仅是在情感上消费慰安妇的故事，而是能参与其中，并省思既有的性别偏见与促发不同形式的性别正义行动。

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再现慰安妇生命故事的同时，博物馆的文化空间扣连不同的社会网络，让身处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的参与者能深刻体认压迫的形成，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也成为平台，重构亲密关系的连结，以使更多受不同形式压迫的阿嬷与女人都得以回家。

伍、随着慰安妇的故事巡走：博物馆、媒体与公共网络的串联

公共化的过程需要召引公民的参与，透过博物馆和纪录片的文化空间与公民进行沟通，以及以不同文化形式进行性别文化的表达，并包含对情感层面和身分认同差异的关照，而博物馆不同形式的策展也经由连构参与者生活经验的召唤，透过慰安妇故事的巡走与串联进行沟通，并进而转化与形成性别意识之提升。

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的空间与再现如同其策展的「安妮与阿嬷相遇：看见女孩的力量」活动，透过国际与在地的串连，共同关切不同形式的性别议题，并使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的文化空间成为对话、交流与女力网络串连的平台。

慰安妇的故事不仅标示着受害者的处境，慰安妇所面对的压迫、歧视、暴力与难于言说的经验更呈显著人类所共同面对的脆弱性，然而慰安妇并非仅能被动的接受保护，在慰安妇的行动倡议中，也不时展现受害者夺回主体发声，与彰显能动性的具体行动。

重新理解受害者的过程，需随着慰安妇的故事巡走，如同 Stringer (2014) 试图转换视受害者为缺乏能动性及需要保护之负面意义，并关注受害者如何发声与行动主体如何开展，因而成为在既有架构中突围的重要面向。而阶级、族群、国族与资本主义的扩张等因素形构了脆弱性在不同历史时空下的不同面貌，理解慰安妇在其中的挣扎与突围，有助于翻转性别处境及呈显能动性之开展，并打破脆弱与能动作为对立的思考框架 (Butler 2016)。

而公共性之检视也可由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媒体再现与慰安妇故事所延伸的多元网络探看脆弱性与能动性之转换。随着慰安妇的故事巡走，以探究博物馆与媒介的文化空间如何中介慰安妇的故事，并解析什么样的结构形构了受害者的处境，重新检视脆弱性，并反思受害者的位置。

透过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的网络串连，展现公共领域的沟通型态，慰安妇故事延展串联了安妮日记的展览，压迫与重生的影展，更透过台湾、日本与韩国青少年共同参观韩国慰安妇博物馆的活动，串联起理解受害者，以及看见受害者能动性的网络，脆弱身体的文化政治因而重新被探看与连结不同世代，不同国家形构下的脆弱性与抵抗策略在跨国交流中也呈显受害者

位置之翻转，以及展现能动性。

慰安妇博物馆透过展览与网络连结，将慰安妇的故事延展至性别教育与串联多元的网络，而媒体不仅在展览中扮演重要角色，更在跨国串连中连构了多元形式的性别机构与社群。

随着近年来各国慰安妇的逐年凋逝，慰安妇博物馆终将会面对慰安妇逐年减少与凋零的景况，为着慰安妇争取权益与去除污名的初衷，将会逐渐扩展为防治性别暴力与连结到各种性别议题的性别空间与中介机构，在析论慰安妇议题、博物馆与媒体间的关系时，由台湾及韩国的慰安妇博物馆之案例探看博物馆与媒体形构出的网络串连，可呈显公共性之网络形构。

关于慰安妇的相关议题，大多数的人并未亲身见证慰安妇，而是透过博物馆的展示与不同媒体的再现与诠释认识慰安妇与其故事。因而博物馆与媒体遂成为重要的中介，形构与再现不同的慰安妇故事，也诠释慰安妇相关议题，并连构到不同形式的人群、活动、组织与机构。

台湾的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之公共性展现，由博物馆并非仅是呈显慰安妇受害者的图景与其脆弱性，而是彰显了慰安妇阿嬷们从压迫中之抵抗，透过艺术作品疗愈，以及用生命展现能动性与成为性别教育重要象征的过程。

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曾举办的「安妮与阿嬷相遇：看见女孩的力量」特展、各种性别影展与慰安妇相关讲座，运用的大量的媒介影像，也将慰安妇议题构连到相关摄影者、导演与不同形式的创作，更由慰安妇议题延展至性别暴力防治等不同社会网络。

而阿嬷家博物馆的跨国路径展现公共性的跨国连结，跨国慰安妇博物馆的网络，将各国的慰安妇故事文本串连为更大面向的公共性别教育网络，并与多元的文化空间衔接。

如以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所参与的「日本军慰安妇历史解决及为亚洲和平国际青少年大会」为例，即增进了跨世代理解慰安妇故事文本与跨国、跨世代的行动连结。那么，跨国的交流串连了什么样的网络？以及参与活动又增进了青少年对慰安妇什么样的理解？曾任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带队参与活动的展览与教育组专员王力纬表示，在带队前往韩国的观察中，发

现在第一届的活动中安排了让慰安妇阿嬷对青少年说故事，让青少年亲身接触受害者，透过此规划使青少年对慰安妇议题有更强的连结，而在活动结束后安排慰安妇和青少年一一拥抱，更强化双方的理解与疗愈。

陆、公共倡议与性别符码的再现与创新

博物馆的影片与文创产品做为一种消费型制，又是如何透过产品传递性别意识？抑或反转偏见？首先，文创产品需要纳入慰安妇议题所在之文化与社会脉络，其次，文创产品如需进入常民的日常生活，与传递情感，文创设计须符合常民日常生活所需，并有其相连的标示系统与符码。文创产品可作为捐助者与支持者的行动串联标示，因而须有清楚的符码设计与串联系统。

以韩国首尔的战争与女性人权博物馆为参照案例，博物馆使用了许多不同媒介的展示来呈现慰安妇相关议题，博物馆一楼的展示邀请观赏者在入门处在黑暗中观赏短片并参与互动，体会慰安妇在黑暗中生存的禁锢，以及体会化为彩蝶重获自由的意象。

而其中的慰安妇相关文创产品，不仅成为运动倡议的流动商品，也将艺术家的主动参与化为培力行动，让认同相关倡议的群众得以透过流动的文创商品标示认同，并汇聚为更大的支持力量。馆长金东姬于访谈中表示馆中贩卖的纪念品和馆中展示的照片许多皆由参与示威者和艺术家主动提供，相关文创品与相关意象与符码仍须经过国家政策相关单位的检视与认可方可在博物馆流通与贩卖，而相关文创品的收入则反馈给博物馆以增加其收入和维持营运，如标示有慰安妇意象的小物与别针在年轻人中即受到好评。

博物馆的二楼除了有多年来的慰安妇运动相关抗争照片与纪录片，更有着制做成动画的【her story】，以媒介转译慰安妇的生命史，并以较亲近人的动画方式召引参观者驻足观赏，博物馆参观者中可见到外国夫妻推着婴儿车看着动画影像，沉重的场景与故事在媒介转化下吸引着不同年龄世代与不同国籍参观者的关注，而展现其公共性。

台湾与韩国慰安妇博物馆在公共化的过程中，透过不同国家的社会脉

络，与文化及社会运动的既有经验，再现慰安妇的生命情境，与对公众倡议性别议题，并运用创意建构性别符码与设计性别文创品，以增进对社会与大众的沟通与传布相关理念。

尽管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透过不同的尝试在此文化空间中不同的参与者进行沟通，企图透过展示与影像进行情感的交流，以召引共感，然而博物馆的经营不易，尤其以慰安妇的历史经历与抗争作为主要募款要求以维持经营的博物馆势必须要重新思考其定位与转型意义，以及思索作为性别文化空间的公共化意义。

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于 2020 年已经历过休馆暂别，到群众募资另觅他址，并于 2021 年重新开幕等过程，博物馆的公共化也面临转化、重新定位与调整与公众的沟通模式以展现其意涵。而在台湾与各国慰安妇逐渐凋零后，一个公共化的慰安妇博物馆也必须要重新思考当不再有在世的慰安妇时，慰安妇博物馆如何转化与保存负面文化遗产并成为重要的性别教育资产，以及透过何种形式持续和公众进行沟通，以让搬迁后的文化空间仍能成为性别公共领域，召引听众的同情共感，让不同的弱势者能在此空间中发声与透过不同行动参与防治性别暴力，以及促进性别意识的提升，皆是性别文化空间彰显公共性价值所需思索之处。

而遗留下来的故事也可能不断透过不同形式媒介的转化，让触动人心的故事不断激发反思战争下的性别处遇，以及由国族、族群、阶级等多元视角反思受压迫的性别处境，并形成共识召引更多人反转歧视，与让公共化的性别故事激发行动力量，与促发公民理解与沟通。

透过阿嬷家博物馆的文化空间与参与者的持续沟通，尝试以影展、戏剧、让青少年跨国和慰安妇的亲身交流等不同形式的扣连，以及与性别团体、其他人权博物馆合作交流，也进行移动展览至台湾文学馆展出等尝试，展现了博物馆的文化空间由静态展示，进而透过网络延展与公民持续对话沟通的努力，而不同形式持续召引参与者由理解进而参与慰安妇生命故事的历程，深化性别议题，并拓展对不义历史的抗争，在跨国求偿与在政治与权力的折冲间，慰安妇个人生命历史的转化也在此文化空间中进行疗愈。

柒、结论

慰安妇故事透过博物馆与媒介的重塑，连构到不同的网络，然则在权力交错的缝隙中，媒介化的慰安妇故事固然拓展其影响力，构连网络与增进反性别暴力与反性别歧视的能量，却也仍需警醒的避免慰安妇故事主体被各种机制与利益收编而失却原有自主性。各国慰安妇博物馆的组织各有宗旨与目的，在构连不同网络时，应不要忘却慰安妇主体，以及检视媒介化过程中的慰安妇故事变貌，并展现更为灵活地与社会交织与产生改善人类生活的效益之公共性。

【芦苇之歌】纪录片和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性别文化空间，以多元管道促成沟通交流的多样可能。由慰安妇的单一议题，透过跨国合作的串联，在性别文化空间中串连更大的网络，共同关注战争、暴力下的性别处遇，并展现女性主体之能动性，进而发展成为不同情境与社会下的性别教育培力案例。在跨越国界与实体文化空间的同时，形构共同的情感空间，而进入博物馆的参观者，能在多媒体的情境表达中认识与理解慰安妇阿嬷心中的情感挣扎与奋力争取尊严的历程，并理解当时的历史脉络，性别文化空间与国际串连的策展，带领参观者回到重现的文化脉络。而回到日常生活的慰安妇也须经历内/外连结的情感，与家族、社会重构并进行情感的接合。

台湾的阿嬷家博物馆呈现了受害者场景的媒介地图，博物馆和媒介转换了受害符码成为能动主体，也转化脆弱性为能动性。人们透过媒介化的慰安妇故事理解慰安妇，博物馆透过媒体赋权和艺术创作展现慰安妇的能动性。然而符码化和商品化的慰安妇意象是在流动中拓展性别倡议的能量，还是在符码化的过程被不同的力量收编，在公共化的故事中需要更严谨的检视。博物馆和媒介将受害者的故事转化为性别教育与群众性别增能的公共素材，从慰安妇个人经验延展而成的故事在公共化的博物馆与媒介再现中，召引参与者重思人权与正义，在由慰安妇为自己发声的影片与其得以疗愈的博物馆空间中，彰显性别突围的故事与幽暗中的微光。

慰安妇故事成为文本，以不同的形式再现，并串联不同形式的公众，以

让性别议题与公共倡议可持续不断发声，也呈显了媒体、博物馆文化空间、网络串连与公共性交织的多元可能。

参考书目

- 杨士堤译 (2015)。《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台北：联合文学。
- 何雯琪译 (2005)。《厌女现象》，台北：书林。(原书 Gilmore, D.D. [2001].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 方念萱 (2016)。〈媒介化、行动化：媒介化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对话〉，《传播、文化与政治》，4:55-83。
- 吴介民、李丁赞 (2005)。〈传递共通感受：一个地方公共领域的公共修辞〉，《台湾社会学刊》，9: 119-163。
- 张锦华 (2014)。《多元文化主义与族群传播权—以原住民族为例》。台北：黎明文化。
- 黄龙兴 (2011)。〈于负面遗产中重构创伤记忆—从奥斯维辛博物馆到景美人权园区〉，《文化资产保存学刊》，17:73-88。
- 陈逸淳 (2012)。〈博物馆面对当代艺术的两难—从「公共性」谈起〉，《博物馆学季刊》，26(2): 31-47。
- 单德兴 (2008)。《越界与创新—亚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台北：允晨文化。
- 顾忠华 (2005)。〈论社会科学的开放性与公共性〉，《台湾社会学刊》，35: 1-21。
- Habermas, J.(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re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Hepp, A., & Hasbrink, U. (2014). Human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tize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K. Lundby(Ed.),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pp.249-272).Boston, MA: De Gruyter.
- Butler, J. (2016). Rethinking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 In J. Butler, Z. Gambetti, & L. Sabsay (Eds.), *Vulnerability in resistance* (pp. 12-27). London, UK: Duck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J. (2013). *Misogynies*. London, UK: The Westbourne Press.
- Stringer, R. (2014). *Knowing victims: Feminism, agency and victim politics in neoliberal tim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Gender Cultural Spaces, Documentary Film and Publicity:
The Comfort Women Museum and Cultural Products**

Chia-Sui Sun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Taiwan Comfort Women Museum, Ama Museum, and its accompanying documentary "Song of the Reed" as examples to explore how gendered cultural spaces and films show publicity, carry memory culture, and construct gender networks. The Ama Museum not only displays the memory culture and history of injustice, allowing comfort women to speak out, but also transforms the victims' personal stories into public assets for gender education. Through the Ama Museum and its related film, the intimate life stories of the comfort women go from private matters to public domain,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 through the museum and film to allow participants in the Ama Museum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oppression, to emotionally resonate with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audience, and to enable more women to resist oppression in its many forms. The museum and film interweave with society, the full life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of comfort women to connect diverse gender networks, and demonstrate public values and ideas.

Keywords: Ama Museum, comfort woman, public values, gender, publicity

* Chia-Sui S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現

張春炎*

本文引用格式

張春炎 (2022)。〈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現〉，《傳播、文化與政治》，15:87-112。

投稿日期：2022 年 2 月 9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5 月 4 日。

* 作者張春炎為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e-mail：
cychang@mail.ncnu.edu.tw

《摘要》

本文旨在探索东南亚族裔地景的多元意义，以及反思其作为新文化公共领域的可能。本文首先运用数据说明，东南亚移民/工在台人数增加是构成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主要动力。其次透过回顾既有的经验研究，本文厘清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所具备的多元意义。第三是透过分析有关族裔消费地的媒体再现，反思台湾的接待社会文化。研究发现，主流平面媒体再现，反应出台湾社会过于对于东南亚族裔的想象缺乏；新媒体的再现则凸显了，族裔地景对于接待社会具隐蔽意涵的公共空间，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公共互动性的新文化公共领域。在结论中，本文指出，是过去研究者的知识行动、在地非营利组织以及晚近可见的东南亚族裔的自主行动，促成了这样的新文化公共领域成为可能。

关键词：地景、东南亚移工、东南亚移民、族裔消费地、媒体再现

壹、前言：东南亚异乡人与台湾街景

多数人到台中旅游，可能会到火车站前的新潮冰淇淋店宫原眼科，却不会踏入对街残旧的第一广场。一栋被社会遗弃的大楼，却意外承接移工流浪的心情。每个星期日，他们一周中唯一的休息日，聚会在大楼里吃饭、唱歌、泡妞、做爱，唯有这些时刻，让他们重新感觉自己像个人，而不是一枚无差异的劳动力（简永达，2016年6月16日）。

这已经是许多台湾人熟悉的经验，在南来北往的岛内交通中，在都市的漫游里，我们越来越常与东南亚移工在街头擦身而过、看见他们在车站的身影。尤其是到了假日，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内外，多能看见东南亚移工聚集的景象。我们是否想过，这群不论是沉默坐在一处，或用着异国语言放声聊天，又或者是席地吃食的异国劳动者们，是如何出现并重构台湾的社会风景？若你曾经注意过他们，那是在哪里？当时你又是如何看待眼前所见的这个景象？

本章开头引用了一小段新闻内容，被报导的地点是台中东盟广场，原名台中市第一广场，就是一个假日会聚集大量东南亚移工的地点，也是近年来特别受到瞩目的东南亚族裔消费地点。在1990年代初期，这个地方原本是中部地区年轻族群常会去消费和休闲的综合百货，1990年代中期因为种种因素不再吸引台湾人前往。故事如同其他东南亚族裔消费聚集地的发展一般，当台湾人不去了，原本以服务当地人为主的商业或公共空间开始没落、萧条，建筑空间就开始逐步衰败，直到东南亚移工走进、填补了这个空间，才又活络。

换言之，东南亚移工的聚集，是让被遗弃的地理空间又有了新生命。故事不同点在于，从闲置、衰败，直到移工进入才又重获生命力的第一广场，不仅是中部最大的东南亚族裔地景（Southeast Asian ethnoscares），它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2015年第一广场被正式更名为「东盟广场」，作为地方政府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东盟广场这个空间被标举出一个新的空间意义，是力求实践文化多元主义理想的新文化公共领域，藉此呼应台湾作为移民社会应有的文化价值。

伟大的城市要善待新移民，成为可以筑梦、圆梦的新故乡，市府有责任把他们当作兄弟姐妹与家人，「台中之美在于多元共荣，彩虹之美在于多色并存」，台中因为他们而丰富（台中市政府，2015年8月31日）。

根据哈伯玛斯的看法，公共领域是一种「私人会合成为公众，并随时准备迫使公共权威在舆论的合法性基础上运作」（Habermas, 1989；转引自李丁赞，2004，页1），是强调由私人汇集而成一种公共意见，也就是「社会中的私人经过理性辩论，相互对焦后所产生的会合和统整，代表着社会的自我反省和转化，也因此形成类似规范的权威」（李丁赞，2004，页13）。如此，则台中市政府打造东盟广场成为多元文化主义的空间，或许相当程度是面对台湾市民社会的一种文化政策的反应，反应了东南亚族裔地景，不仅仅是一种东南亚移民/工为主体的族裔经济或族裔消费地，而是从族裔消费空间转变成为展现多元文化、相互包容的「新公共空间」。要了解这样的意义转变如何而来？则应该从了解东南亚族裔地景所具备的文化意涵开始。因此本章接下来首先透过回顾自2000年前后发展的经验研究，以此来厘清和说明东南亚族裔地景所具备的意义转变。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尽管地方政府高度宣扬了东盟广场的意义，一如开头引述《报导者》的专题报导所述，东盟广场对于广大的台湾民众而言，却常是「地下社会」般的存在。本文认为，地下社会的比喻，正是捕捉了现实上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对于东南亚族裔地景的文化刻板印象。地下社会意味着不被多数人所熟知、经验和理解，甚至有点危险；地下社会连结着台湾社会普遍的歧视想象，想象着地下社会有着不整洁，而这违反多数台湾人所信仰的文明样子；在刻板印象的想象里，地下社会还是由一群人的占领、混乱秩序，违反多数台湾人对于公共空间的认知。这样的想象与台中市政府打造东盟广场成为新文化空间的政策理念，明显有所落差。值得反思的是，这样的大众想象又是如何而来？

回到哈伯玛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论述概念，他将媒体视为是建立私人会合成为公众、建立公共议题的一项重要机制（李丁赞，2004，页7）。相应

的，过去传播研究也常检视媒体作为一种建立公共领域的机制，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洪贞玲、刘昌德（2004）的研究便指出，20世纪以降，资本的垄断和国家强化控制侵蚀了大众媒体扮演公共领域角色的潜能（洪贞玲、刘昌德，2004，页 333）。则关于东南亚族裔地景的社会想象建构，跟大众媒体的关系为何？本文将藉由分析于东南亚族裔地景的大众媒体再现，说明东南亚族裔地景作为一种文化公共领域的社会想象与现实的落差。最后，针对东南亚族裔地景作为新「文化公共领域」的发展，本文亦将进行一些反思。

贰、概念与现象：东南亚族裔地景

具族裔特色的聚集生活区，是移民社会经常会出现的景象。过去研究会以族裔经济（ethnic economics）的概念来分析其意义，强调少数族裔作为移居者在接待社会的生活处境与经济行为（Pécoud, 2010），以及常见其从事主流社群较不愿意做的工作，包括从事危险、肮脏及低薪的劳动现象（Ojo & Shizha, 2018; Qadeer & Kumar, 2006）。抑或采取族裔飞地（ethnic enclave）的概念研究，强调内部有各类的族裔创业、店家或产业，来服务自己的族裔市场需求（Fong & Shen, 2011; Kaplan, 1998）。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族裔飞地或族裔经济，其聚焦于族裔特色的经济行动，较缺乏对文化意义面向的关怀。因此，本文以族裔地景来作为概念的聚焦讨论。

所谓东南亚族裔地景，是指一个空间或场所，聚集一定人数的东南亚族裔者。这些族裔者主要是来台工作的移工，他们来到这个场所交谊互动、购买日常所需、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等等多元的消费景象，便构成了东南亚族裔地景。不仅是移工构成东南亚族裔地景，少数的东南亚新住民，也是构成族裔地景的重要行动者。还有在台湾取得身份证的东南亚移民，以及台湾当地人，在这样的消费场所开设东南亚料理店、杂货店或者提供东南亚族裔种种消费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王志弘，2011）。

地景作为一种概念，不仅是针对特定空间、实体景象的解释，同时是偏向将「地景诠释为由人群的活力和实践所塑造，以符合其文化」（Crang, 1998 / 王志弘等译，2003，页 35）。这说明了，运用地景这样一个概念，不仅是用来指称可轻易观察到的物理景象，更是指涉东南亚族裔消费地的景象背

后，所呈现的社会关系、文化意义。面对全球人口移动日益普遍，Appadurai (1996) 提出族裔地景的概念，强调移居者进入接待社会或形成一种群体认同的地景。王志弘 (2006) 引用这个概念藉以分析在台湾的外籍移工在特定空间或地方所形成族裔认同和消费实践状况。对移工而言，族裔地景空间具备身在异乡却犹如故乡的慰藉，此空间也能短暂舒缓紧绷、充满压力的顾佣关系同时满足异乡生活的消费需求。对主流社会而言，则不时会出现对东南亚为主的劳工消费群聚、空间占用的嫌恶，甚至是担心影响地价房价、环境质量等 (王志弘，2006，页 151-152)。然而王志弘以桃园火车站周边族裔地景为例，研究发现在此空间蕴含了「多元族群或共存合作、或紧张误解的社会关系，展现为复杂的空间政治」(同上引，页 170)。

由此可以说明，相对于「地下社会」的比喻，东南亚族裔地景实际上内涵着更动态与多元的意义。而当我们认识东南亚族裔地景在台湾社会的动态意义转变，便不得不认识东南亚移工和移民在台湾发展概况。易言之，当东南亚族裔人口增长与之相关的族裔地景便会相对增加，此外其内涵及被观看的方式也会随之转变。

东南亚族裔地景的蓬勃发展，最主要跟 1990 年代以来东南亚移工和新移民人数快速增长有高度的关连性。移工人数的增加源于台湾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自 1980 年代台湾政府因为推动 14 项重大公共建设，以劳力短缺为由，首次开放引进东南亚移工，后续可以从历年统计数字发现，东南亚移工在台人数，自 1990 年代初期的数千人，随着 1992 年《就业服务法》通过陆续放宽各行业和职业合法雇用外籍劳工，开始以翻倍的数字增加。关注劳工权益的团体，针对东南亚外籍移工人数的历年迅速攀升的现象，直接点出了政策的迷障：原来官方政策所宣称的「补充性劳动力」，其实早已是台湾不可或缺的「替代性劳动力」(孙友联，2013)。

从劳动部的相关统计数据，确实可以发现，2003 年东南亚移工总数已突破三十万、2011 年突破四十万、2014 年突破五十万，2016 年突破六十万，2018 年底人数来到六十七万，2019 年后就已突破七十万人(请参照下表一)。

表一：产业及社福外籍劳工历年统计 (2003 年-2020 年)

年	总计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其他
---	----	-------	-----	----	----	----

2003	300,150	56,437	81,355	104,728	57,603	27
2004	314,034	27,281	91,150	105,281	90,241	81
2005	327,396	49,094	95,703	98,322	84,185	92
2006	338,755	85,223	90,054	92,894	70,536	48
2007	357,937	115,490	86,423	86,948	69,043	33
2008	365,060	127,764	80,636	75,584	81,060	16
2009	351,016	139,404	72,077	61,432	78,093	10
2010	379,653	156,332	77,538	65,742	80,030	11
2011	425,660	175,409	82,841	71,763	95,643	4
2012	445,579	191,127	86,786	67,611	100,050	5
2013	489,134	213,234	89,024	61,709	125,162	5
2014	551,596	229,491	111,533	59,933	150,632	7
2015	587,940	236,526	123,058	58,372	169,981	3
2016	624,768	245,180	135,797	58,869	184,920	2
2017	676,142	258,084	148,786	61,176	208,095	1
2018	677,698	258,703	149,433	61,085	208,476	1
2019	718,058	74,764	126,661	59,013	196,162	1
2020	709,123	263,358	150,786	58,135	236,835	9

数据源：〈产业及社福外籍劳工人数〉，劳动部，2020年12月，取自 <https://reurl.cc/YvzLqx>。

表一的历年数字变化充分说明了，历年来台的东南亚移工，基本上是以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个国籍为主。因为来台工作的移工数量年增快速，其来台种种生活需求也随之快速增加。相应的，东南亚族裔消费地的发展，可以视为是为了满足不同国籍的移工在异乡之生活需求。

整体而言，台湾各大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的形成，主要是起因于来自东南亚的移工具有族裔特性的消费需求而产生。少数例外是位于新北市中和区的华兴街，该消费地景是以移居台湾的东南亚华人为主。华兴街一带素有小缅甸之称，该地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过去的侨民政策，吸引了原来住在缅甸、为躲避缅甸军事独裁的华人来台。这些移民来台的缅甸华人，虽为华人但却因为保有对于滇缅饮食、用品和语言文字的习惯，因此也造就了中和小缅甸的族裔地景（翟振孝，2005；张春炎，2011）。

东南亚族裔消费服务的供货商家，是构成台湾的东南亚族裔地景的另一类重要行动者。在台湾要成为店家经营者，往往需要具备公民身份。因此经营者除了是台湾人之外，也包含在东南亚具有生活经验的华人移民，以及因为婚姻入籍的新移民-外籍配偶。尤其是东南亚外籍配偶，因为拥有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素养和语言能力，又具备公民身份，不仅能够成为消费需求者，也能够成为满足经营东南亚商店的卖方。因此，这群新移民在台的人数累积，是初步理解东南亚族裔地景何以形成和扩大的数据数据（请参见下表二）。

表二：台湾历年来东南亚四国外籍配偶统计（2004年-2020年）

年	所有国籍的总计	东南亚四国的 总计	印度尼西 亚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2004	336,483	85,105 (25.29%)	24,446 (7.37%)	5,590 (1.66%)	8,888 (2.64%)	68,181 (20.26%)
2005	364,596	115,046 (31.55%)	25,457 (6.98%)	5,899 (1.62%)	9,675 (2.65%)	74,015 (20.3%)
2006	383,204	117,448 (30.65%)	26,068 (6.8%)	6,081 (1.59%)	9,426 (2.46%)	75,873 (19.8%)

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現

2007	399,038	119,206 (29.87%)	26,124 (6.55%)	6,140 (1.54%)	8,962 (2.25%)	77,980 (19.54%)
2008	413,421	121,127 (29.3%)	26,153 (6.33%)	6,340 (1.53%)	8,331 (2.02%)	80,303 (19.42%)
2009	429,495	123,725 (28.81%)	26,486 (6.17%)	6,694 (1.56%)	8,166 (1.9%)	82,379 (19.18%)
2010	444,216	126,084 (28.38%)	26,980 (6.07%)	6,888 (1.55%)	7,970 (1.79%)	84,246 (18.97%)
2011	459,390	128,956 (28.07%)	27,261 (5.93%)	7,184 (1.56%)	8,262 (1.8%)	86,249 (18.77%)
2012	473,144	130,842 (27.58%)	27,684 (5.85%)	7,465 (1.58%)	8,336 (1.76%)	87,357 (18.46%)
2013	486,703	133,067 (27.34%)	27,943 (5.74%)	7,707 (1.58%)	8,375 (1.72%)	89,042 (18.29%)
2014	498,368	135,779 (27.25%)	28,287 (5.68%)	8,021 (1.61%)	8,467 (1.7%)	91,004 (18.26%)
2015	510,250	138,991 (27.24%)	28,699 (5.62%)	8,326 (1.63%)	8,525 (1.67%)	93,441 (18.31%)
2016	521,136	142,813	29,064	8,670	8,633	96,446

		(27.40%)	(5.58%)	(1.66%)	(1.66%)	(18.51%)
2017	530512	147,647 (27.83%)	29,451 (5.55%)	9,075 (1.71%)	8,703 (1.64%)	100,418 (18.93%)
2018.02	532208	148,367 (27.88%)	29,497 (5.54%)	9,149 (1.72%)	8,714 (1.64%)	101,007 (18.98%)
2019	557450	158,708 (28.47%)	30,483 (5.47%)	10,102 (1.81%)	9,126 (1.64%)	108,997 (19.55%)
2020	565,299	161,202 (28.52%)	30,840 (5.46%)	10,375 (1.84%)	9,328 (1.65%)	110,659 (19.58%)

数据源：〈统计资料〉，中华国内政部移民署，2020 年 12 月，取自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因此，表一、表二可见东南亚族裔人数增长数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动力，造就 1990 年代后东南亚族裔地景日渐成为台湾社会的「另类主流地景」。若以主要族裔文化特色来看，目前在台湾的东南亚族裔地景，主要是以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缅甸（华人）族群为主。进一步依照不同东南亚族裔的消费特定，以及规模大小，全台湾可以标示出许多个东南亚族裔地景，这些地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王志弘，2011；陈建元、张凯茵、杨贺雯，2016；陈坤宏，2008, 2012）：

（一）单一东南亚国家族之裔聚集：诸如位在台北中山北路的小菲律宾（圣多福教堂及金万万名店城）、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小印度尼西亚、中和华新街的缅甸街，这些地点主要是由单一国家族群聚集而被命名的地景。

(二) 多元东南亚国家之族裔聚集：也有以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四大主要移工混杂聚集的族裔地景，诸如桃园后火车站周遭，台中东盟广场及周遭、台南火车站周遭、台南国宾大楼，高雄火车站区的外劳街。

(三) 城市外围或乡间的小规模、零星聚集：在各县市的乡间、工业区及港口周遭，因为移工劳动力需求的引进，也不乏有较小规模的东南亚族裔地景的存在，例如台中工业区，以及高雄港、南方澳渔港等。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一个外在客观事实，东南亚族裔地景的增加和类型的说明，仍然不能充分解释东南亚族裔地景的社会意义。换言之，若要理解东南亚族裔地景的存在意义，应从东南亚移工来台的劳动处境来进行分析，以此更认识东南亚族裔地景对族裔群体的生活需求的意义。既有研究发现，对于一个离乡背井的移工而言，能够在休假时光，到一个地点，不用再承受因为语言沟通困难而带来的生活压力，显然极为重要。而语言也代表着相对熟悉东南亚文化的店家能够提供上述族裔消费的满足，因此族裔地景往往也是一个充满族裔文化符号商品的景象。由于新移民的文化背景，其往往比本地人更具贩卖族裔文化商品、服务的能力，因此日渐增加的移民人数，也成为构成消费族裔地景的另一类重要行为者（王志弘，2011）。

整体而言，对于东南亚族裔者而言，东南亚族裔消费群聚地，充满着不为人知的现实。因为来台工作的东南亚移工，经历着国族和阶级的双重弱势。他们在台生活和基本需求由此得到满足，同时也能够短暂逃避来台湾社会的生活压力。诚如过去研究所指出的，移工到东南亚族裔地景的主要动机是期待能够享受家乡味的饮食用品、购满惯用日常用品，并且能够有一个地方自由使用母语与同乡自由互动，享受难得的心理和生理的需求满足（吴挺锋，2002；吴永毅，2007；陈坤宏，2008）。

参、族裔地景的多元意义

由上节可知，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的存在，显现的是备受工作和生活压力的东南亚移民/工，能在非常有限的休假时间里，完成所有生活必须的消费、汇款和需求满足，同时也能满足乡愁的消解获得归属感，甚至是有打黑工、增加收入机会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研究也关注到接待社会与东南亚族裔之间的文化关系，藉此分析解释族裔地景所具备的社会意涵。这些研究多指出，台湾社会往往未能体察或认真看待前述的意义，反而是多存在的负面观感与歧视，来看待东南亚族裔消费群聚。诸如早期研究发现，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会受到台湾报以刻板印象，将东南亚族裔地景视为是一种衰败、脏乱和容易犯罪滋生的问题地，这样的过程又称为空间的病理化（邱淑雯，2007）。这样的研究也凸显出主流社会对于位居阶级弱势、边缘少数的外来族群，抱持对立、不友善的姿态。

然而自 2000 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研究者，采取移工为主体的立场，以同情式的理解角度来研究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这些研究发现，移工在东南亚族裔地景之中的日常饮食、商品交换、语言群聚现象，并关心其如何在台湾社会重建其文化惯习，建立移民/工社群的情感网络与认同（翟振孝，2005；蓝佩嘉，2006；王志弘，2006；王志弘等，2009）。有些研究者则发现到，东南亚移工消费地景的意义，是彰显了缺乏私人空间的移工，放假生活处境是让「外翻口袋」，也就是必须在公共空间进行私人活动，如我们常会看到的街头随地休息的移工（吴永毅，2007）。虽然移工占用公共空间是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之一，然而这样的地景也是使得移工能够摆脱雇主的监控、纾解身心压力的难得保障（王志弘、沈孟颖，2009）。

此外，亦有研究发现因为消费群聚产生的东南亚族裔地景，一方面显现出东南亚语言、标志符号的空间特色，往往利用交通便利和低租金的空间，建立以消费作为核心族裔互动和人际交流（王志弘、沈孟颖、林纯秀，2009；陈建元、张凯茵、杨贺雯，2016）。不仅展现族裔经济下的维生地景（王志弘，2011），同时是「在异乡维系故乡」的族裔地景（张春炎，2011）。这样的空间，对于台湾主流社会而言具有隐蔽性，不仅是因为东南亚族裔此持续以原居地消费和文化实践来组织日常生活，达成一种的文化划界的效果。也因为台湾主流族裔具备公民身份，形成具社会经济地位的阶级优势，使之成为「化外之地」（王志弘、沈孟颖，2009）。

由前述这些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发现东南亚移工消费群聚所形成的族裔地景，它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不仅是一种东南亚移工们（局内人群体）所造成，也是一种接待社会结构与移工社群的权力交锋与相互建构（陈建元、张

凱茵、楊賀雯, 2016)。這些研究者不僅解釋了東南亞移居者消費群聚空間的過程、消費對移工的多層意義, 也彰顯了群聚空間與台灣社會之間的張力, 包括在主流社群與移工社群的劃界與越界, 族裔消費群聚的回避與納編, 以及移居者群聚所展生的文化展演和社群群凝聚(吳挺鋒, 2002; 吳比娜, 2003; 王志弘 2006、2008; 陳坤宏, 2008; 王志弘、沈孟穎 2009; 張春炎, 2011)。

因此, 東南亞族裔地景所內涵的主流族群和東南亞族裔之間的疏離關係, 並非一成不變, 而是從早期的客體化、排他性(exclusive)的族裔空間, 進入到 21 世紀則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容納性(inclusive)意涵的多元文化主義論述的建立。如王志弘(2011)的研究便以台北都會區東南亞族裔地景為例, 其認為過去已經逐步建立起保守的多元文化主義, 在此基礎上則應該跨越到具批判也是更為進步的多元文化主義。所謂保守的多元文化主義, 也就是使移工族裔地景展現出, 主流社會對於東南亞族裔之「文化差異和身份認同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寬容、承認和保障」(王志弘, 2011, 頁 76), 這意味著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劃界和隱蔽性的存在, 是受制於台灣國族國家為框架的保守多元文化主義, 形成一種多元或容納差異的自我贊頌。由此王志弘(2011)也提出了更具進步性的批判多元文化主義, 也就是「立足於普遍公平和正義原則上的承認、寬容和尊重差異(同上引, 頁 76)」, 建立東南亞族裔地景空間作為跨族裔群體交流和差異共存的場域。

本文認為, 這類研究同時呈現出東南亞族裔地景具有新文化公共領域的可能性。因為, 這樣的 research 常帶有強烈的公共議題討論的性質, 也就是從研究場域的進入、發現與批判討論中, 凸顯了台灣作為接待社會, 在面對東南亞族裔遷徙進入後, 出現的種種問題和應該改進的方向。

綜合而言, 過去有關東南亞消費群聚的研究發現, 反應出東南亞族裔地景存在於台灣社會的意義是: 從漠視到發現, 從單一理解到多元理解, 從排他到容納差異。更為重要的是, 東南亞族裔地景也正從被視為客體化(他們)的空間凝視, 朝向探討跨群體交流(我們)的新公共領域。個中所彰顯的意義是, 東南亞族裔地景逐步形成一種台灣作為移民社會, 如何建立有關多元文化主義之公共議題發展的空間領域。

肆、族裔消費地景的媒體再現

本章在前面几节，已说明在台湾的东南亚族裔消费地，对于东南亚移工、移民在台湾这个异乡的生活，具备生命意义的重要性。而这样的重要性构成了东南亚族裔地景的多元意涵。由此带出另一层思考是，回到哈伯玛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论述概念，其强调大众媒体是一个建立更广大公众对于公共议题讨论、交流和形成理性沟通的一项重要机制。反映在本研究主题，则由前述研究脉络所呈现的东南亚族裔地景的意义发现，以及作为新公共领域之可能性，是否能透过大众媒体而拓展形成更大范围而有效的公共讨论。因此，本文将检视大众媒体如何再现东南亚族裔地景？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节将进一步进行东南亚族裔地景的媒体再现分析。进入具体分析前，读者应该了解媒体再现，所具有的几项重要社会意涵：首先，媒体作为一种想象的公共空间，扮演着促进意义流通和关系建构的机制，其会影响广大社会成员怎么看待一个对象、族群和议题，因此各个社会也往往会特别注重大众媒体是否对于特定的族群、性别或者阶级有无不适当的再现 (Chouliaraki, 2010; Scott, 2014)。

其次是，媒体如何再现东南亚地景，可以用来检验台湾社会作为接待社会，其接待文化为何 (张春炎, 2013、2018)。尤其，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人开始组织和推动东南亚移民工的认识与生活关怀，这些行动都体现出台湾社会朝向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的努力。假如善待东南亚移工的接待文化运动已推展开来，那么在接待社会文化之中，是否同样正面体现在移工消费群聚的媒体再现？透过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的媒体再现分析，能够用来检视过去被视为是病理空间、充满歧视角度看待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是否仍存在负面刻板印象，抑或有所改变。这样的分析，也可以相当程度检视，台湾社会如何面对东南亚移工在台生活。

本文搜集台湾主流平面新闻媒体，可以发现，《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苹果日报》等四个在台湾的主要大众平面新闻媒体，对于移工消费群聚地点的新闻关注不高。即便有所报导，普遍的媒体再现往往是针对移工在台湾所引发的社会事件或现象来进行报导。然而亦可归纳分析出不同的媒体再现观点。

一、正向理解的族裔地景再現

诸如《中国时报》在 1990 年代中期，曾报导彰化、桃园等地东南亚外籍劳工群聚现象，尤其是 1995 年 9 月 8 日《中国时报》有一则新闻标题〈桃园工业区 泰式餐厅林立〉，内文描述「供应泰国劳工家乡味食物的需要，与日俱增；在价位、口味上配合一般劳工的消费水平，并附设卡拉OK 供晚餐欢唱休闲，深具异国风情，也相当值得本国民众尝试（中国时报，1995.9.8）」。

《联合报》也有同样的新闻媒体再现，也就是以异国风情的角度报导。如 1999 年 7 月 25 日《联合报》一则新闻标题〈异国风味饮食扑鼻香〉，内文报导「许多在台菲劳，星期天除了到多幅天数教堂望弥撒，饮食也是休闲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几年由于菲劳在星期天大量涌入，附近也增加不少专卖菲律宾菜的自助餐厅、附设卡拉 OK 可以喝啤酒的 PUB、烤肉店即卖炒米粉的路边摊，专门提供菲劳的需求.....老老少少的菲劳在异地的麦当劳用餐，原本不认识，由于共同的语言及背景，有的人很快就打成一片，共同分享座位，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也大声用着共同的语言聊天（联合报，1999.7.25）」。

前述报导，彰显两项特色，首先是抱持正面看法，持平描述移工增加带来的消费需求和群聚现象。这样的媒体再现特色，是倾向去理解东南亚族裔的消费需求。同时也鼓励台湾社会，应在正面看待之余，前往该地景体验。更有媒体再现，是针对台湾社会对待外籍移工的不合宜制度，予以批判。《联合报》一则新闻标题〈不堪其扰 圣多福教堂抗议〉（联合报，1996.3.31），报导警方经常在圣多福天主教堂趁机临检、查缉非法外劳，造成了教堂秩序大乱，为此教堂向外交部和警政署抗议。

二、社会问题化的族裔地景再現

然而东南亚族裔消费群聚的媒体再现，更常出现「社会问题化」的情况，诸如同样报导中山北路的小菲律宾。《联合报》一则新闻，便以〈外劳假日群聚 拟设专区解乱象〉作为新闻标题，内文讨论了大量菲律宾移工群聚、吸引流动摊贩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流动摊贩不但制造环境卫生的脏乱，.....

老是和警方捉迷藏，晴光市场摊商一再向区公所反应，要求是政府应设法解决大批外劳聚集的相关问题（联合报，1999.3.15）」。

此外一旦有犯罪问题，新闻往往会凸显犯罪嫌疑犯所具有的特定东南亚特定族裔身份。这样的媒体再现是反应出主流社会惯于凸显犯罪行为与少数族裔的连结关系。如《中国时报》报导台中第一广场发生的一桩暴力案件，便以〈越劳疑遭同乡刺杀〉作为标题。由此可见，这样的媒体再现是针对东南亚族裔身份的偏见再现。相对的，我们很少会在媒体上看见，主流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族裔身份和其犯罪行为的连结再现，诸如我们几乎不会看到新闻以「台湾本省人涉嫌犯下一桩案件（中国时报，2009.1.30）」这样用语来呈现，足见这类犯罪新闻的再现所隐含的歧视意义。

有时媒体再现方式，则是采取同质化的报导，以外劳代称并形成负面刻板印象，诸如《中国时报》以〈车资冲突 六外劳涉抢夺〉为标题，报导一群外籍移工搭出租车到彰化火车站的冲突事件，这类新闻都凸显外籍劳工这样的身份所带来的酒后闹事或者暴力逞凶危害治安的问题（《中国时报，1994.10.4.）。第三种典型的媒体再现，是指涉东南亚族裔地景为犯罪滋生地，诸如《联合报》以标题〈走私货充斥 违禁品乱窜〉，报导「中山北路三段每逢假日之所以吸引大批菲律宾外劳聚集，除因当地有圣多福天主教堂这个望弥撒的精神『圣地』外，还有许多物质因素，例如这里可以买到走私进口的菲律宾烟、酒、药物，也有很多『地下银行』可以用较高的汇率把台币汇回菲国，更有台湾的餐饮业者开专车接送菲劳到店里连假消费，替违禁品找到更好的流通渠道（联合报，1999.7.25）」。

上述新闻在结语最后提到「从另一观点来看，菲劳平日工作辛苦，又缺乏正当娱乐场所，只要不再 PUB 闹事，警察并不会大惊小怪。」，虽然新闻在结语部分使用了看似同情理解的角度报导，但无法免除标题和大部分内容的刻板印象化的媒体再现，也就是指称或暗示小菲律宾这个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充满犯罪和不法行径，或者是治安死角等。

综合而言，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早在 1990 年代台湾新闻媒体就已经能够对于东南亚移工来台生活有所关照。然而主流平面媒体有关移工消费群聚地的再现，仍然缺乏足够多的报导，报导也无法有效呈现该地景所具有的多元意涵，更未能采取同情式的理解移工的角度，来再现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

不仅如此，既存新闻，仍然不时采取一种刻板印象式的媒体再现模式，将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刻板印象化为是一种异国情调，抑或是「脏乱、治安死角」。则这样的媒体再现，都将更倾向以单调且轻薄的想象，想象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是异国美食街，或者犯罪滋生区。这类典型的媒体再现所带来的社会想象，恐怕只是一种简化或负面标签化东南亚族裔地景。

伍、新公共领域的可能？各种尝试

一、族裔地景媒体再现的去多元化与接待社会文化

本章尝试与读者共同了解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之所以形成，跟东南亚族裔在台湾的人数攀升有关。形构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的主要行为者，大多是以移工身份短暂来台工作的东南亚移工，或者透过婚嫁方式来台的东南亚移民。这些人来台生活或工作，往往具备异乡人的特质，而产生族裔团体相聚和购买故乡商品的需求。尤其是东南亚移工，来台前往往往没有充足语言训练，而语言不通或沟通障碍，也构成了他们在台工作和生活的沉重压力。一旦放假，东南亚移工就更需要消解思乡情绪、安心休息的空间，他们需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和来自相同故乡的人、用故乡的语言互动聊天。此外，对于东南亚移工而言，购买具有故乡味道、习惯使用的物品，是消解乡愁及生活压力的重要管道，这也构成了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的首要意义。因此，东南亚族裔地景的构成意义，不仅是移工的消费聚集，更像是一种思乡的文化实践。

其次是构成东南亚族裔地景的台湾空间实体，多半是在老旧、在地消费人口流逝的台湾都市空间。这类空间景观上往往较为破败或脏乱，较容易让台湾人退避、不愿进入。因此，台湾商场、街道或公共空间的衰败，反而成为东南亚移工躲避在台生活压力的机会，也是这群异乡人能够购买思乡产品的消费场所。对于经营的商家而言，破败的地点让租金比较低廉，弥补了平日-移工上班日就无顾客收入的窘境。低廉租金也让贩卖较为低价东南亚商品、平日无顾客的商家能够维持经营，这才使得具东南亚族裔特色或者能够满足异乡需求的商品，能够持续存在，并满足了思乡、高异乡生活压力、高工时又无太多可支配所得的东南亚移工之需求。

从本章第二、三节的文献回顾可见，过去有诸多研究深刻地探讨了，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所蕴含的多元意义。本文认为，这些进入东南亚族裔地景的研究与发现，不仅是知识也是一种行动，包括促成了与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相关的公共议题被讨论。诸如如何让东南亚族裔地景的意义被更多人认识？如何保存族裔地景？族裔地景应该如何发展？等等。这些持续不断形成的相关公共议题，环绕在东南亚族裔地景的同时，也确实驱使了文化政策行动开展。诸如本文开头所提，地方政府将第一广场从小东南亚重新定位为发展多元文化主义的场域，因此重新命名第一广场为东盟广场。而东盟广场的建立，也成为一個被期待的新文化公共领域。

值得反思的是，在主流平面新闻的媒体再现上，却仍然呈现种种的缺乏，包括了缺乏足够的报导量，同时也缺乏多元意义的呈现。这也说明了，纵然历年来相关研究揭开了意义的面纱，发现东南亚族裔地景具备多元文化主义议题发展的新公共领域意涵，然而传统的报纸新闻媒体，则尚未能有效扮演串连意义讨论的机制，无法实践己身成为公共议题讨论与串连的公共角色。

由此，不免需要再想想 Appadurai 的论点，当大众平面新闻媒体对于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的再现，经常倾向是将之想象成是一种「视而不见」的存在或者单一化的负面刻板印象（Appadurai, 1996 / 郑义恺译, 2009）。那么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则会被经常绑定在一种负面的想象里，也让我们见不到东南亚移工作为的人权需求和宝贵的社会贡献。换言之，原本该是友善移工，使东南亚移工能够利用短暂假日实践人权、社会生活权利的族裔地景，就随着媒体再现，在台湾主流社会文化中，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地景。

媒体再现作为一种反思社会的基础，呈现出本文要谈的另一项关键的意义。作为接待社会，我们在主流平面新闻媒体再现中所不易看见的东南亚族裔之人权和社会意义，也让台湾社会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对于自身社会文化素养的视而不见，视而不见自身「将移工视为劳动机器」的扭曲文化。换言之，如果媒体再现导引着特定的社会想象，那么不免令人忧心的是，这样的社会想象将持续维持一个社会事实，也就是台湾的接待文化是更倾向作为「一个不友善东南亚族裔」的社会事实。

二、新媒体与新公共领域的契机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新媒体的影响力量正在看俏的年代，新媒体再现是另一个可期待的社会想象力来源。本章一开头引用近年来崛起的台湾新媒体《报导者》的专题报导，在该系列报导的媒体再现中，就是以东盟广场为主轴，呈现的生活其中的东南亚移工作为人的事实，再现其具有欲望、物质和休闲的需求和种种人权，因此「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的媒体再现」，其所传达的是：东南亚移民、工在台生活，是离乡背井的生活，有种种需求难得在东盟广场这样的空间被满足的景象。

除此之外，就文化意义的层面，新媒体的报导更传递了体认东南亚移工是生活在台湾的异乡人，需要被尊重、理解。因此这类新媒体再现，一方面再现出在台湾的东南亚移工未被善待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开启了台湾接待文化内涵的自我反省。

在上述的讨论脉络下，也不应该忽略的是，东南亚族裔地景并非始终处于有待被再现的被动角色。以笔者过去几年在台中东盟广场执行教学和研究计划为例，可以发现自 2016 年起，有越来越多台湾在地团体投入友善、理解和推动东南亚族裔权益的行动，包括台中在地原生组织 1095（壹零玖伍文史工作室），¹以及长年维护劳动权的 TIWA（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至东盟广场设立办公室。²笔者所任职的学校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以东南亚学系、东南亚研究中心为主要成员的师生在东盟广场设立 SEAT 南方实验室，搭建台湾与东南亚移民工的「文化交流平台」。³这些从知识到行动的团体，不仅代表台湾社群与东南亚族裔持续进行正向的交流与互动，并在这个东南亚族裔空间

¹ 1095 臉書粉絲頁強調，「建立更多元的文化認知，豐富國人的國際觀，藉此改善外籍人士在台的社會待遇與勞動環境」，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MigrationTaichung/>

² TIWA 曾經針對東協廣場一些不友善移工的舉措進行抗議，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QLKrQ5>

³ SEAT 南方實驗室 <https://www.facebook.com/seataichung/>，係「結合臺中市政府與在地社會團體力量，正式成立服務東南亞移民工與臺灣友善社會的交流溝通平台-『東協廣場溝通互動平臺』」，資料來源：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07000.aspx>

搭建起更多相关文化公共议题的讨论。此外，这些团体也常会透过现场行动、新媒体影响大众媒体传播，藉此引发社会对于东南亚族裔地景相关之公共议题的关注与讨论。诸如 TIWA 在 2019 年经由脸书，以现场直击的方式发布讯息，传播台中警察于晚间驱离坐在东盟广场的移工，并且藉此事件尝试提出相关公共议题的讨论与反省：



影像撷取自 TIWA Taichung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台中办公室(2019.07.14)。【谁的东盟？谁的广场？】，数据源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366411864073203>

正是上述这一则脸书文及现场影像纪录的发布，使 TIWA 台中办公室成为此事件的消息来源，隔日受到《中央社》报导，⁴中央社新闻稿同步引发公

⁴ 中央社（2019 年 7 月 15 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意移工〉，資料來源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1907150188.aspx>

广集团华视新闻，⁵以及数家网络新闻媒体《新头壳》、⁶《关键新闻网》、⁷《芋传媒》的报导。⁸而这一连串新闻，不仅呈现此新闻事件，内容更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相关的公共议题讨论。彰显台湾人进入东南亚族裔地景，形成友善、共容互动，以及建立多元文化主义的公共讨论论述。

除此之外，也可以发现东南亚族裔自主发动社会议题的能力。如印度尼西亚移工 Pindy，自动发起同乡移工一同打扫紧邻东盟广场的绿川和周边街道，这样的活动同时受到网络媒体报导。在接受采访时 Pindy 提到「台湾是我们第 2 个家，想要一起做对社会有帮助的事」，引发诸多媒体报导，相应提出公共议题的讨论，包括应该打破对移工误解及刻板印象，减少社会对于东南亚移工的歧视。此外，Pindy 也联合台湾朋友一同维护彼此的生活环境。彰显出东南亚移工的自主再现的能力，以及爱环境爱台湾，相互平等包容、不分彼此的公共论述。⁹

由此凸显了在东南亚族裔地景之中，从昔日对族裔内部有特殊意涵，但对接待社会具隐蔽意涵的公共空间，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公共互动性的新文化公共领域。这样的发展动力来自于过去研究者的知识行动、在地非营利组织以及晚近可见的东南亚族裔的自主行动，持续促成了文化政策的落实与发展。

⁵ 華視新聞（2019 年 7 月 15 日）。〈"東協廣場"聚會 移工控警惡意驅趕〉，資料來源 <https://news.cts.com.tw/cts/local/201907/201907151967687.html>

⁶ 新頭殼（2019 年 7 月 15 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意移工〉，資料來源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7-15/272927>

⁷ 關鍵評論網（2019 年 7 月 15 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意移工〉，資料來源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2136>

⁸ 芋傳媒（2019 年 7 月 15 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意移工〉，資料來源 <https://taronews.tw/2019/07/15/403213/>

⁹ 此移工自主再現的行動和公共議題擴展，同樣受到一連串媒體報導，包括李文潔（2018 年 3 月 9 日）。〈台中最美背影—印尼移工揪團掃綠川〉，資料來源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380286>；中央社（2018 年 4 月 12 日）。〈台灣也是家 印尼移工主動清理綠川〉，資料來源 <https://www.cna.com.tw/news/alloc/201804120360.aspx>；關鍵評論網（2018 年 4 月 28 日）。〈印尼移工揪團清理台中綠川：「台灣是我們第二個家」〉，資料來源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4545>；陳孟萱、林品鑫（2018 年 5 月 13 日）。〈這就是愛台灣！印尼移工清綠川〉，《華視新聞網》，資料來源 <https://news.cts.com.tw/cts/local/201805/201805131924369.html>。

陆、结论

在结论中，本章鼓励读者正视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东南亚族裔地景，并且反思其存在的意涵与己身经验，进而共同来持续关注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面对多元、跨国移动频繁的世界，移民社会为体质的台湾社会，是否具备待客之道？能否平等看待各种在台湾社会内部所形成的各种族群文化？我们是否展现追求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也就是尊重、平等看待各种族群的文化价值？

本文认为，对于东南亚族裔地景的正视以及文化理解是一个开始，后续东南亚族裔地景如何能够成为一种对文化政策更具影响力的新文化公共领域，端赖于其是否能有效帮助生活在台湾的各种文化族裔和人们，藉此检视台湾的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王志弘，2011）。而东南亚族裔消费地景的媒体再现，在此过程扮演重要角色，值得受到检视与观察，这也关系到未来台湾如何发展更进步的接待社会文化。

参考文献

-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等译（2003）。《文化地理学》。台北：巨流。（原书 Crang, M.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UK: Routledge.）
- 郑义恺译（2009）。《消失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台北：群学。（原书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王志弘（2006）。〈移 / 置认同与空间政治：桃园火车站外围消费族裔地景研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61：149-203。
- 王志弘（2008）。〈族裔-文化经济、谋生策略与认同协商：台北都会区东南亚风味餐饮店个案研究〉，《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报》，39：1-44。
- 王志弘（2011）。〈我们有多元文化城市吗？台北都会区东南亚族裔领域化的机制、类型与作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82：31-84。
- 王志弘、沈孟颖（2009）。〈疆域化、缝隙接口与跨国空间：台北市安康市场「越南街」族裔化地方研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73：119-166。
- 王志弘、沈孟颖、林纯秀（2009）。〈族裔公共空间的划界政治：台北都会区外围东南亚消费地景分析〉，《台湾东南亚学刊》，6(1)：3-48。

- 吴比娜 (2003)。《ChungShan—：台北市菲律宾外籍劳工社群空间的形成》。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学位论文。
- 吴永毅 (2007)。〈无 HOME 可归：公私反转与外籍家劳所受之时空排斥的个案研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66：1-74。
- 吴挺锋 (2002)。〈台湾外籍劳工的抵抗与适应：周休做为一个斗争场域〉，《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3：103-150。
- 李丁赞 (2004)。〈导论：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在台湾的发展〉，收录于李丁赞编《公共领域在台湾：困境与契机》（页 1-62）。台北：桂冠。
- 邱琏雯 (2007)。〈「移民区病理 vs.网络集结点」的冲突与克服：以在越南女性的店家为例〉，《教育与社会研究》，13：95-120。
- 洪贞玲、刘昌德 (2004)。〈在线全球公共领域？网络的潜能、实践与限制〉，《信息社会研究》，6：341-363。
- 孙友联 (2013)。〈移动中的剥削：台湾外劳人权问题剖析〉，《台湾人权学刊》，2(2)：113-128。
- 张春炎 (2011)。〈从异乡人到「艺」乡人：台中市小缅甸美食街的文化景观和象征展演〉，《台湾东南亚学刊》，8(2)：139-170。
- 张春炎 (2013)。〈东南亚的自然灾难与他者化过程：2011 年泰国水患的媒体再现之初探研究〉，《亚太研究论坛》，59：89-119。
- 张春炎 (2018)。〈他者化的受难？菲律宾海燕风灾的新闻论述分析〉，《思与言》，56(4)：145-193。
- 陈坤宏 (2008)。〈台南县市、高雄县市都市商业地区东南亚外籍劳工消费型态之初步比较〉，《建筑与规划学报》，9(3)：211-234。
- 陈坤宏 (2012)。〈东南亚移工聚集之空间分割感受的小区观点：台南市、高雄市、台中市的经验研究〉，《环境与世界》，26：33-75。
- 陈建元、张凯茵、杨贺雯 (2016)。〈台中第一广场暨周边地区东南亚族裔空间形成与转变〉，《都市与计划》，43(3)：261-289
- 翟振孝 (2005)。《迁移、文化与认同：缅华移民的社群建构与跨国网络》。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 蓝佩嘉 (2006)。〈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劳工的控制与出走〉，《台湾社会季刊》，64：109-110。
-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ouliaraki, L. (2010). Global representations of distant suffering. In N. Coupland (Ed.),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pp. 608-624. Malden: Wiley-Blackwell.
- Fong, E., & Shen, J. (2011). Explaining ethnic enclave, ethnic entrepreneurial and employment niche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in Canadian immigrant gateway cities. *Urban Studies*, 48(8), 1605-1633.

- Kaplan, D. H. (1998).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ethnic economies. *Urban Geography*, 19(6), 489-501.
- Ojo, T.H., & Shizha, E.(2018). Ethnic enclaves in Canad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residing within. In E. Shizha, R. Kimani-Dupuis & P. Broni (eds.), *Living beyond borders: Essays on global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pp.162-179).Peter Lang
- Pécoud, A. (2010). What is ethnic in an ethnic econom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 59-76.
- Qadeer, M., & Kumar, S.(2006). Ethnic enclaves and social cohesion. *Canadian Journal of Urban Research*, 15, 1-17.
- Scott, M. (2014). The mediation of distant suffering: An empirical contribution beyond television news tex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1), 3-19.

Southeast Asian Ethnic Landscape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

Chun-Yen Ch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diverse meanings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landscapes and to reflect on their potential as a new cultural public sphere. This article first uses data to illustrate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workers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ethnic consumption landscape in Taiwan. Secondly, b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diverse meaning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nsumption landscape. The third is to reflect on Taiwan's hospitality society and culture by analyzing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consumption landscape. The study found that representations of mainstream print media reflect the lack of imagin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groups in Taiwanese society; representations of new media highlight that the public space where ethnic landscapes have hidden meanings for the host society is gradually developing into a public space with an interactive new cultural public sphere.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the intellectual actions of researchers, loc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autonomous ac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groups that have been seen in the past, which together make such a new cultural public sphere gradually take shape.

Keywords: ethnoscape, landscape, media representation,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Southeast Asian immigration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 Chun-Yen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媒介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对话： 以学术传播的媒介化为考察场域*

刘忠博、冼楚桥**

本文引用格式

刘忠博、冼楚桥（2022）。〈媒介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对话：以学术传播的媒介化为考察场域〉，《传播、文化与政治》，15:113-137。

投稿日期：2022 年 3 月 29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5 月 8 日。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学术传播背景下英语文献中的广州研究」(项目编号: 2019GZGJ14) 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刘忠博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冼楚桥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 级硕士生，e-mail: liupublius@gmail.com。

《摘要》

媒介化理论由欧陆学者提出之后，论者有意或无意地将政治经济的因素排除在理论的建构过程之外，从而忽视媒介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这点从媒介化阵营中近年来提出的分析概念可看出，无论制度论或社会建构论者，他们在解释「为何有些场域能够媒介化，另一些则否」的问题时，都留有缺陷，而考察这个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正好能填补理论解释力的不足。立基于此，本文首先说明媒介化阵营中近年来提出的分析概念，除了对这些概念进行批判性的理解，也说明它们与政治经济学的可能联系。其次，聚焦学术传播的媒介化，我们将以西方期刊数据库公司为例，说明数据库原本作为一种计算引用率的媒介，然而在它建构传播形构的过程中，将学者、图书馆、大学机构与政府单位等行动者纳入形构，从而转变为认证知识生产力的媒介。其后果是让数据库的名称及其影响力的数值烙印在学者们的发表记录之中，而技术的符号也因此铭刻在学术期刊的版权页里，成为学术传播的常态性实践。透过学术传播场域的说明，本文认为媒介化研究应该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提问，并指出未来可能的三项关键议题，藉以更好地拓展媒介化理论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深度媒介化、媒介逻辑、传播形构、传播政治经济学

壹、研究背景及意义

媒介化理论从欧陆学者提出至今，讨论的层次不仅有理论思辨，亦有许多经验研究予以实证（参考 Hjarvard, 2013, 2017; Couldry & Hepp, 2013; Hepp, 2020; 唐士哲, 2014a, 2014b; 方念萱, 2016; 侯东阳, 2018; 王琛元, 2018; 戴宇辰, 2021）。在理论的思辨上，为了回应 Deacon 与 Stanyer (2014, 2015) 曾质疑媒介化理论是否过于笼统以及能否实证的可行性（参考方念萱, 2016），媒介化阵营的学者近年来发展出许多分析概念，试图在抽象理论体系与具体的案例之间，找出介于其中并可加以操作、比较的概念，藉以指引更多的经验研究。不过这些论述仍有局限，特别是处理政治经济的议题时，它们倾向将之视为一种既定的背景，而未能适当地纳入理论建构的过程。

如 Murdock (2017) 所言，媒介化理论家引述 Schulz (2004) 的看法，强调媒介在技术、符号与经济上的特性，然而后继的研究却只重视前两者，经济议题反而鲜少着墨。姚建华 (2021) 也指出，媒介化理论欠缺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讨论勾连。假使如 Couldry 与 Hepp (2013) 所言，媒介化研究强调的是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共变关系，那么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势必造成理论上的瑕疵，特别是媒介化的概念无法对于政治经济的议题提出有效解释。方念萱 (2016) 引述 Deacon 与 Stanyer (2014) 的说法，认为媒介化研究的焦点见诸于「化」这个过程，而资本主义如何与媒介共同推进这个「化」？舍此将难以拼凑媒介化的完整样貌。

另一方面，本文以学术传播领域为媒介化理论的考察场域，其考虑如下：学术传播的内容是知识，而知识作为研究客体，它具有双元的特性：一来知识作为一种观念，理论上某人使用某种观念，并不妨碍他人同时使用，因此它可由世人共享（例如议程设置理论）。二来，承载观念的形式则有使用上的限制。当某人自图书馆借走了某本书时，他人只能另谋管道，或择日再阅（例如《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这本书籍）。如今这两种特性因为数字技术的作用而模糊化了，但学界对于学术传播的媒介化议题却少有申论。更重要的是，学术传播早已离不开媒介。Borgman 与 Furner (2002) 认为学术传播是学者透过正式和非正式的管道来传播与使用信息。从早期学者们私

下非正式的书信往来，到透过印刷术正式出版的书籍，再到今天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学术传播历来都与媒介缠绕，没有理由忽视这一领域的媒介化过程。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介绍媒介化理论中重要的分析概念，如媒介逻辑、媒介动力与传播形构等等，并探讨将之应用的研究。其次，这些概念欠缺将政治经济的运作纳入理论建构之中，而本文将论述它们与政治经济学的可能联系。再者，我们以学术传播为例，说明期刊数据库原本作为一种论文资源分配的媒介，而这种媒介的功能仅是在搜寻相关文献时提供便利性，然而在获得政治经济的驱力之后，便跃升为界定研究生产力的权威性媒介，并影响着学者们的传播实践，从而改变了学术传播文化。最后，凭借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本文也针对媒介化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三项讨论议题。

贰、制度论与社会建构论中的媒介化观点

Hjarvard 与 Li (2016) 认为，媒介化 (mediatization) 是「通过媒介在文化和社会中的重要性，改变和强化不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领域变得依赖媒介及其逻辑的过程」 [12]。更为直白的定义是，「媒介化隐含社会与文化行动的核心成分（如：工作、休闲或游戏等），逐渐披上媒介的形式」 (Hjarvard, 2004)。Hepp (2019) 指出，媒介化的研究并不处理个别媒体内容的效果，而是关注社会与人类实践的方式被媒介日益增加的普遍性所改变。

尽管学界目前对于媒介化理论的重要性逐渐形成共识，然而对于该理论如何扩展至经验研究仍有分歧。目前处理媒介化理论大致可分为两种传统：制度论与社会建构论。一方面，制度论认为媒介化研究关注的是社会上不同的领域逐渐适应或实行媒介机构的规则。另一方面，社会建构论是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出发，探讨当人们的社会和文化实践逐渐与媒介交缠 (entangled) 时所发生的变化 (Hepp, 2019)。本文主旨并非教科书式地统整两种传统的论点，而是聚焦它们各自发展出指导经验研究的理论概念，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的理解。

一、制度论中的媒介动力

作为一种观察媒介、文化与社会领域发生相应转变的理论，有学者认为媒介化可比肩全球化、个人化与商业化，成为架构人类社会发展的元过程（meta-processes; Krotz, 2017）。尽管媒介化阵营中的学者都同意，由于媒介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及其社会文化的转变已成现实（Lundby, 2014），然而媒介化究竟如何镶嵌于社会之中运作？又该如何观察这个过程？面对这些问题，Schulz（2004）从反思早期的媒介化研究着手，指出早期研究善于观察大众媒体，然而这类媒体几乎支配所有的传播资源，如今在新媒体的挑战下，这种资源集中化的局面被打破，Schulz 转而提问：媒介化研究倘若还停留在分析特定的（大众）媒介，是否导致「媒介化（理论）的终结」（Schulz, 2004, p.94；括号字为笔者所加）？

Schulz 的看法是，思考媒介化理论时要超越特定的媒介，并「参照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基本的表现与功能，来解释媒介化」（Schulz, 2004, pp.98-99）。对此，Schulz 试图提出媒介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交流（或互动）的四种类型：（一）媒介在时间与空间之中延伸了人的沟通能力；（二）媒介替代了人们面对面的社交活动；（三）媒介活动与非媒介活动相融合，媒介也因此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四）不同领域的行动者不得不调整其行为以适应媒介的评估或惯例。

将媒介化从针对特定媒介的讨论，转换成媒介的功能性及其社会过程为思路，Schulz 的论点被 Hjarvard 延续下来，不过后者更重视将媒介化放在高度现代性的脉络下，检视媒介作为半独立机构与其他机构互动时，产生的社会文化之变化。在 Hjarvard（2017, p.67）看来，「媒介化是指媒介在文化、社会和不同社会制度中的重要性被改变和强化、以及众多的文化领域逐渐依赖媒介及其逻辑的过程。」。就此而言，媒介逻辑被定义为一组规则与资源，社会上不同机构（或个人）若依此规则行事，就能获得媒介提供的资源来成事。久而久之，也就将媒介的规则内化为自身的规则。媒介逻辑一词可追溯至 Altheide 与 Snow（1970）（参考唐士哲，2014b），而 Strömbäck（2008）也用此概念分析政治媒介化的四个阶段的特征：第一个阶段是媒介成为人们接收政治消息的主要来源；第二个阶段是媒介逐渐独立于政治机构，而记者

也获得更高的自主权；第三个阶段是政治机构开始主动适应媒介机构的逻辑；第四个阶段政治机构不仅主动适应，甚至还会内化媒介逻辑。

Hjarvard (2017) 认为 Strömbäck 运用媒介逻辑时，过于将媒介逻辑与其他机构的逻辑截然对立，二者就像玩一场零和游戏，不是你赢就是我败。舍此，Hjarvard 将媒介逻辑与其他机构逻辑的互动予以刻度化，不同逻辑之间无论此消彼长、互动强弱，都会形塑出不同样貌的媒介化，如同量尺的刻度般，媒介逻辑越强，社会互动的媒介化刻度越高。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观察媒介逻辑的作用？Hjarvard 指出，媒介逻辑能从媒介具体的惯有做法 (modus operandi) 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研究者透过观察这些做法，便能从中窥探出媒介逻辑如何介入社会互动。简言之，Hjarvard (2017, p.71) 认为媒介逻辑可以从以下三个面向，来考察它们的惯常做法：技术面向（典型的做法如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美学面向（典型的做法如戏剧化、框架、风格）、以及制度（典型的做法如立法、组织形式）。

媒介逻辑的概念适用于考察单一类型的媒介，然而社会上的媒介是复数的，前述的媒介逻辑无法覆盖不同媒介在汇聚层次 (aggregate level) 上的影响，因此他改以「媒介动力」(media dynamics) 的概念，捕捉媒介汇聚时引发的媒介化过程。就此而言，媒介具有以下三种作用：放大 (amplification)、框架与表演能动性 (framing and performative agency) 与共构 (co-structuring) (Hjarvard, 2017)：放大是指透过（各种）媒介释出信息之后，其传播的速度、次数都会瞬间增加，而这也会影响人们卷入传播的程度；框架是指媒介使用的语言往往能替议题定性，而表演能动性代表了一种戏剧手法 (dramaturgy)，意指传播或被报导的事件会如(预先设定好的)剧本呈现；共构是指媒介实践既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也会反过来构成社会结构，这点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特别明显。例如新闻媒体采访消息来源时会选择位高权重的人士，因为在媒体看来，这些人在社会结构中拥有支配的地位，其所掌握的信息一般人不易获取，却又影响着整个社会。然而在这些握有权力的人眼中，媒介的采访无疑进一步巩固他们的地位。换言之，媒介与有权者共构了既有的权力关系。

Hjarvard 与 Lundby (2018) 以《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 于 2015 年 1 月遭受恐怖袭击为例, 说明媒介动力如何发挥作用。首先, 就放大的作用来看, 袭击事件爆发之后, 信息便透过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后续也引发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示威抗议活动, 并支持查理周刊的言论自由。其次, 就框架与表演能动性而言, 媒介在此次袭击事件之中, 连结「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两种不同的概念, 而作者认为这种「话语上的耦合」(discursive couplings) 成为整起事件的主导框架, (西方主流的) 新闻媒体借此形塑自身为反恐怖主义与捍卫言论自由的行动者 / 表演者。然而, 犯罪者也会利用媒介的这种框架作用, 宣传自身的理念, 并继续制造恐惧。媒介就像一座表演的舞台, 行动者展演其中。最后, 就共构权力关系而言, 《查理周刊》原本是法国较为边缘、小众的新闻媒体, 但事件发生之后, 由于整个主导框架使然, 它忽然跃身为捍卫言论自由的斗士, 并与西方主流媒介站在同一阵线, 成为既有权力结构的一部份。与此同时, 许多穆斯林也在社交媒介上发声, 谴责恐怖袭击, 试图划清界限, 重新融入既有的权力结构。

无论是媒介逻辑或媒介动力, Hjarvard 都认为它们并不是单方面从媒介这一端发出作用, 继而另一端的社会机构就会被影响; 它们毋宁是在与其他机构互动之中才能被观察到的现象。用 Hjarvard 的话来说, 媒介化「可被描述为一种媒介逻辑与其他机构逻辑相互适应的过程」[1]。在相关的批评方面, Hepp (2020) 认为制度论的观点过于侧重媒介本身的影响力, 并倾向认为这种影响力是先天内建的, 因此有何结果早已事先明了, 后续的发展变化显得次要, 这种分析过于静态, 难以捕捉现实的复杂过程。举例而言, Hjarvard 将媒介逻辑分为物质、美学与制度性的规则与实践, 虽然能帮助研究者检视经验现象, 但已默认了媒介化的过程难以跳脱这三种维度。此外, 这些维度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 也非个别独立的作用, 而可能是并行不悖的发生。例如社交媒介有其技术性 (如算法), 也有制度性的规则 (例如运营媒介的公司的商业逻辑), 更有美学 / 象征的框架 (例如社交媒介的文类, 比方 Twitter 的短文), 用户并非只受到单一维度的影响, 而这三种维度的划分, 对于动态运作的观察不啻为阻碍, 而非助力。

二、社会建构论中的「传播形构」

作为社会建构论阵营的学者，Hepp（2013b）提出「传播形构」（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来分析媒介化的过程。形构的说法可溯自Elias（1978），它是指「个人的网络」（networks of individuals），而Hepp除了延续这种定义之外，也将网络视为一种将个人、集体与组织链接起来的分析单位：由于个人的、集体的或组织的网络时有交迭，因此网络的构成不仅有其相对稳定的状态（例如个人的人际网），也有动态发展的过程（例如个人的人际网与所属企业的组织网彼此交织）。Hepp认为，当今形构的建立过程已离不开媒介的使用（例如人际网依靠社交媒介来沟通，企业组织仰赖电子邮件来沟通），因此传播形构是人们透过各种媒介所进行的传播实践而建立的（Hepp & Hasebrink, 2014）。

为了让传播形构的观察更具操作性与可比较性，Hepp等人指出，传播形构有三种特征（Hepp, et al., 2018, p.30）：

- （一）每个传播形构都是由行动者丛（constellation of actors）构成。
- （二）每个传播形构有一个主导的框架，而这些框架是用来指导人们的传播实践。
- （三）传播形构中的传播实践是与媒介组合（media ensemble）交织在一起。

Kannengießer（2018）以德国的「维修咖啡馆」（repairing cafe）为例，说明如何应用传播形构分析媒介化的过程。维修咖啡馆是一种新的活动形式，人们聚在一起修理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物品，例如手机、纺织品等，而媒体技术物是最常修理的用品之一。Kannengießer指出，首先就行动者丛的构成来看，参与维修活动的人可分为组织活动者、寻求协助者与提供维修者。其次，主导行动者的框架包含意识到媒介技术物的生产过程是有害的（如对自然资源的耗尽）、防止浪费、以及乐于助人等等，然而从许多参与者都提及批判媒介技术物的消费，并透过维修旧物来避免购买新品来看，

Kannengießer 提炼出「消费者批判」(consumer criticism)，是为整个维修活动的主导框架。最后，由于参与者大部份是透过面对面传播的形式，而组织者则会在不同场合的维修活动之中穿针引线、张贴海报或散发传单，藉以推广并保持与其他参与者的联系，此时电子邮件、电话与海报构成了维修咖啡馆所涉及的媒介组合。

更重要的是，维修咖啡馆作为一种传播形构，它不仅有自身的媒介化过程，与此同时还牵涉社会文化的变化。Kannengießer 论证，这种传播形构的媒介实践（一方面是维修旧有的媒介技术物，另一方面参与者联系彼此的媒介组合）代表的是环境的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它与消费社会中的媒介实践（即热衷购买新的媒介物，但使用寿命往往短暂）迥然有异。换句话说，透过这种传播形构所传达的「维修文化」(culture of repair)，是一种可持续的社会运动，如此也印证了 Couldry 与 Hepp 对于媒介化的看法：媒介化是一方面媒介与传播的转型，另一方面是文化与社会的转型 (Couldry & Hepp, 2013, p.197)。

总结而言，媒介逻辑（与媒介动力）和传播形构作为媒介化理论的重要概念，它们在分析媒介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分析角色，然而不同的是，媒介逻辑是站在媒介这一端来检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在此脉络下，媒介逻辑或动力是植入 (insert) 互动之中，从人们互动时的变化，来观察社会文化的相应转变。另一方面，传播形构则是站在人的传播实践这一端，检视人们的媒介实践与新传播网络形成的关系。然而，对于制度论与社会建构论而言，媒介化之所以发生的前提，在于与日俱增的媒体逐渐渗透至人们的日常实践中，从而对于社会文化的转变产生影响 (Hepp, 2019; Lundby, 2014)，但是对于这些媒介为何会与日俱增？以及所有媒介都会产生媒介化的过程吗？这些问题并未深入探究。如果换个方式提问，对于为何有些场域能够发生媒介化，另一些则否的问题，制度论与社会建构论都没有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必须要回到制度论与社会建构论者的媒介视角，检视他们如何理解媒介，以及藉此论证他们在概念上的漏洞。

参、媒介化理论中的媒介及其政治经济基础

由于制度论与社会建构论的学者对于媒介的定义不同，如此也影响他们讨论媒介化之所以发生的过程。就制度论阵营的学者而言，Hjarvard 将媒介视为一种 “institution”，而在英语的语境下，“institution”可以翻译为机构，亦可译为建制 / 制度。当 Hjarvard 将“institution”指涉为机构时，此时媒介是具有一定自主程度的社会机构，它能对社会上其他机构施以影响力。例如前文提及的媒介逻辑，它能介入社会上其他机构的运作。另一方面，当 Hjarvard 将“institution”指涉为制度时，这种制度是指日常生活之中那些具有常态性的、会反复出现的、甚至形成惯例性的传播实践，而在此语境下，媒介是达成这种常态性传播实践的资源（Hjarvard & Lundby, 2018）。

无论是机构或制度，这两者在制度论者看来是可以统合的。例如，科学界为了宣传自身的发现以维持其正当性，它们需透过新闻媒体的公共传播来达成此目的，而媒体报导的标准就成为科学界必须适应的逻辑（Peters, 2012）。就此而言，科学期刊 - 科学家 - 记者 - 媒体公关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一种新的互动方式。换句话说，新闻媒介作为一种机构，它们自身的逻辑（或动力）能植入人们的社会互动之中，形成某种常态性的传播实践。

然而当媒介逻辑植入于互动的过程时，Hjarvard 也认为并非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会受到影响，有些能创造出常态性实践，另一些则否，这取决于不同的场域。Hjarvard 指出，「媒介化的程度可以根据各自场域的自律在多大程度上被消减得以衡量」（刘君等译，2018，页 41），这代表媒介逻辑介入其他场域的社会机构之后（如新闻媒体的报导判准介入了科学期刊的选题），后者的自主性会被改变，而这也意味着媒介机构在介入的过程中，取得了其他场域中的主导权力。然而，媒介究竟如何取得权力？这似乎不是自然的过程，Hjarvard 虽然借用 Bourdieu 的场域理论来说明媒介化，却没有针对权力的议题继续深化其论述。

在经验研究之中，也有论者发现媒介化的过程并非整齐划一的平整。例如唐士哲（2014）探讨台湾政治媒介化的议题，以台湾电视政论节目与政府、政党、立法机构之间的互动为考察，发现后三者会调适自身的惯例以适应前者的逻辑。另一项探讨台湾小区媒介化的研究，黄顺星（2020）却发现小区

报纸并未让其他机构反过来适应其媒介逻辑，而只是做为这些机构的工具。这一正一反的例子说明，在不同场域的媒介化过程推动与否的原因，已非制度论者眼中的媒介逻辑（或动力）能够单独地涵盖。如同唐士哲（2014，页31）所言，政治媒介化有其结构性的因素：

政党藉由外围基金会组织试图承制政论节目、政论名嘴跨界成为政治人物，或资深媒体人成为名嘴，以及政府各部门对于政论反映舆情的重视与监控等现象，皆使得政论节目扮演的，是既有权势阶级政治的延伸。作为一个富有论述权力的建制化实践，其映照出的是更大范围政治与社会脉络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脉络中，电子媒介在解严之后的过度商业化发展、以选举胜选为首要目标的政党竞争文化、政府治理思维中以媒介舆论作为民意的依归等结构性因素…

黄顺星（2020，页165）也说，

在报禁解除后台湾进入去管制的多元媒介体系，透过小区报引发的媒介化过程，反倒因技术、资本以及政策方向转变而弱化小区报 / 媒介的重要性。Couldry（2003a）引入后设资本分析媒介是否产生跨场域的效应并未在小区报上出现，而是国家权力场域及经济场域持续影响媒介。

媒介化在不同场域之中能否取得主导的权力，无法全然与政治与经济的力量分割，或说政治经济的因素反而是让媒介化的过程得以展开的重要原因；Murdock（2017，p.8）甚至有言，媒介逻辑的说法只是结果，而非原因。从制度论者的媒介观点来看，媒介逻辑（或媒介动力）究竟与政治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为何？似乎有必要深化论证。

相对而言，社会建构论的媒介观较为动态与复杂。Hepp（2020）将媒介视为一种「过程」（process），它是人类社会在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与物质化（materialization）交织中一个暂时的行经点（points of passage in

social practice)。这即是说，媒介首先是从人们日常中的传播实践开始发展起来，人们会用自己习惯的（某个）媒介来传播 / 沟通，同时期望他人也会如此使用（某个）媒介，从而形成某种常态性的传播实践，此即制度化之意；而这种常态性的实践会铭刻于（inscribed in）某种媒介技术或（数字）基础设备之中，此即物质化之意。Hepp 认为，所有的媒介都是从人们既有的常态性实践中开始形塑。例如电视，在它普及之前，演员表演与观众欣赏戏剧（如舞台剧）已成为常态性的实践，而电视在此基础上成为一种新的说故事媒介，此即是制度化的过程。其次，电视有其电波收发站、机房等物质技术设备，这是为了服务前述的制度化实践。因此，在 Hepp 看来，电视作为一种媒介，是制度化与物质化结合的结果。

此处的关键在于，Hepp (2020,p.159) 将物质化的过程连结至当今的数字技术与设备，其中包含软件与硬件，而这对于媒介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当我们在使用数字媒体时，它远非只能作为完成传播 / 沟通任务的工具，同时也是数据的生成器，用户每一次的使用，都会形成数字追踪（digital traces），而这些原本属于个人所有的浏览纪录，又会被算法抽绎出来，重新与其他人的纪录一起分门别类，借以服务广告商或其他科技公司。Hepp (2020, p.11) 认为，这种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规则写入算法之中，而这些算法又被重新应用于它们所收集数据的社会现象，即是「重复的转变」（recursive transformation）：算法作为一种规则，不断重复地应用至生成它的实体之中，它本身就变成了社会转变的因素。Hepp 认为，数字媒体的数据搜集与算法，已让我们进入「深度的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

在深度媒介化的脉络下，Hepp 也扩展了「传播形构」的概念。简言之，在家人、朋友、或同事的传播形构之中，个人运用数字媒体的传播实践，会让数字追踪的纪录不只由个人自己所创造，也能由其他人创造，例如被同事标注自己姓名的相片。这些由形构为单位而发动的传播实践，透过算法又能形成一种物以类聚的档案库。在此扩展下，Hepp 已将传播形构的概念连结至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 Zuboff, 2019）与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 Couldry & Mejias 2019），然而在华文世界，除了姚建华（2021）将媒介化与数字劳动进行对话之外，还有从传播形构的视野来观察次文化的

研究（唐乐水，2020）、反性骚扰的研究（曹琬玲，2020）以及台湾同性婚姻公投的研究（陈品丞，2020）等等，至今仍欠缺将传播形构或（深度）媒介化链接至政治经济结构的研究。

本文认为，在深度媒介化的脉络下，传播形构的概念虽然链接至政治经济结构，不过在 Hepp 笔下，这种连结方式仍有以下三点值得商榷：首先，目前传播形构之中的行动者，主要是以一般民众的日常传播实践为主，相对而言企业、资本家等行动者所构造的传播形构缺乏讨论。例如 Mosco（1996 / 冯建三、程宗明译，1998）便认为商品也是由复杂的社会网络所构成，其中包含资本家与消费者，然而这种传播形构的分析目前较为少见。其次，尽管 Hepp 提及形构与形构之间可能彼此重迭，但他的焦点过度集中于形构如何形成的问题，形构之间的冲突较少着墨，包含资本家之间、资本家与其他社群的冲突。最后，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焦点应该「从媒体内容的政治经济转向数字基础设施的政治经济」（Hepp,2020,p.23），这种呼吁过于将内容与设备二分，因为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下，除了生产与消费过程的分析之外，媒体内容是以所有权的角度去讨论，就此而言媒体内容与数字技术设备无异，都是资本家的资产，缺乏技术设备难以产制内容，而缺乏内容又无法进行演算。换句话说，如果将分析焦点全部从媒体内容移转至数字技术设备，反而忽视两者之间的连动关系。

立基以上三点的反思，作为一种初探性的尝试，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的取径出发，思考未来媒介化研究可能的三项研究焦点。下文将以学术传播的场域为例，首先说明资本建置的媒介（期刊数据库）如何构造出自己的传播形构，从而影响学者的传播实践，其次则处理不同传播形构之间的冲突，最后则解释为何当今的媒介内容仍是关键，舍此将难以掌握深度媒介化的全貌。

肆、从学术传播观察未来媒介化研究的三项议题

一、资本在传播形构的建构力量：商业期刊数据库的扩张运动

二战之后，科学文献的数量飞涨，论文质量参差不齐，加之新学科涌现，传统书目学已无法有效记录，于是 E. Garfield 设计一种追踪文章引文 (citation) 的方法，而这套方法日后发展成知名的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以下简称引文索引)。引文索引在计算期刊的影响因子上展现成效，而高引用率的期刊可称为核心期刊。Garfield 原本只想在繁杂无章的科学期刊之中建立某种秩序，但却无心插柳，引发以下两种非意图后果：第一，大学图书馆鉴于购置馆藏的经费有限，在优先级考虑下，会先购置核心期刊 (Nisonger, 2007; Smith, 1981; Enger, 2009)。Pancheshnikov (2007) 指出，自 1960 年代以降，以引文索引来界定核心期刊的方法，已成为图书馆采购不同领域的学术期刊之依据。第二，对于商业出版商来说，他们看到学术期刊的市场属于「非弹性市场」(inelastic market)，即市场并非按照供需来调节，而是买方（图书馆）有定期向卖方（出版商）购买的需求，因此有利可图 (Guédon, 2014; 刘忠博, 郭雨丽, 刘慧, 2020)。

由于大学图书馆是学术期刊最大的购买方，图书馆界定期刊资源的方式就非常重要，尤其是涉及核心期刊的认定。当学术期刊被收录在引文索引时，出版这份期刊的单位就等于确保了经济来源。2004 年，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 Elsevier 也推出类似 SCI 的引文索引数据库：Scopus，这表示对于出版商来说，若能涉及认定核心期刊的业务，那么在非弹性市场的结构下就立于不败之地。

数据库的功能在于收录学术期刊与计算其影响力，这对于研究者而言具有便利性。一般来说，大学图书馆也有自己的搜寻系统，但出版商建置的数据库拥有海量的期刊文献，加上系统能计算期刊（与文章）的引用率与相关的文献网络，用户能在短时间寻得所需资源，这导致图书馆自建的搜寻系统逐渐被数据库取代。Elsevier 曾发布一份报告指出，图书馆订购的电子资源，能有效提升研究人员的论文生产力，而其中一名受访者的访谈如下 (Tenopir, 2010, p.21)：

电子数据对图书馆资源来说...具有必要性，过去寻找与新主题最相关的文献会耗费一整个下午，而使用电子数据只要 15 到 30 分

钟。

除了堪称便利的信息搜寻系统之外，出版商也会积极地向全世界推销其产品。例如 Elsevier 于 2010 年便在亚洲地区包含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多个国家举办推广活动，且 2011 年时其 Scopus 还获得澳大利亚官方的「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认证为唯一书目信息供应平台。截至 2021 年，Elsevier 的产品已在全球获得超过 2.5 万个政府与学术机构使用¹。

此外，当引文索引方法成为图书馆认定核心期刊的依据时，这代表原本只是作为知识资源分配系统的数据库，再得到了公共机构的承认之后，便超越了其技术性媒介的角色，转变为学术传播之中涉及评价学术声望的媒介，而评价的标准即是影响因子：期刊的影响因子越高，越能代表期刊的学术地位；期刊论文的引用率越高，也越能代表这篇论文及其作者的影响力。

近年来，这种认定更是超越大学图书馆馆藏购置的权限，从而与大学排名挂钩。英国 QS 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的排名榜单便是一例²。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家单位对于鉴定排名的标准之一，就是审视各大学的论文发表与引用率：QS 是看 Elsevier 公司旗下的数据库产品 Scopus，而上海交大则是看 Thomson Reuters 公司旗下的 SCI 与 SSCI 数据库。特别就后者的指标来说，评估大学的指标有四，分别是「教育质量」(Quality of Education)、「教职员研究表现」(Quality of Faculty)、「研究产出」(Research Output)、以及「整体表现」(Per Capita Performance)，然而研究产出系指包含在（一）Nature 与 Science 等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以及（二）SCI 与 SSCI 等数据库发表的论文，这两者占了 40% 的比重，是所有指标之最，由此不难

¹ 參見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pdf_file/0008/928016/ELS_digital_collateral_corp-broch_CH2.pdf

² 有關 QS 的排名標準，請見：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methodology?page=1>；有關上海交大的排名標準，請見：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ARWU-Methodology-2014.html>。

推知，这些收录在数据库的期刊便成了各大学（及其学者）投稿的兵家必争之地。

2011 年 7 月，中国大陆教育部更将大学发展与数据库论文的发表挂钩，发布「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其中将国际论文发表及其引用率，列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政策文字之中；这项规划是如此界定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

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是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学术论文在发表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引用的次数之和。该指针是评价国际科学论文质量的重要指针，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科学论文的影响力。³

这项规划使得各校进行「奖励」发放时变得「有理有据」，甚至有学者认为「在科研项目申报与结题、科研成果评审、职称荣誉评定、人才引进和业绩点考核等政策中，存在重视 SCI / SSCI 期刊的程度比中文权威核心期刊高得很离谱的现象」（朱晓华、何书金、王岱、孙枫、汪德根，2016，页 681）。

然而关键在于，当大学排名与数据库论文构连时，数据库跃升为一种规范学术社群传播活动的主导框架，它不再只是单纯的论文资源分配，也是认定论文重要性的权威性媒介。如今，在许多学院的网站以及教师的介绍网页中，列出发表的期刊论文及其总数、收录的数据库名称、以及相关的影响因子已是常态，这表示数据库作为一种媒介，已植入学术社群的发表记录之中，成为制度化的学术传播实践，而技术的符号（如 Scopus, SCI）更铭刻在期刊的版权页之中，成为一种期刊的认证标记。这些传播实践之所以看似合理，Stack（2016）认为是数据库已成为界定何谓「研究生产力」（research productivity）的媒介，即数据库取得了认证知识生产力的权威性。

总结而言，从商业数据库的扩张来看，Elsevier 与 Thomson Reuters 等公司于世界各地举办说明会并推销系统之下，其所建构的传播形构，首先行动

³ 詳見「十二五規劃」的附錄：「重要指標和名詞解釋」，網址 <http://www.most.gov.cn/kjgh/>

者从除了包含学者们与各大学图书馆，也将许多政府单位纳入其形构之中，而这些行动者的学术传播实践，便是围绕在这些公司所建置的数据库。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传播形构之中，宰制行动者的主导框架，系将发表收录在期刊数据库的论文，视为研究生产力的象征。再者，使用这些数据库的媒介组合，除了这些公司本身的网站之外，从图书馆的网页也可以链接至数据库本身，而这种连结是以一种授权的方式为之，即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账号，学者登入之后便可开始使用。从资本建构的传播形构来看，我们观察到媒介化的过程并非自然而然的形成，而学者们的学术传播实践（即自己发表或下载他人的论文），多半没有太多的选择。

二、传播形构之间的冲突

由于商业出版商建置的数据库所费不貲，各大学图书馆渐渐无力负荷，故而有别于这些公司建构的传播形构便应运而生。由「开放社会研究院」(Open Society Institute)、学者、各大学图书馆等行动者建构的传播形构，其主导框架是知识的公有性，亦即他们认为受公共补助的学术研究应该免费公开与共享，而非如商业数据库一般，将论文视为商品，以付费墙形式阻隔人们的使用。这种传播形构的媒介组合，可分为学者个人建置的论文网站（如哈萨克斯坦神经学家 Alexandra Elbakyan 建置的 Sci-Hub）、学科型典藏网站（如以物理学为主体的网站 ArXiv）以及机构型的典藏网站（如政治大学机构典藏）。透过这些网站上传自己或下载他人的论文变得简单可行。Karaganis (2018) 将这种新兴的传播网络名之为「影子图书馆」(Shadow Libraries)，用以捕捉另类学术传播管道在形成的同时，所历经来自主流媒介（出版商 / 资本）的抵抗，以及如何创造出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可能性。

从 Hepp (2020) 分析的青少年的传播形构与媒介组合来看，他认为可以从这些人使用媒介的过程之中，观察出他们对于不同传播形构的融入程度。例如对于家庭的形构而言，脸书是主要的使用媒介，而对于朋友的形构来说，twitter 或 Instagram 则较为重要，而从他们减少脸书、并增加 twitter 的使用来看，可观察他们对于何种传播形构的重视。然而，从政治经济学的

視野來看，傳播形構的建構無法忽視資本（家）的作用，並且媒介組合的形成本質上是行動者與資本鬥爭下的產物。例如 2017 年時 Sci-Hub 就被 Elsevier 公司提告，紐約地方法院判決該網站須賠償該公司 1500 萬美元的侵犯著作權損失（Schiermeier, 2017, June 22），⁴而未來 SCI-Hub 勢必會不斷面臨這類挑戰。

又如 2019 年 2 月，加州大學圖書館決定停訂 Elsevier 公司的期刊數據庫，這是由於 2017 年時，前者購買數據庫的經費已超過 1150 萬美元，嚴重排擠該校購置其他資源的預算，財政負擔沉重，於是雙方展開數月議價，爾後協商以失敗告終。⁵無独有偶，早於加州大學兩年，台灣大學已於 2017 年 1 月停訂 Elsevier 的 ScienceDirect 數據庫，而台大的說法是「目前全校訂購近 4,700 種期刊，其中 Elsevier ScienceDirect 的 784 種期刊占訂購種數 17%，所需費用却逾期刊採購總金額 33%。又本校訂購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雖已由 2008 年的 833 種，減少為 2016 年的 784 種，但是訂購費用却增加為 143%」⁶同年 6 月，雖然台大宣布與 Elsevier 議價成功，並續訂 ScienceDirect 數據庫，不過仍表示「三年後的下一回議價談判，仍是我們必須持續努力的」⁷。

儘管台大目前已恢復訂購該公司的數據庫，然而 2017 年停訂的事件已引發國際學界注意。全球最大的開放獲取出版商「公共科學圖書館」（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在 2018 年 7 月發布一篇文章指出，台灣於同年已與德國、瑞典、秘魯等國家，共同組成「不與 Elsevier 交易專區」（No Elsevier Deal Zone），而台灣、德國與瑞典還是 OECD 組織的成員，其研究支出占了 35 個會員國的 9%，而她們的決定預料會引發後續的影響，不交易專區也有可能進一步擴大。⁸假使未來不交易的作為成真，那麼大學圖書館就無法使用

⁴參見 <https://www.nature.com/news/us-court-grants-elsevier-millions-in-damages-from-sci-hub-1.22196>

⁵參見 <https://www.library.ucla.edu/news/uc-ends-negotiations-elsevier>

⁶參見 <http://www.lib.ntu.edu.tw/node/2969>

⁷參考 <http://epaper.ntu.edu.tw/view.php?listid=34&id=25965>

⁸參考

<https://blogs.plos.org/absolutely-maybe/2018/07/30/europe-expanded-the-no-elsevier-deal-zone-this-could-change-everything/>

这些商业数据库，从而影响人们的媒介组合。简而言之，只要资本建构或主导的传播形构越强势，那么未来这种斗争就越有可能持续上演。

三、新旧媒介对于内容所有权的合纵连横

尽管媒介化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媒介内容的效果，然而媒介内容的所有权却无法忽视，特别是在深度媒介化的脉络之下。如前所述，深度媒介化是基于数字设备的普及与算法的规则，而人们每次的媒介使用都被记录下来，其数据则透过算法进行归类。在学术传播的场域之中，学者们也开始应用社交媒体来传播自己的论文。例如 ResearchGate 的平台，使用者可以用它来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论文）、追踪研究兴趣与其他研究者、评论和分享他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要求他人提供论文电子全文。此外，该平台还会建议有相似兴趣的人建立联系。

ResearchGate 原本由两位科学家及一名医师所创建，然而在获得资本的投资后，逐渐转型为一家能实现营利的社交平台，而该公司的商业模式，即是追踪用户的使用数据，并将这些个人数据转换成商品。在算法的驱动下，「你最终会看到（学者们的）表现与出版品，因为它们会（自动）出现在你眼前」（DE OLIVEIRA, 2018, p.113；括号内字为笔者所加）。

有别于传统的商业数据库公司是以学者提供自己论文内容的方式，来建构书目索引系统并打造其传播形构，ResearchGate 这类新兴的社交平台是让学者提供自己的社会资本（DE OLIVEIRA, 2018），论文内容只是让学者之间联系彼此、从而建立社会关系的工具。不过，由于这个平台让使用者有权发布自己的论文之外，也可以要求他人提供全文，于是这就冲击到商业数据库公司的核心利益。2017 年，Elsevier 公司与美国化学学会（ACS）在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对 ResearchGate 提起诉讼，声称后者免费提供的论文，实则都是受著作权法所保障，故而涉嫌侵权。时至今年（2022）三月，慕尼黑地区法院宣判，ResearchGate 平台上的部分论文侵权，并指出该平台也要为使用者上传的内容负责（Kwon, 2022, March 22）。

不过，并非所有出版商都排斥社交媒体平台。2019年3月，出版商 Springer Nature 与 ResearchGate 展开合作计划，ResearchGate 的使用者只要透过该平台认证拥有 Springer Nature 的机构账号，即可在平台上阅读和下载 Springer Nature 出版的论文全文。目前 Springer Nature 旗下有 40 本期刊、超过 5 万篇论文透过如此方式让 ResearchGate 的使用者利用。⁹综合而言，Elsevier 与 Springer Nature 对待社交媒体的方式截然不同，这表示资本在建构传播形构的过程之中，尤其在考虑组建行动者丛时，哪些行动者能被纳入（或排斥），内容的所有权实乃关键因素。

伍、代结论：媒介化研究中的政治经济转向

本文从学术传播的媒介化过程中指出，期刊数据库之所以能介入学术传播文化（即媒介化的「化」字能够成功），关键是资本在构造传播形构时所展现的权力，而这种政治经济式的思考，往往也是历来媒介化研究较少讨论的议题。媒介化理论近年来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如方念萱，2016；陈品丞，2020）、物质性（如戴宇晨，2021）等理论，如此的讨论似乎有迈向微观分析的发展趋势，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媒介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全然没有对话的基础？唐士哲指出（2014b，页 27-28），其实两者都关心社会权力的运作：

媒介化概念与政治经济学同样主张传媒的物质意涵是特定社会权力关系的来源，然而政治经济学往往把人为控制的因素，作为探究传媒特定权力关系的起点...相较而言，媒介化的思维却是采取一个反向的推论：即是由社会菁英或权势阶级的个人或组织的日常思维、行止中，推断传媒过程在权力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传媒涉入的符号流通如何对于社会生活产生整体、累积的效应。换句话说，同样关切传媒作为理解社会权力运作的基本单位，政治经济学着重巨观、结构性的传媒经营架构；媒介化倾向由微观、个体的传播实践或沟通行动着

⁹ 參見 ResearchGate 的網站說明，網址：
<https://explore.researchgate.net/display/support/ResearchGate+and+Springer+Nature+partnership>

手...

进一步而言，如果政治经济学的强项在宏观的结构分析，而媒介化理论则从微观的传播实践出发，那么这是否意味两者不能结合？答案也未必如此。Jensen (2013, p.214) 探讨媒介化理论时，借助 Giddens 结构化理论的视角，将媒介视为社会中的结构与行动之外的第三种元素，其功能在于凭借能够「跨越时空的传播，来中介结构和能动性」(communication mediates structure and agency across time and space)。换言之，在构连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之间，媒介已是社会能持续运作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个从媒介来链接宏观与微观的尝试是，van Dijck (2013) 在分析社交媒体平台时，将平台的特性区分为二：技术文化与社会经济结构，前者重视用户、技术与内容的分析，而后者侧重在所有权、经济结构与商业模式的讨论，而这种区分的合理性即是建立在结合微观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宏观的政治经济学。

本文认为，媒介化研究可将政治经济学取经纳入讨论，亦即将媒介化的过程安置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之中。就此而言，我们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结合传播形构的概念，提出以下三项可供未来思考的议题：资本（家）在建构传播形构中的作用、传播形构之间的冲突、以及媒介内容的所有权议题。作为一篇初探性的研究，本文希冀能对媒介化的政治经济学取经，抛砖引玉，希冀增添知识上的积累。

参考书目

- 方念萱 (2016)。〈媒介化、行动化：媒介化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对话〉，《传播、文化与政治》，4: 55-83。
- 王琛元 (2018)。〈欧洲传播研究的「媒介化」转向：概念、路径与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5: 5-26。

- 朱晓华、何书金、王岱、孙枫、汪德根 (2016)。〈SCI/SSCI 期刊与中文权威核心期刊论文的学术价值评价—基于地理工作者的感知分析〉,《地理学报》, 71(4): 680-692。
- 侯东阳、高佳 (2018)。〈媒介化理论及研究路径、适用性〉,《新闻与传播研究》, 5: 27-45。
- 姚建华 (2021)。《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江苏人民出版社。
- 唐士哲 (2014a)。〈重构媒介? 「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新闻学研究》, 121: 1-39。
- 唐士哲 (2014b)。〈从政治化媒介到媒介化政治: 电视政论节目作为制度化的政治实践〉,《中华传播学刊》, 25: 3-41。
- 唐少杰, 齐心译 (2015)。《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南京: 译林。
- 唐乐水 (2020)。〈当媒介化遇到次文化: 一种历时性研究的思路〉,《中华传播学刊》, 38:99-138。
- 曹婉玲 (2020)。〈媒介化与跨媒介叙事想象: #MeToo 如何交织故事世界〉,《中华传播学刊》, 38: 50-97。
- 陈品丞 (2020)。〈从二元本体论到行动本体论: 媒介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转向与实作〉,《中华传播学刊》, 38: 9-47。
- 冯建三、程宗明译。(1998)。《传播政治经济学—再思考与再更新》。台北: 五南。(原书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 Sage.)
- 黄顺星 (2020)。〈媒小区: 以媒介化理论检视台湾小区报发展〉,《中华传播学刊》, 38:139-176。
- 刘君等译(2018)。《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上海: 复旦大学。
- 刘忠博、郭雨丽、刘慧 (2020)。〈「掠夺性期刊」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形成与省思〉。《新闻与传播研究》, 10: 95-109+128。
- 戴宇辰 (2021)。〈媒介化研究的「中间道路」: 物质性路径与传播形构〉,《南京社会科学》, 7: 104-112+121。
- Borgman, C. L., & Furner, J. (2002).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bibliometrics. In B. Cronin (Ed.),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36, pp. 3-72). Medford, NJ: Information Today, Inc.
- Couldry, N. & Hepp, A. (2013). Conceptualis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191-202.
- Couldry, N. & Mejias, U.A. (2019). Data colonialism: Rethinking big data's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 336-349.
- DE OLIVEIRA, T. M. (2018). Mediatization of scienc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paradigm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work in the digital era1. *Sao Paulo-Brasil*, (3), 101.
- Deacon, D. & Stanyer, J. (2014). Mediatization: Key concept or conceptual bandwag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7),1032-1044.

- Deacon, D. & Stanyer, J. (2015). 'Mediatization and' or 'Mediatization of' ? A response to Hepp et al.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7(4),655-657.
- Dombrowski, T. (1988). Journal Evaluation Using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as a Collection Development Tool. *Collection Management*, 10(3-4), 175-180.
- Enger, K. B. (2009). Using citation analysis to develop core book collections in academic libraries.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1(2), 107-112.
- Franzen, M. (2012). Making science news: The press relations of scientific journals and implications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 Rödger, S., Franzen, M., Weingart, P. (Eds.), *The sciences' media connection: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 (pp. 333-352):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Science.
- Guédon, J. C. (2014). *The future of the academic journal*. UK: Chandos Publishing.
- Hepp A. (2013b). 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of mediatized worlds: Mediatization research in times of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6), 615-629.
- Hepp, A. (2019). Mediatization. In Schnettler, B., Tuma, R., vom Lehn, D., Traue, B., & Eberle, T. S. (Eds.). *Kleines Al(e)phabets des Kommunikativen Konstruktivismus*. (pp.301-306).
- Hepp, A. (2020). *Deep mediatiz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Hepp, A., Brieter, A., & Hasebrink, U. (Eds.). (2018).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ransforming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deep mediatization*. Gewerbestrasse,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Hepp, A., & Hasebrink, U. (2014). Human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tize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Lundby K (ed.).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Handbooks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pp. 249-272).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Hjarvard, S. (2004).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 In Ib Bondebjerg & P. Golding (Eds.),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 Bristol, UK: Intellect Books.
- Hjarvard, S. (2017). *The logics of the media and the mediatized conditio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Media logic(s) Revisited*. doi:10.1007/978-3-319-65756-1_4.
- Hjarvard, S., & Li, Z., (TRANS.) (2016). I X. Wu (red.), *International Media Industry Review*. Shanghai: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
- Hjarvard, S., & Lundby K. (2018). Understanding media dynamics. In Lundby K. (Ed.). *Contesting religion: The media dynamics of cultural conflicts in Scandinavia*(pp. 51-64). Berlin: De Gruyter

- Jensen, K. B. (2013). Definitive and sensitiz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mediat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3(3), 203-222.
- Karaganis, J. (2018). *Shadow Libraries: access to knowledge in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The MIT Press.
- Krotz, F. (2007) 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3(3), 256-260.
- Kwon, (2022, March 4). ResearchGate dealt a blow in copyright lawsuit. *Nature*. Retrieve from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0513-9>
- Lundby, K. (ed.). (2014).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Handbooks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vol. 21*.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Pancheshnikov, Y. (2007). A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 citations in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student theses as indicators of collection use and a background for collection management at a university library.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33(6), 674-683.
- Peters, H. P. (2012). Scientific sources and the mass media: Forms and consequences of medialization. In Rodder, S., Franzen, M., and Weingart, P. (Eds.), *The sciences' media connection: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 (pp. 217-240).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 Schulz, A. (2004).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 87-101.
- Schiermeier, Q.(2017, June 22). US court grants Elsevier millions in damages from Sci-Hub. *Nature*. Retrieve from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017.22196>
- Strömbäck, J. (2008).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3(3), 228-246.
- Stack, M. (2016).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 and the media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Van Dijck, J.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the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rofile Books, London.

**A Dialogue Between Theory of Mediatiz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Taking the Mediatiza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s Research Field**

Zhongbo Liu & Chu Qiao Xian

ABSTRACT

After the mediation theory was put forward by European scholars, the scholars excluded the factors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theory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thus ignoring the possi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diation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is can be seen from the recent discussions of concepts of mediatization, whether institutionalist or social constructionists, they have failed in explaining the question of “why some fields can be mediated and others are not”, and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behind this problem can fill the gap of theory in this regard.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question,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key concepts proposed in the mediatization theory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and not only provide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oncepts, but also illustrates their possible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economy. Secondly, focusing on the mediatiza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e will take a western journal database compan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at the database was originally used as a medium for calculating citation rates, bu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he publishers integrated scholars, libraries,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units into the formation, thereby transforming into this medium for certifying knowledge productivity.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the name of the database and the numerical value of its influence are inscribed in the publication records of scholars, and the symbol of technology is also inscribed in the copyright page of academic journals, which has become a normal practice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ield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mediatization research should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we also try to point out three possible future key issues, so as to better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of mediatization theory.

Keywords: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deep mediatization, media logics,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 Zhongbo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mail: liupublius@gmail.com. Chu Qiao Xian, master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乌克兰的军事情境

包亚克 (Jacques Baud) *

译注: 冯建三**

本文引用格式

冯建三译注(2022)。〈乌克兰的军事情境〉,《传播、文化与政治》,15:139-159。

壹、第一步: 通往战争

投稿日期: 2022 年 4 月 5 日; 通过日期: 2022 年 6 月 5 日。

*包亚克 (Jacques Baud) 是瑞士参谋本部的退役上校, 曾经担任瑞士战略情报分析工作, 是东欧专家。他在美国与英国情报服务单位受训, 曾经担任联合国维和工作的政策主任。他以联合国法治与安全体制专家的身份, 领导联合国情报单位在苏丹的多国团队。他曾经在非洲联盟工作五年, 在北约负责打击小型武器的扩散。苏联解体后, 他参与了欧洲与俄罗斯军方及情报官员的最高层之讨论工作。在北约的工作是, 他密切注意乌克兰 2014 年危机以后的变化, 其后参与协助乌克兰的工作。他有多本着作, 都与情报、战争与恐怖主义有关, 特别是 *Le Détournement* (由 SIGEST 出版) 与 *Gouverner par les fake news* 与 *L'affaire Navalny*。他最近的一本书是 *Poutine, maître du jeu?* 由 Max Milo 出版。这篇文章先以法文在 3 月 14 日发表在「法国情报研究中心」(Centre Français de Recherche sur le Renseignement), 作者曾更新至 28 日。

**冯建三, 政大新闻系教授, e-mail: jsfeng@nccu.edu.tw。中译说明: 谢谢卢倩仪告知本文, 英译出版于 *The Postil* (2022 年 4 月 1 日), 5 月与 6 月 1 日, 它另刊登包亚克两次访谈文章。*Postil* 杂志自诩「古典人文主义」(classical humanism), 植根在「信念与理性」的基督世界 (<https://www.thepostil.com/about/>)。卡西 (B. D. Cathey) 略编辑 *Postil* 的译文并随文短评, 转载于 *The Unz Review* (<https://www.unz.com/>), 它声称「搜集美国主流传媒大抵排除, 但有趣、重要且有争议的视野」。卡西说本文让「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译者无力作此宣称, 但该文披露的事情与观点, 与欧美主流明显不同, 译者学习杭士基 (Noam Chomsky) 的就事论事, 予以译译, 或可让人在探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原因时, 能有不同的说法做为参考。杭士基在 2022 年 4 月 27 日表示, 他说过美国前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很危险, 但这与他肯定川普主张乌克兰局势当由外交斡旋早日结束, 并不冲突; 重点不是川普, 是「我们理当老实」, 特别是拜登团队「似乎无意支持和平谈判」(Krishnankutty, 2022 May 12)。杭士基反对川普的排外、绿能及低社福取向, 但他也同时质疑民主党主流及不批评其主张的传媒。

许多年来，从马里 (Mali) 到阿富汗，我的工作都与和平有关，为求和平，我的生命有着风险。因此，不是要谈战争是否能够正当化这个问题，是要了解，是什么导致战争。

乌克兰冲突的根源挺多，我们先得予以检视。首先，过去八年来不断有人说，乌克兰东部的东巴斯 (Donbass) 地区出现了「分离主义派」或「独立派」。这是名词误用。该地区的 卢甘斯克 (Lugansk) 与 顿内茨克 (Donetsk) 是自称共和政体 (republic)，是在 2014 年 5 月通过公民投票 (referendums) 为之，但他们不是追求「独立」，虽然是有粗心大意的记者作此声称。实际上，这两个公投是「自决」或说「自主」的公投。还有，外界用「挺俄罗斯的」(pro-Russian) 这个词汇，原是要厘清，却会让人以为俄罗斯这个国家参与了这场冲突，惟俄国并没有参与，该词若改为「说俄语的人」，会是更诚实的表述方式。另得注意的是，普亭反对前述两个地区的人公投，但公投仍然进行。

究其实，这两个共和政体并没有试图要从乌克兰分离出去，她们是要有自主的地位，确认她们能够在乌克兰政府认可俄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的情境下，使用俄语——2014 年 2 月 23 日在美国资助下，(经由民主选出的) 总统亚努科维奇 (Victor Yanukovych) 遭推翻后，授予俄语也是乌克兰官方语言之一、在 2012 年颁行的语言法 (the Kivalov-Kolesnichenko Law)，就遭废除。

¹ 这就有些像是瑞士德语区出现了盲动群体，决定要让法语及意大利语，再也不是瑞士的官方语言之一。

¹ 譯註：二〇〇一年的人口普查顯示，烏克蘭裔的烏克蘭國籍人約佔 77.8%，俄裔約 17.3%。支持俄語作為官方語言之一的烏克蘭全國人口比例，在 1995 是 52%，顏色革命後一年(2005)降至 48.7%，2014 廣場事件後再減到 32.2%，2018 是 30.8%。分區計算，已被俄羅斯併入的克里米亞未調查，其他六個區最低的是西部 2.1%、中部是 19.6%、基輔仍有 33.1%、東部是 46.6%，而南部是 53.9%，東巴斯是 63.3%。再者，烏克蘭民族的人(原文未指明，但可能是 2016 或 2018 年，)約有半數在家主要是說烏克蘭語，25%說俄語，25%兩種都用。但俄羅斯裔的烏克蘭人在 2018 年主要在家主要說俄語已從 2012 的 80%減至 68%，說兩種則是 17%增加至 27%，雖然歷史上俄裔烏克蘭人在家還說烏克蘭語的人不到 5%。母語是烏克蘭語的人，60%主要說烏克蘭語，15%說俄語 25%雙語 (Veira-Ramos & Liubyva, 2020, pp.218-222)。

这个决定在说俄语的地区，掀起了风暴。接着就是政府开始镇压这些说俄语的地区，如敖德萨（Odessa）、聂伯罗（Dnepropetrovsk）、哈尔科夫（Kharkov），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这些行动起自 2014 年 2 月 24 日，然后是军事对抗，在俄语区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屠杀，特别是在敖德萨与马立波（Mariupol）。

在这个阶段，乌克兰的一般军士的手法过度呆滞，完全是教条式操作，虽然压制了对手，但并没有真正占到上风。（反之，）自主派发动的作战，是用轻武器，采取高度机动的操作。这些反叛基辅政府的群体采取了更有弹性，没那么教条的作法，他们利用了乌克兰军方的惰性，不断让他们「进入陷阱」。

我在 2014 年时，仍在北约服役，负责打击小型武器的扩散，同时也得试着侦测，俄罗斯人是不是运送武器给反叛群体，藉此确认莫斯科有没有涉入这场冲突。我们当时取得的情报，几乎完全来自波兰情报单位，这与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机构」（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的信息，并不「吻合」—这些宣称相当粗糙，但**俄罗斯确实没有运送武器进入乌克兰**。

实情是，乌克兰军队说俄语的单位叛变，向追求自治的反叛群体提供武器。随着乌克兰军方的失利，坦克、大炮与整个防空营队的装备，这才在自主派群体间，四处充斥。在自治区的武器增多之后，乌克兰政府（有了变化，于是有后来在 2014 年 9 月的）走向承认明斯克协议（Minsk Agreements）²之签订。

卡西的评论：以上文字让人震惊。我们一直认定，乌东地区的自主派至少得到「一些」来自俄罗斯的武器。毕竟西方传媒不停报导，从基辅在东巴斯地区投入「反恐操作」的第一天开始，「俄罗斯人就已

² 譯註：*Ukraine and Russia* 的作者 Antolia Lieven（2021/11/15）說，該協議是讓兩地取得如同美國聯邦之下「州」的自治地位。政大民族系教授趙竹成（2022/3/1）也說，明斯克協定是要讓烏東地區內戰熄火，由聯合國安理會在 2015 年確認，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德法俄烏四國總統協商後，進入第二層次，由歐安組織及俄國代表見證，由基輔與頓內次克及盧甘斯克代表共五人簽字，規定烏東地區選舉「根據」烏克蘭法律，沒有否認烏克蘭在該地的主權，但至戰爭發生，基輔都未執行選舉。

经入侵乌克兰。」我们的这些媒体不断表示，假使真正要自由，就要挺身战斗……。

但在签署「明斯克协议 1」之后不久，乌克兰总统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发动大规模反恐行动对付东巴斯。在北约官员的低质量咨询后，乌克兰人在德巴尔切夫（Debaltsevo）大败，乌克兰政府只好参与「明斯克 2」协议。

这里，我们理当记得，无论是明斯克 1（2014 年 9 月）或明斯克 2（2015 年 2 月）的协议，都没有说东区两共和政权要分离独立，都只是要在乌克兰的架构内，给予自治。已经读了两次协议的人（，真正完整读完的人很少，）应该就会知道，两个政权的地位归向何处，得由基辅与两个共和政权的代表在协商后才能决定，这是乌克兰在内部解决自己事务的方案。

由于是乌克兰内部的事情，俄罗斯因此从 2014 年以来，都是很有系统地要求，理当落实明斯克协议，同时也拒绝参与协商。在另一边，也就是西方，则在法国也很有系统地介入下，想要以「诺曼底方案」(Normandy format) 取代明斯克协议，这就使得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得面对面（商定）。不过，这里我们得记得，在 2022 年 2 月 23 至 24 日之前，从来没有俄罗斯军队在东巴斯地区出现。再者，OSCE 的各个观察员在这个日期之前，完全没有在东巴斯地区察觉到有任何一丁点的俄罗斯军事单位的运作。这里可以举《华盛顿邮报》作为例子，该报在 2021 年 12 月 3 日刊登美国情报地图，其中没有显示东巴斯地区存在俄罗斯军队。

乌克兰国安局（the Ukrainian Security Service, SBU）格里察克（Vasyl Hrytsak）局长在 2015 年 10 月承认，他们在东巴斯地区察觉仅有 56 位俄罗斯战斗人员。这个数字完全与 1990 年代时，瑞士人进入波士尼亚，或与法国人今日进入乌克兰战斗的人数，可以相提并论。

那个时候的乌克兰军队状况堪虞。在四年内战后，乌克兰军事检察长马季奥斯（Anatoly Matios）在 2018 年表示，乌军在东巴斯地区丧失 2700 人：891 人死于疾病、318 人因车祸意外去世、其他意外致死 177 人、175 人中毒（酗酒与药物）死亡、172 人操作武器不慎丧命、101 人违反安全规定、

228 人遭谋害，另有 615 人自杀。

实际状态是乌克兰军队因干部腐化而衰败，不再有乌国人的支持。英国内政部在 2014 年 3/4 月曾有报告，指军方召回后备军力时，百分之七十在第一季没有报到，第二季是 80%，第三季是 90%，第四季是 95%。到了 2017 年 10/11 月，稍前发起的「2017 年秋季」回营召集动员，仍有 70% 的人没有报到。计算这个比例时，还不包括自杀与脱队的人（通常是加入要求自治的群体），这些人最多可以占了（译按：乌克兰人称之为）「反恐区」(Anti-Terrorist Operation Zone, ATO)（译按：也就是东巴斯区）工作人力的三成。乌克兰年轻人拒绝前往东巴斯地区作战，他们宁可移民，这就至少也局部解释了乌克兰的人口赤字现象。

乌克兰国防部于是寻求北约协助，想让军队行伍的生活显得更有「吸引力」一些。先前，我在联合国的规范架构内，曾经有在类似项目的工作经验，北约因此要我参与，重建乌克兰军方的形象。这个过程原本需要很长时间，但乌克兰军方希望要能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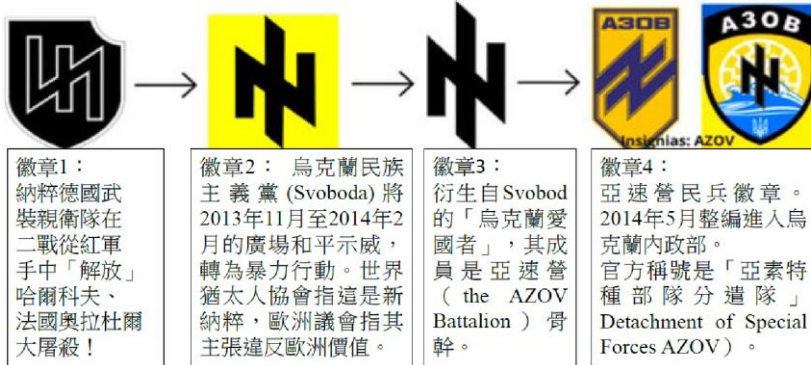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乌克兰政府为了快速补充欠缺的兵源，就转向招募「准军事民兵」(paramilitary militias)。根据路透社报导，这些民兵在 2020 年占了乌克兰军力大约四成，总计约 10 万 2 千人。美国、英国、加拿大与法国提供武器与资金，武装了这些来自 19 个国籍的民兵。

这些得到西方的支持民兵从 2014 年以来，就已存在。即便有人想要论称这些人未必是「纳粹」，但这些民兵相当暴力、意识形态让人作呕，同时恶毒地反犹太，却是不争的事实，组成这些民兵团营队的人，一个个都是狂热残暴之人。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亚速营」(Azov Regiment)，它的徽章让人忆起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武装亲卫队，在乌克兰，却有人尊敬这个标志，指它在 1943 年从苏维埃手中解放了哈尔科夫 (Kharkov)，又在 1944 年执行了法国奥拉杜尔 (Oradour-sur-Glane) 的大屠杀！

有人说乌克兰民兵是「纳粹」或「新纳粹」，纯属俄罗斯的宣传。但《以色列时报》(Times of Israel) 或「西点军校反恐中心」(the West Point Academy's Center for Counterterrorism) 可不这样看待。《新闻周刊》(Newsweek) 在 2014 年的报导则似乎说这些民兵与「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有更多的关

系。相信哪一种呢？就请自行选择。

这些民兵自从 2014 年以来就对平民犯下无数罪行，奸淫、拷打酷刑与杀戮…，西方国家给予支持，也不断提供武器给他们。



有的人认为，这些民兵整合进入乌克兰的国民警卫队之后，已经「去纳粹化」，但根本不是这样。有许多例证可以说明，就说亚速营的阶级徽章，应该就能让人恍然大悟：

在 2022 年，与入侵的俄罗斯入侵者作战的乌克兰军队，其组成是：

(一) 国防部直属的军队，有三个军团 (corps)，并有能够参与演习的军事装备如坦克、重火炮与飞弹……等等。

(二) 国民警卫队 (National Guard)，由内政部提供给养并分成五个地方指挥区。

因此，**国民警卫队是地方自卫队伍，不是乌克兰军队的一部份**。这些国民警卫队包括准军事民兵，名称是「志愿营队」(volunteer battalions)，也有人以意有所指的「复仇营队」(reprisal battalions) 相称；同时也有步兵，主要是训练来从事都会区战斗，目前负责哈尔科夫 (Kharkov)、马立波 (Mariupol)、敖德萨 (Odessa) 与基甫 (Kiev) 等地的防务。

貳、第二步：战争

退休前，我是瑞士战略情报机构分析华沙公约组织军力的组长，对于我们提供的服务，不再能够有助于了解乌克兰的军事状态，我有哀伤，但不惊讶。就在我们家户户的电视银幕，宣称自己是「专家」的人镇日游走不断传输，所说无他，就是声称俄罗斯人（以及普亭）没有理性。我们得先跳出这个圈子说话。

一、战争爆发

美国人从 2021 年 11 月起，持续地对外有威胁之言，指俄罗斯就要入侵乌克兰。不过，乌克兰人起初似乎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不同意？

这得从 2021 年 3 月 24 日说起。当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下达命令，要重新取回克里米亚，并开始部署军力至乌国南部。就在这个时候，北约也在黑海与波罗的海之间，举行多次演习，连带出现的是，沿着俄罗斯边界飞行侦测的次数显著增加。俄罗斯于是执行了数次演练，测试自己的军队是否随时可以运作，这也是对外展示，俄罗斯在跟进情势的变化与发展。³

在俄罗斯的 the ZAPAD 21 演习结束后，事态平静了下来，这时是 10 月、11 月，只是外界认为这些军队的行动，是在强化攻击乌克兰的准备。不过，即便是乌克兰当局都拒绝作此判断，并不认为俄罗斯在备战，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Oleksiy Reznikov）都有声明，指乌国边境从春天以来，就没有什么变化。

³ 譯按：外界似乎僅說俄羅斯軍演，沒有提及本文所說的北約軍演。因此，歷來反對美國軍事帝國的人與網刊，就只是這樣陳述：普亭在 2021 年 4 月「增加兵力 12 萬人，部署在烏克蘭邊境，發動軍事演習。當時，華府甚至已經說這是『戰爭威脅』」。（McCoy, 2022, April 19）

乌克兰违反明斯克协议，在东巴斯区以无人机操控多回空中行动，包括至少有一次攻击加油站，时间是 2021 年 10 月。美国传媒报导了这则新闻，但欧洲人没有报导；**欧美都没有谴责这些违规行动。**

事情在 2022 年 2 月来到了危机关头。法国总统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 2 月 7 日访问莫斯科，再次承诺普亭，表示会履行明斯克协议，次日，他与泽伦斯基会面时，也重复这个承诺。但是，「诺曼底方案」的多位政治顾问 2 月 11 日在柏林会谈九小时以后，并无具体结果：乌克兰人仍然拒绝履行明斯克协议，很显然是有来自美国的压力。普亭则心理有数，马克宏开了空台支票，西方国家无意落实协议，八年以来，对于这个协议，西方都是维持这个立场，无意执行。

乌克兰在接壤区的准备持续进行。俄罗斯国会有了警觉；接着是 2 月 15 日，杜马国会就要普亭承认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而早先他是拒绝这个作法。

「拜登总统在 2 月 17 日宣布，俄罗斯即将攻击乌克兰」。他怎么知道？这是个谜。不过，16 日起，轰炸东巴斯区的炮弹急速增加，OSCE 的每日报告都有记载。可想而知的是，西方的传媒、欧盟或北约，以及任何西方政府，都没有反应也没有介入，其后西方只是说，这个消息只是俄罗斯的不实信息。然而，真实的情况似乎是**欧盟与一些国家刻意对此保持沉默，不提屠杀东巴斯人群这回事，知道这将挑起俄罗斯的介入。**

这个时候，东巴斯地区出现破坏行动的报告，已经多回。东巴斯区的战斗人员拦截到破坏队伍，这些人说波兰语，配有西方装备，打算在哥罗夫卡（Gorlivka）制造化武事件。这些人可能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佣兵，由美国人及乌克兰人或欧洲战斗人员在内的人领导或提供「咨询」，目标就是在东巴斯两个共和政权执行破坏行动。

拜登其实早在 2 月 16 日就知道，乌克兰政府已经开始对东巴斯区的平民区狂炸猛轰，这是要为难普亭，使他进入难以抉择的困境：协助东巴斯的军队同时也就必然弄出国际问题，或者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东巴斯说俄语的人被弄得粉碎。如果他决定介入，普亭便可引用「保护责任」的国际义务。但是，**他知道介入的性质或规模大小，都同样会引发制裁风暴。因此，究竟**

俄罗斯是要将介入限定在东巴斯地区，或对西方施加压力就乌克兰地位有个决断，俄罗斯需要支付的代价，将是相同。这就是他在 2 月 21 日讲演所做的解释。在同一天，他同意杜马国会的要求，承认两个东巴斯共和国的独立，与此同时，他也与两国签署了友谊及协助协议（译按：这就在程序上，符合由独立的国家请求俄罗斯进入的国际法要求）。

乌克兰持续轰炸东巴斯平民区，然后，两个共和国在 2 月 23 日要求俄罗斯给予军事协助。俄罗斯在 2 月 24 日就引用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亦即在防卫联盟的架构下可以互相提供军事协助。

为了要让公众以为俄罗斯介入，似乎完全非法，西方这些强权刻意隐匿实情，不让战争早在 2 月 16 日就已经发生的真相，为外界所知。乌克兰军队想要攻击东巴斯地区，早在 2021 年就已经有所准备，对此，有些俄罗斯与欧洲的情报服务也是一清二楚。

普亭在 2 月 24 日的演讲陈述这次行动的两大目标：乌克兰的「去军事化」与「去纳粹化」因此，并没有什么接管乌克兰，也没有甚至有人假想中地那般，要占据乌克兰；当然更不是要摧毁乌克兰。

当日至今，我们对俄罗斯的操作所知，就相当有限：**俄罗斯人的军事操作有绝佳的安全部署（OPSEC），他们的计划详情外界无从得知。**但整个操作的路径算是相当快就已经显露，我们因此可以了解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转化为操作层次的面貌。

去军事化：

- 摧毁乌克兰航空地面设施、防空系统与侦察设备；
- 指挥与情报结构（C31）及深入该领土的主要后勤路线维持中立；
- 包围集结在东南区的大部分乌克兰军队。

去纳粹化：

- 摧毁哈尔科夫、马立波、敖德萨等城市的「志愿营队」，或使其中立，以及摧毁这些地方的军事设施。

二、去军事化

俄罗斯的进攻，以非常「古典的」方式推动。起初－如同 1967 年以色列的前例－就是在最初几小时内，摧毁乌国停留在地面的空军。接着，根据「水流」原则，俄军沿着多个轴线同时推进：那个地方抵抗弱就先进驻，放着城市（若要用部队拿下，那可是高难度）稍候再说。在北方，**车诺保（Chernobyl）** 电厂很快就落入俄军手中，这是为了防止破坏。乌克兰与俄罗斯军士携手一起保护电厂的画面，当然不会出现。

俄罗斯想要接管首都基辅、想要消灭泽伦斯基，典型是来自西方的说法。但是，普亭从来没有想要射杀或推翻泽伦斯基。俄罗斯反而是希望他继续掌权，以包围基辅作为手段，将他推向谈判桌。**俄罗斯要的是乌克兰中立化。**

西方有很多评论家倍感惊讶，俄罗斯人不舍协商解决之途，却又同时推进军事运作。答案就在俄罗斯的战略容貌，从苏联时代就是这样。若在西方，政治手段结束才是战争的开始。然而，俄罗斯的路线来自克劳塞维兹的（Clausewitzian）启发：战争是政治手段的延续，从此端到彼端，自然可以顺畅流动，即便仍然在交战中。这可以让我方施加压力于敌方，将渠推向协商。

从实际的运作层面看，俄罗斯的进攻是示范，展现了事前的行动与计划：在六天内，俄罗斯拿下了面积与英国等大的领域，**推进的速度比纳粹军队在 1940 年达到的水平，来得要快。**⁴

⁴ 譯註：作者此處指俄羅斯的軍事思維與西方不同，能速戰則速戰，不能則緩慢推進。英語及台灣出版品則絕大多數指陳俄羅斯挫敗。與本文看法相同者，譯者僅看到兩篇，一是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理事長李黎明（2022 年 5 月 3），二是新加坡智庫人員指越南軍事戰略專家亦持該看法（Ha & Luong, 2022, May 13）。支持聯合國 2022 年 3 月 2 日譴責俄羅斯要求撤兵有 141 國、35 國棄權，僅 5 國反對。但支持美歐制裁俄羅斯的國家少了很多，北美歐洲紐澳之外，亞洲僅有台日韓新等國，中印巴西印尼等等非洲中南美洲與亞洲百餘國，並沒有響應，原因可能是戰略與經濟考量、殖民歷史記憶，以及認定俄羅斯入侵當譴責，但北約而特別是美國不是沒有責任...等等。在這些地方，是否存在與本文作者相同的見解，另得探詢。不過，在西方主流新聞指俄羅斯損失慘重而烏克蘭勝利的報導聲中，最慢從 5 月 19 日起，似乎出現新的形態，當天《紐約時報》社論罕見地質疑美國的烏克蘭戰略，〈烏克蘭戰爭日見複雜，美國尚未完成準備〉，三日後紐時再使刊登於紙版（Editorial Board, 2022, May 19）。

乌克兰大量军队部署在国境之南，准备要在东巴斯区遭遇俄军。出于这个原因，俄罗斯军队从三月一开始，就能圈住「斧头状」(cauldron) 这块区域，亦即斯拉夫扬斯克 (Slavyansk)、克拉马托尔斯克 (Kramatorsk) 以及北顿涅斯克 (Severodonetsk) 之间的地带，在东边，俄军通过哈尔科夫，在南边则从克里米亚推进。同时，来自卢甘斯克与顿内茨克这两个共和国的军力，是对俄罗斯的补充，这是来自东边的另一股推进力量。

到了这个阶段，俄罗斯军力放慢了脚步，开始紧缩袋口，**但已经没有任何时间压力或进度时程**。他们的去军事化目标差不多都已经完成，**仅存的乌克兰军队再也没有操作与战略的指挥结构**。

那些在媒体现身的「专家」则认为，俄军「慢了下来」是因为后勤作业不良，但这其实是俄人已经达成其目标的结果。俄军无意占领整个乌克兰领土。就实情论断，**俄罗斯人似乎是要试着限缩，只是前进至该国的语言区边境**。

在我们这边的媒体，说的是俄军轰炸平民区，不分青红皂白，特别是在哈尔科夫，看了就让人惊恐的照片影像大肆传送。然而，有位拉丁美洲特派员力拉 (Gonzalo Lira) 住在那里，他提供的描述是在 3 月 10 日与 11 日，城市是平静的。⁵在这个大城市，我们所见不是所有的现场，这是真的——

一週後，《華盛頓郵報》指〈烏克蘭志願軍在東部有被遺棄的感覺〉，因為僅能日食馬鈴薯，躲在壕溝只有輕武器，外頭是俄羅斯砲火猛烈 (Raghavan, 2022, May 26)。紐時外稿專欄的評論員在 31 日更說〈烏克蘭戰爭發展至此，美國難辭其咎〉 (Caldwell, 2022, May 31)。《經濟學人》至 6 月上旬都未曾出現類似質疑，反而說烏克蘭「被低估了」；「烏克蘭的士氣還是樂觀」，若讓步而俄羅斯取勝，「遲早就會誘惑（俄羅斯）對烏克蘭再咬第三次，或咬其他地方如喬治亞，摩爾多瓦，或甚至波羅的海的一個國家」；若烏克蘭割地求和，未來發生核武戰爭的機會就增加 (Economist 2022, May 21, 28; June 4)。以輸贏說戰爭，未能投入更多努力兼顧和平與正義，不智且殘忍。李特 (Ritter, 2022, June 25) 則考察雙方軍火數量與戰術的數字與分析多方說法，指俄羅斯贏定了，認為醜陋的和平仍是減少傷亡的出路。

⁵ 譯註：力拉是智利裔美國人，4 月 15 日被烏克蘭 SBU 押走，失蹤七日後再次出現（新聞也傳到了玻利維亞中西部、第三大城市哥查班巴 (Cochabamba) 由工會擁有及經營的收音機電台 Radio Kawsachun Coca。該台在 2007 年創辦，2019 年 5 月再創 Kawsachun News 英語新聞網，它在 2022 年 4 月 21 日發佈新聞，並引述智利 CNN 報導，指智利外交部聯絡了烏克蘭相關單位。該則新聞並發佈力拉在 3 月 26 日以手機發佈在推特的圖文，上面寫著「你想知道澤倫斯基政權治下的烏克蘭嗎？用谷歌

但力拉在当地的现身说法，似乎显示我们不断从电视屏幕得到的总体战争印象，并不准确。至于东巴斯两个共和国的人，他们已经「解放了」他们自己的领土，已经在马力波进行城市作战。

三、去纳粹化

在哈尔科夫、马立波与敖德萨这些城市，乌克兰的防务是由准军事民兵负责，**他们知道「去纳粹化」主要就是针对他们**。对于攻击这些都会地区的军队来说，平民会是问题。俄罗斯人寻求建立人道走廊，要让这些城市的平民离开，仅让民兵在内，与他们交战就容易得多。

反之，**这些乌克兰民兵则试着要让平民留在市区，不是要让他们撤退，目的是劝阻俄罗斯军队不要在这里开战**。这就是他们不愿意执行人道走廊协议的原因，他们尽其所能，就是要确保俄罗斯人的这些努力无法成功——他们使用大量市民当作「人肉盾牌」。**很多影像显示平民想要离开马立波，却遭亚速营的战斗人员殴打，当然，西方媒体老早就仔细地把这些影像检查过了。**⁶

脸书原本将亚速营与伊斯兰国（ISIS）列入相同的一类，都要接受该平台「对危险的个人与组织之政策」限制。因此，这类来源假使「上传」美化其活动的内容，会遭系统性作法予以拒斥。但是，脸书在 2 月 24 日改变这个政策，容许上传有利于亚速营民兵的内容。与此作法相同，到了三月，脸书授权前东欧国家若有人上传内容，要人谋杀俄罗斯军人与其领导人，是可以的。⁷激励、鼓舞我们的价值，原来就只是这样。

搜索下列名字。」然後列出當時已經失蹤多日的八位記者名字，該圖文最後說：「假使你在 12 小時或更長時間沒有看到我的推文，請將我的名字放入前面這個名單。GL」（Kawsachun News 2022, April 20, 22）

⁶ 譯註：《華盛頓郵報》批評俄羅斯殺害平民，不過，該報也刊登一篇烏克蘭在平民區部署防務的新聞（Raghavan, 2022, March 28）。兩日後，洪毅（2022 年 3 月 31 日）的編譯納入這則報導，指〈美媒批烏克蘭於居民區布防〉，致使「俄軍轟炸砲擊烏克蘭城市，讓俄國面臨蓄意攻擊平民、違反戰爭罪等指控。美媒批烏克蘭於居民區布防俄軍轟炸砲擊烏克蘭城市，讓俄國面臨蓄意攻擊平民、違反戰爭罪等指控。」

⁷ 譯按：臉書這個雙重標準，引發批評（如 Biddle 2022, April 14）。

我们的媒体广传一种浪漫的形象，显示乌克兰人民大力抵抗。这个形象引导欧盟提供金援买武器送入乌克兰群众。**我曾经担任联合国维和队伍的指挥，负责保护平民。我们的理解是，平民遭到暴力对待，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境下，才会出现。特别是武器充斥，却没有指挥系统**（译按：予以分配及管理）。

这些指挥系统才能确保军火的本质：他们的功能是将军火引导至特定的目标。**若以随机方式武装民众（这是目前的状态），欧盟是把民众变成战斗员，这就造成重大效应，会使民众变成潜在的遭攻击目标。**还有，没有指挥系统、欠缺操作目标，军火的分配无可避免地，有人会拿来算旧帐，也会流落至帮派盗匪手中，这些会是更致命的事情。战争变成是多种情绪的宣泄。武力变成暴力。在利比亚的塔瓦加（Tawarga），从2011年8月11至13日，有三万非洲黑人被屠杀，武器就是从法国（非法）空投过来的。⁸还有，（译按：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the British Roy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RUSI）的研究已经指出，送武器进入乌克兰并不会增加任何价值。

再者，运送武器至交战国，会遭另一方认定是好战份子，也就让自己陷入危险。俄罗斯在警告运送武器将被视为敌意目标后，2022年3月13日就对尼古拉耶夫（Mykolayev）的空军基地展开空袭。

纳粹德国在柏林战役的最后时刻，历经灾难，欧盟正在重复这个经验。战争必须让军人肩负，一旦战败，就得承认。假使还要抵抗，必须要有领导也要纳入结构。但是，我们现在的作为刚好正相反——我们正把平民推在前

⁸译按：戰爭武器下落不明、無法掌握的新聞，時有報導，如《紐約時報》長篇文章追蹤，指美國入侵阿富汗（2001）、伊拉克（2003）以來，十多年累計發出145萬件軍火（槍枝與機關槍...等等），但僅75萬件可以核實，消失者「數以十萬計」（Chivers 2016, August 24）。在烏克蘭戰事，張佑生（2022年4月21日）的編譯指出，〈缺乏核實 美軍援去向不明（美在烏缺乏部隊 軍援下落難追蹤 對烏要求只能照單全收）〉，「美國提供的軍備主要經由波蘭運入烏克蘭，至於如何使用和在何處使用，都由烏克蘭自己決定。」在美國參眾兩院以絕對多數，於2022年5月10日通過400億美元軍援烏克蘭之後，反對該案的共和黨眾議員二十多位發表公開信，要求總統拜登注意武器流向，因2017年的調查顯示，2013至2015年間，美國送達的30萬小型軍火在烏克蘭消失，僅找回13%，烏克蘭情治單位在2019年發現軍人販售手榴彈...等等軍火（Greenwald, 2022, May 23）。

面并战斗，与此同时，脸书授权让人在其平台呼吁谋害俄罗斯军人与领导人。激励、鼓舞我们的价值，原来就只是这样。

在有些情报人员眼中，这个不负责任的决定，是用乌克兰人当作炮灰与普亭的俄罗斯作战。比较好的方法是进入协商，因此也就确保平民百姓的安全，不是火上加油。用别人的血作战，历来容易。

四、马立波的妇产科医院

在说明之前，重要的提醒是，防卫马立波的行伍，并非乌克兰正规军队，是亚速营民兵，其中并有外籍佣兵。

纽约的「俄罗斯联合国领事馆」在 2022 年 3 月 7 日总结情势，这样陈述：「住宅区报告指乌克兰军方驱逐马立波市立婴儿第一医院，然后在医院内部设置战斗点。」3 月 8 日俄罗斯的独立媒体 Lenta.ru 刊登了马立波民众的证词，表示亚速营民兵团已经接管这家妇幼医院，他们以其武器威胁市民，驱离这些原先在医院的民众。这些陈述证实了俄罗斯大使几小时前的陈述。

9

这家马立波医院占有一个优势，亦即在此装置反坦克武器并观察动静，再好不过。俄罗斯军队在 3 月 9 日摧毁医院。根据 CNN 报导，有 17 人受伤，但影像没有显示建筑物内有人受到伤害，也并没有证据指认受害者与这次攻击有关。新闻是说到了儿童，但事实上，什么都没有。虽然有这些事实，但没有阻却欧盟领导人将这件事，说成是「战争罪」。这也让泽伦斯基有了底气，呼吁要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航区。

真确地说，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但若将事件连串排列，可以

⁹ 譯按：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本文作者說的 Lenta.ru，可能沒有那麼獨立。該網媒在俄羅斯很受歡迎，但 2014 年解雇 30 多位記者後被指為親官方，2020 年則由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蒐購，2022 年 4 月 21 日查閱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nta.ru>。不過，也有人提醒，在地緣政治事件，維基的記錄與解釋常有爭議，甚至已達「我們來告訴你怎麼思考」的地步」（Cole, 2021）。Lenta.ru 的前述性質，使作者的引述可信度，可能會打折扣，但美國調查記者 Blumenthal（2022, March 18）引述更多的消息來源，倒是同樣證實本文的說法。

发现比较可能的进展，是俄罗斯军队攻击了亚速营的所在，并且，妇幼医院当时没有平民。

问题在于，马立波等城市的守军，也就是准军事民兵得到国际小区的鼓励，也就不遵守战争的规则。似乎，乌克兰人已经再次演出 1990 年科威特妇幼医院的场景。当时，伟达公关顾问公司（Hill & Knowlton，译按：1927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创办）承包了（译按：科威特政府的）1070 万美元的项目，策划了整个事件，¹⁰目的也是要让联合国安理会相信，然后通过决议，于是有了「沙漠之盾行动」（Operation Desert Shield/Storm）介入伊拉克。¹¹

乌克兰东巴斯地区的平民遭受攻击八年，西方政治人物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制裁乌克兰政府。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进入一种动态关系，西方政治圈在这个变化中，牺牲了国际法，就只为了达成他们弱化俄罗斯的目标。

参、第三步：结论

我是退休的情报专业人员，震惊的第一件事，在于西方情报服务完全缺席，没有正确呈现过去一年的情势。真相似乎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情报服务，无不臣服于政治人。问题在于，那捏政策的人是政治人——**举世最优秀的情报服务也会无用武之处，假使决策者无意倾听。在这场危机，应运而生的场面，就是这样。**

是这样的局面，很多情报服务是有非常准确与理性的局势分析，另有一些情报服务提供的图像，则与我们的传媒所做的宣传，一模一样。问题在这里出现，依据经验，我发现后面这类情报的分析水平，相当低劣——他们黏

¹⁰ 這起醜聞的較記載與剖析，參見 Stauber & Rampton (2002, pp.167-175)，該段文字亦可在下列網址讀到 <https://www.prwatch.org/books/tsigfy10.html>。該書有白舜羽、劉粹倫 (2011) 中譯本。另可參見 Fingrut (1993)，以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tizens_for_a_Free_Kuwait。該事件是科威特人的造假，但美國政府造假求戰，例子同樣不少，最大宗有二，一是 1964 年 8 月 4 日宣稱北越非法在公海攻擊美國艦艇，這就為次年美國升高越戰製造了藉口 (Herman & Chomsky, 1988/沈聿德譯，2021, 頁 268-272)；二是 2003 年謊稱伊拉克擁有大量毀滅武器而入侵 (見譯註 11)。

¹¹ 該次戰爭的局部紀錄，參見成令方編 (1991)。

住了教条，欠缺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独立执守，也就无从提出具有军事「质量」的评估。¹²

第二，有些欧洲国家的政治人在响应局势时，似乎刻意拥抱意识形态。这次危机从一开始就很不理性，原因在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在这场危机，所有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文件，来自商业来源而由政治人提出。

卡西的评论：情报服务业已受制于「负面筛选」的过程，意识形态在此比客观原则更受采用，随之就出现病态现象，一旦这些现象积累到了一个门坎，各个国家机关之内就进入人以群分的逻辑，同类人可能就会逐渐布满于整个政体。至此，民主就病态横生，开始自我毁灭。

有些西方政治人显然想要看到冲突的出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攻击剧目，是专为他工作的「老虎团队」想象出来的产物——他的作法与（前国防部长）伦斯斐（Donald Rumsfeld）如出一辙，他在 2002 年也「绕开」CIA 及其他情报服务机构，情治人员对伊拉克是不是有大量化学武器，并没有那么肯定。¹³

今日我们还在目睹的戏剧化发展，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但拒绝去看：

- 战略层次：北约的扩张；
- 政治层次：西方拒绝执行明斯克协议；
- 运作层次：过去几年来，东巴斯地区的民众持续遭受反复攻击，且在 2022 年 2

¹²政治考量凌駕外交專業與情報分析在美國的情況是，2008 至 2016 年核心外交經費減少近四分之一，外交任命的專業減弱，以捐款等考量任命駐外大使，比例至川普年代增加至 43%。職業外交官晉升助理部長以上的比例，從 1975 年的 60% 減少至 30%（Economist, 2020, August 15）。美國聯邦層級的多種情報工作，年薪少於民間 2-5 萬美元或更多，批川普的人指他任總統四年，重創美國情報單位的「名聲」，（Economist, 2018, March 3; 2020, December 5）但將問題都導向川普，顯非全豹。

¹³ 2003 年 3 月 19 日，美國以伊拉克有「大量毀滅武器」為由，在沒有聯合國授權但英國支持下，出兵入侵伊拉克。事後證實沒有這些武器，次年，《紐約時報》在十版（The Editor, 2004）、《華盛頓郵報》（Kurtz, 2004）在頭版先後撰文，正式為自己沒有查證而接受政府說法並助長戰爭道歉。布朗大學的「戰爭的成本」研究項目說，「無人能夠確認多少人在美軍入侵後，多少人死亡。不過，我們知道直接死於戰爭暴力有關的平民人數...至 2019 年 10 月是 18.4382 至 20.7156 萬人」，不含美軍或伊拉克軍警及記者、NGO.....等人數（Brown University, 2021）。

月下旬急遽增加。

换句话说，我们扼腕并且谴责俄罗斯的攻击，这自然是会的。但是，我们（那就是指美国、法国与欧盟）却创造了导致冲突爆发的多种情境。我们对乌克兰人民及逃离的两百万难民（译按：至 3 月），感同身受。这些都很对。但是，八年来，因为他们自己的政府之屠杀而逃离东巴斯地区的相同人数之乌克兰人民，假使我们能够也有一点同理心，现在的这些灾难的任何一样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东巴斯地区的人遭受的苦难是不是可以用「种族灭绝」(genocide)，可以任人讨论。这个词通常是用来指涉更大规模的案例（比如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Holocaust 等等）。但是，假使援用这个词在《种族灭绝公约》(the Genocide Convention) 的定义，以其宽松的界说，可能就算是了。

这场冲突很显然让我们歇斯底里。多式多种的制裁似乎已经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偏好工具。假使我们早已坚持乌克兰遵守明斯克协议，这个冲突就无从发生，这个协议可正是我们（译按：欧洲人）参与协议并且背书。对普亭的谴责也是对我们的谴责。事后的抱怨于事无补——我们早就应该采取行动。然而，马克宏（法国总统，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总理苏兹（Olaf Scholz）或者泽伦斯基，没有一人尊重并信守他们的承诺。这就造成一种结果，真正的输家，是没有声音的人。

欧盟过去没有能够提振明斯克协议的执行——刚好相反，乌克兰东巴斯地区的平民遭到自己的政府轰炸时，欧盟并没有反应。假使欧盟对此已有反应，普亭就没有必要反应。没有在外交层面现身，欧盟凸显自己身份的方式，反而是火上加油。乌克兰政府在 2 月 27 日已经同意与俄罗斯协商。但几个小时后，欧盟投票同意以 4.5 亿欧元的预算，购买军火送达乌克兰，这就是火上加油了。这个时刻开始，乌克兰人觉得他们没有必要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亚速营民兵在马立波的存在，甚至还让欧盟加码，增加 5 亿欧元的武器支持。

在西方政府的祝福下，乌克兰人内部赞成协商的人已经被拔除得一乾二净。这就是发生在基里耶夫（Denis Kireyev）身上的事，这位乌克兰谈判代表之一在 3 月 5 日被乌克兰 SBU 暗杀，因为他对俄罗斯太友善，被认定是

叛徒。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德米延克 (Dmitry Demyanenko) 身上, 他是 SBU 基辅市及其地区主要区域的副首长, 也因为太过赞成与俄罗斯协议, 在 3 月 10 日也遭暗杀——动手的人, 来自号称「和平使者」(Mirotvorets) 的民兵集团。与「和平使者」有关的民兵, 其网站列举了「乌克兰之敌」, 张贴了他们个人资料、住址与电话号码, 要让任何人可以骚扰或甚至消灭他们, 这个作为在很多国家都构成犯罪, 会遭处罚, 但在乌克兰, 政府并不追究。联合国与有些欧洲国家是提出关闭这个网站的要求——但是乌克兰的「拉达」(the Rada), 也就是国会, 予以拒绝。

结局会是代价很高, 但普亭可能会达成他所设定的目标。我们已经将普亭推向中国, 他与北京的连结会强化。中国正在以这场冲突的中介者身份出现。美国人开始接触委内瑞拉与伊朗人, 想要走出他们自己弄出来的能源僵局——美国必须低声下气地撤回对其敌人的制裁。

有些西方政府的部会首长想要让俄罗斯经济崩盘, 要让俄罗斯人受苦, 或甚至呼吁要暗杀普亭, 这就显示(即便他们已经局部翻转了他们言词的形式, 但实质意思没有改变!) 我们的领导阶层, 比起我们所憎恨的人, 没有来得更高明——制裁残障奥运会的俄罗斯选手或者俄罗斯艺文人员, 这与对普亭的战斗, 一点关系也没有。

相较于我们在伊拉克、阿富汗或利比亚的作为, 乌克兰冲突在哪些地方需要让人更给予谴责? 对于那些对国际小区刻意说谎, 就只是为了要发动不正义的、没有正当性的, 也残杀人们的战争, 我们采取了哪些制裁手段? 对于那些供应武器给也门冲突的企业、政治人或国家, 我们可曾采取任何一种制裁? 世有公论, 以也门战争为「最糟糕的人道灾难」。

参考书目

白舜羽、刘粹伦译 (2011)。《有毒污泥爱你好：揭开黑心公关的秘密档案》。台北：红桌文化。(原书 Stauber, J., & Rampton, S.(2002). *Toxic sludge is good for you: Lies, damn lies and the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 Common

- Courage Press.)
- 成令方编 (1991)。《战争·文化·国家机器》。台北：唐山。
- 李黎明 (2022 年 5 月 3 日)。〈西方不解的俄罗斯战略〉，《联合报》，A13。
- 洪毅 (编译) (2022 年 3 月 31 日)。〈美媒批乌克兰于居民区布防〉，《联合报》，A8。
- 沈聿德译 (2021)。《制造共识：媒体政治经济学》。台北：野人文化。(原书：Herman, E. S.,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Pantheon.)
- 张佑生 (编译) (2022 年 4 月 21 日)。〈缺乏核实 美军援去向不明〉，《联合报》，A10。
- 陈韵涵、李京伦 (编译) (2022 年 4 月 4 日)。〈俄军一边撤离基辅 一边埋地雷〉。《联合报》，A8。
- 赵竹成 (2022 年 3 月 1 日)。〈明斯克协议 谁出卖乌克兰?〉。《联合报》，A10。
- 潘勋、李京伦 (编译) (2022 年 4 月 5 日)。〈400 平民遭屠 欧美吁加强制裁俄〉，《联合报》，A8。
- Biddle, S. (2022, April 14). *Facebook's Ukraine-Russia moderation rules prompt cries of double standard*. From <https://theintercept.com/2022/04/13/facebook-ukraine-russia-moderation-double-standard/>
- Blumenthal, M. (2022, March 18). *Was bombing of Mariupol theater staged by Ukrainian Azov extremists to trigger NATO intervention?*. From <https://thegrayzone.com/2022/03/18/bombing-mariupol-theater-ukrainian-azov-nato-intervention/>
- Brown University (2021). *Cost of war: Iraqi civilians*. From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costs/human/civilians/iraqi>
- Chivers, C. J. (2016, August 24). *How many guns did the U.S. lose track of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Hundreds of thousands*.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6/08/23/magazine/how-many-guns-did-the-us-lose-track-of-in-iraq-and-afghanistan-hundreds-of-thousands.html>
- Caldwell, C. (2022, May 31). *The war in Ukraine may be impossible to stop. And the U.S. deserves much of the blame*.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31/opinion/us-ukraine-putin-war.html>
(本文两日后有中文译版〈乌克兰战争发展至此，美国难辞其咎〉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20602/us-ukraine-putin-war/zh-hant/>)
- Cole, T. J. (2021). *We'll tell you what to think: Wikipedia, propaganda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consensus*.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 Economist (2018, March 3). *Spooks for hire*. p.31.
- Economist (2020, August 15). *America's State Department: the dereliction of diplomacy*. pp.48-50.
- Economist (2020, December 5). *Shadow business*. p.39.
- Economist (2022, May 21). *Ukraine: the relief of Kharkiv*. pp.47-48.

- Economist (2022,May 28). Ukraine: don't stop now. pp.8-9.
- Economist (2022,June 4)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pp.15-17.
- Editorial Board (2022,May 19). The war in Ukraine is getting complicated, and America isn't ready.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19/opinion/america-ukraine-war-support.html>
- Editor (2004). From the editors: The Times and Iraq'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6, Section A, p.10.
- Fingrut, D. (1993). Operation desert storm: Outright disinformation scheme. Retrieved 2022, April 21, from <https://msuweb.montclair.edu/~furr/Vietnam/gulf-war-fingrut.html>, 由 Grover Furr 在 1999 补充与说明。
- Greenwald, G.(2022,May 23). *Twenty-Two House Republicans Demand Accountability on Biden's \$40B War Spending*, <https://scheerpost.com/2022/05/23/greenwald-twenty-two-house-republicans-demand-accountability-on-bidens-40b-war-spending/>
- Hedges, C. (2022,April 18). Hedges: American Commissars, 2022,4 19 读取自 <https://scheerpost.com/2022/04/18/hedges-american-commissars/>
- Human Rights Watch (2022,April 21). Ukraine: Russian Forces' Trail of Death in Bucha.From <https://www.hrw.org/news/2022/04/21/ukraine-russian-forces-trail-death-bucha>
- Kawsachun News(2022, April 20). Chilean and US authorities silent on Gonzalo Lira.From <https://kawsachunnews.com/chilean-and-us-authorities-silent-on-gonzalo-lira>
- Kawsachun News(2022,April 22). Chilean Gonzalo Lira was taken by SBU, says he's "OK". From <https://kawsachunnews.com/chilean-gonzalo-lira-was-taken-by-sbu-says-hes-ok>
- Krishnankutty, P. (2022,May 12). Under fire for praising Trump's Ukraine stance, Noam Chomsky says US ex-president 'not the issue', the Print. From <https://theprint.in/world/under-fire-for-praising-trumps-ukraine-stance-noam-chomsky-says-us-ex-president-not-the-issue/951672/>
- Kurtz , H. (2004). The post on WMDs: An inside story.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2, Front page.
- Lieven, A. (2021, November 15).Ukraine: The most dangerous problem in the world but there's already a solution. *the Nation*.From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orld/ukraine-donbas-russia-conflict/>
- McCoy, A.(2022,April 19). How to end the war in Ukraine: A solution beyond Sanctions. From <https://tomdispatch.com/how-to-end-the-war-in-ukraine/> , 次(20)日转载于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2/04/20/how-to-end-the-war-in-ukraine-a-solution-beyond-sanctions/>
- Raghavan, S.(2022,March 28). Russia has killed civilians in Ukraine. Kyiv's

- defense tactics add to the danger.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3/28/ukraine-kyiv-russia-civilians/>
- Raghavan, S. (2022, May 26). Ukrainian volunteer fighters in the east feel abandon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5/26/ukraine-frontline-russia-military-severodonetsk/>
- Ritter, S. (2022, June 25). The fantasy of fanaticism. From
<https://consortiumnews.com/2022/06/25/scott-ritter-the-fantasy-of-fanaticism/>
- Stauber, J., & Rampton, S. (2002). Toxic sludge is good for you: Lies, damn lies and the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 (pp. 167-175). Common Courage Press. Chapter 10. From <https://www.prwatch.org/books/tsigfy10.html>.
- Veira-Ramos, A., & Liubyva, T. (2020). Ukrainian identities in transformation. In A. Veira-Ramos, T. Liubyva & E. Golovakha (Ed.). *Ukraine in Transformation: From Soviet Republic to European Society* (pp. 203-228). Palgrave Macmillan.

不实信息、广场事件与战争责任： 理解乌克兰

冯建三*

本文引用格式

冯建三 (2022)。〈不实信息、广场事件与战争责任：理解乌克兰〉，《传播、文化与政治》，15:161-201。

投稿日期：2022 年 4 月 5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 作者冯建三为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e-mail: jsfeng@nccu.edu.tw。卢倩仪、傅大为、郭力昕...等等朋友提供部分数据，在此致谢。

《摘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相互指控，宣称对方的新闻传播不实。通过「布查镇」屠杀疑云，本文具体呈现双方提出的「事实」或质疑之后，进入「广场事件」真相的探讨。乌克兰首都基辅在 2013 年底爆发示威抗议，原本和平，2014 年初转暴力，近百人遇害后，政府垮台，爆发内战，八年后有今日战争。本文评估美国、乌克兰极右派在俄入侵过程的可能角色。根据这些文献探勘，作者同意乌裔加拿大学者的「广场」分析，是有特定力量刻意转和平示威为血腥事件，这是俄乌爆发战争的重要远因之一。有了这些理解作为基础，佐以其他事实与分析，作者最后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责任归属，提出看法。

关键词：不实信息、俄乌战争、乌克兰极右派、广场事件、战争责任

壹、前言

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强化对其海内外新闻的管制；同时，谷歌与脸书也将俄罗斯传媒的各种内容下架，欧盟稍晚发布禁令之后，推特跟进。接着，西方不满对岸平台（比如，抖音），成为「普亭战争的宣传工具」（White, 2022, March 11），同时，「中媒买脸书广告 帮俄洗白」（张沛元编译，2022 年 3 月 11 日）等新闻，也陆续传出，然后是「大翻译运动」是反映或抹黑中国大陆的争论登场。（陈君硕 2022 年 3 月 14 日；陈成良编译，2022 年 3 月 14 日）《经济学人》另有报导，指俄罗斯搜集挺西方、反战的文艺人员、记者与演员作家等等，说他们是叛徒并且将其名单上网公告（Economist, 2022, March 19）。独立记者则报导乌克兰在开战前七、八年，已在查禁政党、搜集「不够爱国」份子的名单，同样也是上网，差别是，已有人遇害（Blumental and Krishnaswamy, 2022, April 17）。

再看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女编辑奥斯雅尼可娃（Marina Ovsyannikova）在晚间新闻播报时，突然现身主播后面高举反战标语，画面传遍全球。不过，在受罚约合台币八千元后，她已获释、多次受访，并拒绝出国，仅在过了两周，传出她已接受德国斯普林格传媒集团（Axel Springer）邀请，成为自由撰稿人。（庄蕙嘉编译 2022 年 3 月 27 日；经济日报，2022 年 4 月 13 日）这位女编辑的故事似又显示，俄罗斯战争期间的言论与新闻管制，尚存迂回空间。战前，则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莫斯科特派员魏尔强调，「尽管西方有预存立场，老是指俄罗斯媒体如同往日的苏维埃傀儡，但实际上俄罗斯的新闻图像相当多样。」当俄罗斯以管制假新闻为由，颁行系列新法时，莫斯科传媒的反应是群起抨击政府（Weir, 2018, February 6; 2019, March 20）。这个评价得到《经济学人》的反向证实，开战后，该刊先前的俄罗斯是「相对开放的威权」（Economist, 2022, May 21b）。

回到西方对俄罗斯不实信息的管制。美国国务院在 2022 年 4 月成立「不实信息治理局」（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使得建制刊物很快有了忧虑，担心行政权力成为黑手，箝制表意空间（Saul, 2022, May 5; Golinkin, 2022, May 12; Allsop, 2022, May 20）。另类媒体则已经有了实质的困扰或伤

害，比如，无法收到捐款、遭人抹黑、被算法过滤与删除特定内容...等等 (Laurin, 2022, June 9)。此外，十余位国防与情治机构离退人员联名称赞脸书、谷歌、推特，指它们具有强大中央化信息流通的检查能力，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Greenwald, 2022, April 21)。在英国，竟有丑闻爆出，知名记者马森 (Paul Mason) 与外交部联手对付他们认定的不实信息，手法包括评估可否绕过英国诽谤法，有效抹黑特定对象，如「解密英国」(Declassified UK) 网站 (Klarenberg, 2022, June 13)。

貳、不实信息：布查镇民遇害事件的争论

在这些真实与虚假信息与新闻的争论中，引发更大争论的第一起事件，是布查 (Bucha) 镇民遇害及其消息的真伪虚实。

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土耳其和平协商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乌克兰当地时间 2022 年 3 月 30 日，俄军撤离基辅北方数十公里，人口 3 万余的布查镇。五天后台湾外电开始报导，指该镇「尸体横陈，二百八十名...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军在当地处决平民...俄国国防部则称这是假讯息...」(陈韵涵、李京伦, 2022 年 4 月 4 日) 次日死亡数字增加至四百以上, 过了 40 多天, BBC (2022, May 16) 的报导以说遇害者达一千人。

乌克兰控诉这是「种族灭绝」，俄罗斯则「反咬抹黑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潘勋、李京伦, 2022 年 4 月 5 日)。六日外电报导则称〈俄称屠杀造假 美媒卫星图作证〉, 指「纽约时报检视卫星空照图, 发现 3 月上旬俄军占领期间布查街头就已出现这些平民遗体, 推翻俄国的造假说法。」同日, 另一家报纸以更显著的图文指「布查街头尸横遍野」、「...美国马萨利科技公司 3 月 19 日和 21 日布查空拍照片清楚显示显示...已有多具尸体...纽约时报...3 月 9 日至 11 日的卫星照片...已出现与人类尸体类的..的黑色物体, 戳破俄...反控乌方『假造』...的说词。」(自由时报, 2022 年 4 月 6 日)

不过,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冲突研究的副博士、比利时 HOWEST 大学研究员麦坎 (McCann, 2022, April 4) 发现, 4 月 2 日《纽约时报》已从布查镇发布长篇新闻, 仅说首批进入的乌克兰兵士是亚速营的人, 是看到了死尸, 但未提大屠杀。但就在「乌克兰全国及国际传媒注意到有大屠杀消息的前几

小时」，美国与欧盟赞助的研究单位网站宣布，「特种兵已经开始在布查镇展开清除行动」，然后，顷刻间屠杀的图片开始传遍全球；并且，维基百科的「布查镇屠杀」(Bucha Massacre) 条目在一天内就完成撰写！前《华尔街日报》与《波士顿环球报》及《周日泰晤士报》调查记者，也曾经担任《纽约时报》特约撰述 19 年的劳力亚 (Lauria, 2022, April 4)，在他主编的《联盟新闻》(创办于 1995 年) 提出另一种疑问，表示纽时所报导的卫星照片得通过「无偏私的调查，才能确认可否作为证据」。

德国之音指「对假新闻作战」(War On Fakes) 是俄罗斯散播不实信息的网站，(DW, n.d.) 但该网站逐日从 3 月 30 日起记载布查镇的大事，符合麦坎的发现：(一) 镇长 31 日讲话时还很快乐，若有惨事，应该不会有此反应。首批进入布查镇的乌克兰国民兵播放战斗人员拍摄的视频，显示军队平静穿过大街小巷，没有「堆积如山的尸体」。乌克兰警方在 4 月 2 日发布布查镇报告，没有隔日开始出现的尸体之消息与照片。《纽约时报》指极右派亚速营民兵在 4 月 1 日与 2 日已经进入布查镇，而西方传媒开始大肆报导惨杀事情起于 4 月 3 日；在此之前，任何类似的指控，并不存在。(二) 在俄罗斯异端创办、保密优于脸书与推特等平台的「电报频道」(The Telegram Channel)，俄罗斯专门聚合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新闻的 Intel Slava Z 从俄军入侵开始，就详细跟随俄军记录，显示俄罗斯到的城市，很多居民都带着白绷带以示没有参与战斗，而乌克兰公布的尸首大多都带着这些白色绷带 (Orinoco Tribune, 2022, April 5)。

对于很多死者手臂有白绷带一事，李特 (Scott Ritter) 这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曾在联合国负责执行军备控制任务及武器检查，并以美国入侵前就再三告诫伊拉克并无大量毁灭武器而有名声的人，另有补充 (Flowers & Lombardo, 2022, April 8)。他指出，在作战时，平民与战斗员死伤经常是 1: 1，但在乌克兰是 1: 7，平民遇害比较少。原因是俄罗斯人进入市区后，与平民维持物资交换关系，并无或少有敌对。俄军离开后，反而惨事发生。这是因为，乌克兰政府先前有令，与敌人合作就得处罚。是有影片反复播放，显示乌克兰警方说，4 月 1 日将有「清除行动，消灭合作者」，并且有资深政治人物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警示居民不要外出，因清除工作

即将执行。更可议的是，执行杀害合作者的亚速营，为此还取了个名字「狩猎单位」(Safari unit)！卫星照片说3月19日就有尸体横陈，但李特提醒，在华氏50-60度（按：约摄氏10-20度C）十多天，尸首会是腐败血肿的可怕模样；不过，墨西哥记者在4月2日获准入内，他拍摄的影像，尸身显得遇害未久(fresh)。李特认为，遇害者是在4月1日(含)以后被杀的。美国共和党籍参军31年的上校、后出任参议员的布雷克(Black, 2022, April 27)也以丰富的军旅及战场经验提出质疑，认为俄军未曾猛烈攻击，是要争取民心，并没有动机作此犯行。

李特提出前述分析之后，他的4千推特跟户很快增加到1.4万。推特将他停权两次。第一次停权时，跟户已有6万，第二次被停权之前，将近10万。他认为这是算法侦测其言词，自动予以停权。他说，对于乌克兰，他的熟悉程度不如他对伊拉克的了解，但基于多年的训练及资料分析，他仍自信这些分析更接近真实。

BBC收音机第四频道(Radio 4)在5月31日制播36分钟的〈乌克兰：不实信息的战争〉，两日后上网供下载(BBC, 2022, June 2)。这个节目的前十余分钟以布查镇杀戮作为例子，批评史罗斯伯格博士，认为「有些学者、记者与名人...质疑西方政府对战争的叙述，却助长了俄罗斯的不实宣传。」BBC没有在节目中讨论李特等人提出的质疑。史罗斯伯格是英国「传媒改革联盟」(Media Reform Coalition)前任理事长，同时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新闻传播副教授，主持「捍卫真相研究室」(Truth Defence)，他次日随即推文批评BBC抹黑(Schlosberg, 2022, June 1)。美国政论杂志旗舰《国家》(the Nation)的发行人霍伊费尔(Heuvel, 2022, May 24)在华邮撰文，呼吁「不要抹黑...要就乌克兰战争，来一场辩论。」她引述主流媒体尊崇的李普曼(W. Lippmann)之警句：「思考若相同，就是没人要思考。」

乌克兰民主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也是政治及史学家、反对北约东扩的皮拉什(Denis Pilash)受访时，表示北约仅是俄罗斯入侵的借口，布查镇...等地的残杀平民，显示这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如同美国入侵伊拉克〉(Goodman & Nermeen, 2022, April 21)。联合国秘书长与印度先后呼吁联合国组织团队入内调查，但安理会迄未决议。纽约的「人权观察团体」(Human

Rights Watch) 4 月 4 日派員前往布查鎮從 5 至 10 日訪談 35 位居民，21 日發布新聞，指「發現大量證據」，顯示 3 月 4 日至 31 日占領該鎮的俄軍「犯下明顯的戰爭罪行」(HRW, 2022, April 21)。HRW 在中東與拉美的調查數度引來偏頗的批評，但 HRW 在本案是否不公，無法確認，唯該報告，以及至 2022 年 6 月 7 日的維基百科條目「布查鎮屠殺」，也都沒有征引、討論或否定前述質疑。

真相仍然不明，惟很重要，即便未來的調查證實俄羅斯軍隊沒有在布查鎮殺戮，是另有兇手，但俄羅斯入侵在先，才有後來的布查鎮民在內的許多人喪生，是不爭的事實。動手殺人是兇手，造成有人動手殺人也是犯罪；以北約東擴造成生存威脅而入侵是罪行，但長年以來，假使有人、有政府、有跨國組織讓烏克蘭誤認，或者自行挑釁乃至設圈套讓俄羅斯入侵，就不是犯罪嗎？

參、極右派在烏克蘭

愛國人士、民族主義者可以有兩種內涵。一種內縮排外，強調血液、民族 (nation)、文化的純粹乃至優越與經濟利益的優先，於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種外張廣納，因為愛己所以及人，希望達到愛人者人恆愛之的境界，發展為博愛之心與休戚與共的能力。

世人僅有一種內涵者，應該很少，多數兼具二者，只是比例不一。前者若過度張揚，令人往往稱之為極右派，成分若再更多一些，就向納粹或法西斯靠攏，於是在西方產生「白人優越與至上論」的現象，這個質素加上其他原因，近年來數度衍生殺害有色人種乃至同樣是白人的災難¹，識者憂心。

在烏克蘭，今日的極右派可以從 1941 年說起。當時，納粹德國入侵蘇聯，1929 年成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¹ 根據 Maryland 大學的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之統計，在美國，恐怖攻擊在 2000 年約 40 餘次，原因起於白人至上論的比例是 14%，該百分比至 2019 年（70 餘次恐攻），已經上升至 50%。美國之外，白人至上論或極端右翼民族主義殺人的最大事件，是 2011 年 Anders Behring Breivik 在挪威殺 77 人，遇害者多是挪威工黨夏季青年營人員，2019 年 Brenton Tarrant 在紐西蘭基督城清真寺射殺 51 位穆斯林 (Economist, 2022, May 21a; AP, 2021, July 19)。

Nationalists, OUN) 大约有八万人 (来自西部为主) 与纳粹合作, 杀害 15 至 20 万住在乌克兰的犹太人。当时 OUN 最常呼喊的口号, 包括「希特勒万岁... 杀死犹太人与共产党人!」(Simpson, 1988, p.164)

但二战之后, 他们未受审判, 因为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庇护。本世纪初陆续解密的文件显示, CIA 的前身最慢从 1946 年起就联系 OUN, 1948 年有文件记载班杰拉 (Stefan Bandera), 1949 年底, CIA 多次派机低空飞抵中亚与乌克兰, 会合 OUN 游击队, 持续与苏联战斗至 1950 年代初。OUN 的若干要员在 CIA 协助下, 安抵美国无恙度过一生 (Michel, 2022, May 11)。CIA 也另设文职机构, 提供大量出版与财务资源, 支持民族主义派与反政府者从内对付乌克兰共产党, 直至苏联解体前夕 (Kuzio, 2012)。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 (Nikhiita Khrushchev) 1954 年在没有立法情况下, 以总统令将几百年来都是俄罗斯共和国的克里米亚 (Crimea) 省, 送交乌克兰共和国, 《真理报》仅以 81 个英文字报导。有人说, 这是「礼物」, 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三百年; 并且, 大饥荒 (1931-34) 年代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 合计致死 500 多万人, 其中 390 万是乌克兰人。克里米亚归属的重新厘定, 是出于这些历史考虑, 或者仅只是新政权通过领土重划, 宣告苏联要分权而减少中央集权, 同时标志对斯大林的修正? 无法确认 (Calamur, 2014, February 27; Applebaum, 2022, May 8)。

在 OUN 各派别中, 班杰拉不是最知名、影响力也并非最强大, 但在 1959 年遭苏联派人暗杀于德国后, 他成为乌克兰纳粹的象征。尤先科 (Viktor Yushchenko) 总统的妻子是白宫前官员, 2010 年元月, 他即将卸任, 却迅速以总统令, 授予班杰拉国家英雄的尊称。此举在国内引发争议, 海外也有欧洲议会、多个俄罗斯及波兰与犹太政治人与组织, 群起谴责; 同年四月, 尤先科卸任后两个月, 法院取消该头衔, 次年正式吊销。乌克兰国会在 2019 年 8 月仍然否决给予班杰拉这个头衔的提案 (Wikipedia n.d.1)。至今, 有人说班杰拉是解放者, 贡献乌克兰的独立建国; 另有乌克兰人谴责他是法西斯份子战犯, 要为屠杀波兰平民而特别是乌克兰的犹太人屠杀负责。

苏联在 1980 年代末倡导「改革与开放」, 乌克兰在 1991 年底独立, 极右派人群同样集结, 成立多个政党。至今, 仅有独立前几个月创办并在 1995

年改名「自由党」(Svoboda)，在 2004 年起由医生加尼伯克 (Oleh Tiahnybok) 担任党魁以后，才在 2009 年于西部人口 20 余万的捷尔诺波尔 (Ternopil) 市赢得 120 民代席次的 50 席 (Shekhovstsov, 2011)。自由党在 2010 年成为「加利西亚」(Galicia) 区域的主要政党，(Katchanovski et.al., 2013, p.189)。2012 年取得一席国会议员席次 (Stern, 2012, December 26)，其后已无斩获。所有新法西斯政党的全国选票加总，从未超过 5%，有些人因此以为极右群体的作用不大，但广场事件爆发，可能因为这群人的作用，乌克兰出现了独立之后，最大的政局变化。

肆、是广场革命，还是政变？

这是指 2013 年 11 月的和平抗议活动，后来出现暴力并有枪手狙击，造成百人遇害、总统下台，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并加入、形同是遭俄罗斯合并的事件。当时，对于这次事件的称呼已经不同，大英百科全书的条目使用中性的词句「广场抗议运动」(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d.)；称之为广场 (Maidan) 或「尊严」(Wikipedia, n.d.2)「革命」的人，凸显出发点是正当的抗议的同时，淡化或无意探讨，抗议后期是否可能已经是美国所支持的「政变」(Mearsheimer, 2014)；以政变相称的人着眼于后期及结果，忽视前期的自发性性质，致使与暴力无关的大多数抗议者，可能为此而难以接受变政的论述。

不同的用词，可能也标志了两类人群的文化与阶级差异。着有《乌克兰的民主、民粹与新自由主义》的贝沙 (Baysha, 2022) 教授出身乌克兰，1990 年代初任乌东电视台记者，她与朋友都是西化派、以文明代理人自居，劳工阶级反对他们赞成的改革，他们无感与瞧不起，兼而有之。多年以后，贝沙已至基辅电视台负责历史记录片监制，思维开始变化，本世纪初她前往美国攻读硕、博士学位，后以媒体批判的视野，回顾祖国独立后的历史。似乎，亲西方但同时要与俄罗斯切割的一边，会有较高比例使用「革命」；反之，其对立立面未必就是劳工阶级，但显然很高比例会用「政变」。

事件起源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有一记者在脸书发文，指总统亚努科维奇 (V. Yanukovich) 拒绝与欧盟签约，不让乌克兰与欧盟创制自由贸易区。当日午夜，「超过一千位有高教背景的都会青年来到广场」抗议，他们认定加入欧盟是乌克兰脱离腐败、走向经济现代化，改善生活水平的必经道路。这是如同节庆一般的欢乐集结，11 月 30 日，政府以圣诞节将到，要在广场布置大型圣诞树为由，下令警察清场。这个决定与行动，激起更多人前来声援，达到 35 万！欧美于是施压基辅政府，总统转向，从俄罗斯取得 150 亿美元贷款。到了次 (2014) 年元月底冲突升高，2 月 18 日是第一个高峰，12 位抗议者与警察遭枪枝射杀，到了 20 日，「政府下令狙击手射杀抗议人群，致死人数很快就超过一百人。」欧盟见状制裁，冻结中央政府有关官员的资产与旅行签证，各地寡头企业眼见放在西方银行的资金无法动用，也就让受其支配的国通过决议对抗行政权，这是政权垮台的开始。2 月 21 日欧盟代表由波兰外交部长领军，与朝野协商，条件之一是总统大选提前在年底举行，亚努科维奇知道大选必输，当晚连夜逃离基辅，据说卷款几百万美元；次 (22) 日国会投票予以罢免，俄罗斯让他入境。这是当时新闻界的主要报导内涵，(Boyd-Barrett, 2016; Liu, 2019) 也是维基条目的叙述 (Wikipedia, n.d.2)。

这些叙述得到很多专家的背书或转述。比如，哈佛大学史学家、乌克兰研究所所长浦洛基 (Plokyh, 2021, p.191-3)，以及在学术界有一定声望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之系列「人人都应知道」当中，有关乌克兰一书的说法 (Ākel'čik 2020, p.119-20)。另外，2015 年完成，并由「网飞」购入放映的纪录片【凛冬烈火：乌克兰为自由而战】，其维基百科的条目显示，众多专业评论及业余反应是佳评如潮；在 2017 年委内瑞拉反政府的行动，以及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集会，该片得到多次播映机会 (Wikipedia, n.d.3)。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网飞无偿释出在 YouTube 播出 (Netflix, 2022, March 5)，「一天点阅率近 20 万」(TVBS, 2022, March 6)。该片结构单纯、容易看容易懂，提供的信息、知识或观点不多，最鲜明的印象可能是影片开始与结束，阳光年轻男性无畏冲突与杀戮，表示会持续抗争，传达政府残暴不仁，而示威群众信念不动如山：「我们不入欧就不自由，我们是欧洲国家」。

对照之下，次年由史东（Stone, 2016）制播的【战火中的乌克兰】比较复杂。该片交代近千年而特别是二战前后的乌克兰历史，它也铺陈与讨论重要议题，如乌克兰 2004 年的总统大选争论、谁拥有乌克兰电视新闻频道、亚努科维奇最后没有与欧盟签约是否因为俄罗斯干预、和平示威转为百人遇害的凶手是谁、2015 年敖德萨工会大楼（见后文）事件是否预谋、乔治亚前总统何以出任敖德萨州长，以及谁击落大马客机...等等。另外，该片应该是刻意要批评主流叙述，因此该片最后以字幕强调，「知识是力量。有能力能够适时识别（警讯），可能可以救别的国家或你自己...因为今日战争不仅是有坦克和炸弹，还伴随...媒体...」² 【战】片在 2021 年 8 月放入 YouTube，(Stone, 2021, August 20)，2022 年 3 月遭下线十天后放回，至 2022 年 6 月 4 日累计 87.3231 万次点击、3 万以上按赞与 7643 则留言。至相同一日，放入 YouTube 仅三个月的【凜】片有 101.6655 万次点击、3.1 万以上按赞与 5180 则留言（Netflix, 2022, March 5）。

【战】片提出，【凜】片等等主流叙述不追踪的重要问题是：亚努科维奇真是因为俄罗斯介入而转向吗？欧盟的自由贸易条款真对乌克兰有利吗？亚努科维奇即便知道 2015 年底大选必败，有什么理由必须仓皇逃跑，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外逃才能卷款吗？

【战】片的调查与访察所提出的答案，同样得到众多专家支持。比如，普林斯顿政治学教授、专治俄罗斯柯亨（Cohen, 2019 part I）指出，欧盟的方案在经济上根本不可行。一是提供的财政协助太少；二是要求乌克兰政府实行苛刻的财政紧缩措施，包括出售国有资产；三则这些作法必然大举削弱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长期且重要的经济关系。经济之外，欧盟方案另有政军盘算，要求乌克兰遵守欧洲的「军事及安全」政策，这是不提北约，但其实是铺路，要让北约军武进入乌克兰。这些条款迫使已有深刻分裂的乌克兰，只能二选一，有俄罗斯，无西方，反之亦然。与此同时，俄罗斯另提对案，建议俄罗斯、欧盟及美国合作协助乌克兰，不使其财政崩溃，这是加法，不是减法，欧美却又拒绝。至于总统弃国，有无卷款无法得知，但若卷款，连夜

² 影片的 92 分 45 秒至 93 分 03 秒。

逃离并不合常理。一是没有类似 2021 年阿富汗总统专机载送巨款逃离的可信报导（罗方妤编译，2021 年 8 月 19 日）。二是在史东纪录片的访问中，亚努科维奇声称他有人身安全的威胁，不火速离境则命危；这个说法是否可信是可质疑，但主流叙述不予讨论，无助澄清真相。三则类似事件在所多有，最近的例子是 2019 年，玻利维亚总统莫拉雷士（Evo Morales）被错误指控选举舞弊，遭到威胁的同一天已经搭机飞抵墨西哥得到庇护（Farthing & Becker, 2021, p.48-9）。

更重要的关键，和平示威在 11 月 30 日出现大规模镇压后，是不是给予有心人有机可乘？致使有后来的重大流血案件发生，特别是 2 月 20 日的致死人数更多，累计上升至百人。谁是狙击手？

相当重要的一则新闻与一篇学术调查，早就可能已经提供了解答，或者，至少是通向答案的线索。

先说一则新闻。

美国的乌克兰大使皮亚特（Geoffrey Pyatt）与美国欧盟助理国务卿卢岚（Victoria Nuland）的四分多钟谈话，显示两人形同是在安排广场事件之后，乌克兰的内阁组成、权力的部署。这段录音配上图片，在 2014 年 2 月 4 日出现于 YouTube，三天后，BBC 记者马库斯（Marcus, 2014, February 7）将其转为文字加上自己的评论，以独家新闻的方式，全文在 BBC 网站刊登两人的对谈。

美国从未否认外泄影音的真实性，甚至还因为卢岚讲出了“Fuck the E.U.”这样的粗话，使得国务院发表声明向欧盟致歉。当时的主流媒体几乎完全在报导诸如此类的下流话语，却对谈话所透露，美国已在干预或想要安排乌克兰总统以外的内阁之人事，略而不谈或少谈。除了确认副总统拜登会在适当时刻现身，鼓舞广场派，两人提及的三位乌克兰重要政治人物，后来完全如同对话指出的方向，「各就其位」：亚采纽克（A. P. Yatsenyuk）担任总理（两年多），卢岚指不适合选总统的前世界重量级拳王克里契科（W. Klitschko）弃选总统、转选基辅市长并当选，两人表示不适合入阁的自由党魁加尼伯克，确实是没有官位。但是，美国《外交政策》在 3 月 18 日发布以色列人的分析，指出美国重量级参议员麦肯（John McCain）于四个月前

至广场对抗议人群讲演，高呼「自由世界与你们同在，美国与你们同在」时，站在他身旁的就是加尼伯克；并且，新政府有四分之一阁员（包括国防部长、副首相、检察总长与国会副议长）来自「自由党」，而加尼伯克是其党魁。这是新的情势，美国国务院却避重就轻，表示极右派在乌克兰国会没有代表；俄罗斯电视频道（RT）指乌克兰有新纳粹成分，该台主播华尔（Liz Wahl）觉得恶心而当众辞职，西方媒体不是说 RT 所言属实，是表扬华尔很勇敢。

（Foxall and Kessler 2014/3/18）广场事件后的新内阁，也是乌克兰首次有外国（美国）公民亚列西科（N. Jaresko）出任阁员（财政部长）、立陶宛人阿布罗马维丘斯（A. Abromavičius）执掌经贸部长，乔治亚人科维塔什维利（A. Kvitashvili）担任健保部长。这些外国人出掌本国政务，并非来自乌克兰的邀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推荐」（Baldwin, 2022, April 28）。北约秘书长托腾伯格开战后三个月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讲，颇见得意，他说：「2014 年以来，北约...特别是美国加拿大与英国...一直都在提供装备并训练乌克兰军队，人数以万计...」（Stoltenberg, 2022, May 24）欧美传媒「惊讶」俄罗斯军力不如预期强大，其实《华尔街日报》提供了答案：〈乌克兰军事成功的秘密：北约多年的训练〉，各种军事教程与科目已经让数以万计的士兵，加上军事将领与国会监督军力的队伍脱胎换骨，从苏联时期的呆板风格，摇身成为现代化的灵活军队（Michaels, 2022, April 13）。

BBC 揭露的录音显示，在 2 月 18 日抗议者与警察共 12 人遇害的前两周，或甚至更早之前（因皮亚特与卢岚两人的谈话时间，无法确认，但必然早于 2 月 4 日），美国高官已经开始讨论变天后的乌克兰政局。外界无从知道的是，美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积极介入，是起于 11 月 30 日警方清场引起民众强烈反弹，或是更早？或者，更晚一些，在 2014 年 1 月 19 日大量街头暴力在基辅市中心出现以后？无论早晚，两位高阶外交官的谈话足以证明美国介入乌克兰政局，惟这是在推动政变吗？是或不是，要看怎么界定政变。但很清楚的是，假使不是主动，美国至少是趁虚而入且见猎心喜，积极要让自己属意的人选掌控新的政权。BBC 记者马库斯评论两人的谈话，这样说：「美国各层官员都在企图召集与组织乌克兰反对派...副总统拜登显然已经摩拳擦掌，即将上场，在合适时候给予...鼓励。」（Marcus 2014, February 7）新闻界因为

工作常规（或说陋习）以及其他原因，不肯或无法追踪事件的新事证，致使是否政变没有成为追踪报导与讨论的题材，民众也就形同遭致蒙蔽；美国政府不尊重他国，并且可能参与或主导政变，却已摇身变成见义勇为、伸张民主之人。黑白在此颠倒。

再看两篇学术调查与报告，焦点分别是「广场事件的枪杀」，以及「2015至2016年的调查与审判」。

广场事件后，不但大多数新闻，大多数学术著作也集中抨击政府的暴力行动。虽说也有多数人表示抗议者也有暴力，但规模很小，最重要的是，执政团队下台，来自非暴力示威所赐。

学术论文指政府倒台，也有可能出自极右派的暴力行动的第一篇，是分析这个可能性，不是坚定提出这个观点（Popova, 2014, p.69）。作者说，乌克兰司法受制或听命于行政权的问题由来已久，广场事件前三年多，更加严重，这就使得抗议人群失去最后一个制度管道推进要求，极右派暴力行动者因此有机可乘。同时，该文认为极右派「也许不是暴力升高的引动者（trigger），他们可能也是因为警方...的惨忍、法外手段的杀人与绑架与殴打，以及1月16日国会通过镇压性质更浓的法律，于是挺身而出。」

真正确认极右派是凶嫌的首论文，出自乌克兰移民、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政治与传播系任教的察诺维斯基教授在次（2015）年9月完成，且随即上传学术网站的〈狙击手在乌克兰广场的屠杀〉（Katchanovski, 2015）。

这是迄今最详尽的举证与论述，该文第一版发表后，亚速营战士前往其乌克兰住家搜索与威胁，后来「有很多组织的独立调查及众多影音证据都支持察诺维斯基的发现，包括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英国BBC...等等（Hahn, 2008, p.198）。此外，另有学者不只是引述，而是自行进行经验研究，运用不同的数据库与方法（如Ishchenko, 2016, p.4），或者运用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的素材，并采取「质化分析以求追踪行动者决策的相互因果关系」（如Kudelia, 2018, p.502），他们也都得到与察诺维斯基相同的结论。

乌克兰的新政权迟至 2015 年元月，这才启动对涉案人员的调查与起诉工作，检察总署在 2019 年将各种数据迁移调查局，由后者执行后续工作。到了 2021 年 11 月，完成所有调查与审判。

针对广场杀戮及其后续审调，察诺维斯基总计发表论文 6 次，并随进展而有材料扩充与论文更新，包括纸版形式 2 次而篇幅较短 (Katchanovski, 2016, 2020a)，纸版发表的篇幅，可能不及 4 次电子版合计篇幅的六分之一 (Katchanovski, 2015, 2017, 2020b, 2021)。若是计算「社会科学研究网」(SSRN) 4 篇电子版 (实则是两篇，另两篇的主题与论点是随时间而有材料增加后，前两篇论文的新版本)，至 2022 年 6 月 11 日它们的合计下载数是 6956 次；最晚完成的论文是 2021 年底，上传是 2022 年 3 月。2021 年 8 月 8 日，作者上传的前述论文，另有两个影音附录。A 是「狙击手在乌克兰广场的屠杀」，约 80 分钟；B 是「百名证人有关乌克兰广场狙击手的现身说法」，约 57 分钟。两部附录像音至 2022 年 6 月 2 日，分别有 1540 与 1362 人次点击。通过影像，文字描述的不具体，得到补足，现场的真实状态配合旁白与字幕，清晰让人看到广场示威群众控制的 20 余个空间，正是 2 月 20 日 49 位抗议者与警察遇害之所 (ibid.)。

两次主题运用的数据，数量相当庞大，都是从已经公开的数据源搜集与整理。两个主题各有前后的两个版本，它们的数据源及结论，先后编译如后。

第一个主题是「广场狙击」的质化分析，取材包括 150G 的众多影音实况录像，来自事发期间不同国家约一百多位新闻人员，以及更多社交媒体用户上传的现场影音图文，包括 5000 张照片，以及，拦截各个狙击手、军警维安情治人员的无线通话录音将近 30G。再者，作者亲往杀戮现场实际搜集，取得了抗议群众与政府人员的双方说法，加上双方证人与目击者提交的报告。对于当时及后续政府官员的多种说法，另以时序定位与剖析，得知不同杀戮事件与双方狙击手的藏身地点，至少有 20 余处，枪击时刻则有多个。通过这些程序，作者确认了将近 50 位遇害者的中枪时刻。最后，察诺维斯基援用「理性选择论」及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检视被推翻之政府（亚努科维奇总统）及其高阶官员、警察与维安情治人员，以及广场抗议群众（特别是 2013 年 11 月成立的「右区」(Right Sector)、成立较早的「自由党」

(Svoboda)，加上寡头支持的政党如「祖国」(All-Ukrainian Union Fatherland)，何者更可能及实际上执行「这个嫁祸事件」(a false flag operation)。作者回顾美国、苏联与俄罗斯在多种地缘政治冲突事件中(包括2013年叙利亚动用化武疑云，以及2014年大马民航机遭击落...等等)，以及广场事件的百位西方记者之报导以后，信心十足，认定是广场的暴力极右派之理性计划下，枪杀自己的群众以嫁祸，达成推翻政府并夺取政权的目标。(Katchanovski, 2015, 2018)

第二个主题是针对罪刑「调查与审判」的分析，材料有三个来源：(一)乌克兰法庭裁定数据库的2500多次记录，共有几百小时的影音；(二)检视抗议受伤者与遇害者的亲友、检察官与被告证人，还有前政府高阶官员的证词；(三)法医的枪伤及医学检察及实验的分析结果，包括审判期间对外公开的广场屠杀照片与影音。这六年来的材料表明，2014年2月20日的4位遇害及数十位受伤警察，以及至少49位遇害及157位受伤的抗议者，全部发生在广场群众控制的各大建筑与地区。这些证据来自受伤抗议者、数十位控方证人，并有广场派狙击手当中14位出面坦承。审判期间提出的影音显示，绝大多数抗议者遭射击的时间，与金雕警察的射击时间并不相同，法医的医学检视也确认绝大多数抗议者被击中的部位，来自其后方或其两侧。检视遇害或受伤抗议者的弹道，发现它们与金雕警察击发所伤害或杀害的抗议者之弹道，并不相同。法医检视又发现，金雕警察是在「乌克兰饭店」(Hotel Ukraine)内部向广场抗议人群上方或(躲在其附近的)树木与柱子的狙击手射击。然而，这场审判有历史上最多影音图文纪录、众多抗议者与警员陨命，但七年多结案时，没有任何被告被逮捕或定罪。作者的结论是，检方拒绝承认有任何狙击手藏匿在广场派控制的大楼内部，因此，这些调查与审判，目地仅是掩饰，未能揭露极右派群体预谋杀人的责任，新政府想方设法，就是要让对自己不利、要将使自己难堪的消息与真相，不为外界知悉。西方政府与民间组织对广场事件的调查与审判兴趣不大，仅有欧洲协会(Council of Europe)在2015年发表报告，指基辅政府调查结果与官方公开声明存在矛盾，以及联合国在2019年表示，基辅尚未制裁任何犯下杀人与暴力致死的人(Katchanovski, 2021)。

广场事件发生的当下，如果事未易察，则事后真相已经大白，但事发期间主流传媒的报导与评论的效果持续存在，仍然以其设定的框架及意识领导，阻止真相外传。

讽刺或说值得肯定的是，已有博士论文发现，俄罗斯传媒在广场事件发生时，报导相对开放，西方新闻反而封闭。刘自修博士 (Liu, 2019, p.xii, 124, 136-7, 146-7, 165) 的研究显示，作为俄罗斯主要英文日报的《莫斯科时报》(Moscow Times)，确实同时受制于国家与商业压力，但「从车臣战争至传媒检察，都对政府立场采取批判视野」。就广场事件来说，该报说政府镇压是乌克兰危机升高的主要原因；该报有 21% 内容指政府不与欧洲签约引爆了抗议；该报也说乌克兰持续混乱，是乌东说俄语的人口反对广场示威并要分离独立所造成。这些内容与西方传媒并无不同。但英国传媒如《泰晤士报》与《卫报》... 等等更为一面倒，没有出现常见于俄罗斯的反广场派之观点，并且，它们传达反俄罗斯的意向，已至夸张的水平。刘自修认为，对比英俄传媒对广场事件的报导与评论，再次证实赫曼与杭士基知名的「宣传模式」，仍然适用 (Herman & Chomsky, 1988 / 沈聿德译, 2021)。

自由体制的新闻媒体以专业看门口自诩，监督权势的运作，可褒可扁，只要属实。但在广场事件时，这些媒体并无监督职能，其报导视野与评论观点，口径吻合西方政经与传媒菁英的说法，既然如此，想要在副总统拜登 (Biden, 2017) 的回忆论，或者美国乌克兰大使馆当时高阶官员对事件的建构 (Smith, 2022)，坦承白宫的角色，也就无异缘木求鱼，两本书当然也就完全不提 BBC 的独家揭露，更不可能意识到察诺维斯基论文的存在。至于「维基解密」的狙击手条目，绝口不提察诺维斯基的研究 (Wikipedia n.d.2)，也许反映了真相外传的规模仍然还没有大到足以反映在维基百科；或者，如同柯尔斯 (Coles, 2021, p.35) 所说，「维基并不开放，群众智慧无法予以平衡。维基是美国国家-军事-财团的宣传工具」？

伍、敖德萨惨案：平衡报导，但受害者似乎承受较多谴责

欧美主要传媒对广场事件的呈现，以反俄为主轴、也就明显偏颇。数月之后，2014年5月2日发生在「黑海明珠」敖德萨（Odessa）的另一惨案，虽有平衡，但受害者似乎仍遭谴责（blame the victim）。敖德萨是百万人口的美丽港都，也是乌克兰第三大城市，法国导演高达（Jean-Luc Godard）的《电影社会主义》（Film socialisme），有豪华邮轮航行地中海，月也来到敖德萨。

惨案发生一个多月之后，「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调查报告，显示事件的大致过程如后。（OHCHR, 2014, p.9-10）

事发当天下午两点，约有300位「反广场派」³的人集结，走向450公尺外、有2000人的「挺广场派」集结之主教座堂广场（Sobornaya square），包括是日早晨甫从第二大城哈尔可夫（Kharkiv）抵达、大多是挺广场派的600位足球迷。挺广场派先前已经表明，5月2日三点将从集结地开始游行。两派都有活跃份子带头罩，携带斧头与金属或木质棍棒。由于两派可能对峙的消息早前已经外传，警方前一天表示，将加派警力2000人巡逻以防止生事，二日当天三点，是有15位警察、另有两部巴士载着警察停在主教座堂广场。

³ 依據維基百科的烏克蘭條目（<https://en.wikipedia.org/wiki/Ukraine>），烏克蘭這個「國家」（country, state）在2001年有4116.7萬人，烏克蘭族（nation）佔77.8%，俄羅斯族17.3%，兩族語言及宗教近似，俄裔多在東區。坊間多以挺廣場（pro-Maidan）、挺烏克蘭（pro-Ukraine）等詞彙稱呼支持在2004年廣場事件以後執政、親歐的政府；另以反廣場（anti-Maidan）、挺俄羅斯（pro-Russian）、分離主義者（separatist）稱呼另一群體。這些用語以「挺廣場」及「反廣場」較為準確，因此下文在翻譯時，主要就以這兩個詞彙為主。挺烏克蘭或俄羅斯或分離主義者各自有缺點，「挺烏克蘭」一詞使其對立面變成不挺烏克蘭，亦即國籍是烏克蘭人者不支持自己的「國家」（country），「挺俄羅斯」與「分離主義者」在此語境下變成如同克里米亞的情況，是要脫離烏克蘭這個「國家」（state, country）。但烏東頓涅茨克州（Donetsk）與盧干斯克州（Luhansk）因廣場事件，在2014年4至5月宣布並公投獨立，但沒有得到任何國家（包括俄羅斯的）承認，其後則在2015年明斯克（Minsk）協議下，同意仍是烏克蘭一部分，但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改為如同美國聯邦制的州，擁有較高的地方自治權能（含讓俄語成為官方語言之一）。後來因為基輔政府在極右派要脅下（見後文），無法或不願意執行明斯克協議，致使俄羅斯在今（2022）年2月24日入侵烏克蘭前三天，承認兩州的獨立地位。另見本期〈烏克蘭的軍事情境〉開頭，作者包亞克（Jacques Baud）的說明。

三点十五分，反广场派走近挺广场派，形同挑衅，两派起了冲突，秩序很快失控，警员是有增加，但不足以阻止暴力；到了六点半，警方及双方群众共有六人殒命。在挺广场派追打下，反广场派 60 人躲入阿夫纳 (Afina) 购物中心，稍后抵达的警方带走 47 人，其他人奔向反广场派集结、约有 200 人的花园广场 (the Kulikovo Pole square) 帐棚区。这个时候，挺广场派有政治人物呼吁支持者走向帐棚区，反广场派闪躲，遁入附近的工会大楼。七点三十分，挺广场派开始烧毁反广场派的帐棚，并向工会大楼丢掷汽油弹，躲在里面的反广场派也从内向外丢掷汽油弹。人权委员会的乌克兰分会在七点四三分以电话联络 650 公尺外的消防队前来救火，消防队四十分钟后才到，但已经有 32 人困在工会大楼内被烧死，10 人从窗子跳楼摔死。另有 24 人轻重伤不等，包括 99 人住院 (含 22 位警察)。

联合国报告的调查时间相对从容，可能比较接近真相，显示 (一) 冲突双方的挺广场派的人数，是反广场派人数的六倍以上；(二) 受害者主要是反广场派；(三) 虽然预告但警方并没有加派 2000 警力阻止冲突发生，原因不明；(四) 近在咫尺的消防队何以救火迟到，同样无从知悉。

事件发生当时，新闻媒体受制于编采时间及其他因素，联合国未曾解释的 (三) 与 (四)，媒体同样无法回答。但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并未披露 (一) 的，这就使得下列引述的四家传媒在看似「平衡」报导与究责之余，似乎会有「谴责受害者」的倾向 (二)。

比如，「德国之声」(DW, 2015, May 2) 的报导是：双方「在街头撕打致使 6 人遭射杀...5 月 2 日...又有 42 人死了」、「双方都以最残酷手段相向」、「火焰已于门厅前的木质障碍物着火，双方相互丢掷汽油弹」、「何以警方没有采取行动？」有人提出的解释是「警方惊吓，不敢承担责任。」法国 (France 24, 2014, May 2) 的国营电视新闻频道说：「挺政府与反政府的活跃分子发生冲突，在敖德萨引发火势，警方说死了 31 人。」英国的《卫报》(Amos & Salem, 2014, May 2) 有更多报导，指「亲俄罗斯的活跃分子带着棍棒与气枪，攻击挺广场派集结人群后，冲突爆发」、「工会大楼在一日街头战斗后失火」、「挺广场派的活跃分子攻击工会大楼，内有反对基辅政府并主张乌克兰要与俄罗斯有更密切关系的抗议人群，致使超过 30 人遇害」；此外，《卫报》使用路

透社的一张照片，显示「亲俄罗斯的活跃分子在敖德萨街头冲突时，举起手枪对准支持基辅政府的人。」BBC（2014, May 3）的报导，指确实的事件时间次序还不清楚，但「据报，反广场派进入大楼并设置障碍，双方互丢汽油弹」。三天后 BBC（2014, May 6）再以较长篇幅，表示「目击者说，反广场派的活跃分子袭击走向足球赛场地的人，然后发生暴力」，BBC 也使用与《卫报》相同的路透社照片，表示「有些反广场派活跃分子在暴动过程，举枪射击」。BBC 说，「反广场派活跃分子手持棍棒及其他武器，但警方袖手旁观」；又说，挺广场的游行人群随后也以石块丢向反广场派群众。最后，「似乎毫无疑问，枪响以及死伤消息传出后，挺广场派的人更加气愤」。「维基百科」的「2014 年敖德萨冲突」（Wikipedia n.d.4）引述联合国的调查报告两次，但未引本文作者编译的原（英）文内容，而是在该条目第一段引另 4 个来源，这样陈述「暴力在 5 月 2 日升高，反广场的暴民（mob）攻击挺广场的活跃分子（activists），后者反过来迫使反广场活跃分子（activists）进入工会大楼，接着就是大楼着火，因双方相互丢掷汽油弹...造成 48 人死亡，大多数是反广场示威的人...」。

陆、主流智库与媒体说极右派

英语出版品谈论乌克兰极右派（含民兵亚速营），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作为分断，前后不同。先前，虽然不多，也有淡化，但亦见不少担忧之声。

比如，美国的「自由之家」曾在 2018 年发布报告，指出除了「自由党」等 3 个比较大的政党拥有若干中央与地方民代席次，另有至少 10 个以上不参选，但在公共领域经常现身的团体。该报告区分激进派与极右派，激进派仅用和平手段，极右派除了通过组织，以社交媒体进行侵略性宣传，最大的差异是它推动「街头政治」，采取非法的暴力行动，试图以强制力量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若是在公共领域出现他们认定有害民族或他们难以接受的要求，如「左派、女性主义者、自由派与 LGBT 活跃者、捍卫人权者，以及种族与宗教的少数派」的身影与主张，他们就会予以压制与「清除」。虽然明显操弄这些反民主的手段，但庇荫于民族主义的符号与修辞，也因为他们

参与了广场战斗「有功」，这些极右派团体与政府而特别是执法单位。已经发展出和睦关系。总之，「在 2014 年广场革命之后...极右派再也不是边缘团体」(Likhachev, 2018, p.5)。

广场事件后，基辅的新政权除了压制多个反对组织及政党，极右派也取得不成比例的内阁位置如前所述，他们并且在军警情治单位大有斩获。新政府又颁发勋章给 OUN 老兵、尊崇班杰拉，更以二战期间极右派军队建军的 10 月 14 日，作为乌克兰军事纪念日 (Dubovyk, 2022, March 14)。

另一方面，更大的问题来自乌东两州因广场事件而宣布独立之后，即便未获任何国家承认，但已经引爆内战，在乌克兰政府接受北约训练与提供资源的过程，极右派民兵同样从中获得军火与金钱，并已经产生多个组织，最知名的是亚速营 (Azov Battalion)。单是美国，从 2014 年 2 月起不到 20 个月，为了「对抗俄罗斯的侵略」，白宫已经提供乌克兰 20 亿美元贷款保证，以及将近 7.6 亿美元的「安全、特定项目及技术协助」经费。2015 年底在国防部压力下，美国众议院在半年前删除的禁令，重新恢复，先前已经扩充的民兵，规模坐大，当年亚速营从 400 人增加至 2000 人。这等于是美国「赞助新纳粹」，「看到亚速营民兵以纳粹标志出场的影像，德国人相当震惊。」这是二战以后，首次有纳粹标志的军事团体在欧洲从事作战，对象是乌克兰说俄语的欧洲人 (Carden, 2016, Jan. 14; Parry, 2015, June 12)。美国及英国另与战略传播公司合作，协助「激进民族主义派」，发动信息战对抗乌东俄语人群 (Boyd-Barrett, 2019, p.45)。

对于极右派的暴力倾向与记录，英美主流媒体并非没有注意，虽然可能不多。早在基辅过渡政府成立一周左右，BBC (2014, March 1) 已经以 6 分多钟报导自称与「自由党」有联系的两百多位极右派；BBC 指这是「一小批人但有组织」，是广场抗议者当中「最有力量的一群」。他们认为想要亲近俄罗斯的人，「就让他们搬到俄罗斯...乌克兰只能是乌克兰人的...我们的任务是砍断与...俄罗斯的所有连带」。过了一年多，BBC (2015, July 23) 再以 9 分多钟的专题，指「右区」这个推广民兵运动的极右政党「威胁要推翻乌克兰政府」。然后是两年多后的《卫报》制作 13 多分钟影片 (Guardian, 2017, September 5)，焦点是亚速营民兵已经投入战斗，并以举办儿童夏令营的方

式扎根与扩张。德国的《时代周报》(Die Zeit) 则有调查报导, 指亚速营虽然仅只是乌克兰众多极右组织之一, 却已是「世界极端右翼网络的中心」, 相当特殊, 「有政治议程, 与政党及民兵组织都有联系, 也有夏季营队训练学童, 并且也开始研拟国际战略, 邀请西方极右派访问乌克兰——『一起战斗』。」(Ishchenko, 2022, p.22)

北美方面,《纽约时报》曾在 2014 年 4 月 6 日报导新纳粹民兵抢夺政府军火, 在广场事件时, 派出 600 民兵到基辅与警方战斗; 虽然纽时没有说, 民兵攻占市政厅之后, 升起了纳粹与白人至上的旗帜。4 月 12 日, 纽时报导在广场事件扮演要角、新纳粹领导人之一穆兹科 (O. Muzychko) 两周多之前与警方枪战死亡。8 月 10 日该报则以一篇千余字的最后 2 百字, 提及乌克兰正规军轰炸顿涅茨克的反广场派时, 是要掩护 6 个民兵团攻入都会区作战 (转引自 Parry, 2014, August 11)。《新闻周刊》则在 9 月以比较平淡的笔调, 引述「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发布的报告, 指乌克兰地方媒体出现受害者首级被割下的照片, 至当时 (9 月初) 已经有超过 3000 人遇害。周刊说超过 30 个「挺民族主义」的民兵队伍, 其中有多数由乌克兰商业寡头巨子之一克罗莫伊斯基 (I. Kolomoyskyi) 公开资助, 他也在 2014 年春悬赏, 表示抓到说俄语的「破坏者」, 一人一万美元 (Sharkov, 2014, September 10)。

美加的 Vice (2018, May 25) 新闻制作了 22 分钟的「失控: 乌克兰的流氓民兵」, 四年以来累计将近一千万点击; 该片指乌克兰政府声称军队在其控制中, 民兵已经解散。但该刊调查后, 察觉部分民兵仍在战斗, 无意放下武器。两年多之后, 美国《时代周刊》同时推出两万 (英文) 字的调查, 佐以 8 分钟的影音 (Shuster & Perrigo, 2021, January 7,9), 铺陈乌克兰极右派超级种族主义者民兵, 通过运用脸书等手段, 自我激进化也培植新世代。

主要媒介揭露乌克兰极右派及其潜在暴力威胁的报导或评论, 原本已经不多, 俄罗斯入侵之后, 几乎消声匿迹, 甚至不再重要。还在开战前几日, 纽时已经表示, 俄罗斯不断从事不实传播, 不仅内容可能错误, 并且不实传播还包括「所述虽然真实, 但对当前事态, 无关紧要。」(Goldmansour 2022, May 18) 这里, 应该知道的是, 虽有「通俄门」(Russiagate) 一词, 纽时等

美国主流媒体与民主党同声谴责俄罗斯制造不实信息，试图协助川普（D. Trump）当选总统，但除了美国自己查无实证之外，比较可信的反而是乌克兰政府与民主党合作，希望协助希拉里（Hilary Clinton）入主白宫！（Vogel and Stern, 2017）

现在，回到纽时所说，主要传媒先前曾经报导，但现在变成无关紧要的事实是哪些？乌克兰的极右派问题显然是一种，开战三个多月以来，似乎再无该类报导。（Goldmansour 2022, May 18）另一种就是北约问题。早在 30 多年前，纽时刊登美国前苏联大使、也是围堵政策制订者凯南（Kennan, 1997, February 25）的评论，他表示「北约若东扩，将是美国后冷战年代最致命的错误决定」。纽时专作家傅立曼（Friedman, 1998, May 2）来年访谈，再次强调凯南这个观点；今年俄罗斯入侵后，傅立曼三度通过凯南之口，表示『推动北约东扩...「俄罗斯当然会做出不好的反应，然后主张北约扩张的人会说俄罗斯人就是这样」（转引自庄惠嘉编译，2022 年 3 月 14 日）。这是开战之后罕见的再次提及，但大多数时候纽时不再「老调重弹」，而是指控俄罗斯用北约东扩等五种说法，试图正当化其入侵。纽时之外，CNN、《华盛顿邮报》与《新闻周刊》都有这个倾向（转引自 Goldmansour, 2022, May 18）。比较明显的一篇例外，出自《时代周刊》对巴西前总统、年底将再参选的鲁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之专访（Nugent, 2022, May 1；庄惠嘉编译 2022 年 5 月 6 日）。鲁拉批评美国总统拜登「煽动俄乌开战」，但也批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V. Zelensky）。

泽伦斯基在 2019 年以和解俄罗斯，亦即执行德法参与的明斯克协议作为选举要求，3 月以首轮 30% 选票（居次者仅 15%）进入第二轮，再以 73% 选票当选并在 5 月 20 日就任总统。何以泽伦斯基没有履行竞选承诺，致使俄罗斯入侵？

泽伦斯基何以未履行承诺？若非自己无意执行、妥协或改变想法，就是遇到较难或无法克服的原因，以致不能执行。前一种可能，未见披露，也不合常理，虽然无法完全排除。后一种情况，亦即来自右派，以及，可能也存在的国的阻挠。泽伦斯基前一任总统波洛申科（P. Poroshenko），原本就不肯执行明斯克协议，他卸任后很快就发动「反投降」运动，继续反对，即便民

调查显示, 仅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 却有将近 50% 不支持这个要求 (Ishchenko, 2022, p.30)。除了波洛申科倡议反对, 另有亚速营等极右派「展示实力」破坏协议。比如, 早在 2015 年, 群众在国会外游行, 「自由党」人投掷手榴弹炸死 4 位国家守卫, 3 年后仍未被定罪。敖德萨市长特鲁哈诺夫 (G. Trukhanov) 因土地开发洗钱案, 在 2018 年初听证会后, 极端派以枪枝当庭攻击并射伤一位警察, 无人遭收押, 而警方也消极以对 (Likhachev, 2018, p.5)。柯亨教授在 2019 年 10 月受访, 表示「泽伦斯基以和平候选人胜出, 拥有巨大使命要创造和平, 因此他必须与普亭协商。但存在一个主要障碍。乌克兰的法西斯派表示, 假使他继续采取与普亭协商的路线, 他们会杀死泽伦斯基...除非美国支持泽伦斯基与普亭谈判, 否则...泽伦斯基没有商谈结束战争的机会...」美国选择的作法, 在同年底众议院审议军援乌克兰法案时表露无遗, 众议员西夫 (A. Schiff) 赤裸坦白: 「美国必须援助乌克兰...我们可以在那里与俄罗斯作战, 我们不需在这里与俄罗斯作战。」极右派暴力的阴影与肆虐, 以及泽伦斯基政府对付异端的严厉, 在 2021 年更见升高。因为 2014 年在广场事件扮演一角的拜登, 已经就任美国总统。当年有三家挺反对派的电视频道遭关闭; 6 月时, 政府制裁 538 个人与 540 家公司, 美国国务院公开宣称「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恶质影响」。2022 年元月基辅政府关闭第 4 家电视频道, 泽伦斯基支持度跌至 23%, 4 月, 他再关 2 家频道, 接着下令合并所有频道, 仅存单一频道说一种话 (Baldwin, 2022, April 28)。

极右派方面, 至 2021 年 8 月有更夸张的表现: 武装抗议者在总统府外面, 打伤至少 8 位警员, 无人被捕。俄入侵前两周, 纽时报导泽伦斯基即便只是表示要与俄罗斯商谈, 「都会有极大政治风险」, 极右派会「破获并甚至推翻他的政府」。华邮稍候也说, 「基辅反对与说俄语的东区分离主义派协商, 这是关键的障碍。」极右派领导人之一胡迪门科 (Yuri Hudymenko) 威胁泽伦斯基, 「乌克兰政府的任何人若要签署和谈文件, 一百万人就会走上街头, 政府就不会是政府。」泽伦斯基任命的国安局长丹尼洛夫 (Oleksiy Danilov) 也宣布, 「执行明斯克协议, 等于毁灭乌克兰。」(以上转引自 Aaron 2022, April 10; 另见 Mearsheimer et.al. 2022, April 8)

广场事件后，亲欧政府在全国展开肃清，谁遭指为亲俄，乃至不够民族主义，都有遭殃之虞。泽伦斯基执政以后，这些作为持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亲西方的纽约人权组织双双发布报告，谴责乌克兰情治机关酷刑对待政治异端。乌东地区，战争爆发后两周内，已有 2 位乌东地区地方行政首长，以及基辅地区一位镇长，因为与俄罗斯协商和平遇害；对此，泽兰斯基说「与俄罗斯合作的人，将有后果」。在极右派内部副部长格拉先科（A. Herashchenko）放行下，广场事件后开始搜集的「国家敌人」黑名单，其中已有多人遭致暗杀，包括知名记者布里纳（O. Buzina）与反对党议员（O. Kalashnikov）；该网站甚至列入友俄的外国政治人物，包括德国前总理施洛德（G. Schroder）。俄入侵之后，被逮捕的记者与人权工作者...等等名单与「罪名」，已有人搜集并在 4/10 发布（Blumental & Krishnaswamy, 2022, April 17）。

寡头商人、亲俄、女儿以普亭为教父，但反对俄国占领乌克兰领土的梅德韦丘克（V. Medvedchuk）在 2019 年入秋当选国会议员，次年 8 月亚速营以塑钢子弹攻击反对党多人的坐车，2021 年 5 月他被指叛国而软禁（Dickinson, 2021, May 13）。俄入侵之后，「反对派平台 - 为了生活党」（The Opposition Platform for Life）这个最大反对党（在 450 国会席次有 44 席，仅次于执政「公仆党」的 254 席，即便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仍然连同其他 10 个政党，都被指为亲俄而被解散（Sauer 2022, March 20）。一个月后，基辅政府再将该党主席之一的梅德韦丘克投入入狱（DW, 2022, April 14）。

柒、俄罗斯的愚蠢犯行

美国《外交政策》季刊在今年初，曾有专文叙述普亭本来很「爱」西方，想要加入北约，但 2003 年以后，普亭突然转向，原因可能是「他的内圈集团愈来愈封闭孤立，使得他们与现实失去了联系，于是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Braw, 2022, January 19）。这是美方的看法，普廷与俄罗斯的转变，同样或更可能的原因，是乔治亚与北约联合军演增加及 2003 年爆发「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而出现倒向美国政权等事件，但季刊不提。这个关

系与美国提供的民主支持，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有争论（Mitchell, 2009, p.112-26）。

但是，另有一个观点，认为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M. Gorbachev）、叶尔钦（B. Yeltsin），而特别是再到普亭，不是三度，是三任而多届领导人都是「有心向明月」、要以大欧洲让俄罗斯融入（Pozner, 2018），却也落得一次、二次与三次「明月照沟渠」的下场。俄罗斯认定美国引起颜色革命，于是掉头离去；西方（美国）自认是正当的民主支持，责怪俄罗斯自闭。

这个不同的认知，同样展现在苏联解体之后，美欧自认有权东扩北约，但俄罗斯的理解是，这是对其生存威胁的举动。俄罗斯在 2008 年与乔治亚发生战争，已有北约因素。今年俄罗斯同样以这个主要理由，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声称不是入侵乌克兰，是要排除北约结合乌克兰对俄罗斯产生的生存威胁，因此要使乌克兰去军事化与去纳粹化（Putin 2022, February 24）。惟这些理由即便为人接受，无法改变俄罗斯是侵略者的事实，即便俄罗斯是长期遭受挑衅，受挑衅而认定这是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虽然可以理解（understandable），但是，要以入侵排解盛怒或解除危险，却无法让人接受这是正当的（justifiable）反应。开战至今及往后，是会使得美欧军政威胁扩大还是减少，是会减少还是增加乌克兰极右派力量，未必一定如同俄罗斯想要有的方向发展。何况，俄罗斯入侵已经暂时使北约更为「团结」且增加军事预算而美国霸权似乎更为巩固，无一是和平之福。

发动战争已经难以让人认可其正当，更何况自由民主体制的传媒，在重要时刻「制造共识」，效能胜于自由度较低的民主或半专制国家如俄罗斯；此时，发动战争的俄罗斯屡屡遭受挑衅的事实，在反俄共识更为巩固之时，更难见诸天日。赫曼与杭士基的名作说得很清楚，美国媒体允许甚至是鼓励积极的辩论、批评和唱反调，只要这些内容没有超越菁英阶层认同的前提（Herman & Chomsky, 1988 / 沈聿德译，2021，页 315, 366）。

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这就是说，西方舆论不太可能有效传达或是辩论北约东扩是否正当，北约是否多年来持续挑衅而造成危险。最多，只会出现少数的逸轨，并且这些不合常规的超越，除了不会撼动主流的常态叙事，有时也被用以错误地否定赫曼与杭士基等人的论证。主张西方要为克里米亚

被并入俄罗斯，以及西方要为乌克兰被入侵而负责的声音，仍然可以出现在《纽约时报》(Caldwell, 2022, May 31)。多年以来，美国学界抱持前述看法的人不少，其中，最知名者可能是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14; 2022, March 11)，他的讲演放入 YouTube 后，7 年累计点击超过两千万 (Mearsheimer, 2015)。然而，这些挑战共识的少数言论，无法扭转大局。杭士基在今 (2022) 年 4 月有一小的查询，就有发现，即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绝大多数是因为确凿挑衅」而发生，但网络上「没有挑衅就入侵乌克兰」(Unprovoked invasion of Ukraine) 高达 243 万笔，远远多于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没有挑衅就入侵伊拉克」(Unprovoked invasion of Iraq) 的 1.17 万次 (Polychroniou, 2022, April 28)。虽然，真实情况刚好相反，伊拉克根本没有挑衅，遭入侵只是白宫片面宣称伊拉克拥有大量毁灭武器；事后发现没有，但已经造成伊拉克数十万人死亡。

不但俄罗斯因为长期被挑衅而入侵，外界知悉者不多，并且，知悉者当中，可能也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倾向于认定这只是侵略者的借口、未必是俄罗斯真正的判断，从而这些知悉者也就在拒绝其入侵正当性的同时，无法考虑是否应该设身处地理解俄罗斯的立场与看法。西方传媒在入侵之前，仍然报导乌克兰极右派之害，在战争爆发之后，这样的声音大致消声匿迹如前所述，这就显示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即便最后在军事上可以成功，也会让人更难看到美国与北约挑衅的连带责任。入侵是主犯，挑衅者的性质怎么理解，后文就此讨论。

捌、美国没有责任吗？

美国总统拜登从 2022 年 2 月初起，连番密集示警，声称「美情报」显示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至 12 日 (美国时间) 更明确预测〈俄 16 日攻乌〉(张文馨 2022 年 2 月 13 日)。两日后，苏联时期美国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讲演，指「常识」可知，「终止北约东扩」危机就消失，美国却不动声色，致使他怀疑这是一场「被蓄意促成的危机」；他说，「也许我错了，且错得离

谱，但我不能否认我们正目睹一场精心策划的闹剧，被美国舆论的知名人士严重放大，以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Matlock, 2022, February 14)

这个看法让人骇异，美国不承诺北约不东扩，就是要引诱俄罗斯入侵吗？若依本期包亚克情报官的分析，是有可能(见页 139)。但证据不算充足。《经济学人》周刊同样看到美国这次信息战，与过往不同，它称赞拜登的示警手法高明，成效良好，是完美的超前部署。它说，美军在韩战期间研究抵制「洗脑」的方法，心理学家后来撷取其成果并提炼，指出信息也可以成为病毒的形式；因此，如同注射疫苗能够免疫，针对病毒信息预先注入病原体，同样足以让人不受不实信息之害。预知大事即将爆发，若是先行广发大量事实，其后的不实宣传就会较难得逞。去(2021)年 10 月起，白宫开始大肆宣传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12 月再有战情，指出俄罗斯在 2022 年初，将会出兵 17.5 万，又说俄罗斯已有推翻乌克兰政府的方案。《经》高度肯定美国这个作法，认为国防部这次的透明前所未有，「似乎成功了...防止了北约与美国公众被分化、设定了普亭将以何种借口发动攻击，甚至可能推迟了普亭的入侵时程」(Economist, 2022, February 26)。

《经济学人》所描述的事实与马特洛克的观察，基本相同，差异是该刊支持北约东扩而认为战争发生不是美国的责任，马特洛克则反对北约东扩而审慎怀疑美国蓄意制造战争。

另一个可能的理解方式是，假使套用杭士基的用词，俄罗斯固然是有「侵略的犯行」，并且，结果还会「适得其反」，因此也就是「愚蠢」(Polychroniou, 2022, April 7)。那么，美国夹北约的百般挑衅，是不是就是狡猾？犯有煽动或引诱罪责之嫌，至少是「极不道德」地让乌克兰以为进入北约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Meyerson & Cooper, 2022, February 25)，结果却是支付惨痛代价，听任两个大国以第三国、也就是自己作为代理人，在第三国、也就是自己的领土发生战争？若是可以这样看待，那么，即便不能说美国蓄谋制造代理人战争，但假使说美国「乐观其成」、愿意看到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削弱自己的国力，也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何况，后见之明，提供了两个证据支持这个看法。

证据之一，就在眼前。开战至今，美国力挺乌克兰的动向已经支持这个判断。参众两院在 5 月 10 日追加 70 亿、责成白宫另以 400 亿美元投入乌克兰（其中军事援助约 315 亿，人道援助约 85 亿；Economist, 2022, May 14）。这就使得美国在开战「十周」之内，累计已经承诺或送出 540 亿美元至乌克兰，但（一）美国撤离之前二十年，每「一年」投入阿富汗「仅」有 460 亿美元，（二）俄罗斯「一年」的全部军事预算是 690 亿美元（Greenwald, 2022, May 14）。外界理当援助乌克兰，外交斡旋、人道援助及军事支持，需要三管齐下，惟美国毫无外交努力，却以约合美国国务院整年、乌克兰三分之一 GDP 的 540 亿美元，投入军事...等等支持，这个目标不再只是「防卫」乌克兰（Rana, 2022, May 23），是〈华盛顿将与俄罗斯战斗直至最后一位乌克兰人〉，使得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互以乌克兰进行代理人战争的指控，（Bandow, 2022, April 14）显得不是空穴来风。乌俄专家李文（Lieven, 2022, June 6）则注意到，眼见美国有意利用这次冲突摧毁俄罗斯，反对俄罗斯入侵的俄国中间派知识菁英，已经出现变化，他们已在转而支持普亭。

证据之二，前车可鉴。美国主战不求和、甚至阻止和平谈判的事例，不止一桩，但 1970 年代的阿富汗例子，目标正是苏联。

苏联以阿富汗亲苏政府的邀请为名，在 1979 年底入侵阿富汗打击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圣战士」（Mujahideen）反叛军。外界当时不知道的是，在 1978 年，美国已在部署，用意正是试图增加苏联入侵的机率。

美国前国防部长盖兹（Robert M. Gates）在回忆录，最早揭露这段历史。他以将近十页铺陈之后，结论是：「卡特总统与国安顾问布里辛斯基（Z. Brzezinski）几乎在苏联入侵一年之前，就已经看出苏联将要强化他们在阿富汗的角色。他们在九个月之前发动相关工作，在苏联大举入侵前几乎六个月，开始秘密提供资金，一切就为协助阿富汗反叛军。」（Gates, 1996, p.149）过了一年多，得知此事、巴黎发行的周刊《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访问最重要的当事人，也就是布里辛斯基。美国资深记者布鲁姆（William Blum）将这篇访谈英译为〈布里辛斯基：是的，CIA 比俄国更早进入阿富汗〉之后，转告吉布斯（David N. Gibbs）教授。到了 2000 年，吉布斯以书评论

文〈阿富汗：回顾苏联的入侵〉的部分篇幅（Gibbs, 2000, pp.241- 242）予以披露，现编译如后。

布里辛斯基：「正式的历史说法是，苏联在 1979 年底入侵阿富汗之后，CIA 才从 1980 年起援助圣战士。但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卡特总统在 1979 年 7 月 3 日就签署第一道指令，提供秘密援助给首都卡布尔（Kabul）反对亲苏政府的势力。正就在那天，我给总统写了便条，向总统解释，这个援助可以引诱苏联派军介入。」

问：「这样做虽有风险，但你当时主张秘密行动，也许是你想让苏联进入战争，因此就想办法，要逞挑拨之能？」

布里辛斯基：「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推动俄国人的介入，我们只是心知肚明，认为这个作法很有可能增加机会，让他们介入。」

问：「当时，苏联以美国已经秘密介入阿富汗为由，因此他们进入对抗，就有正当性。这个说法彼时无人相信。但现在回顾，是有真实依据。今日再看，你一点都没有悔意吗？」

布里辛斯基：「为什么要有悔意呢？秘密行动，太好了，这个点子产生了效果。『吸引俄罗斯人进入阿富汗陷阱』，你要我为此而萌生悔意吗？苏联人正式进入阿富汗国境当天，我有文字给卡特总统，主要是表示：『现在，我们有机会让苏联也有个越战。』事态确实往这个方向发展，将近十年，莫斯科不得不持续作战，但苏联无法承受得起，这场冲突使苏联最后没了士气，苏维埃帝国最后也就崩溃。」

问：「对于美国曾经支持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尔后这些人又将武器给予后来的恐怖主义者，并且向他们提供咨询，对于这些，你也没有悔意吗？」

布里辛斯基：「放眼世界史，哪一个重要些？是塔利班（Taliban）（译按：的出现）还是苏维埃帝国的崩溃更重要些？一些燥动的穆斯林，还是中欧的解放与冷战的终结？」

问：「一些燥动的穆斯林？」但一直有人不断地说，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

布里辛斯基：「瞎说！有人说，西方有个对付伊斯兰的全球政策。这样认定很愚蠢：根本没有全球的伊斯兰。要以理性态度看待伊斯兰，不能带有蛊惑之心，也不能带有情绪。伊斯兰是世界的主要宗教，有 15 亿信徒。但难道沙特阿拉伯的基本教义派、温和的摩洛哥、好武的巴基斯坦，以及亲西方的埃及，或者中亚的世俗派伊斯兰，能有什么共通性吗？若有，也只不过是如同统合基督教国家的那种相同...。」

布里辛斯基的看法，状似不同于韩廷顿 (S. Huntington)，后者说：「在这个新世界中，最普遍、重要而危险的冲突，不在社会阶级、贫富或其他经济团体的冲突上，而在隶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族群间的冲突。」「回教徒和他们的邻居没有办法和平共存...回教徒比较有暴力倾向。」(黄裕美译，1997，页 7, 351-4)

但是，两人相同之处，是制造敌人，这很可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之一。在布里辛斯基于法国留下前述记录三年之后，众所周知，骇异听闻、非常少数的极端分子，以穆斯林之名实则污蔑穆斯林，引爆「9/11」恐怖攻击，其后美国政府不肯反省，旋即以暴制暴、发动反恐战争。2001 至 2020 年，根据布朗大学的研究，美国以反恐为名，从非洲到亚洲（菲律宾）发动的战争，至少虚耗了美国纳税人在 85 个国家累计投入 8 兆美元，不是建设社会，是让军火商荷包丰厚，以各种战争杀死 92.9 万人（含美军 7050 人），并使 3800 万人流离失所、家园破碎 (Brown University, 2021)。

今 (2022) 年 2 月 24 日爆发的战争，俄罗斯是入侵主犯，美国为首的北约认定俄罗斯威权专制、天生就会犯罪，不惜多方挑衅以制造敌人，难道就没有罪责、甚至是同样或更重的罪责吗？德法为首的其他北约盟国没有欧洲自身的政策，就可将所有责任推向美国吗？乌克兰极右派使 2014 年和平的抗议活动转变为暴力与狙击杀人，致使原本可以同时交往西方与俄罗斯的乌克兰，完全转向西方，先引爆内战，后遭入侵，这些极右派没有责任吗？泽伦斯基是因为被极右派夹持，或者在当选后自主放弃他在 2019 年选总统的和解俄罗斯之承诺，也有未能使战争引信拆除的责任吗？

这些责任归属的澄清、辩论与认定是重要的，不厘清则来日战争再次以不同方式爆发，机会增加。预防、也就是不让战争发生的重要一步，是要厘清真相。当前，死于战争的生灵、流离失所的性命、家园的毁损、人情亲情友情的消逝与苦楚伤痛、生态环境的破坏、地球暖化求其调适与减温的进度可能延迟、低收入人群更难承受的粮食危机，皆已横陈在世人眼前。美国执掌政治权力的人及其支持者，真能因为愿意看到俄罗斯的弱化而「乐观其成」吗？真能为没有以宣布乌克兰不入北约而听任俄罗斯入侵为恶，就会心安理得而无道德亏损吗？

参考书目

- TVBS (2022 年 3 月 6 日)。〈乌民争自由...纪录片【凛冬烈火】上 YT 一天点阅率近 20 万〉, 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o8p5T0fGo>
- 自由时报 (2022 年 4 月 6 日) 〈布查街头尸横遍野 卫星照片打脸俄〉 (编译)。《自由时报》, A3。
- 沈聿德译 (2021)。《制造共识: 媒体政治经济学》。台北: 野人文化。(原书: Herman, E. S.,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Pantheon.)
- 洪毅 (编译) (2022 年 4 月 6 日)。〈俄称屠杀造假 美媒卫星图作证〉。《联合报》。A8 版。
- 张文馨 (2022 年 2 月 13 日)。〈美情资 俄 16 日攻乌〉, 《联合报》, A1。
- 张沛元 (编译) (2022 年 3 月 11 日)。〈不只大内宣 中媒买脸书广告 帮俄洗白〉。《自由时报》, A4。
- 庄惠嘉 (编译) (2022 年 3 月 14)。〈俄乌战火 美国无责?〉。《联合报》, A2。
- 庄惠嘉 (编译) (2022 年 5 月 6)。〈巴西前总统批拜登: 煽动俄乌开战〉。《联合报》, A8。
- 庄惠嘉 (2022 年 3 月 27)。〈奥斯雅尼可娃不当超级英雄 俄新闻制作人 闯直播反战〉。《联合报》, A8。
- 陈成良 (编译) (2022 年 03 月 14)。〈社群「大翻译运动」 掀出中国瞎挺俄自由时报〉。《自由时报》, A4。
- 陈君硕 (2022 年 3 月 14)。〈推特大翻译运动 揭大陆真实舆情〉。《中国时报》, A12。

- 黄裕美译 (1997)。《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 联经。(原著 Huntington, S.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Y: Simon & Schuster)
- 经济日报 (2022 年 4 月 13)。〈德国 俄国营 TV 编辑持标语反战获世界报母公司延揽供稿〉, 《经济日报》, A8。
- 罗方妤 (2021 年 8 月 19 日) 〈流亡总统卷台币 47 亿 甘尼 逃到阿联〉 (编译)。《联合报》, A2。
- Aaron, M. (2022, April 10). Siding with Ukraine's far-right, US sabotaged Zelensky's mandate for peace. From <https://mate.substack.com/p/siding-with-ukraines-far-right-us?s=r>
- Allsop, J. (2022, May 20). *Smears, opacity, and the implosion of a government disinformation board*. https://www.cjr.org/the_media_today/disinformation_governance_board.php
- Amos, H., & Salem, H. (2014, May 2). *Ukraine clashes: dozens dead after Odessa building fir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y/02/ukraine-dead-odessa-building-fire>
- AP (2021, July 19). *Norways July 22, 2011, terror attack: a timeline*, <https://apnews.com/article/europe-norway-bd6c9d2efd6ce2148c3d85cb79d73af9>
- Applebaum, A. (2022, May 8). (last updated) *Holodomor (Great Famine of 1932-33)*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Holodomor>
- Baldwin, N. (2022, April 28). *The real Zelensky: from celebrity populist to unpopular Pinochet-style neoliberal*, <https://thegrayzone.com/2022/04/28/zelensky-celebrity-populist-pinochet-neoliberal/>
- Bandow, D. (2022, April 14). Washington will fight Russia to the last Ukrainian. From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Washington-Will-Fight-Russia-To-The-Last-Ukrainian/>
- Baysha, O. (2022). *Democracy, popu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Ukraine: On the fringes of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Routledge.
- BBC (2014, March 1). *Neo-Nazi threat in new Ukraine*.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Bo0akeDMY>
- BBC (2014, May 3). *Ukraine crisis: Dozens killed in Odessa fire amid clashes*.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7259620>
- BBC (2014, May 6). *How did Odessa's fire happen?* .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7275383>
- BBC (2022, May 16). *Ukraine: The children's camp that became an execution ground*,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61442387>
- BBC (2022, June 2). *Ukraine: The Disinformation War*, From <https://www.bbc.co.uk/programmes/p0cbjrtp>

- BBC (2015, July 23). *The far-right group threatening to overthrow Ukraine's government*.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EKQsnRGv7s>
- Biden, J. (2017). *Promise Me, Dad: A Year of Hope, Hardship, and Purpose*. Flatiron Books
- Black, R. (2022, April 27). *Col. Richard Black: U.S. Leading World to Nuclear War*,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p0TYx_eUI
- Blumental, M., & Krishnaswamy, E. (2022, April 17). “*One less traitor*”: *Zelensky oversees campaign of assassination, kidnapping and torture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From <https://thegrayzone.com/2022/04/17/traitor-zelensky-assassination-kidnapping-arrest-political-opposition/>
- Boyd-Barrett, O. (2016). *Western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Ukraine crisis: A study in conflict propaganda*. Routledge.
- Boyd-Barrett, O. (2019). *RussiaGate and propaganda: Di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Routledge
- Braw, E. (2022, January 19). *When Putin loved NATO*. From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19/putin-russia-ukraine-nato-george-robertson/>
- Brown University (2021). *Cost of war: Iraqi civilians*. From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
- Calamur, K. (2014, February 27). *Crimea: A gift To Ukraine becomes a political flash point*. From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4/02/27/283481587/crimea-a-gift-to-ukraine-becomes-a-political-flash-point>
- Caldwell, C. (2022, May 31). *The War in Ukraine May Be Impossible To Stop. And the U.S. Deserves Much of the Blame*,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31/opinion/us-ukraine-putin-war.html>
(本文兩日後有中文譯版〈烏克蘭戰爭發展至此，美國難辭其咎〉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20602/us-ukraine-putin-war/zh-hant/>)
- Carden, J. (2016, January 14). *Congress has removed a ban on funding Neo-Nazis from its year-end spending bill*. From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politics/congress-has-removed-a-ban-on-funding-neo-nazis-from-its-year-end-spending-bill/>
- Cohen, S. F. (2019). *War with Russia_ From Putin and Ukraine To Trump and Russiagate*. Hot Books.
- Coles, T. J. (2021). *We'll tell you what to think : Wikipedia, propaganda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consensus*. URSA Major.
- Dickinson, P. (2021, May 13). *Putin's key Ukraine ally charged with treason*. From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putins-key-ukraine-ally-charged-with-treason/>
- Dubovyk, Y. (2022, March 14). *Ukrainian leftist criticizes western war drive with Russia: US is using Ukraine as "cannon fodder"*. From

- <https://orinocotribune.com/ukrainian-leftist-criticizes-western-war-drive-with-russia-us-is-using-ukraine-as-cannon-fodder/>
- DW (2015, May 2). *The Odessa file: What happened on May 2, 2014?* From <https://www.dw.com/en/the-odessa-file-what-happened-on-may-2-2014/a-18425200>
- DW(2022, April 14).梅德韦丘克：普亭的乌克兰亲信被捕。
<https://www.dw.com/zh/梅德韦丘克普京的乌克兰亲信被捕/a-61475589>
- DW(n.d.).Ukraine war: How a “fact-checking” website is spreading Russian propaganda.From <https://www.dw.com/en/ukraine-war-how-a-fact-checking-website-is-spreading-russian-propaganda/a-61062940>
- Economist (2022, February 26). Reality against Putin: the administration is countering Russian disinformation, p.34.
- Economist (2022, March 19).Russia: the Zfactor, pp.46-47.
- Economist (2022, May 14). Ukraine: no ports in a storm, pp.48-49.
- Economist (2022, May 21a).Domestic terrorism: sickening theory and lethal practice, pp.32-33.
- Economist (2022, May 21b). The propaganda front: welcome to the Putin show, pp. 54-56.
-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d.). The Maidan protest movement.From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Ukraine/The-Maidan-protest-movement>
- Farthing, L., & Becker, T. (2021). *Coup: A story of violence and resistance in Bolivia*(pp.48-49). Haymarket Books.
- France 24 (2014, May 2). Ukrainian unrest spreads as dozens killed in Odessa. From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40502-dozens-killed-building-fire-ukraine-odessa-clashes-pro-russia-activists>
- Êkel'čik, S. (2020)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Ukra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owers, M., & Lombardo, J. (2022, April 8). Ukraine: A conversation with Scott Ritter, Retrieved 2022, April 18, from <https://popularresistance.org/ukraine-a-conversation-with-scott-ritter/> (119分钟多的访谈，引述自 1:02:04~ 1:06:08.)
- Foxall, A.,& Kessler, O. (2014, March 18). *It's time for a frank conversation about some of the unsavory characters in Kiev*. From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4/03/18/yes-there-are-bad-guys-in-the-ukrainian-government/>
- Friedman, T. L. (1998,May 2). Foreign affairs; now a word from x. *New York Times*. section a, page 15.
- Gates, R. M. (1996). *From the shadows: 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 Gibbs, D. N. (2000).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in retrospec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7(2), 233-242.

- Goldmansour, L. (2022, May 18). Disinformation label serves to marginalize crucial Ukraine facts. From <https://fair.org/HOME/DISINFORMATION-LABEL-SERVES-TO-MARGINALIZE-CRUCIAL-UKRAINE-FACTS/>
- Golinkin, L. (2022, May 12). Meet the head of Biden's new. Disinformation governing board. From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politics/meet-the-head-of-bidens-new-disinformation-governing-board>
- Goodman, A., & Nermeen, S. (2022, April 21). Ukrainian Historian Says Putin's Invasion Is an Imperialist War Akin to U.S. Attack on Iraq, https://www.democracynow.org/2022/4/21/ukrainian_historian_putin_invasion_akin_iraq
- Guardian (2017, September 5) *Ukraine's far-right children's camp: 'I want to bring up a warri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BXmbkwiSw>
- Greenwald, G. (2022, April 21) *Former intelligence officials, citing Russia, say big tech monopoly power is vital to national security*. <https://greenwald.substack.com/p/former-intelligence-officials-citing?r=&s=>
- Greenwald, G. (2022, May 14) *The Bizarre, Unanimous Dem Support for the \$40b War Package to Raytheon and CIA: "For Ukraine"*, <https://greenwald.substack.com/p/the-bizarre-unanimous-dem-support-426?s=r>
- Ha, H. T., & Luong, D. Nguyen an (2022, May 13) *The Russia-Ukraine War: Unpacking Online Pro-Russia Narratives in Vietnam*, <https://fulcrum.sg/the-russia-ukraine-war-unpacking-online-pro-russia-narratives-in-vietnam/>
- Hahn, G. M. (2018) *Ukraine over the edge: Russia, the west and the new cold war*.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 Heuvel, K. V. (2022, May 24) *We need a real debate about the Ukraine war*,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5/24/ukraine-russia-war-biden-strategy-debate/>
- Ishchenko, V. (2016). Far right participation in the Ukrainian Maidan protests: an attempt of systematic estimati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7(4), 453-472.
- Ishchenko, V. (2022) Interview: towards the abyss, *New Left Review*, Jan/Apr, 17-39.
- Katchanovski, I., Zenon E. K., Bohdan Y., N., & Yurkevich, M. (2013).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Ukraine* (2nd ed). The Scarecrow Press .
- Katchanovski, I. (2021) *The Maidan Massacre in Ukraine: Revelations from Trials and Investigation* (November 29, 202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4048494>
- Katchanovski, I. (2020a) "The far right, the Euromaidan, and the Maidan massacre in Ukraine."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23, (1), 5-29.

- Katchanovski, I. (2020b) *The Maidan Massacre in Ukraine: Revelations from Trials and Investigations* (November 14, 2020).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735661>
- Katchanovski, I. (2017). *The Maidan Massacre in Ukraine: Revelations from Trials and Government Investigations*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994347>
- Katchanovski, I. (2016a). The Separatist War in Donbas: A Violent Break-up of Ukraine?,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7(4): 473-489)
- Katchanovski, I. (2016b). The Maidan massacre in Ukraine: a summary of analysis, evidence and findings. *The Return of the Cold War: Ukraine, the West and Russia*. J.L. Black and Michael Johns (Eds.), (pp. 220-224). Routledge,
- Katchanovski, I. (2015). *The 'Snipers' Massacre' on the Maidan in Ukraine* (Last revised: 12 Feb 201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6582453,986>
- Kennan, G. F. (1997, February 5). A Fateful Error, *New York Times*, Section A, page 23.
- Klarenberg, K. (2022, June 13). *Leaked emails expose Paul Mason's collusion with senior British intelligence agent*. From
<https://thegrayzone.com/2022/06/13/paul-masons-collusion-british-intelligence-agent/>
- Kudelia, S. (2018). When Numbers are Not Enough: The Strategic Use of Violence in Ukraine's 2014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50(4), 501-521.
- Kuzio, T. (2012). U.S. support for Ukraine's liber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A study of prolog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45, 51-64.
- Lauria, J. (2022, April 4). Questions abound about bucha massac. From
<https://consortiumnews.com/2022/04/04/questions-abound-about-bucha-massacre/>
- Lauria, J. (2022, June 9). The plot against grayzone & suspicions about consortium news. From
<https://consortiumnews.com/2022/06/09/the-uk-plot-against-grayzone-suspicions-about-consortium-news/>
- Lieven, A. (2022, June 6). Why Russian intellectuals are hardening support for war in Ukraine. From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2/06/06/why-russian-intellectuals-are-hardening-support-for-war-in-ukraine/>
- Likhachev, V. (2018). Far-right extremism as a threat to Ukrainian democracy. From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analytical-brief/2018/far-right-extremism-threat-ukrainian-democracy>

- Liu, Z. (2019). *The Ukraine crisis and media systems: comparison of UK and Russian media coverag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 Matlock, J. F. Jr (2022, February 14). Today's crisis over Ukraine. From <https://usrussiaaccord.org/acura-viewpoint-jack-f-matlock-jr-todays-crisis-over-ukraine/> (笔名「深喉」的人中译在3月1日以〈前美国驻苏大使: 乌克兰危机是美国任性造成 古巴危机美国也秘密同意撤土耳其导弹〉为题, 刊登于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10256139-前美国驻苏大使-乌克兰危机是美国任性造成-古巴>)
- Marcus, J.(2014, February 7). *Ukraine crisis: Transcript of leaked Nuland-Pyatt call*.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079957>
- Mearsheimer, J. J. (2014).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October. *Foreign Policy*.
- Mearsheimer, J. J. (2015) Why is Ukraine the West's fault? Featuring John Mearsheimer.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rMiSQAGOS4&t=291s>
- Mearsheimer, J. J. (2022, March 11) *John Mearsheimer on why the West is princip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Ukrainian crisis*, <https://www.economist.com/by-invitation/2022/03/11/john-mearsheimer-on-why-the-west-is-principally-responsible-for-the-ukrainian-crisis>
- Mearsheimer, J. et.al. (2022, April 8) *John Mearsheimer on War in Ukraine with Katrina vanden Heuvel, Ambassador Jack Matloc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3s7MRJkAI>
- Meyerson, H., & Cooper, R. (2022, February 25) Worse Than a Crime; It's a Blunder, <https://prospect.org/world/worse-than-a-crime-its-a-blunder-russia-ukraine-li-even-interview/>
- Michaels, D. (2022, April 13). The secret of Ukraine's military success: Years of NATO training. *Wall Street Journal*.From <https://www.wsj.com/articles/ukraine-military-success-years-of-nato-training-11649861339>
- Michel, C.(2022, May 11) *The Covert Operation to Back Ukrainian Independence that Haunts the CIA*,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2/05/11/covert-operation-ukrainian-independence-haunts-cia-00029968>
- Mitchell, L. A. (2009). *Uncertain democracy US foreign policy and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Netflix (2022, March 5). 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NxLzFfR5w&t=2904s>
- Nugent, C.(2022). Lula talks to TIME about Ukraine, Bolsonaro, and Brazil's fragile democracy.From <https://time.com/6173232/lula-da-silva-transcript/>
- OHCHR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2014).*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Ukraine*.From

-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untries/UA/HRMMUReport15June2014.pdf>
- Orinoco Tribune(2022, April 5). Staged massacre in bucha. From <https://orinocotribune.com/staged-massacre-in-bucha/>
- Parry, R. (2015, June 12). *When US house saw Ukraine's neo-nazis*. From <https://consortiumnews.com/2015/06/12/u-s-house-admits-nazi-role-in-ukraine/>
- Parry, R. (2014, August 11). *When western media saw Ukraine's Neo-Nazis*. From <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14/08/11/nyt-discovers-ukraines-neo-nazis-war>
- Plokhly, S. (2021). *The frontline: Essays on Ukraine's past and pres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lychroniou, C.J. (2022, April 7). *Chomsky: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Is Blocking Paths to De-escalation in Ukraine*, Truthout, <https://truthout.org/articles/chomsky-us-policy-toward-putin-assures-no-path-to-de-escalation-in-ukraine/>
- Polychroniou, C.J. (2022, April 28). *Noam Chomsky: Propaganda wars are raging as Russia's war on Ukraine Expands*. From <https://truthout.org/articles/noam-chomsky-propaganda-wars-are-raging-as-russias-war-on-ukraine-expands/>
- Popova, M. (2014). *Why the orange revolution was short and peaceful and Euromaidan long and violent*.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1(6), 64-70.
- Pozner, V. (2018). *How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d Vladimir Putin*, 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Yale Univers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X7Ng75e5gQ&t=939s>
- Putin, V. (2022, February 24).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43>
- Rana, A. (2022, May 23). *Left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Heart of Empire*,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left-internationalism-in-the-heart-of-empire
- Sauer, P. (2022, March 20). *Ukraine suspends 11 political parties with links to Russia*,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mar/20/ukraine-suspends-11-political-parties-with-links-to-russia>
- Saul, I. (2022, May 5). *The 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 From <https://www.readtangle.com/disinformation-governance-board-alejandro-mayorkas/>
- Schlosberg, J. (2022, June 1). *Last night, @BBCRadio4 aired a documentary...*, <https://twitter.com/jrschlosberg/status/1531889802001391616>
- Sharkov, D. (2014, September 10). *Ukrainian Nationalist Volunteers Committing 'ISIS-Style' War Crimes*, <https://www.newsweek.com/evidence-war-crimes-committed-ukrainian-nationalist-volunteers-grows-269604>

- Shekhovstov, A.(2011). The Creeping Resurgence of the Ukrainian Radical Right? The Case of the Freedom Party, *Europe-Asia Studies*. 6(2):203-228).
- Shuster, S., & Perrigo, B. (2021,January 9) *Inside A White Supremacist Militia in Ukrai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910FG46C4>
- Shuster, S., & Perrigo, B. (2021,January 7) *Like, Share, Recruit: How a White-Supremacist Militia Uses Facebook to Radicalize and Train New Members*. <https://time.com/5926750/azov-far-right-movement-facebook/>
- Simpson, C. (1988). *Blowback: America's recruitment of Naz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old war*. Weidenfeld & Nicolson.
- Smith, C. M.(2022) .*Ukraine's revolt, Russia's reveng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Stern, D. (2012,December 26). *Svoboda: The rise of Ukraine's ultra-nationalists*.From <https://www.bbc.com/news/magazine-20824693>
- Stoltenberg, J.(2022, May 24).*Davos 2022: Special address by NATO Secretary-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5/special-address-nato-secretary-general-jens-stoltenberg-davos-2022/>
- Stone, O. (2016). 《战火中的乌克兰》(Ukraine on Fire), 中文字幕影片可在日本网站收看, <https://www.nicovideo.jp/watch/sm40211290>
- Stone, O. (2016). (2021,August 20) *Ukraine on Fi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cmNGvaDUS>
- Vice (2018,May 25). *Out of control: Ukraine's rogue militias*.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MXuKB0BoY>
- Vogel, K. P., & Stern, D. (2017). Ukrainian efforts to sabotage Trump backfire.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7/01/ukraine-sabotage-trump-backfire-233446>
- Weir, F. (2018,February 6). *Russia's media scene: not just a state affair*,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Europe/2018/0206/Russia-s-media-scene-not-just-a-state-affair>
- Weir, F. (2019,March 20). *Fake news' in Russia: State censorship elicits an outcry*. From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Europe/2019/0320/Fake-news-in-Russia-State-censorship-elicits-an-outcry>.
- White, E.(2022,March 11). China's tech platforms become propaganda tools in Putin's war. From <https://www.ft.com/content/d460c6f6-ffc7-4d61-9350-bef378fcc5c5>
- Wikipedia (n.d.1). *Stepan Bander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pan_Bandera
- Wikipedia (n.d.2). *Revolution of dignity*.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volution_of_Dignity
- Wikipedia (n.d.3). *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nter_on_Fire:_Ukraine%27s_Fight_for_Freedom.
- Wikipedia (n.d.4). *2014 Odessa clashes*.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4_Odessa_clashes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评析《运动—批判社会学的视野》

陈子轩*

書 名：运动—批判社会学的视野
作 者：Richard Giulianotti 着 刘昌德 译
出版日期：2016 年英文二版，2021 年 8 月中文译版
出 版 社：五南

本文引用格式

陈子轩 (2022)。〈评析《运动—批判社会学的视野》〉，《传播、文化与政治》，15:203-206。

投稿日期：2022 年 1 月 7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2 月 20 日。

* 作者陈子轩为体育大学体育研究所教授，e-mail: tzuhsuanchen@gmail.com

在《运动—批判社会学的视野》(Sport- A Critical Sociology) 这本运动

社会学教科 / 入门书中, Richard Giulianotti 采取在前三章中, 先建立起母学科古典社会学的大架构, 再引入「运动」与社会学的连结方式。本书架构上以理论与议题交错, 此为较大胆的写作方式, 一般运动社会学教科书中较常见的, 乃以社会议题中的单一面向为轴, 次序开展。例如, 由 12 位台湾学者共同撰写、黄东治主编(2021)的《运动社会学概论》就涵盖了包括全球化、政治、国族主义、媒体等议题为轴; 国内也有译着、由 Maguire, Jarvie, Mansfield 与 Bradley 所著之《运动世界的社会学》(黄东治、邱金松译, 2008)亦是以议题为轴, 再导入相关社会学理论或相关研究。近年在北美影响最巨、由 Jay Coakley(2021)所著的 *Sports in Society: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一书, 已经历 13 版的更新, 也是以社会化、儿童、偏差行为、种族等议题为轴, 再导入相关理论的爬梳与对话。以议题为轴, 多少将运动社会学这个社会学与体育学交错的次学门视为应用领域, 让对于运动实务场域有兴趣的读者, 有较容易的切入点。

因此, Giulianotti 书中, 虽说以理论或学派为章节, 仍不乏相对应的主要议题, 但本书中却有理论与议题为章节标题的混见状况, 前三章以古典社会学理论为主轴, 介绍功能论、诠释性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 在各章节篇幅有限的情况下, 对于初接触运动/社会学理论的读者与学生而言, 并不容易直接上手(对照之下, Jay Coakley 甚至在该书尾声「运动的未来」一章中才「提及」马克思), 尤其对于来自非社会学相关领域的读者, 在阅读本书的前面数章时, 可以想见会有一些的进入障碍, 因此, 本书或较适合已对社会学理论有初步认识、并进一步想将相关理论应用在运动场域的读者。

理论与议题两种不同的主轴, 正是运动社会学作为两种母学门交会处, 选择不同切入点后难以回避的矛盾。但在 Giulianotti 本书的书写中, 又在两个轴线间游移, 时以学者、理论为章节分野(1-4 章、9-10 章), 时又以议题为章节(5-8、11-12 章), 究竟该坚持单一流派理论的统整、或是援引不同学者分析相同现象以进行对话? 这时矛盾就容易出现了。在第 9 章中, 特别将 Norbert Elias 的型态社会学独立出来, 第 10 章则聚焦在 Pierre Bourdieu 的论述上, 两者无疑都在运动社会学长流中有其关键影响力与重要性, 或可解读为在某些议题与论点上, 这些学者已然奠定一家之言, 成为该议题必然

参照的典范，但是某些议题上，可能就欠缺了多元并陈的碰撞，例如在运动与文明进程中，Elias 的观点与 Allen Guttmann(1978)的 From Ritual to Record 若能并置，或可激发出不同史观的论辩，或是在第 10 章中，加入更多关于 Thorstein Veblen ([1899]2001)以降有闲阶级的形成，或是阶序与社会化等等论点，或可给予读者不同的视角。

除了架构上在理论与议题之间的取舍挣扎之外，本书立论扎实，论述精辟，案例合宜，无疑是目前台湾运动社会学中重要的教科/入门书。不过，与许多教科书采取较为中立、「平衡报导」的摘要式写作不同，Giulianotti 在书中不吝宣称其立场，他的批判不仅针对运动场上需要针砭的议题，更指向近年来在北美运动研究社群兴起的身体文化研究（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简称 PCS，见第 4 章），对于该流派所倡议内视的「身体」视角转向并不以为然，也认为 PCS 过于虚无飘渺，如此大力抨击，也显见运动社会学与 PCS 两派的争辩，十多年来依旧持续着(陈子轩，2012)。

自林文兰(2009)评论当时台湾运动社会学教科书以来，十年间全球乃至于台湾的运动场域持续发生重大的变化，作为教科书，不论理论、议题或是案例总有缓不济急的感慨，本书译作的出版，可说是台湾运动社会学领域教科书的及时雨。

然而，既为译作，在以英美为主流观点的运动社会学教科书中，各自的举例或是聚焦的议题，必然随着各文化脉络而有所不同，这也形成文化与理论转译的必然阙漏。诚如译者在其序中所昭示的一般，「台湾之光」、「国球」等等名词所体现的国族主义意涵，正是台湾运动底蕴中最重要的基调，在此书中却未见独立章节讨论，至为可惜。美国运动社会学界，因其独特的国际政经情势与运动历史脉络，国族主义已是其数十年以来难以校正回归的盲点（Coakley 书中同样欠缺国族主义的章节），但过往在英、澳、纽、加等同为英语系知识输出国的运动社会学论述中，通常并不会缺席的国族主义，Giulianotti 却在本书中易外地忽略了。

除了国族之外，媒体也是本教科书中令人意外的缺席。媒体自无线/有线/卫星的线性电视年代，进入诡谲多变与多向流动的串流/OTT 时代，产制端中不断膨胀的转播权利金，内容端的丰富多元，以及阅听人端无所不在的媒

介化运动感知经验，再再都成为运动的时代精神，本书中未从媒体层面切入运动，至为可惜。尽管可以理解，一本教科书无法穷尽运动世界的所有面向，但国族与媒体，这两项影响台湾运动发展甚巨的面向的缺席，是无法忽略的憾事。但以译者在其译序中所述，翻译本书的动念正是多年来本书做为其课堂使用参考，因此吾人反倒可以理解，毕竟此二面向正是刘昌德长年关注与着墨甚深的议题，因此，如同译者的授课策略一般，适时地加入国族与媒体的本土议题与观点，当是使用本书时所需的补遗。

同时，本书做为台湾运动社会学入门书籍，刘昌德的译注可谓居功厥伟，翻译的质量为相关领域教科书中的佼佼者，除了原著中的理论翻译中规中矩之外，一些并不好翻译的俚语与运动术语都能精准地传达，甚至配合到运动台湾近年流行的语汇，无疑为本书再增添阅读与参考的价值。

参考书目

- 林文兰 (2009)。〈不「运动」的社会学？评三本运动社会学教科书〉，《台湾社会学刊》，42: 227-239。
- 陈子轩 (2012)。〈迈向批判运动社会学 / 身体文化研究〉，《体育学报》，45(4), 267-278。
- 黄东治、邱金松译 (2008)。《运动世界的社会学》。台北：学富。（原书 Maguire, J., Jarvie, G., Mansfield, L. & Bradley, J. [2002], *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 黄东治等 (2021)。《运动社会学概论》。台中：华格那。
- Coakley, J. (2021). *Sports in Society: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13 ed.): McGraw Hill.
- Guttmann, A. (1978). *From ritual to record :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Veblen, T. ([1899]2001).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2001 Modern Library ed.). New York, NY: Modern Library.

订 阅

零售：每期新台币 500 元

个人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账号 50313103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ling Hu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Research Articles in general

- *New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ase of PTS+ in Taiwan*
- *A Swing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Paradigm: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 *Gender Cultural Spaces, Documentary Film and Publicity:
The Comfort Women Museum and Cultural Products*
- *Southeast Asian Ethnic Landscape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

Research Notes

- *A Dialogue Between Theory of Mediatiz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Taking the Mediatiza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s Research Field*

Past and Present

- *Jacques Baud: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Ukraine*
- *Disinformation, Euromaidan, War-and-Accountability:
Understanding Ukraine*

Book Review

- *The review of Sport :
A critical sociology*